

河海大学出版社

瞿秋白评传

叶楠著



QUQIUBAI PINGZHUAN

瞿秋白评传

叶楠 著

河海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吴劭文

封面设计 叶 栋

瞿秋白评传

叶楠著

出版：河海大学出版社（南京市西康路1号）

发行：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刷：南京人民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 字数：180千字

版次：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800册

ISBN 7-5630-0201-4/D·11 定价：3.40元

前 言

翻开《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透过一行行文字，看到多少党的优秀领导人，多少为党为国捐躯的党的英雄儿女。他们似灿烂群星，照亮了党的历史，照亮了人们的心。无疑，瞿秋白是其中一颗明亮的巨星。他作为杰出的党的政治活动家，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党的早期历史与他的名字不可分。如果说，陈独秀、李大钊是党的创始人、第一代领袖，那么，秋白则是他们的得力助手，同样是党在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他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开创性的贡献。此后，陈独秀犯了右倾错误，李大钊于1927年4月28日殉难，革命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这时外表文弱内里坚强的秋白，毅然挑起历史的重任，断然纠正刚愎自用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在血泊中领导全党举起武装起义的大旗，进行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正是有这个起点，才有秋收起义、井冈山道路。秋白关于武装斗争的理论、土地革命的思想、农民运动的见解、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主张，都是有代表性、开拓性的，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都带有方向性指导意义的。如果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发展时期的领袖是毛泽东，那么，秋白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时期的领袖。他起到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

为何在大革命向土地革命转折时公推秋白当领袖呢？尤其是，陈独秀退出中央后，当时政治局常委为李立三、周恩来、李维汉、张国焘、张太雷。何以秋白一跃而成党的最高领导呢？那时，他虽不是常委，主要从事理论工作，但党内路线斗争他

并不文弱。“五大”以来，他旗帜鲜明地反对陈独秀、彭述之的右倾路线，为全党同志所崇敬。当革命受到挫折时，他拖着羸弱躯体，挺身而出，为应变出谋献策，得到常委的信赖。李维汉回忆，当时许多工作找秋白商量，他实际上参加了中央常委的领导工作。7月21日补秋白为常委后，他临危不乱，才思敏捷，雷厉风行地主持筹备“八七”会议，儒雅中有尖利，沉静中有高昂，优柔中有刚强。诚然，此次会上选28岁的秋白主持中央领导工作，这跟共产国际不无关系。秋白第一次赴苏，参加了共产国际“三大”、“四大”，两次会见列宁，第二次赴苏，参加了共产国际“六大”，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忠诚的战士。他翻译过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既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的译员，也是其参谋。来接替鲍罗廷的罗明纳滋也很看重秋白的才华。但是，去过苏联，担任共产国际代表翻译的岂止秋白一人，为什么他成为接替陈独秀的最佳人选呢？这还得从秋白本身的素质来考虑。他外表柔弱，却生性倔强；他脸色似乎苍白，可思想深邃；他架着一副深度近视金边眼镜，镜片下射出的却是锐利而远大的目光；他看似温文尔雅，却英勇坚定。他是文人政治家。在党的早期阶段，他在系统研究马列主义、正确地回答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方面，可称得上出类拔萃。从党的“三大”到“五大”，他都在中央担任宣传和理论方面的负责工作，可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党内有普遍的威信。特别是如他自己所言“反对陈独秀，可是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历史偏偏选择他做“王者之师”。

时流岁转，党由年轻而成为成熟的党。秋白身前身后几经沉浮，最终仍然确立他作为我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历史地位。为何他在人世间只活了36个春秋，而他作为党的早期领袖

之一的形象，洒脱、持重、俊美……活在人们心里，并且世世代代的活下去。这是因为他是卓越的革命家，也是普通知识分子的代表。在他出生前五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订立屈辱的《马关条约》，旧中国进一步半封建半殖民地化。在这内忧外患相煎熬的岁月里，多少先进知识分子振臂而起。谭嗣同等杀身成仁，孙中山高举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义旗。受到这些爱国主义的熏陶，秋白少年时就发出愤怒的呼喊：“非把清朝皇帝推翻不可！”青年秋白苦苦探求救国救民之路，经历“五四”运动，他思想觉醒了，由出世而“入世”。赴苏俄，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在列宁的故乡他由革命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者。他的道路是革命知识分子共同走的必然之路，具有普遍规律性。当他献身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后，跟李大钊等一起，积极促成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可贵的是，他不仅以过人的智慧推动胜利北伐，并且以出众的才华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事关革命方向的大问题。国共合作，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究竟是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当时陈独秀等认为应发展资本主义。（至今，台湾的姜新立在他所著《瞿秋白的悲剧·绪言》中还说：“理应争取的是资本主义道路”。）秋白则明确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且，依据列宁《两个策略》的思想和中国国情，从理论上阐述其间要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他认为旧中国是“宗法社会”，实行的是“封建制度”，它是列强共管的“国际殖民地”，因此，必须在“工人阶级（共产党）领导”下，引导民众“解放中国于帝国主义统治之下，推翻封建剥削”。其“胜利的前途，不能不超越资产阶级性的范围，而过度于非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就超越一般知识分子的思想高度，显示出他确实是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出色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

这还因为他是使人感到亲切的“文人”政治家。秋白24岁进入中央领导层，28岁成为党的最高领导，神采奕奕，叱咤风云。以一介“书生”，运筹全局，指挥一个又一个震撼中华大地的暴动。他不同于比其早八年牺牲的李大钊，不同于跟他同时就义的方志敏，也不同于在他之后成为党的领袖的毛泽东。他有政治活动家的素质，又有“文人”才气，当他跌入低谷，被开除出政治局，内受“左”的不断打击，外遭国民党反动派疯狂追捕，更显出他文采风流，潇洒人生。被捕初写的假口供被敌人发现后，他笑答这“算我是做了一篇小说”，浪漫得可以。在“左”的迫害下，在敌人的屠刀面前，他又表现出政治家的坚贞。这位“文人”政治家的一生短暂，跌宕起伏，道路曲折，带着悲壮传奇的色彩。人们更感到他可敬又可亲。

这又因为他是遭遇坎坷的优秀普通党员，也是具有传统美德的人。他是不屈不挠的战斗者。跟军阀、帝国主义斗，他站在“五卅”反帝大罢工斗争的前沿；跟旧文化、旧思想斗，他尖锐地批判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哲学，批判梁启超、张君勱等的唯心论。他的这种斗争精神鼓舞我们向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思想冲锋陷阵。他对“人权论”、对“自由人”的“文艺自由论”的批判，是我们反和平演变、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战斗的重要思想武器。在他将告别人世时，曾感到“十二分疲劳”，就在这种“十二分疲劳”状况下，他还在锋利地解剖自己的“脆弱”灵魂。这种思想上不疲倦的战斗，对我们思想革命化有重要意义。他胸怀坦诚，不文过饰非。他说：“独秀虽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有的错误甚至是严重的，但一些重大问题是经过集体讨论的，我也有责任。”对他自己在短期内犯的盲动主义错误，他自觉纠正，主动一而再，再而三地深刻检查。甚而说“立三路线是我的许多错误观念”“的逻辑的发展”。这种勇于承担过错的责任，正表现了他具

有党的领袖的重要品德。他那样大胆地挖掘自己深层意识，诸如潜伏的绅士意识、早期的佛教影响、“文人”积习等等，更反映了他纯真的党性。无私才能无畏。秋白是受到文化传统陶冶的新文化运动的第二代人。他为人和气、富有同情心，正直、疾恶如仇，“憎恶贪污、卑鄙……以至一切恶浊的社会现象”。他超脱，追求个性，忠于友谊，忠于爱情。他与鲁迅披肝沥胆的友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传为佳话。他也是有七情六欲的人，在绝灭的前夜，他留恋着一直依傍的唯一的亲人杨之华，留恋着他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然而，他又是共产党人，为了党的事业、人民的前程，命毕汀州，申江梦断。秋白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少年时经历的愁苦，青年时的磨难，中年时的逆境，自然形成他个性中有某种抑郁成份。但是，坚强的党性约束着他，他从不向人吐露心中的苦闷、委屈，即使对自己的妻子也是如此。于是，我们看到：在秋天晨霜的辉映下，清瘦的秋白凝视着远方，目光是那样执着，又似乎有些忧郁……

写下这些，作为曾试图多侧面评述秋白的一种补白吧。最后，本书能问世跟本院及兄弟院校刊物支持分不开，^①特此致谢。

南京教育学院叶楠写于1989年秋

^①如第1章部分内容曾在南京教育学院院刊发表：第6期（1985年7月出版）题为《秋白的咏菊诗与咏梅诗》；第32期（1989年6月出版）题为《瞿秋白的狱中词〈卜算子〉》。再如第9章先后在下列报刊发表：本院院刊第9期（1986年1月出版）题为《瞿秋白——从小学教师到杰出的教育家》；常州教育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题为《〈多余的话〉断想》；丽水师专学报（1984年第2期）题为《为〈多余的话〉说几句话》。



△作者采访秋白爱人妹妹杨子英。

▽作者与秋白女儿瞿独伊交谈。（陈路摄）



目 录

- 一、平凡而伟大的心胸
——从秋白绝笔诗到咏菊诗探微…………… (1)
- 二、社会的心灵 坦荡的心史
——秋白两部散文集个性特色…………… (24)
- 三、高尚的情操 纯洁的爱情
——秋白的精神文明观和审美观…………… (55)
- 四、秋白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贡献
——兼议其在党史上的地位…………… (88)
- 五、秋白文艺思想纵横谈
——与鲁迅、毛泽东文艺思想比较 …… (122)
- 六、秋白对语言理论的奉献
——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开拓 …… (139)
- 七、秋白在“左联”时的文学活动
——中国普罗文学运动的先驱 …… (155)
- 八、棘天荆地两代人友谊的“结晶”
——兼论秋白与鲁迅杂文的同异 …… (180)
- 九、最后的斗争 悲壮的一幕
——《多余的话》断想 …… (223)
- 后记 …… (244)

一、平凡而伟大的心胸

——从秋白绝笔诗到咏菊诗探微

1921年7月，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只游船上，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自此，许许多多的中国共产党人就为全中国劳动人民的解放和幸福，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繁荣、昌盛、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花朵，是无数党的先烈用鲜血浇灌出来的。

1935年6月9日晨，天色晦暝。国民党反动派的刽子手枪杀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土地部部长胡海同志。

6月18日，更是阴沉沉的天。国民党36师匪兵遵照蒋介石的密令^①，举枪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射击。罗汉岭回荡着凄厉的枪声，一代英豪秋白血染中华大地。这年夏秋之交，国民党匪徒在南昌城北下沙窝^②枪杀了红军将领方志敏。就义前，这位与秋白同年生，同年牺牲的伟大共产主义战士曾写道：“我流血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朵。”^③说来也怪，后人去赣水之滨的下沙窝、罗汉岭下的草坪，都见着一簇一簇映山红，好似一片片火红的朝霞。这使人联想到秋白在告别这世界时，也以花作喻：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

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花如故。^④

①1935年6月2日，蒋介石给蒋鼎文密令。龙溪绥署蒋主任：寒已法电悉。成密。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中正。冬行息字印。

②1935年8月6日，方志敏殉难于下沙窝。（《方志敏传》P 280—281，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最近发现尚有脚镣的方志敏遗骨亦在此，从而，排除其他就难地点的说法。

③方志敏《可爱的中国》

④瞿秋白《卜算子·咏梅》

面对死亡，秋白作诗表明的坚定信念，委婉含蓄。方志敏则是直抒胸臆，气壮山河：“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①比秋白早四年牺牲，同是江苏常州籍共产党人恽代英，死时跟秋白、方志敏一样，~~都~~都年方36岁。他的“狱中诗”则是慷慨激昂，豪情满怀：“已拚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②他们的共性是都表现了共产党人对革命坚贞不渝的精神。却又各有个性：方志敏的诗文壮怀激烈；恽代英的诗句气势豪迈；秋白的词调坦荡洒脱。

然而，对秋白的绝笔诗，相当长的时期有种种不同看法。或认为它“空寂”^③，以为其调“凄婉”^④，或说它是“捏造”的^⑤，也有明确考证“确为瞿秋白所作”。^⑥对秋白的其他狱中诗，以至他的整个诗歌创作评价也都有分歧意见。那么，如何通过秋白的狱中诗以及其他诗词，来看秋白坚定的信念、崇高的品德、复杂

①方志敏《死：——共产主义殉道者的记述》

②恽代英，1931年4月19日在南京江东门中央军监操场上遭枪杀。这首诗的前两句为，“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

③笔者谈秋白的绝笔诗是指《偶成》，司马璐则把《浣溪沙》也作为绝笔诗之一（见其《瞿秋白传》P 105，1962年10月香港初版）。姜新立亦持此说，“一首调寄浣溪沙，刻划出这个悲剧人物的最后心境。”“充满着萧杀、悲凄、空寂和幻灭。”（见其所著《瞿秋白的悲剧》P 1—2，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出版。）

④有的知名学者也讲秋白在狱中的诗词，“流露了淡淡的孤独感和低沉、凄婉的情绪。”（见《文学评论丛刊》第11辑）

⑤1950年7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戚克家《关于瞿秋白同志的“死”》及文前编者按，讲秋白的绝笔诗《偶成》“是敌人埋伏的暗箭”，是“国民党反动派曾在报纸上故意发表经过篡改过的或捏造的‘遗作’”。

⑥《浣溪沙》是秋白写给国民党36师军医陈炎冰的，手迹尚存。当时《福建民报》记者李克长和天津《大公报》记者都提到《偶成》等诗为秋白作，国民党36师师长宋希濂等亦有佐证，（见《革命史资料》1981年第2期，文史出版社。）此周红兴、陈铁健均有考证。

而美好的心灵呢？秋白的诗作又有哪些独特的创作个性呢？让我们先看看秋白在世时的最后一夜与半个白天的真实生活情景吧。

（一）最后一天与绝笔诗

毛泽东同志曾说：“王明路线把好多好同志都断送了。”1935年，壮烈牺牲在战场的有：贺昌（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阮啸仙（中共赣南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毛泽覃（毛泽东的弟弟、红军军长）、古柏（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何叔衡（苏维埃政府最高法院院长）……直接死于王明路线顽固推行者手中的有罗英等。在刑场上英勇就义的有：抗日先遣队21师师长胡天桃、先遣队保卫局局长周群……6月7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娄梦侠被枪毙。6月9日晨，中共兴国县委书记谢名仁又被枪毙。9天后，1935年6月18日，这是秋白生命的最后半天。清晨，长汀国民党36师师部的囚室^①静悄悄的。秋白一大早就起来了，他在昨晚就已知道蒋介石处决自己的密令^②。心里反而格外平静，仿佛一切都解脱了，凝望着囚室花窗外的石榴树^③，回味在世最后一夜的梦境：漫步山间小径，夕阳明灭，黄叶纷飞，恰似仙境。忽而触发灵感，他急忙翻阅唐诗集，见韦应

^①蒋匪36师师部在福建长汀县长汀中学里，秋白的囚室亦在此。囚室是木结构房间，约10平方米。汤淑敏等曾实地观察过。在这小小的与世隔绝的天地里，秋白度过生命最后一段时间。

^②宋希濂回忆：1935年6月17日，我先后接到蒋介石和蒋鼎文均为“限即刻到”的电令，“着将瞿秋白就地处决具报”。17日晚，他的参谋长向贤矩奉其命至囚室，向秋白暗示蒋介石处决密令。

^③秋白囚室外有—步宽的狭长天井，前边有一小门，通向20多平方米的小院，这是秋白放风的地方，院子的东北角有一棵石榴树。1985年，我的同学汤淑敏，也是秋白研究者，她实地考察时，县博物馆同志说，这棵树当年秋白在时就有了。

物、郎士元诗，又看到杜甫的《宿府》，遂集句得《偶成》一首。时间已是按分秒计了，他伏案挥笔写绝笔诗。这时，36师特务连连长廖祥光走进囚室，向秋白出示枪决令。秋白一面镇静而诙谐地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一面飞笔把诗写完，并加上一段跋语。而后坦然出囚室。秋白绝笔如下：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七晚，梦行山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

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方欲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

秋白绝笔

说秋白绝笔诗为国民党御用文人捏造，这陈铁健等同志均有考证反驳。这里要补充的是，绝笔中提到的“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乃秋白狱中所写《卜算子》中的词句，此词是写给狱中为他看病的军医陈炎冰的^①。笔者见过手迹复印件。白色的宣纸上，有着秋白清秀的黑字落款：“录呈 炎冰先生雅正 瞿秋白。”当时《闽西日报》记者李克长^②曾访问过秋白，秋白赠《浣溪沙》等诗三首给他。少校军医陈炎冰的部属上尉军医陈志刚

^①陈炎冰，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北伐。后脱党。当时他是国民党36师军医处少校军医，曾留日。狱中主要由他为秋白看病，来往治病中秋白向他宣传革命理想，讲曲折低潮时要预见光明，特送他一张照片，书赠诗三首，写在一尺宽、一尺七寸长的宣纸上。受秋白的启迪，不久，他脱离了36师，倾向进步。解放后，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盐城医院内科主任，卫校教务主任，广州医学院教授。

^②李克长，记者，1935年6月4日到长汀狱中访问秋白，写成《瞿秋白访问记》，1935年7月8日发表，载《国闻周报》第12卷第26期，文中讲到秋白赠他《卜算子》等三首词。他又有《未正法前瞿秋白访问记》，刊于1935年7月3日至17日《福建民报》上。

也给秋白看过病，现为盐城市政协委员，纪白曾专程去访，他也谈到秋白曾写过集唐诗。没有图章，就在洋蜡烛上刻一个“白”字盖上。这也可作佐证。

秋白绝笔是否“凄婉”呢？这后文将详论。此处首先要驳斥的是，恶意攻击秋白的绝笔是“绝望的哀鸣”、“是背叛革命的自白诗”，诬蔑秋白是“共产主义的叛徒”。

俗话说，听其言，更要观其行。秋白的绝笔下一节再评说，先瞧瞧秋白从容就义的潇洒英姿吧。6月17日晚，勤务兵给秋白送来一大盘菜，还上了酒。接着听到狭长天井里传来的军用皮靴“咯噔”、“咯噔”声，这是国民党36师参谋长向贤矩特有的脚步声。敏感的秋白情知有异，才饮一口酒，向贤矩已到了“一丈见方”^①的秋白囚室。不等向贤矩开口，秋白坦然发问：“怎么，要送我上路？”向贤矩板着脸答道：“是的。”而后又屈身向前说道：“瞿先生最后应再三斟酌，如能回心转意，尚可望‘蒋公’收回成命。”秋白镇静沉着地听着，泰然自若，又饮了一口酒后，铿锵有力地答道：“我早等着这一天了！这样做，才符合蒋介石其人的作为！”向贤矩观察良久，见秋白之志终不可改，遂向师长回复瞿秋白毫无回心之意。后来，宋希濂回忆，秋白知最高当局枪决令时，“面色一点没有变化，若无其事”^②。此时，秋白稍有松动，就“可望‘蒋公’收回成命”，秋白终不为诱降所动，他怎会写下“背叛革命的自白诗”呢？6月17日这一夜，“是在绝灭的前夜”，秋白一人在这小小的囚室，空荡荡的囚室，书桌上还放着唐诗^③的囚室，

①1956年4月2日，宋希濂写的材料云：“瞿秋白住的房间约有一丈见方”，“室内有一张中国式的木床，一张书桌，二三条板凳，一个洗脸架。”宋希濂，湖南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他读过秋白著作，敬仰秋白学识、为人。对秋白看守从严，生活从优。

②宋希濂《瞿秋白烈士被捕和就义经过》，《革命史资料（2）》。

③军医陈炎冰在狱中给秋白看病时，把唐诗带给秋白。

感到自己无愧于党，无愧于人生，无愧于“秋之白华”^①，无愧于“赤爱”的“结晶”^②。他舒展地活动四肢，感到从未有的解脱。他要了些安眠药吃，睡得很香，还做了个梦。胆小乞生，写下“绝望哀鸣”的人，能在死神即将降临的前夜睡得这样安详吗？

再看秋白写好绝笔后，那生命最后两个多小时，所表现出的大义凛然的神态。6月18日上午，国民党36师师部内外，卫兵林立，一片肃杀之气。^③秋白写罢绝笔，坦然正其衣履，昂首出囚室。9时许，36师还搞了什么军法开庭宣判^④，秋白身着中式黑色对襟衫，下身穿白布抵膝短裤，黑线袜，黑布鞋，一身透露出庄重肃穆的浩然正气，他那威严、鄙视的眼光，穿过镜片直射伪审判长吴松涛身上，吴松涛似乎一下子变矮小了。而后，秋白从容向外走去^⑤，到中山公园凉亭前，他背着双手，神情恬淡，留下生前最后一张全身照。接着，他见亭中“菲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乃言曰：‘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我们

①秋白曾把自己与杨之华的名字嵌合为“秋之白华”，并巧妙地刻在一个图章上。

②瞿独伊告诉笔者，1929年3月15日，秋白给杨之华信中有题赠女儿小独伊的诗，诗中称瞿独伊为“赤爱的新的结晶”。

③1935年6月15、16、17日，蒋介石等连续电催36师即刻执行蒋对秋白的密令：“就地枪决”。宋希濂回忆，1935年6月17日晚，向贤矩向其报告瞿秋白毫无转意之心后，“当天晚上我和向贤矩及政训处蒋先启、特务连长余冰研究了执行这个命令的具体措施。商定6月18日上午10时……枪决，在司令部通往中山公园的路上及中山公园的周围，均由警卫连严密警戒，禁止老百姓观看”。

④高春霖《我所知道的瞿秋白烈士就义前后》：“伪师部于同年6月18日上午开庭宣判，由审判长吴淞涛和我两人出席。”见《革命史资料》第2辑，文史出版社。

⑤宋希濂回忆：九时许，秋白先生“仰面向我们这些人看了一下，神态自若，缓步从容地走出大门”。

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①。人世间的最后一餐，边吃边饮，仪态从容，发出“绝望的哀鸣”的人能这样么？

酒毕，秋白徐步赴刑场^②，前后均有卫兵押行。特务连夹道戒严，秋白面不改色，手持香烟，顾盼自如，洒然行进。沿途用俄语唱《国际歌》，唱《红军歌》。^③过西门街道口时，秋白忽见一衣服破烂瞎眼乞丐，蹒跚而行，秋白在被押行进中不由回首投去同情的目光^④。走到罗汉岭下一片草坪时，凶相毕露的“监斩官”得意洋洋地说：“杀尽了共产党，‘革命’便可成功了。”秋白满怀豪情地反驳：“共产党人是杀不尽的。没有共产党，革命是不会成功的！”^⑤秋白从切身经历看到中国共产党是经过火与血洗礼的坚强的党，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他虽然对王明等把持的中央怀疑、不满，但他的共产主义信念坚定不移，对马列主义深信不移。革命受到挫折，王明得势他并不悲观。他机智地预见到经历曲折、失败后，必然出现曙光^⑥，党内正确路线必将战胜错误路线，这

①引自“平写于（6月）18日午刻的汀州通讯《瞿秋白毕命纪》”。（见1935年7月5日天津《大公报》第4版）

②周永祥《瞿秋白年谱》P124：“中山公园至刑场约两华里。”陈铁健同志1979年夏去长汀，两次由中山公园凉亭遗址步行至罗汉岭下瞿秋白就义地。边行边记时间，“中速行走，约需二十分钟”。

③1935年7月5日上海《申报》长汀通讯《瞿秋白伏法记》，瞿秋白“唱俄文国际歌及红军歌各一阙……缓步赴刑场，手持烟卷，态度镇静”。又，国民党36师政训处长蒋先启，原是留俄学生，他当时监刑，清楚地听到秋白唱的“英特纳雄奈尔……英特纳雄奈尔”的歌声。

④1935年7月5日天津《大公报》：瞿秋白由“前后卫士护送，空气极为肃穆。经过街衢之口，见一瞎眼乞丐，回首一顾，似有所感也。”

⑤杨之华《回忆秋白》P167。

⑥1935年7月5日上海《申报》报导：“记者曾往访二次，……六月十五日，瞿至新生活俱乐部阅报，卫士紧侍其侧，翻阅报章甚忙。”按：据王观泉同志推算，6月14日是秋白拒劝降的终审。那么，秋白那样才智过人，自知死期将近，又为何如此急切翻阅报章呢？他惦念着长征，以及把自己“留驻”在国民党军队进入“苏区”的党中央。查，6月中旬《申报》、《大公报》、《中央日报》刊登的标题有：《中共中央易人，毛泽东复出指挥军事》、《朱毛股匪大部南渡乌江》、《陈毅股匪流窜赣边区》……秋白的脸上微露胜利的笑容。又，杜静、萧三的《瞿秋白同志传》也有此相关记叙。

样的马克思主义党一定能领导革命走向胜利。秋白坚信党，至死不变。他怎么会写下背叛革命的绝笔呢？只是为“被拉出队伍”不能和同志一起前进而惋惜罢了。这样的心境决非“空寂和幻灭”。寒流梦断，人之将亡，心却是充实的。何来“空寂”？

10时许，秋白行至蛇王宫养济院右侧一片青青草坪中间。他盘足而坐，正面对着刽子手点头微笑：“此地甚好！”^①他怡然自得地仰望着苍翠的罗汉岭，环视四周芳草如茵的草坪。试问哪来什么“绝望”？什么“空寂”？什么“幻灭”？这正是翠竹鲜花春意浓，青山绿水总是情。“永别了，美丽的世界！”^②在这人世间的最后一瞬间，他眼眸、心底留下的是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冬去春来，鲜花不败。砰然一声，万籁俱寂，万事俱休。他“告别了，这世界的一切。”^③魂飞天国，疲乏的躯体得到了“永久的休息”^④。罗汉岭久久地久久地回荡着秋白最后的呼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⑤这是一个遭遇坎坷的共产党人发自内心的最后自白，留给后人的是一座美的丰碑、悲壮的史诗。所谓“绝望的哀鸣”、“背叛革命的自白诗”、“共产主义的叛徒”，是泼向圣哲伟人的污水！

（二）绝笔与绝笔诗

相当一些人谈到秋白绝笔，着重讲的是绝笔诗《偶成》。

①陈子刚回忆说：“管药材的少校主任曹文桂告诉我，就义前，瞿先生对执行者提出：我不能屈膝跪着死，我要坐着。不能打我的头。最后他盘膝而坐，子弹穿过心脏而英勇就义。”见瞿秋秋纪念馆编《瞿秋白研究》（1）P411。按：盐城市政协委员陈子刚，1973年在他73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②③④《多余的话》

⑤宋希濂回忆：“执行后，蒋先启回到司令部向我和向贤矩报告执行情况，说秋白先生到公园后，……当秋白先生喊完口号后，他便命令士兵开枪，结束了秋白先生的生命，时间约在10时左右。”按：其中地点有误，高春霖对此回忆亦有误，应为罗汉岭下养济院右侧草坪。

1937年，雪华提及“绝笔诗”时说：“这首诗，哀婉凄其，满呈鬼气，读来直叫人惨然不欢。”^①这是蓄意诬蔑，不去论它。然而，我们有的同志看秋白的绝笔就只见《偶成》，谈到绝笔诗，也总认为它有“凄婉的情绪”，或是觉着格调低沉、灰暗、伤感。通观秋白绝笔全篇诗文，着重点在文末：“狱中言志耳”。什么“志”呢？即“秋白曾有句：‘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这诗句的大意是，敌人的一切手段如过眼烟云，这时必然将我杀害，而这正是我乐于所往的归宿。“逍遥”，闲暇自如，这里表现秋白面对死亡，坦然处之的胸襟。对照秋白在狱中的言行：敌人威胁利诱，不为所动；“走到生命的尽期”，视死如归，乃言“辞世长逝为真快乐”。这不由使人联想到鲁迅的《死》，文中闪耀着秋白就义这天提到的那种精神：“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联想到鲁迅之言：“假使我现在已经是鬼”，“岂不快哉！”^②一个是党外布尔什维克，一个是在苏联参加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都表现了对死的泰然自若的气度，显示了伟人的品格、气质。至此，我们可以窥见秋白的良苦用心，言梦、集句都只不过是曲笔，卒章才显其“志”。如果，一开始就直率地言“志”，国民党的报纸能刊登他的绝笔么？而秋白是希望他的“志”能公开发表的。

既然，绝笔旨要在跋语，讲绝笔诗就先要论跋语中的《卜算子》诗句。这自然使人联想到陆游的《卜算子·咏梅》。陆游的词是：“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秋白与陆游生活在不同时代，但都身处逆境，都坚贞操守。这是两人情感相通之处，因而，秋白步陆游《卜算子·咏梅》原韵，点化某

^①雪华录寄《多余的话》时为其写的《引言》，刊上海《逸经》第25期。

^②鲁迅的《死》，最初发表于1936年9月20日《中流》半月刊第1卷第2期，后由许广平编入《鲁迅杂文末编》。

些语句，作《卜算子》，来表达自己的对革命坚贞不屈的情操。可是，深入比较，就发现陆游词流露出较浓的哀愁，还有某种孤芳自赏、以及对未来的迷茫。秋白的词虽也有淡淡的惆怅之情，如上阕首句：“寂寞此人间”，是说作为敌人的“阶下囚”，虽独自顶住酷刑威逼，劝降利诱，但在那方丈的小囚室里，远离战友，不通音讯，不免感到孤寂。这是秋白身陷囹圄复杂心境的写照。而下句秋白是：“且喜身无主”，可欣慰的是，自身心灵没有被敌人所主宰。而陆游的“寂寞开无主”，下面则是“黄昏独自愁”，对比秋白的用“且喜”一转，一个“喜”字在欣喜之中，还洋溢着共产党人坚持革命气节的自豪之情。秋白词下阕末句：“应有香如故”，与陆游词“只有香如故”，一字之差，反映了新时代革命家与封建社会爱国志士不同的精神境界。秋白坚信不管路途多么曲折，中国必将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正如严冬要过去，明媚的春天迟早要到来，那时梅花必定依然吐着芳香一样。字里行间充满革命乐观主义，富有积极的浪漫主义色彩。

《偶成》，这是人们谈得最多的秋白绝笔诗。前文谈到有的同志出于好心，否认此诗出于秋白手笔，不过，欠论据。而侯甸倒提出一条：“秋白同志”是“诗思敏捷的文学家。如果他自分必死，留诗明志，绝不会从前人故纸中寻章摘句”。^①此看似有理，其实站不住。正因为秋白才思出众，才会想到用集唐诗这种形式明“志”，即从唐诗这一首抽一句，另一首中取一句组成诗。集前人诗句，往往产生多义，这便于曲折言“志”。秋白与方志敏在狱中，都曾以必死的决心，图意外获释。方志敏曾想到对敌人“欺骗与敷衍”，但又担心“弄巧成拙”，“惹起党的怀疑”，以至“身败名裂”。^②秋白被俘后先编了假名、假情况，自被查悉真实身份

^①侯甸《为烈士辩诬》，1985年6月18日《人民日报》。

^②方志敏《死——共产主义殉道者的记述》

后，生死、后人如何评说都置之度外了，唯一关心的只是最后的遗言如何由狱中传出，何惧集唐诗歧义可能引起的误解呢？况且在此之前，秋白已写过一首集唐诗《忆内》。狱中给秋白看过病的国民党军医陈志刚亦有所旁证^①。

七绝《偶成》一、二句取自韦应物和郎士元诗。大意为，夕阳忽明忽灭将落山，落叶、流泉让人留连忘返。联系《多余的话·告别》：“我留恋什么？……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以前更光明了。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可看出这两句通过写景反映死亡将临时，秋白对祖国山水的热爱。第三句取于杜甫诗，述说奔波飘泊已十载。第四句为郎士元诗句。“万缘空”即“万缘俱寂”，“心持半偈”乃为佛家弟子心中默念佛经唱词。此处借用佛家语表示虽然自己牺牲，但心里不忘革命战友、孩子。在《多余的话·告别》中，秋白对“在斗争中勇猛精进着”的战友，表示“祝贺”；对“孩子们”，秋白说“我替他们祝福”！再联系《偶成》前言，写集句时还在回味梦行仙境。而集成《偶成》后的跋语，视“毕命”为“逍遥”，这真是“生死参透了”。难怪唐弢认为“心持半偈万缘空”，无非是视死如归、义无反顾的诗化语言表达。有的同志认为这“也流露出万念俱灰的感伤心绪”。诚然，秋白早年曾受佛教的影响，此处也可看出这种影响残存的痕迹。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秋白已否定词讖之说，对佛学中消极的已作了扬弃。这里秋白借用佛家用语言“志”，因此，不能就佛家语作字面诠释，而应

^①陈志刚，1911年生，国民党36师上尉军医。1935年，当时军医处处长也派他去给秋白看病，他是初级医生，而陈炎冰是少校军医，留过日，秋白肺病他看后均向陈炎冰反映。常州纪念馆纪白曾访过他。他说：秋白在狱中“先后给我写下了八小张的诗，内容都是集唐。”

发掘深层含意。

相对来说,《偶成》要比《卜算子》沉郁些,不过,它们都有共同点,即“狱中言志耳”,都表现了他就义时那种坚定、镇静、安详的革命气节。自然,也反映了他那丰富、复杂的情感。《卜算子》从整体看,基调是明朗的、乐观的,但也有某些孤寂之情。对比毛泽东同志的《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一个“笑”字,把乐观的感情突出表现出来。

(三)狱中其他诸诗

秋白在狱中的其他四首旧体诗是:《浣溪沙》、《梦回》、《无题》、《忆内》,还有一首格言的白话诗《狱中题照》^①。基调都是积极的,表现了秋白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对党的忠诚、对美好事物的热爱、对战友和亲人的思念。毫无阴森的“鬼气”,也不能说它格调凄婉伤感灰色,更不能说它是“佛学思想的复归”^②。另一个方面,这些诗也反映了秋白作为“文人政治家”特异的气质、复杂的心态。

《狱中题照》: 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 这并不是格言,也不是哲理,而是另外有些意思的话。

这两句格言,看似有玄学意味,其实深含辩证的哲理: 灵魂高洁,即使没有了“躯壳”,虽死犹生; 出卖了灵魂,苟且保全了

^①此为秋白给狱中为他看病军医陈炎冰照片上的题词,人民文学出版社据手稿复制件抄录,编入《瞿秋白诗文选》P 240,题目为编者所加。

^②罗宁同志认为,敌人要杀害秋白,肉体上的痛苦又怎么解脱呢? 秋白把死当做“休息”,即佛经里所说的死并非死,而是往生。这是秋白青少年时代佛学思想的复归和返光。其观点见罗宁《瞿秋白与佛学》,1988年《法音》第7期。罗宁同志有不少独到见解,但这看法值得商榷。

“躯壳”，却如行尸走肉！在狱中，国民党福建省党部调查室主任钱永健对秋白劝降：“识时务者为俊杰。”王傲夫更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特派福建党务视察委员身份诱劝、威逼：“瞿先生，你不看顾顺章转变后，南京对他的优待。”秋白慷慨陈辞：“我不是顾顺章”，“我情愿作一个不识时务笨拙的人，不愿作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秋白把高尚的灵魂看得高于躯壳。这里哪来“佛教色彩”？

秋白赠陈炎冰的诗还有《梦回》：“山城细雨作春寒，料峭孤衾旧梦残。何事万缘俱寂后，偏留绮思绕云山。”这首七绝虽然描写了在山城狱中彻夜难眠的情景，抒写了孤身在寒冷囚室的心绪，甚而出现佛家用语：“万缘俱寂”。但这跟前文讲到的一样，绝不能就佛经来解成四大皆空，“心如太虚”，万缘寂灭。^④其实，秋白在即将告别人世时，对共产主义事业、对战友尤其既是“依傍”的同志，又是“唯一的亲人”杨之华思恋强烈。“七绝”中“绮思”思的就是这，而且是“偏留”。真可谓梦绕情牵，思绪绵绵。以

①王傲夫，又名王书生、王杰夫。吉林人，当时年约三十五六岁。北平燕京大学毕业后曾研究过一段宗教。在商震军中以清洗进步人士深得陈立夫的青睞，先后充当中统训练科副科长、科长，并负责领导“中共自首人员招待所”和中统“社会调查人员训练班”，作过对一些大叛徒的劝降工作。后历任中统局设计委员、训练委员主任、总督官、纪律审查委员会主席，解放前夕，任国民党大连市党部主任委员。

②陈铁健《最后的斗争——瞿秋白就义前后》，载《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3期。

③韩斌生《瞿秋白与中国现代文化》，“瞿秋白在赠军医陈炎冰照片上题诗……其中的佛教色彩亦不难觉察。”见常州教育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P2。

④吴之光在《秋白人生观中的佛学思想探微》一文中指出：“万缘俱寂”等，含有“人我空”、“法我空”、“不住于相”、“心如太虚”的佛理。见瞿秋白纪念馆辑《瞿秋白研究》（1）P347。

“梦回”作题，画龙点睛。

《浣溪沙》，是秋白赠陈炎冰的又一首词：“廿载沉浮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湖海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黄昏已近夕阳红。”司马璐与姜新立，一在香港，一在台湾，两人所著均引了此诗。他们看重的是“空寂”、“忏悔”。词的上阕中的“万事空”，不能就字面把“空”解作“空寂”，以为“到头来万事皆空”。秋白的一生跟党的早期历史不可分，他的升沉起落都与革命联系在一起。秋白怎能视“万事皆空”呢？怎能忘怀政治呢？他只是反思后感慨虚度年华，有负党的重托。词的下阕讲，过去的战斗生活成为美好回忆，而今被囚汀州江城，不能和同志们一起继续战斗，多么遗憾呵！我的生命即将结束，犹如红日西沉、满天彩霞。这哪有什么“空寂”、空无、幻灭呢？更谈不上什么“悲哀”、“凄楚”、“忏悔”！当然，秋白也是人，词中也透露出他那矛盾、内疚的复杂心理。由“枉抛心力作英雄”里，可窥见秋白内心有着当文人还是做政治家的矛盾。他在《多余的话》中说自己“爱文艺”，却“枉费了一生心力在我所不感兴趣的政治上”。他多次向人表示“无牛赖犬耕”^①是搞不好的。而历史又偏把自己推上“领袖”的地位，尽管“心力交瘁”去干，毕竟是

^①跟秋白同赴苏俄的记者颂华说：“我们此行，本是‘无牛则赖犬耕’。后来，秋白对鲁迅、茅盾谈时曾借用此语。茅盾说：“记得那时他写给我和鲁迅的短信中有一次署名‘犬耕’。我们不解其意，秋白说：我搞政治，好比犬耕田，力不胜任的。”（见1980年《红旗》第6期茅盾《回忆秋白烈士》）1927年初，秋白在《瞿秋白论文集·自序》中提到：“‘没有牛时，迫得狗去耕田’，这确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情形。秋白是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努力做这种‘狗耕田’的工作，自己知道是很不胜任的。”（见《瞿秋白选集》P311）此外，秋白还向李克长讲：“文人结习未除不适合政治运动。”“我曾向人表示：‘田总归要牛来耕的，现在要我这匹马来耕田，恐怕吃力不讨好。’”（见1935年《国闻周报》12卷26期《瞿秋白访问记》）有趣的是，这里秋白将“犬”改为“马”。可能是避嫌，考虑对党的影响吧。

“犬耕”，有负众望，心底积淀的恐非一己之“凄楚”，而是对组织信托的负疚。这种严于自责的深层内心心态，既表现了秋白那具有民族传统文人道德的复杂性格，也显示他作为共产党人的亮节高风。

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又是“文人”、凡人。他也有七情六欲，更有丰富多样的有时甚而是矛盾着的思想、情感。这也体现在秋白在狱中写的其他两首诗中，《无题》虽有“斩断尘缘”的禅语，但对理想的追求、对事业的信念、对党的信赖，岂是斩得断的么？另一面：“欲知治国平天下，原有英雄大圣人。”又表达他尘缘未断，坚信引导革命胜利自有后来人，坚信中国的前途必然是光明的。《忆内》集唐朝诗人李端、李商隐、杜甫、戴叔伦的诗句，表达了秋白作为“文人政治家”异常丰富美好的情感。“夜思千重恋旧游”，本是李端抒发对好友的离愁别恨，秋白巧妙地加以借用，来述写对与杨之华在上海、苏联追求马克思主义共同战斗生涯的依恋。“海燕飞时独倚楼”，秋白将这句戴叔伦的诗句点化，既有对爱妻之华的深念与关切，又曲折表达期望革命胜利的情思，感情细腻真挚，境界高尚圣洁。秋白除继承了民族传统的美德，更继承了传统文化，加上他才智过人，文思敏捷，因而，能将李端这句诗注入新意^①，表现了现代革命者美好的情操。自然，作为有血有肉的人，他诗中也委婉地表露出内心的苦闷、“文人”的积习以及早年受佛学影响的痕迹。这跟

^①这句诗原意为，她独依楼栏，望着比翼双飞的海燕而思念我。此处秋白引用“海燕”有深层含意。“海燕”在俄语中有“暴风雨的报信者”之意。1901年高尔基作《海燕之歌》，讴歌了海燕精神，鼓舞了俄罗斯人民起来革命。秋白第一个把高尔基的《海燕》翻译介绍给中国人民。（见1933年秋白署名萧参翻译的《高尔基创作选集》）这里借用“海燕”诗句，除跟“我梦君时君梦我”相似，表达了秋白对“最亲爱的人”的思念，更有憧憬“海燕飞时”的胜利之情。

他饱受“内斗”之苦有关，也跟他幼时家庭的熏陶、青少年时受到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教养有关，这下文将评述。

(四) 早期诗词

秋白诞生在常州一个破落的仕宦书香之家^①。常州是吴文化的领地，出名士。秋白的父亲瞿稚彬也是名士，好“四王”之画，他的画《洞庭春色》，颇得王石谷画的神韵。^②秋白也善绘画^③，他青年时的诗如《皓月》：“皓月落沧海，碎影摇万里。生理亦如斯，浩波欲无际。”诗中有画。绝笔诗《偶成》是诗，也是山水画。这跟瞿稚彬对幼时秋白国画的传授不无关系。秋白的母亲金

^①1899年1月29日，即清光绪戊戌年阴历十二月十八日，秋白生于常州青果巷八桂堂内的“天香楼”。其祖父为清朝“奉政大夫”，任过江西知县。祖父死后，全家寄居湖北任布政司史的叔祖父家，叔祖父卒，他家迁至常州青果巷，此地属武进县。

^②春秋时代，常州叫延陵，属吴国，因吴王寿梦的第四子季礼受封于此而得名。战国时吴国被越国所灭。公元前196年，刘邦封兄子刘濞为吴王，复吴国，延陵属会稽郡，归吴国。三国时代，常州为孙吴辖地。公元589年，隋文帝于常熟县置常州，自此有“常州”名。李伯元（《官场现形记》作者）、张惠言、张琦（他们合编《词选》）、张太雷、恽代英……皆常州名士。

^③据武进县党史办吴之光同志查《瞿氏宗谱》，秋白父世玮，字稚彬，挂有“浙江侯补盐大使”虚衔，终身未做官。笔者访问秋白幼年好友羊牧之，羊牧之谈到，瞿稚彬时称“七少爷”，信黄老之学，好清朝王鉴、王时敏、王原祁、王石谷的画，画得一手好画，并教秋白丹青之艺。在常州博物馆，笔者见到瞿稚彬所画《山居图》、《秋山落叶图》、《岁寒图》等，古朴清新。又，查郑午昌编著的《中国画学全史》，该书提到：“瞿园初，武进，山水。”按，园初是瞿稚彬的道号。

^④常州瞿秋白纪念馆存有秋白赠予宽山水画，笔法颇似其父。又，该画照片见《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封三。

衡玉是才女，能作诗填词^①，从小给秋白讲《孔雀东南飞》的故事，教秋白诗词歌赋。8岁，秋白就能背李白《静夜思》等唐诗宋词^②。秋白诗词深湛的修养跟父母的开蒙教养分不开的。秋白的伯父瞿世琥^③、世琨善篆刻，教过秋白刻印。秋白的堂舅父庄怡亭是他的私塾老师，教他《千字文》、《神童诗》。在这样文化环境的培育下，1905年秋白插班入冠英小学，1909年跳级入常州府中学，咏诗刻印，在同学中秋白一直为佼佼者^④。1913年秋，秋白在瞿氏宗祠东厢屋窗前，望着盛开的菊花，忽有所感，当即挥毫写下一首嵌字咏菊诗：今岁花开盛，栽宜白玉盆。只缘秋色淡，无处觅霜痕。

诗中秋白巧妙地嵌了自己的名：霜，以及别号：秋白。瞿秋白在家族中属“懋”字辈^⑤，最初名懋森，号熊伯（谐音为雄魄）。因为他出生时头顶有两个对称的旋心，俗称“双顶”，故小名阿双。小学学名瞿双，读中学后期，改名为瞿爽，或作瞿霜。他的别号有

①金衡玉，出身仕宦家庭，其父金心芾任清朝广东盐大使，对次女衡玉钟爱，在家庭延师教读诗、书。她的文学修养、善良品德对秋白深有影响。

②羊牧之，金衡玉随身侍女之子，他跟笔者谈到，秋白小时跟羊牧之的母亲和羊牧之合睡一床，那时秋白8岁，羊牧之6岁，两人互唱宋词唐诗，秋白很聪明，《静夜思》、《蚕妇》均背得烂熟。

③据《瞿氏宗谱》，瞿世琥原名世璜，字薛斋（雪斋），附贡生，历任浙江桐乡、山阴、常山、长兴等县知县。（民国后任丹阳、泰兴等县知县）。按：瞿世琥与秋白家关系密切，喜爱秋白才智。

④秋白同学李子宽回忆：“自1913年至1914年之间，秋白课余时间付诸吟咏者不少……存二三百首……于各种印谱早有研究，较诸我辈初作尝试者迥然不同。”见李子宽《追忆学生时期之瞿秋白张太雷两先烈》。

⑤《瞿代宗谱》15世为“世”字辈，如世琥、世璜、世琨、世玮等。16世为懋字辈，如懋森（秋白）懋焱（云白）懋森（景白）等。

瓠舟、铁槎(梅)、漆梅、秋白^①。除“瓠舟”外,都跟“霜”有关联,其中“秋白”更是从“霜”^②演化而来。“秋”是“霜”降落的时令,“白”是“霜”的颜色。喻义是象霜那样洁白纯洁,淡雅晶莹,不入流俗。此诗咏赞秋天白菊花的耐寒,蕴含少年秋白愤世嫉恶独立寒秋的志趣,表现了秋白追求高洁无畏、清白无暇的品格。秋白母亲看了此诗,连声称“好诗,好诗”,其父则另有一番心境^③。这时秋白年仅14^④。

3年后,秋白丧母。这是因为他的四伯父弃官闲居,再也无钱接济已败落的秋白父亲一家。他家靠典当、借债支撑,到字画、

①杨福利,秋白读冠英小学时的同学。常州市博物馆藏1964年访杨福利的记录稿中提到,杨世栋(字福利)是秋白三弟景白奶妈的儿子,与秋白姑表兄金庆成(也在冠英小学读书)及秋白,三人结义为兄弟。杨年居长,取名“霁松”;金次之,取名“晴竹”,秋白最小,自己取名“铁梅”、“漆梅”。戏称松竹梅岁寒三友。又,贺忠贤《少年秋白轶事》,载常州教育学院学刊1985年第1期亦有此记载。此外,常州博物馆藏的吴凌虚赠秋白《李长吉歌诗》四册,书上就写有“漆梅藏书”、“铁梅珍藏”。馆内藏的任乃讷赠秋白小漆盒,盒面上刻有“漆梅玩此”。这些既可佐证秋白有“铁梅”等别号,也说明秋白狱中《卜算子·咏梅》并非偶然。少年秋白就深爱傲风雪的腊梅。他和张太雷常去红梅阁观赏梅花。

②秋白取名霜,既寓有菊花傲霜的精神,也有喻似霜那样洁白品格之意。秋白牺牲后,1936年春,鲁迅编辑了《海上述林》,署“诸夏怀霜社校印”。“诸夏怀霜”,含意深远。意指整个华夏民族都怀念瞿霜,全中国人民都怀念秋白。

③秋白父信奉道教,学星相术,见此诗后心中惶然。陈铁健据羊牧之回忆录为咏菊诗注:“瞿世玮语咏菊诗云:‘怎么秋色淡,怎么无处觅霜痕?把秋白的秋字,瞿霜的霜字,都写了进去,而且是淡而无处寻觅,充满着不吉利语,恐怕是儿不得善终了。’”又,贺忠贤《少年秋白轶事》中也有类似记载。

④张永《瞿秋白与菊、竹、梅》:“秋白13岁时曾写过一首咏菊诗”。见《周末》1989年2月4日。按:此说年龄有误。

服饰都当得差不多时，全家不得不搬到不用交房钱的瞿氏祠堂居住，吃粥度日。住祠堂是世人看不起的，亲朋好友大都与他们断绝了来往。秋白深感“痛、苦、愁、惨”，世态炎凉。为撑持名士之家最低的体面，秋白母亲身心交瘁，1915年，秋白因家穷困停学，这对他母亲更是极大刺激。1916年，家中欠账单已有一寸多厚，正当年关，对欠债人家来说，则是鬼门关。秋白之母走头无路，萌生死念。这年阴历正月初五，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寒冷之夜。她用酒吞服了两盒火柴头自尽了。清明时节，秋白含泪作《哭母》诗：“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饥寒此日无人管，落得灵前爱子身。”这首诗表达秋白对慈母痛彻肝肠的悼念^①，也是对那时世道中人与人关系的愤懑、怨恨^②，反映了他心中郁积饥寒无人问的悲凄。秋白狱中诗某些孤寂、惆怅之情，在此可见端倪。

母亲一死，全家各奔东西。这年年底，秋白离开了在无锡任教的小学，去武昌投奔堂兄瞿纯白。后又至黄坡姑父周福孙家，在周家除读《老子》、《庄子》等书^③、以及佛经《大智度论》、《成唯识论》外，常与表兄周均量切磋诗词、佛学、人生。1917年春，秋白随纯白堂兄到北京，后考进俄文专修馆。当时“民国”新官僚的黑暗，使他苦恼。他学俄语外，还研究哲学、佛学，探索人生，寻求救

①金衡玉托她的外甥女婿秦耐铭，为秋白在无锡乡下谋得小学教员一职，月薪10元。1916年初，衡玉送子离开家乡外出谋生，在债台高筑处境下，她还千求万托借了钱，给秋白做一件出门的蓝长衫。秋白见衣思亲，悲痛欲绝，热泪沾襟。真是“蓝衫添得泪痕新”。

②秋白在《饿乡纪程》有一段文字揭露破落封建旧家族人与人关系的虚伪、冷酷：“破产的大家族”里，“家族中的分子，兄弟，父子，姑嫂，叔伯，——因经济利益的冲突，家庭维系——夫妻情爱关系——的不牢固，都面面觑戴着孔教的假面具，背地里嫉恨怨悻咒毒害。无所不至。”这可为“亲到贫时不算亲”的注解。

③秋白在常州府中学时已读过《庄子集释》、《老子道德经注》。

国之法。这时他与鲁迅的“荷戟独彷徨”有某种相似，写下带有颓唐气息的《雪意》：“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⑤这首七绝表现了秋白愤世疾俗、寄意梅花自励，反映他在迷惘中仍在探索，但也流露出往事不堪回首，心中枯寂怅惘之情。在诗中秋白又提到贞洁耐寒的梅花，这使人联想到少年秋白对梅花真挚的爱^①，也想到他的狱中诗《卜算子·咏梅》。

秋白的诗词是他“心弦上乐谱的记录”。从他青少年时的诗中可看到：他狱中诗显现了的那种坚贞不屈，高风亮节，由他少年时咏菊诗中对傲霜独立寒秋菊花的咏赞，便窥见端倪；他狱中诗流露某种孤寂、空灵，在他青少年诗词里也蕴含了这种心态。而这只是他心灵的一角，作为他诗歌的主旋律是积极的，高亢的。对此，下文还要阐述。

①瞿秋白《饿乡纪程》：“从北京到五四运动之前，共三年，是我最枯寂的生涯。友朋的交际可以说是绝对的断绝。北京城里新官僚‘民国’的生活使我受一重大的痛苦刺激。厌世的哲学思想随着我这三年研究哲学的程度而增高。”“因研究佛学试解人生问题，而有就菩萨行而为佛教人间化的心愿。”秋白憎恶旧社会的污浊，积极探求改造社会之方，但又有“厌世观”，这就是他当时处于孤独之际的“二元的人生观”。

②1932年12月7日秋白将此诗书赠鲁迅，于诗后写下跋语：“此种颓唐气息，今日思之，恍如隔世。然作此诗时，正是青年时代。殆所谓‘忏悔的贵族’心情也。”按：“忏悔的贵族”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塑造的一种独特艺术形象。这种人物出身贵族，厌恶本阶级的腐败、罪恶，又无法挽救它，或随本阶级一起灭亡，或背叛它。秋白不是随没落阶级殉葬的“忏悔的贵族”，他背叛了没落的本阶级，投身于革命。

③原诗无题，此题是周红兴和《瞿秋白诗文选》编者所加。西汉、隋、唐等都以长安为国都。此时秋白在北京，以长安代称。

④羊牧之回忆，秋白少年时送他“一本《花月痕》小说，封面已换，上面自画老梅一枝……盖有自刊‘铁梅’小方章一。”见《忆秋白》P66，人民文学出版社。又，秋白少年时还喜欢吹《梅花三弄》，因为全曲主调反复咏叹的是那俏也不争春的梅花。

(五) 中期诗歌

秋白中期诗歌最能反映上述主旋律。有代表性的是《秋意》。秋白用象征的手法，借对秋月、秋云的描绘，寓自己追求理想矢志不渝，坚信光明必将战胜黑暗，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虽有些纤云薄翳，原不碍，原不碍，他那果毅沉潜的活力，待些须，依旧是光华万丈。”而且，境界深远：“一任他秋意萧萧，秋云黯黯，我只笑，笑君空扰攘。”《赤潮曲》格调更为昂扬，气势更为豪迈。开头用对偶句：“赤潮澎湃，晓霞飞动”，对冲决旧堤岸的十月革命怒潮作了赞颂，讴歌了共产主义运动磅礴之势。第三段通过回环反复：“猛攻，猛攻”，“奋勇，奋勇”，表现无产阶级一往无前的进攻精神。最后，展示了美好的未来革命前景：“从今后，福音遍被，天下文明。只待共产大同。看！光华万丈涌。”与《秋意》相同，又是一句“光华万丈”，而压底的一个“涌”，一字千钧。

从1913年秋白14岁作《白菊花》^①，到1935年他36岁时的绝笔诗《偶成》。他一生几乎没有停止诗歌创作^②。他既有抒情言志的诗，也有鼓动诗与讽刺诗；有旧体诗，也有自由诗。纵观其诗词歌谣，可看到：第一，少年秋白、青年秋白、中年秋白心灵发展的轨迹，即从具有爱国心、追求正义的少年，进而到革命民主主义者，以至共产主义战士的艰辛历程。他的早期诗歌表现了对黑暗旧社会和封建旧秩序的痛恨及独立寒秋的志向。当他痛感“亲到贫时不算亲”时，便毅然抛却“江南旧梦”，顽强地探索救国

①这首歌词在1923年6月出版的《新青年》季刊第1期上发表，秋白诗情激荡地创作这词时，也是他翻译《国际歌》之时。比较秋白翻译《国际歌》中的词句，“看！光华万丈，照耀我红日一轮。”可以看出《赤潮曲》受到《国际歌》的启迪。

②此诗当时未发表。秋白首次公开发表的诗是《远》，刊于1920年8月出版的《人道》月刊第1期。

③秋白写的诗很多，但流传下来的仅50多首。

之道、人生之路。他的中期诗歌赞颂了革命的赤潮，赞美了“胼胝满目”的劳工阶级，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这些诗歌富有时代精神和战斗气息，笔调雄浑奔放，音韵铿锵有力。他的晚期狱中诗，某些地方曾流露淡淡的委婉沉郁，以及矛盾而又内疚心绪，那是他惨遭打击、历尽沧桑的折光反映。但其主调是积极的，表现了秋白对党对革命事业的赤诚之心，表现了他对生活、对战友的热爱。

第二，秋白兼革命家与诗人一身，有着深厚的中国古典诗词根底，融古而出新，体现了他那特有的精神气质和风采。他的“何事万缘俱寂后，偏留绮思绕云山”诗句，叩人心扉，显然是由陆游《示儿》的名句“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点化而来，表现的却是他自己昂扬而低回的心灵乐章。他的《天语》似受李清照《渔家傲·记梦》某种影响，诚如钱璠之同志所论：“两者的意境是不同的。一是眷念故乡，不忍离开苦难的人间；一则缅怀天国，要想乘风飞往仙山琼阁。”①此外，秋白还注意从外国诗歌、中国民歌吸取有益的营养。《赤潮曲》与《铁花》由《国际歌》中有所借鉴，但又是中国风格的。他的大众诗《东洋人出兵》便是运用“小热昏”这类民间小调写的②，既可诵，也可唱③，这是“一种新的俗话诗”，“大众的诗”。明白晓畅，千人唱，万人和。他的讽刺诗、打油诗融民歌、小调、古诗词于一体，可与鲁迅写的民谣体

①钱璠之《春来应有香如故》，常州教育学院学刊1983年第1期p17。

②1931年9月，秋白化装去上海城隍庙听民间艺人说唱，见一老艺人领着一小姑娘一边唱“小热昏”，一边卖梨膏糖。他们的唱腔及唱词“东洋大炮轰沈阳，香蕉糖来梨膏糖”给他启迪。回来后，便用“小热昏”的小调，写了《东洋人出兵》，刊同年9月28日“左联”机关杂志《文学导报》第5期。见周永祥《瞿秋白年谱》p92、93。又，1962年6月19日《文汇报》上的《秋白三访城隍庙》，1963年11月8日《南方日报》上的《瞿秋白的乱来腔》，均有记载。

③《东洋人出兵》的副题为《乱来腔》，歌词前有这样说明：“这首歌的调头是没有什么一定的，大家随口可以唱，所以叫做乱来腔。”见《瞿秋白诗文选》p218。

讽刺诗相比美。秋白是俊逸洒脱、才华横溢的诗人^①，他是中国无产阶级诗歌“漏泄春光的第一燕”。

第三，秋白是党的卓越政治活动家，又有文人气质。就义时既坚贞不屈，又从容赋绝笔诗；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是平凡而心灵美的人；坚定共产主义信仰，慷慨高歌死，又热爱美好事物，眷念亲人、战友；他是党早期著名领袖，有着坚强党性、高尚情操，又是凡胎俗骨的普通党员、正派的人^②；他是不屈不挠的战斗者，顽强坚韧，受打击而不馁，仍奋然而行，对敌气如长虹，孤独囚室不免怅然，可“勇气并没有挫下来”^③，“只待共产大同”。他的诗是“心影心响的史诗”。丁玲说：秋白的“个性完全呈露在诗里”^④。有诗为证：“淡绿色的落叶儿，秋意中轻轻飘展呢。/落叶儿，我送你归去，祝你安安心心抛离‘生意’。/春华秋实，你的使命尽了；地上枯死了绿茵草，/枝上飞去了啁啾的鸟，只落得把秋来报告。”在《过去》这首诗中，秋白对飘落秋叶自我牺牲精神的吟颂，实际也是他自己伟大而平凡一生的形象写照。秋风秋雨看秋叶，更见秋白光华照千秋。^⑤

①瞿秋白《论大众文艺》、《大众文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这些文中秋白有论及诗的创作主张。他是有诗作与诗论的诗人。

②李维汉：“他是一个正派的人，他没有野心，能平等待人，愿听取不同意见，能团结同志，不搞宗派主义。”见《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③毛泽东题辞：“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见《瞿秋白文集》第1卷（文学编）。

④丁玲《我对〈多余话的话〉的理解》，1980年3月21日《光明日报》。

⑤本章某些内容曾发表于1985年7月4日《爱国报》，题为《瞿秋白的咏菊、咏梅诗》，1985年8月13日《南汽报》，题为《秋白，不可撼动的纪念碑》。

二、社会的心灵 坦荡的心史

——秋白两部散文集的个性特色

鲁迅曾把英国伟大剧作家肖伯纳比喻为“镜子”^①，秋白也把他与鲁迅合编的《肖伯纳在上海》比为“平面的镜子”^②。其实，象秋白这样既有文学家的才气，又有政治家的敏锐，何尝不是明镜呢？自1920年11月至1922年3月，秋白先后写成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③，更是无比广阔的平面镜子。这面特大的镜子，最早向中国读者映现世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面貌，苏俄十月革命刚胜利后的“社会心灵”，由这特大镜子里的“明镜”，人们看到怀着赤子之心的秋白，从热爱祖国，探索真理，追求光明，成为革命民主主义者，进而为共产主义战士的思想变化历程，看到了秋白那忠诚、坦荡的红心。

秋白的这两部作品不仅在题材、体裁、写法上对现代散文领域有新的开拓，而且，“文如其心”，心海心波无不显示秋白对社

①鲁迅《肖伯纳在上海》序，《南腔北调集》P73—74，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②瞿秋白《肖伯纳在上海》写在前面，《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P300，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③《饿乡纪程》写的是自中国至俄国的路程、心程。1920年11月，秋白在赴俄途中的哈尔滨，他作为《晨报》记者在写报道的同时，开始写此书，到1921年10月，在莫斯科定稿。11月在书跋后加写一段说明寄回中国。1922年9月，上海商务印书馆作“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出版。《赤都心史》写的是在赤色莫斯科见闻感受。于1921年2月16日着手写，至1922年3月下旬完稿，8月写“引言”。1924年6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也作“文学研究丛书”之一出版。茅盾在《我走过的路》中说：“这两部书名是一副对联，可以见作者的风流潇洒。”

会主义热切的追求、赞颂，而又有其独特的个性^①。这两部佳作在“五四”文坛犹如别具一格的两枝腊梅，它们在现代文学史的重要地位，一致公认。但是，它们究竟算什么体裁呢？是游记^②，是“报告”，还是散文？看法不一致，作品主要表现的是什么，也小有分歧。是倾诉心灵感受的散文，还是游记或报告？这跟秋白在作品中主要表现的是什么相关联。无疑，这写的是赤都之行，表现的是他所见所感、他的“心程”。要探讨他思想演变的历程，重要的一环是搞清他为何不畏千难万险奔赴“饿乡”？他不怕天寒地冻，铁心去“赤都”，自有其“内的要求”。由他告别亲友中也可窥见一二。

（一）三别亲友

一别老父。老式的火车载着秋白，从北京向济南运行。秋白在出国之前向父亲瞿稚彬道别。^③随着车轮“哐啷”“哐啷”声响，秋白心海也掀起一个又一个波涛：为什么要辞别不忍舍的

^①瞿秋白：“两书均是著者幼稚的文学试作品”，“文学的作品至少也要略见作者的个性。”秋白又说：“我愿意突出个性，印取自己的思潮。”见《赤都心史》的《引言》及《序》，《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P114，115，1985年出版。下面所引均为新版本，不一一注出。

^②1922年9月，秋白之友，改《饿乡纪程》为《新俄国游记》，副题为《中国到俄国的记程》出版。有的评论，如《读书月报》刊登的《我国最早的一部访苏游记——〈饿乡纪程〉》，也是从游记角度评的，见该刊1957年第9期。

^③杨如鹏《瞿秋白——中国报告文学的开拓者》：“直到现在，许多文学研究者仍习惯于把这两部书作为散文集看待。实际上，就是按当代报告文学的特征来衡量，这两部书中的多数作品也堪称报告文学的范本（除去少量诗作），称它们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报告文集之一，是有充分根据的。”“称它们是散文集，就不能说是准确的了。”见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瞿秋白研究文集》P225—226。

^④秋白母亲自尽后，全家各奔东西。父亲一人住在济南的友人王璞生家，以教画糊口，生活清苦。王凤年老先生当年曾跟瞿稚彬学画，在《五十年前泉城一画家——王凤年谈瞿秋白烈士的父亲在济南》一文中，讲到瞿稚彬生活的窘境。（见1982年4月3日《济南日报》）晚年，他从王家搬出，住道教人集居的“悟善社”，后迁“正宗坛”，客死异乡。

父亲去赤俄呢？为什么？“惨酷的社会，好象严厉的算术教授给了我极难的天文学算题，闷闷的不能解决；我牢锁在心灵的监狱里。‘内的要求’驱使我，——悲惨的环境，几乎没有把我变成冷酷不仁的‘畸零之人’，——我决然忍心舍弃老父及兄弟姊妹亲友而西去了。”^①为什么？为什么要离别亲爱的父亲去“赤都”呢？“我要求改变环境，去发展个性，求一个‘中国问题’的相当解决，——略尽一分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②1917至1920年冬，秋白刚步入青年时期。他由“厌世”而“出世”，以至“入世”求救国之道；由憎恨“士”的家庭制度，萌生民主主义思想，到憧憬“红艳艳光明鲜丽的所在”，决心“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坚定“赤都”之行。^③这是秋白年轻时思想的前进，人生观的转变，心灵深处“内的要求”。秋白的好友王统照赞他“有大无畏的精神与魄力，居然敢在1920年危险的时期中，向人人视为畏途的苏维埃俄罗斯大踏步走去”。^④尽管这样，火车上，秋白却老在担心怎样跟父亲说才好呢？直到济南，具有传统美德的秋白还不知如何向老父启齿。且看秋白自己描写当时的情景：

山东济南大明湖畔，黯黯的灯光，草棚底下，一张小圆桌旁，坐着三个人，残肴剩酒还觑着他们，似乎可惜他们已经兴致索然，不再动箸光顾光顾……^⑤

这三人就是秋白父子、还有秋白父亲的一位道友。还说什么呢？秋白望着“年纪已近半百，忧煎病迫”^⑥的父亲，似乎要说什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P15。②同上，P8。③同上，P5。下文再引该集，有时不注“文学编”。

④剑三《新俄国游记》，1922年载刊在中国大学《晨光》杂志第1卷第3号。王统照，字剑三，笔名有剑先等。1918年，考入北京中国英国文学系学习，当时秋白已是北京俄文专修馆的学生，他们一起参加“五四”运动，发表文章，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

⑤同①，P7。⑥同上，P8。

么。倒是苍老、憔悴的瞿稚彬对秋白讲：“你这一去……随处自去小心，现在世界交通便利，几万里的远路，也不算什么生离死别……只要你自己不要忘记自身的职务、你仔肩很重呵！……”^①这真是知子莫如父，瞿稚彬深知秋白有着执着的追求，谁也拉不住。所以，蔼然可亲地说了一番鼓励叮嘱的话。

秋白为何千里迢迢要去“赤都”呢？除了他“自己心灵的要求”外，自有其客观的历史必然原因。让我们随秋白返回“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去探讨秋白去苏俄的历史必然性吧。

二别堂兄。秋白回到北京堂兄瞿纯白^②家，其家^③位于东城观音寺草厂胡同南口，它是古城老式的院落，秋白住在后院东屋，倚凭书案，可见窗外的小院。此时此刻，秋白是怎样一番心情呢？他自己写道：

小小的院落，疏疏的闲花闲草，清早带些微霜，好象一任晓风飏拂摇曳，感慨有些别意，仿佛知道，这窗中人快要离他们远去万里了。^④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p7。

②瞿纯白，据《瞿氏宗谱》载，他是瞿氏15世瞿世璠的长子，名常，字纯伯。又据瞿纯白的长子瞿重华口述，韩斌生老师整理的材料：“瞿秋白和我父亲瞿纯白是同祖堂兄弟，”“我的父亲比秋白长十多岁，”“秋白大叔来到北京，住在我家中。”按：瞿纯白为1889年生，比秋白大10岁，京师大学堂法文专修班毕业，历任南洋方言学堂、上海南洋大学、北京民国大学、清河陆军预备大学等校教员。后任京汉铁路局通译。当时在北洋政府外交部任职。

③瞿纯白家先在北京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羊肉胡同的一座三进院落里，不久，就迁入草厂胡同南口路西第一个门内的院房。“五四”运动前后和秋白比较接近的郑振铎说：“秋白独自住一个屋子，屋子里有书桌、书架，收拾得干干净净。”见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二三事》，载1955年第12期《新观察》。

④《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P16。

由朝霞满天到夕阳西下，“窗中人”望着庭院里的秋花秋叶，思绪翻腾。为什么要离别故国亲人去赤色的莫斯科呢？为什么？当时的旧中国是黑暗的半封建半殖民地，“阴沉沉，黑魑魑，寒风刺骨，腥秽污湿所在，我有生以来没有一点半点阳光”^①。这处境多象鲁迅写到的漆黑的“破小屋，又湿，又阴”^②；“绝无窗户”的“铁屋子”^③。自然，“我”不是“屋”里“昏睡”者，更不是不想开“窗”者。而是近似狂而不狂的觉醒者。秋白清醒地由辛亥革命的流产，看到发展资本主义求富强，是此路不通。“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噩梦。”^④十月革命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灿烂庄严，光明鲜艳”。阴黑的“天地间，忽然放出一线微细的光明来了”。“兄弟们”，“我去拨开重障，放他进来。兄弟们应当明白了，尽等着是不中用的，须得自己动手。”“想必大家以为我是疯子了”，要去“红艳艳光明鲜丽的所在”。^⑤这里的“疯子”跟鲁迅笔下“狂人”同中又有异，即“狂人”还不曾明确地看到光明。此处的“疯子”不仅由“一线的光明”，坚信“就此一线便照遍了大千世界”，而且，动手“去拨开重障”。这跟后来鲁迅作品中“傻子”动手砸阴黑“小屋”，“开一个窗洞”，又有相似之处，略有所不同的是“疯子”要“兄弟们”明白得“自己动手”，而“傻子”只是一个人干。然而，要让“兄弟们”都明白，去赤俄寻求光明并非“疯话”，谈何容易。秋白想起前不久与堂兄纯白的一场争论：

①瞿秋白《饿乡纪程·绪言》，《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P3。

②鲁迅《野草》《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③鲁迅《呐喊·自序》，写于1922年12月3日，于1923年8月21日《晨报·文学旬刊》发表。

④瞿秋白《饿乡纪程》P26。

⑤《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P4—5。

秋白俄专未毕业，就应《晨报》聘赴苏俄采访，瞿纯白认为堂弟太不考虑自己前途，问秋白为什么现在急于去赤都呢：“你等到毕业，凭你的才力，不当个公使，也是有身份的随员！为什么要现在去做个记者呢？”

能言善辩的秋白沉默不语。在纯白家寄居三年有余，多方受其照顾，怕直说伤了情份。

见秋白不响，纯白对秋白去灾情、饥荒、战乱、严寒的苏俄，竭力反对，大声说道：“这是自趋死地！”

秋白坚信“俄国是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红光烛天，赤潮澎湃”，“宁死亦当一行”。他向纯白表示，自己“不是为生乃是为死而走”^①。

看来这次谈话是话不投机，不欢而散。那眼前这次作别将如何？黄昏时分，纯白兄嫂只是说了一番勉励的话：“到俄国后专门研究学问”，“不要半途而辍”等等。这反使秋白感到堂兄嫂的情分，低徊感慨不尽。

三别好友。与“五四”运动中结识的好友告别，则另有一番慷慨激昂的情调。那是1920年10月15日深夜，在位于北京东城城墙不远的耿济之家^②。矮胖的主人穿着羊皮皮袍，和参加聚

^① 瞿秋白：“纯哥当初竭力反对我到俄国去，以为自趋绝地，我却不是为生乃是为死而走”。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P17。又，瞿纯白之子瞿意华在《回忆秋白叔父在北京的情况》中讲到：“当时我父亲不同意大叔出国，理由是俄专行将毕业，很快就可以在北平政府部门找一个生活安定、薪水较高的职业，为什么一定要背井离乡、‘自趋绝路’呢？那时候，在一般人看来，俄国是一个贫困而可怕的地方，但大叔主意已定，任凭我父亲如何劝说，他也毫不动摇。”

^② 耿济之，名匡，1919年11月，秋白跟他及郑振铎、瞿菊农、许地山等，以“北京社会实进社”名义，创办《新社会》旬刊。1920年5月被查封。王统照回忆那时耿济之住在“北京东城的极东，距高大城墙不远一个胡同的小院里的南屋里”。见王统照《恰恰是三十个年头了》，《忆秋白》P114。

会为秋白送别的郑振铎、瞿菊农^①、王统照、郭梦良、郭叔奇，等了又等，而被送别者却还未到。突然，门铃响了，一位喊道：“来了，来了！准是他——秋白。”可进来的是姗姗来迟的送行者：郭绍虞。此时，秋白在哪里呢？他从北京饭店优林^②办公室出来，怀揣着才签了的护照，急匆匆往耿济之家赶。喜悦震撼着他的身心，他边行边想，是什么推动自己铁心赴新俄呢？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使他从独自苦闷的探索中，投入火热的斗争。^③忘不了，社会主义的热烈讨论，引起的无限兴味；忘不了，椭圆脸上有着中国式下垂黑胡子的守常先生^④；忘不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①瞿菊农，名世英，江苏武进人，秋白的叔叔。

②优林(现译尤林) Urin 远东共和国派驻中国的外交使节。远东共和国1920年4月建立，1922年11月并入苏俄。

③瞿秋白《饿乡纪程》：“五四运动陡然爆发，我于是卷入旋涡，孤寂的生活打破了。”《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P26。

④李大钊，字守常。1919年的“五四”运动，他是组织者和领导者。秋白是俄专的“总代表之一”(《多余的话》)，是俄专、汇文大学、铁路管理学堂学生运动的“谋主”(郑振铎云)，后又成北京学联的注目人物。1920年3月，在守常先生组织、指导下，秘密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最初参加的有邓中夏、张国焘、朱务善、何孟雄等10多人，不久，秋白也参加了。1920年夏《新社会》被封查后，郑振铎等又于8月5日出《人道》月刊。(郑振铎回忆当时秋白不赞成此名，但也没有提出别的刊名。)同时组织人道社。1920年8月16日，在李大钊组织下，人道社，少年中国学会、觉悟社等五个进步团体代表，聚于北京陶然亭慈悲庵北配殿开联席会，会上李大钊提出，到农工中去。这些活动把守常先生与秋白联系起来。加上，1919年2月到1922年10月，守常主编《晨报》副刊。秋白将成为《晨报》记者，又怎能不想到促使他去赤俄的守常先生呢？

的秘密集会^①，正是守常先生对十月革命风暴的赞颂，正是在研究会秘密活动地点研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使自己从而倾向社会主义，充满豪气赴“饿乡”^②。想着行着，于午夜时，秋白带着秋夜晚风卷起的街尘，冲进了同学耿济之家。

“明儿早上几点？”等得心焦的一位直截问秋白几点起程。

“6点半——天还不亮哩。”秋白边答边摘下眼镜用手绢擦拭，接着又说：“谁也不必送，哈！送么？也就是东车站，这隔赤塔还远得很呢。哈哈！”青年秋白总是那一付满不在乎地洒脱神气。

“太冷，太冷！不要说现在的莫斯科，一到哈尔滨就冷得够受。您虽有皮大衣，可是身子骨……”又一位说道，其他送行者也有同感。秋白面容虽苍白、清瘦，而眼里却有一股英气，他深深吸了一口烟，在喷出时环视了大家，说道：

①瞿秋白《多余的话》：“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我也因为读了俄文的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按：应为《妇女与社会主义》）的某几段，对于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理想发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所以也加入了。”

李大钊既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组织者，也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少年中国学会”的左翼不少也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如邓中夏、高君宇等。恽代英1919年10月参加“少年中国学会”，至1920年6月在北平编《少年中国学会丛书》，这样，秋白也就认识并与邓中夏、恽代英有了神交。

②清朝文学家管异之，江苏人士，秋白说他“称伯夷叔齐的首阳山为饿乡”（这是清朝另一文学家蓝鼎元《饿乡记》中的话），由此而联想到他的“饿乡”：苏俄。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P31。在同卷P5也曾提到：当时的苏俄“是冰天雪窖饥寒交迫的去处”，“我且叫他‘饿乡’”。P67上说，在苏俄“一九一九年秋天刘君（按：指刘绍周）还吃过两个月马食料呢”。P171上讲：“东俄旱灾非常之甚”。“俄国中央及各省报纸上载灾区通信：‘一堆一堆饥疲不堪的老人幼童倒卧道旁，呻吟转侧。……啮草根烂根。’”

③当时送行者之一王统照的回忆，见《忆秋白》P116—117。

“对我们自己心灵的要求，是负绝对的责任的。”“用不着我和你们辩论。我们各自照着自己能力的限度，适应自己心灵的要求，破弃一切去着手进行。……清管异之称伯夷叔齐的首阳山为饿乡，”“我现在有了我的饿乡了，——苏维埃俄国。俄国怎样没有吃，没有穿……饥，寒……暂且不管……他始终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我已经决定走的了。……现在一切都已预备妥帖，明天就动身……诸位同志各自勉励努力前进呵！”①

诸友带着佩服与羡慕的心理，望着秋白。一个个紧握怀有如此决心与勇气的秋白的手，珍重道别。

16日，自北京起程，火车经天津，秋白下车与张太雷等告别。秋白与张太雷后来在莫斯科还有一段为秋白终身难忘的经历，这后文还要叙述，此处先表这夜他们的抵足长谈。他们是同乡，又是同窗^②，一起回顾少年时在常州红梅阁的赏梅，登上文笔塔的开阔心胸^③；他们是同志——那个年代这称呼意味

①瞿秋白《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文学篇）第1卷P31。

②瞿秋白：“天津重过。又到我二表姊处去告别。张昭德及江苏第五中学同学吴炳文，张太来三位同志都在天津，晚间抵足长谈，作我中国社会生活的最后回忆。”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P32。

③张太来即张太雷，原名曾让，字泰来，学名张复，参加革命后始名太雷。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县人。1911年入常州府中学堂预科，1912年春升入该学堂本科。同年7月，常州府中学改名为江苏省第5中学。他与秋白是同乡，又是同学。

④张太雷的亲密战友王一知回忆，丁则勤、姚维斗、王树棣整理，“太雷与瞿秋白曾是省常中的同学和好友，他们一同游历过的红梅阁景色秀丽”。（王一知《回忆太雷》P5，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回忆张太雷》。）羊牧之既是秋白少年时好友，又与太雷相识，他回忆，秋白、我、还有“那个穿长衫的人”（按，即张太雷），一起游常州文笔塔。“一层一层地向上爬着，一口气登上第七级最上层。我们凭栏四望，心胸顿觉开朗”。（羊牧之《太雷轶事》，见《回忆张太雷》P77。）

着亲切、信任，可以相互打开心灵的窗户，一起回忆“五四”风暴，回忆守常先生关于俄国革命生动而透彻的介绍^①；他们是志同道合的战友，一席长谈，更坚定了秋白赴“饿乡”的决心，张太雷对秋白的人生观、信仰也有进一步了解。

由“三别”中可以看到秋白不畏饥寒去“饿乡”，乃是阴沉的旧社会的压迫，激起他对封建“士”族制度的背叛；乃是“五四”运动的烈火，燃起他心中之火，希望之光。他向往着去十月革命的发源地，考察社会主义，这是秋白心灵“内的要求”。《饿乡纪程》与《赤都心史》主要也是表现这种心灵的“心影心响”，以及通过“我”折射出的“社会心灵”。当然，此时，秋白倾向社会主义，还是朦胧的，通过苏俄实地考察才清晰起来。

（二）路程中见心程

前面引言中提到，对秋白的这两部作品，有的评论者作为秋白一路访苏行程的游记^②。也有的中国新文学史专著，虽把它们归入散文一章内，但仍作“通讯游记”，不评述作者的“心程”。^③对此，秋白自己在《饿乡纪程》《跋》的后记中说得很明白：“具体而论，有记‘自中国至俄国’之路程，抽象而论，是记著者‘自非俄

^①1919年8月，张太雷作为天津请愿代表之一，曾来北平。通过“五四”运动，张太雷结识了李大钊、邓中夏，并与于方舟等有进一步联系。1920年3月，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来北平会见李大钊等，讨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问题，张太雷任翻译。不久，他与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朱务善、张国焘、刘仁静等一起参加了李大钊发起建立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这样，秋白与张太雷又多了一层思想上联系。

^②并非把这两部作品作游记评论的，都只见“路程”，不见“心程”。如王统照撰文指出：“批评这书的价值，且不要看‘西伯利亚之路程如何如何，’‘当着眼秋白的人生哲学。’”见剑三《新俄国游记》。

^③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P125（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把《新俄罗斯游记》和《赤都心史》放入“第五章收获丰富的散文”，具体评述只谈“藉秋白的这些通讯游记把苏联人民的奋斗的真实情况报导给中国”，不谈它们是“心影心响的史诗”。

乡至饿乡’之心程。”^①那么，秋白是如何通过“路程中的见闻经过”^②，展现他“心程中的变迁起伏”^③呢？让我们随着秋白克服千难万险的行程，看他是如何通过社会调查、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批判“旧我”，树立共产主义信仰，对社会主义有了清晰认识的，从而，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年轻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0年10月18日，秋白带着“宇宙的意志”^④，从天津乘车北上。路线是：哈尔滨——满州里——赤塔——伊尔库次克——莫斯科。当列车到哈尔滨时，苏俄远东战事激烈，东部边境有白军“谢美诺夫横梗在满洲里赤塔之间，火车不通”^⑤，红军正与之大战。这样，秋白等一行人不得不在哈尔滨滞留50多天。

哈尔滨是“俄国新旧党的纠葛地”^⑥。有逃亡的白俄将军、资本家，有俄国旧党的机关报《俄声》，甚而还有“谢美诺夫的机关报”，《光明报》^⑦。而俄国共产党也在此活动，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同志也由此入境，俄国新党机关报《前进》^⑧也在此。这正好为秋白实地调查的对象，调查中更激起秋白急于赴“赤都”，以一睹庐山真面目。调查的结果，秋白专门写成报道^⑨，寄往《晨报》。《饿乡纪程》中所记主要是“在哈尔滨的感想”，赴俄途中“心

①②③瞿秋白《饿乡纪程·跋》的后记，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P109。

④1920年10月16日，济之，振铎作诗《追寄秋白宗武颂华》，菊农作《追寄颂华宗武二兄暨秋白侄》。18日早晨，秋白收到，他作诗《去国答〈人道〉》回复。诗中云：“驱策我，有‘宇宙的意志’。欢迎我，有‘自然的和谐’。”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P36。

⑤瞿秋白《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P44。⑥同上P48。⑦同上P49。⑧同上P48。⑨同上P50，“哈尔滨的大概情形，我在哈时所做几封《晨报》通信也曾略略叙及。这是要专门调查研究的。我此地（按：指《饿乡纪程》）不过随便写几句感想”。

理变迁”。①这里且举秋白第一次听到《国际歌》的感受为例：

“十一月七日是在彼得城发生世界上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的日子。”“得一俄国友人的介绍去参观他们的庆祝会。会场是哈尔滨工党联合会预备开劳工大学的新房子，”“会场里人拥挤得不了，”“宣布开会时大家都高呼‘万岁’，哄然起立唱《国际歌》(International)，声调雄壮得很。——这是我第一次听见《国际歌》”。②

在这雄壮嘹亮的《国际歌》歌声中，人们庆贺十月革命胜利三周年，庆贺苏维埃政府，庆贺俄罗斯共产党，庆贺共产国际。这庄严雄浑的《国际歌》歌声，震撼青年秋白的心灵。他感受到共产党的“空气”。在哈尔滨简陋的福顺客栈。屋外，枯树，积雪；天空，一轮冷月。屋内，秋白心苗里却含着蓬蓬勃勃的春意，他经一个个寒夜的笔耕，写了《饿乡纪程》的前九章。

12月初，红军打败了谢美诺夫的白匪军。秋白情不自禁欢呼：“启程了，启程了！向着红光里去！”他想：“苏维埃制度，——无产阶级独裁机关，——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可以有研究的机会了！”③10日，专车启动。13日晚，到达中俄边境的满州里站。“遇着刘君绍周，得知劳农政府的事实上的经济状况”④。16日，列车穿越中俄境线，在大风雪中，进入

①瞿秋白《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第1卷p52。②同①p60、61。

③同①p60。除第6章外，均引用新版本。

④刘绍周，1916年4月被选为中华旅俄联合会会长。1919年3月初召开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其第四次会议由列宁主持，刘绍周作为“中国代表发言”。（见《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p14。）1920年7月，他又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不过他与国内李大钊发起成立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没有联系（当时秋白还只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刘绍周（后改名刘泽荣）直到1956年才加入中国共产党。但那时秋白对他十分看重。秋白在《瞿秋白文集》第1卷p66中写道：“旅俄华工联合总会会长刘绍周。他是在俄留学生最出色的人才。他曾经对我们说许多华侨的事情，还有关于共产主义的，歌俄经过三年大战四年内乱，经济状况破坏得不了。”

千里冰封的西伯利亚，18日，抵达远东共和国新都城赤塔。在此又受阻17天。四处呈现战争残迹，市面萧条，食物奇缺，气温冷到零下40多度，患有肺病的秋白连呼吸也感到困难。中国驻赤塔领事葆毅，是秋白在俄文专修馆的同学，关切地对秋白说：“我劝你不要到莫斯科去。”秋白的同行者之一想回国。秋白仍决定去“叩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的俄国的大门”。他写道：

我的责任是在于：研究共产主义——此社会组织在人类文化上的价值，研究俄罗斯文化——人类文化之一部分，自旧文化进于新文化的出发点。寒风猎猎，万里积雪，臭肉干糠，猪狗饲料，饥寒苦痛是我努力的代价。现在已到门庭，请举步入室登堂罢。^①

秋白在赤塔进行社会调查，访问远东共和国政府要员。此外，就是认真研读共产主义著作。秋白读了赤塔共产党委员会送来的许多书刊，如《俄罗斯共产主义党纲》、《共产国际》、《社会主义史》等，对俄国共产党有进一层了解，心也更向往“赤都”。

“哈尔滨得空气，满洲里得事实，赤塔得理论，再往前去，感受其实际生活。”^②1921年1月4日，秋白等离开赤塔往西前进。7日下午到达伊尔库茨克，短暂停留期间，秋白体味赤军占领不到半年的实际生活，观察各种人物对共产党的心态。9日上午8时，列车又向西行。在秋白离开不久，张太雷也到了伊尔库茨克^③。而秋白与张太雷再相会是在莫斯科。秋白于1921

①《瞿秋白文集》第1卷P73。②同①P77，“颂华呢，”（按：俞颂华，与秋白同行的记者）“就想回国”。③同①P84。④同①P82。

⑤《张太雷年谱》：1921年春“赴伊尔库茨克，3月到达，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任中国科书记，并以共产国际工作人员身份从事共产国际组织局委派的工作。”见《张太雷文集》P329，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又，王一知《回忆太雷》：“他（按：指张太雷）在一九二一年一月，接受党的委派，到伊尔库茨克远东共产国际书记处工作，被任命为远东书记处中国组的书记。”见《回忆张太雷》P6，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下面引用此书，只注书名，不注出版社，出版年月，引其他书亦同此体例。）

年1月25日晚先到“心海中的灯塔”。至此，他写了18篇通讯报道，同时，撰写了《饿乡纪程》的大部分，勾画了秋白为探求社会主义光明之道路，由“非饿乡”而至“赤都”的历程与心程。

在莫斯科，秋白多次见过列宁和其他领导人，又深入工厂、农村，还参加俄共第十一次等重要代表大会，与各种类型的人交谈，探索社会心理、苏维埃人的内心，他感受到苏俄实际生活的巨变，体察到苏维埃人对社会主义坚定的信念。在感受、考察中“冥求人生问题答案”^①，树立唯物主义的哲学观、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在思索与心灵的搏斗中，不断否定“旧我”，扬弃受老庄、佛教影响的“避世观”、受西方影响的“空泛的民主主义”、“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而成为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②。在莫斯科，秋白与张太雷又相遇。时间是1921年5月中、下旬^③。张太雷于1920年就参加了上海、北京、天津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工作。1921年3月，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5月中下旬，他从伊尔库茨克到莫斯科，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来参加即将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P80。

②《多余的话》：“我二十一、二岁(按：指1920至1921年期间)，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

③鲍里斯·舒米亚茨基与张太雷一起经历1920年至1922年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的创建，他撰文写道：“他(按：张太雷)参加筹备朝鲜共产党成立大会的组织局”。“一九二一年五月四日，在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开幕式上，张太雷同志在祝辞”。“一九二一年五月七日，他即以上一个论题，(按：指《日本无产阶级与朝鲜贫民》)在大会上作了一个饶有趣味的报告。”见斯大林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科研团体刊物《革命的东方》，1928年第4—5期合刊。鲍里斯·舒米亚茨基《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历史片断》。按：指当时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在伊尔库茨克召开，推算张太雷在5月中下旬才能到莫斯科。

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①。其时，秋白已树立共产主义理想，特别通过报道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更增强了这种信仰，自然而然有参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要求。张太雷是秋白的同乡、同学，又同是“五四”运动中中学生请愿代表，同受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组织者及成员的影响^②。天津之夜曾抵足长谈。而今张太雷在莫斯科见到秋白是如此热心共产主义人间化，也就自然成了秋白的入党介绍人^③。秋白参加共产党，这是他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的明显标志。就在他转为正式党员的9月，他写下了抒发“世界大同”

① 鲍里斯·舒米亚茨基云：“在共产国际‘三大’召开的一个月以前，接到一个通知，说中共中央派张太雷同志和刚从中国起程的杨厚德同志作为出席国际‘三大’的代表。”“一九二一年六月，张太雷同志与杨厚德一起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② 罗章龙《忆太雷同志》：“一九二〇年，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酝酿成立期间，太雷与天津一部分同学于方舟、韩麟符、安幸生等率先参加了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见《回忆张太雷》P66。按：此虽孤证，但张太雷与李达、邓中夏、高君宇等既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会员，又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这样，他们应有联系。瞿秋白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成员，他们也就间接对秋白有了解。

③ 瞿秋白《多余的话》附录《记忆中的日期》：“一九二一年五月，张太雷抵莫介绍入共产党。九月，任东大翻译始正式入党。”另外，《多余的话》中提到“是张太雷介绍我进党的”。由此看来，秋白当时是联共（布）党员，也是中共党员。因为秋白1921年5月已是党员了，所以1921年9月，秋白才能成为东方大学中国班的翻译与助教。（中国班学员有刘少奇、任弼时等。）作为秋白是1921年5月入党的重要旁证是，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中国代表团中国共产党代表名单。这次会议是1921年11月11日召开的，中国有54名代表，其中共产党23名，共青团17名，其他为14名。（见鲍里斯·舒米亚茨基《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历史片断》）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一大”后成立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拟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正式代表。（见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P3，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

另一说为1922年2月入党。依据是李克长的《瞿秋白访问记》，李克长记秋白答：“次年，（可推算为1922年）张国焘、张太雷等到俄，介绍我入共党。”（见《国闻周报》第12卷26期，1935年4月24日出版。）张国焘是1922年1月到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张太雷1921年8月回国，1922年1月赴苏，也是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又据肖劲光《回忆旅俄支部前后的一些情况》：“任弼时是一九二二年初转党的”，“瞿秋白入党我们都举了手。”（见《“一大”前后》（3）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的共产主义理想的诗句：“愿万族共‘婵娟’，但愿‘婵娟’年千亿。”“欧亚华俄——情天如一。”^① 1921年10月，他更明确地写道：“二十年来盲求摸索不知所措……如今幸而见着心海中的灯塔”。党呵，你就是灯塔，你就是方向。成为共产党员的秋白记下的就是这样的“心影心响”。在莫斯科，秋白写了大量的通讯报道，除邮寄遗失的外，还在《晨报》上发表了《共产主义之人间化》、《自赤塔至莫斯科的见闻记》^②等40多篇，计16万多字。在此同时，于1921年10月完成尚未写完的《饿乡纪程》。另外，他自1921年2月16日起就着手写《赤都心史》，到1922年3月下旬完稿，8月又写了“引言”。主要抒写秋白心灵的感受。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饿乡纪程》与《赤都心史》是散文集，并非游记，也非报导。不然，秋白为什么又另外写这么多通讯报道呢？后文对此还要展开论说。还可看出，秋白赴“赤都”的行程，以及秋白如何背叛“士”的本阶级，走向共产主义思想变化的历程。近些年来，有的研究学者看到秋白《饿乡纪程》的“程”是“路程”与“心程”，指出其作品是“复线结构”。^③这是极有见地的。但是，是“心程”为主线、还是“路程”为主线呢？值得深

①《瞿秋白文集》第1卷P178。②同①P109。

③这篇通讯与《莫斯科之耶稣复活节及五一节》，均未收入1953年版《瞿秋白文集》。它们都是瞿秋白所作，都曾在《晨报》发表后，后收入《晨报》1924年出版的《游记第二集》，由丁景唐同志于1958年发现，现前一篇已收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P178—183，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后一篇也收入此卷，P246—249。

④姜建《“五四”散文中的一朵奇葩》：《饿乡纪程》“是一种复线结构。客观的描写随作者足迹而展开即路程，内心世界的刻画随作者心理起伏而展开即心程，一明一暗构成双线。”见《瞿秋白研究文集》P243，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入探讨^①。

(三)社会的心灵

上文谈到有评论者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专著把秋白的这两部作品作为游记，认为“这些通讯游记”是“报导十月革命后俄国情形的”。这是作者主要表现的，也是这两部作品的“最大成就”。果真如此么？先说体裁。从作者自述来看。秋白在《饿乡纪程》《跋》的后记中说：《饿乡纪程》“以体裁而论为随感录”^②。在《赤都心史·引言》中说：

两书均是著者幼稚的文学试作品，而决不是枯燥的游记，决不是旅行指南！——欲了解一国的社会生活，决不能单凭几条法律几部法令，而要看得见那一社会的心灵。^③

这里可以看出著者不是作为游记来写旅途所见所闻及自然风光的，而是作为随感的散文来写显示社会心灵的生活的。

再从与中外游记的比较来看。我国古代的酈道元的《水经注》、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以及谢灵运的《游名山志》等，记述山川地理，异地风俗。比较枯燥，还称不上文学作品。外国的马可·波罗写中国的游记，内容较丰富，但也缺乏文学性。而秋白的这两部作品是使人动情的文学作品。《饿乡纪程》共16节，前九节虽从话别、起程写到列车至中苏边境，但主要是写自幼至今秋白思想的变化，以及为何赴“饿乡”，新俄国在秋白心中的初步印象。旅途退居次要地位，突出的是心灵的感受。文学是展示人的心灵的。正是在这方面它不同于那些枯燥的游记、旅行指

^①王铁仙同志既是秋白的亲戚（他母亲是秋白的妹妹），又是研究秋白颇有成就的学者。在瞿秋白学术讨论会期间，曾跟笔者谈到，《饿乡纪程》与《赤都心史》的主线，应是秋白的心理。这对笔者深有启示。后面将就此研讨。

^②《瞿秋白文集》P 109。^③同^② P 115。

南，而成为文学作品。《赤都心史》有49则诗文，虽叙写在莫斯科的见闻、观察、游览，但主要写在“赤都”生活的感受、“冥想感会”，是“我心灵的影和响”。^①正因如此，所以，它也如其他那些优秀的文学作品一样，引起人们心灵的共鸣。还有些游记，象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姚鼐的《登泰山记》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或写山川风水，或借景思古幽情，而秋白运用了游记的某些形式，开拓其题材的领域，山川自然仅作背景，着重在社会、人生面貌的展现^②，社会心灵的反映。这使得它们与这些游记不同。在现代散文史上，它们也由于运用散文反映重大社会题材而开拓了散文领域，从而在散文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在“五四”时期既有开创性，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再剖析这两部作品的特色，看它们所表现的主要内容、成就。它们不同于写自然风光游记的第一个特色是，秋白以生动的文笔，在这两部散文集中描叙了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人民面临的种种困难、严峻的形势：帝国主义支持下白匪叛乱，战乱破坏了年轻苏维埃国家经济，旱灾侵袭俄罗斯大地，投机商人十分猖獗。对此，秋白没有作纯客观的描写，而是饱含着主观的强烈感情，赞颂了英雄的苏联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不畏强暴，不畏艰险，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赞颂了人民坚信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的信念。跟孙福熙写的旅居法国的游记《山野掇拾》相比，《山野掇拾》勾画的是，法国乡间大自然的风光，白云、小溪、山峦、花草等等。而《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则是红色的风暴、时代的风云、社会的奇变，多侧面展现了苏俄人

①《撰秋白文集》第1卷P114。

②秋白是文学研究会会员，会员登记号为第40号。他认为文学“是社会的反映”，他的这两部作品着重在反映社会的心灵，也正是他为人、为现实的文艺观的反映。

民的风貌、社会的心灵。因而，它们跟孙福熙那类游记不同，也不同于一般地对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的报道。秋白在写社会变革时，注重写社会的心态变化。秋白说：

“社会革命，俄国的社会革命，”“是社会心理，——实际生活‘心’的一方面，——及经济生活，——实际生活物的一方面，——和合而映成的蜃楼。”^①

在这两部作品中，对政治、经济、民俗等各方面的变革，秋白总是以敏锐的观察力，于细微处反映这种变革。例如，当时停止战时“军事共产主义”经济政策，实行新经济政策。对外开放，“与国外通商”，“借外国资本来发展俄国工业——社会主义的基础”，“聘用外国技师，购买外国机器”等。^②对这些重大变革秋白通过生动场面、细节来描述：

“十字街间，旷场两面，一排一排小摊子。……人山人海，农家妇女，老人，工人，学生……种种色色人，簇拥在一处。这里一批白面包，香肠，火腿，牛奶，糖果点心，那里一批小褂，绒裤，布匹。一堆一堆旧书旧报，铁罐洋锅，碗盏茶杯……唔！多得很呢！”“街窗里红玫瑰绣球花欣欣的舞弄他的美色，一处两处散见着新漆的商号匾额，——啊哎！热闹呢！再不象‘冬时’，军事的共产主义之下，满街只有茫茫的雪色，往来步行的‘职员’，夹着公事皮包的人影了。”^③

这里，秋白勾勒出新经济政策初期，开放商业不久出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秋白不仅揭示出苏俄实际生活的巨变，而且还深刻地挖掘出社会心理的变化。他写道：

这几天正是赤潮高涨的时候。……大剧院五千余座位

①《瞿秋白文集》第1卷P93。②同①P139。

③《瞿秋白文集》第1卷P154—155。

都占得满满的，在台上四望，真是人海，万头攒动，欣喜的气氛，革命的热度已到百分。^①

20年代，英国的罗素写《游俄之感想》。虽写了作者心灵感受，但罗素感到的是俄国革命的阴森可怕。中国的徐志摩也善于观察，他观察体验到的是“莫斯科人的神情更是分明的忧郁、惨淡”，“心上都压着重量似的”^②。为什么他们的感想、他们写的莫斯科人的心灵与秋白的截然不同？这是因为秋白不仅有文学家的素养，诸如观察深刻，善于体察社会心理等等，而且有正确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指导。

它们不同于写山川自然游记的第二特色是，把视角放在阶级、群众的心理上，把焦点集中在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上。对苏维埃社会的主体，秋白写道：“革命的风暴时期，群众集会的社会心理现万丈火焰，不可阻的伟力。”确实是“赤潮澎湃”。^③对资产阶级心理，秋白在作品中写道：

“俄国女郎说道：‘可怕得很！可怕得很！莫斯科去么？……’女郎披着紫狐披肩耸耸肩，慌慌张张的。……看完戏出来，那女郎又对我说，他家有一所房子，现在一大半充公了，自己只留四五间住的，其余尽让新来官员住，还有工人……弄得一塌糊涂。”“资产阶级的心理，生来如此。”^④

对被没收财产的地主，秋白通过对其言语、神态的描述，揭示其惶惚迷乱的心理。这个老是嚷嚷着“什么！什么”的地主说道：“我没有犯罪，为什么没收财产？”——他始终不明白是革

①《瞿秋白文集》第1卷P159。

②徐志摩《欧游漫录》，《徐志摩全集·散文集（丙丁）》，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3年版。

③同①P200。④同①P73。

命。”他“有时背着手，有时又叉着腰，独行踽踽，来去踟蹰，不时指手划脚，呢喃自语：——呀！什么”。①真是维妙维肖。

秋白除描述不同阶级、阶层的心理来反映“社会，心灵”外，更把艺术的焦点对准一个个有心灵的活生生的人。在这两部作品中写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苏维埃领导人路纳察尔斯基、②列若乏·等，也写了教委的普通职员刘博文纳女士、历史教授纪务立、托尔斯泰孙女苏菲亚、翻译郭质生以及工程师和村苏维埃秘书等。秋白在作品中多次描述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写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演说，秋白着重写列宁的头影：

电气照相灯开时，列宁的伟大的头影投射在共产国际“各地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等标语题词上，又衬着红绫奇画，——另成一新奇的感想，特异的象征。③

辅之以群众的反映：“列宁的演说，篇末数字往往为霹雳的鼓掌声所吞没。”④秋白写列宁出席赤色十月工厂庆祝晚会，则侧重写党的领袖对群众心灵的凝聚力：

列宁立登演坛。全会场都拥挤簇动。几分钟间，好象是奇愕不胜，寂然一响，后来突然“万岁”声，鼓掌声，震天动地。……工人群众的眼光，万箭一心，都注射在列宁身上。大家用心尽力听着演说，一字不肯放过。⑤

秋白通过写群众对领袖的敬仰，反映社会心灵的聚集力。

①《瞿秋白文集》第1卷P202。

②苏俄教育人民委员。苏联文艺评论家、作家。（1875——1933）著有《艺术与马克思主义》及剧本《解放了的董吉诃德》、《浮士德与城》等。

③苏俄通商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

④⑤瞿秋白《赤都心史》18《列宁杜洛次基》，《瞿秋白文集》第1卷P162。⑥同①P203。

还由一个个普通苏维埃人的心灵，显现“社会的心灵”。在《心灵之感受》这章节中，秋白叙写了一位村苏维埃秘书平凡的经历。欧战后，布尔什维克解放了他，社会变革促使他心理变化。这位近30岁的青年人，一次路中遇见一老妇背着一大袋马铃薯，踽踽前行。这位青年人帮她背了大袋，一直送她到家，替她安置好。出老妇家他往自己家走时，觉得身上十分轻松，原来烦闷的心绪一扫而光。他说：“‘为人服务’，忘了这‘我’，‘我’却安逸，念念着‘我’，‘我’反受苦。”^①这岂是这位年轻的村苏维埃秘书的感受，而是保尔克察金那一代苏维埃青年的心灵，是俄罗斯心灵的精采。文中这位青年人说：“——唔！中国的青年，那知俄罗斯心灵的悠远”，^②怎么悠远呢？秋白的心灵与之是相通的。秋白之后，张思德精神、雷锋精神不都与之相通的么？

它们不同于那些科学性游记的第三个特色是，对山川景物不是纯客观的介绍，而是融入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③对祖国赤诚的爱，对家乡炽烈的思念，化作对中华大地景色的赞颂：

“江南风物，清山秀水，松江的鲈鱼，西乡的菘菜，为我营养；”“豆棚瓜架草虫的天籁，晓风残月诗人的新意，怡悦我的性情”。^④

情真意切，达到物我交融的境地。有些游记虽也寄情于景，象俞平伯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但仍与秋白的这两部作品有别。秋白的往往是情、理、景交融，形成蕴含深刻社会意义的意象。例如：

“一望远东，紫赤光焰，愈转愈明，炎炎的云苗，莽然由

①②《瞿秋白文集》第1卷P175、173。

③王国维《人间词话》 ④同①P15。

天际直射，烘烘烈烈，光轮轰旋，——呀！晓霞，晓霞！”“可以确信，神明的太阳，有赤色的晓霞为之先声，不久不久，光现宇宙，满于万壑。”^①

“晓霞”含有革命胜利的黎明来临的寓意，“太阳”则是理想社会的象征。“神明的太阳”必将照亮沉睡的东方古国，“光现宇宙”，多么坚定的信念，多么豪迈的气势，多么深邃的哲理。

有的散文也含有丰富的寓意，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他们都是江苏籍作家，各有其特点。朱自清的散文含蓄、深沉，意境幽远。秋白的散文明白、晓畅，意境博大而深长。

(四) 赤子之心谱

杨如鹏同志认为秋白的这两部作品是报告文学，这种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②，因而，也更值得探讨。相关的另一问题是，“路程”与“心程”何为主线？描述“心程”的特色是什么？

究竟是通讯报告，还是叙写心程的随感或散文？先看秋白自己在《饿乡纪程》《跋》的后记中是怎么说的：

此中凡路程中的见闻经过，具体事实，以及心程中的变迁起伏，思想理论，都总叙总束于此（以体裁而论为随感录）。至于到俄之后，这两部分，当即分开。第一部分：一切调查，考察，制度，政事，拟著一部《现代的俄罗斯》，用政治史，社会思想史的体裁。第二部分：著者的思想情感以及琐闻逸事，拟记一本《赤都心史》，用日记，笔记的体裁。^③

①《瞿秋白文集》第1卷P229。②同①P109—110。

③黄修己：“现代报告文学则发轫于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见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简史》P296，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6月版。刘炼、李安葆《五四时期的瞿秋白》认为它们是“两本通讯集”。见胡华主编《五四时期的历史人物》P180，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出版。

这里，秋白说《饿乡纪程》是“随感录”式的散文，说《赤都心史》是“日记、笔记”式的散文。还明确说明全面系统调查、报告苏俄制度和政事的，将著《现代的俄罗斯》。可见，对这两部作品秋白不把它们作为“通讯”“报告”体裁来处理。这在《赤都心史·序》中说得更清楚：

“于此时期，我任北京《晨报》通信记者的职务，所以一切赤国的时事自有继续的通信，一切赤国的制度另有系统的论述，不入《赤都心史》内。”“不敢用枯燥的笔记游记的体裁。”“所以杂集随感录”。

此处，秋白更为明确说明：关于苏俄革命的观察报告、制度的系统论述，不入《赤都心史》。其“另有系统的论述”，是指用社会科学论文体裁著的《俄罗斯革命论》。而苏俄的时事则有通讯报告。《赤都心史》写的是深切的感想，用的是随感录的形式。如果还是“报告”，那秋白写的40多篇报道已报告过了，还用再写这两部作品吗？《赤都心史》12的《劳工复活》^①，写于1921年5月1日，注重人们在“五一”节又是复活节心态的描写，具体描写多，对话多，心理表现多，用的是随笔笔调写的。而同一题材的《莫斯科之耶稣复活节及五一节》^②，写于同年同月4日，着重在报道五一节又是复活节这天莫斯科的动态，叙述多，写的事件、演说较详细。前一篇写群众心态，对嘉里宁^③的演说一笔带过，至于其他代表的演说、露天音乐会等均略去。它是散文。后一篇则是事实的新闻报告，侧重点不在节日气氛的渲染，主要是

①《瞿秋白文集》第1卷P114。②同①P144—146。

③《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P246—249，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原载1921年5月24日、25日《晨报》，署名瞿秋白。

④嘉里宁，现译加里宁（1875—1946），当时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节日活动的报道，具体报道了加里宁演说的主要内容，并提到美国回国的工人代表、英国工人代表、巴尔干半岛代表的演说，简要报告了露天大会，音乐会的情况。它是通讯报告。由此可见一斑，这两部作品都是散文体裁。

对这两部作品的结构，一些秋白的研究者注意到“路程”与“心程”交织的“复线结构”。谁为作品的主线呢？有的学者认为路程中的见闻事实，是主线，心程的起伏变迁是副线。这看法尚可商讨，还是先看秋白自述。

《饿乡纪程·跋》后记：“这篇中所写，原为著者思想之经过”。①

《赤都心史·序》：“《赤都心史》将记我个人心理上之经过，在此赤色的莫斯科里，所闻所见所思所感。”“是我心理记录的底稿。”“赤都中心影心响的史诗，”“心弦上乐谱的记录。”②

再看作品的情况。《饿乡纪程·绪言》概述“我愿去，我不得不去”“饿乡”。为什么会不怕“冰天雪窖饥寒交迫”，一定要去“饿乡”呢？一至四节写出身旧的士族，致使自己“心灵虽有和谐的弦”，却“弹不出和谐的调”，而“决然忍心舍弃老父及兄弟姊妹亲友而西去了”。这里，秋白用了1.5万字左右的篇幅回顾自己的思想发展，如何产生“内的要求”，“决定到俄国去走一走”。这里，不是开头就讲旅途见闻，而是交待为什么去的缘由。显然，是以心程为主线的，第5节虽讲起程，着重还在讲“我入俄的志愿——担一份中国再生时思想发展的责任”③。此后，“路程”与“心程”虽然成双线发展，但是心潮起伏倒是秋白着重要写的，旅途见闻、景色只是背景，心程虽随着路程的推进而发展，但这

①《瞿秋白文集》1卷P109。②同①P114。

③同①P31。

只是“内的要求”发展必然性的反映，“路程”仅是表层结构，“心程”才是深层结构，作品要表现的、打动人心的也是这深层的“心海心波”。因此“心程”是主线，《赤都心史》虽有参观等活动，并不象《饿乡纪程》中那样有预定的行程，“路程”更居于次要地位，中心是“赤都中心影心响”。作品所记无论是社会心灵的描述，还是自我的解剖，都是“于心灵的明镜上显种种光影”，故而名“心史”。自然，心程是主线，莫斯科参观见闻是副线。

“五四”时代新文学家许多都注重写心灵的情感，都注重个性。秋白这两部作品又有什么特色呢？

其一，深刻地分析社会和“‘士’的阶级”。

冰心也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在20年代也有因旅居国外而写成的散文集^①，最初也是登在《晨报》上的，写的也是“国外的经历，和病中的感想”^②，着重也在内心的心绪。范伯群和曾华鹏论及这部散文集时说：“《寄小读者》是她留美生活的侧影，又是她游学时灵魂的心图。”^③但是，冰心往往写她自己的心声，限在狭窄的圈子里，^④除抒发对祖国之爱外，较多反映的是：母爱、童心、个人的愁怅，缺乏从更广阔的方面对社会、对阶级、对自己作深刻的解剖。同是写离别，冰心写的是：“载着最重的离愁，飘然而去！”“我的心是如何的飞扬而凄恻！”^⑤唤起的是童年的回忆、依恋。而秋白写离别是放在将赴“赤都”这个大社会

①冰心，1923年8月赴美留学，三年中给《晨报副镌》《儿童世界》专栏写了29篇通讯形式的散文，1926年集成《寄小读者》出版。在“五四”时期也有散文作品。②《冰心全集·自序》

③范伯群、曾华鹏《冰心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④茅盾《冰心论》：“冰心女士最属于她自己。她的作品，不反映社会，却反映了她自己。”

⑤冰心《寄小读者·通讯七》

背景下来写的，其中不乏亲子之爱，好友离去的牵挂之情，可那是当时的社会心理折光。而且，紧接着表现的不是“爱的哲学”，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深刻地解剖“‘士’的阶级”。从世界资本主义的侵入，旧中国走入半封建半殖民地化，使得“旧的家族生产制快打破了。旧的‘士的阶级’，尤其不得不破产”。分析到他自己的阶级出身，他思想“裂变”的社会与阶级的原因：

我的诞生地，就是在这颠危簸荡的社会组织中破产的“士的阶级”之一家族里。这种最畸形的社会地位，濒于破产死灭的一种病的状态，绝对和我心灵的“内的要求”相矛盾。①

封建大家族的腐朽、虚伪，表面虚情假意，内里嫉恨暗斗，使秋白憎恨“士”的阶级，使他要离去这“颠危簸荡紊乱不堪”的旧中国社会，而“要求改变环境”，去“红艳艳光明鲜丽的所在”，去探求入生，建立人与人新型的关系，“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冰心也憎恶封建社会、制度，也探索入生，但她常处于矛盾之中，她缺乏追求光明的胆略②。而这跟冰心还属于小资产阶级进步作家，只是有一般民主主义意识相关。秋白则通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李达、张太雷等的影响，粗具社会主义观点，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因而，秋白才能有不同于一般的深刻观察力，在作品中反映社会的本质，指出“士”的阶级由“震颤动摇”到“模糊渐灭”的历史命运，看到自己必须与它“裂变”，相信“总有那一天，所有的‘士’无产阶级化了”。这是秋白这两部散文集的“亮色”所在，也是它们不同于其他“五四”进步作家的特色所在。

其二，严格而坦荡的自我解剖。

①《瞿秋白文集》第1卷P14。②《冰心小说散文集·自序》：“我只是暴露黑暗，并没有找到光明，原因是我没有找光明的勇气！”

“五四”时期进步作家不少主张表现个性，表露真情。郁达夫的散文敢于袒露自己的内心，写得情意沛然。^①但是，他缺乏自我批判，往往单纯吐露忧郁、感伤的心绪。而秋白在这两部散文集中既有真诚坦荡心灵，又有鲁迅的那种自我解剖、自我批判精神。秋白在自我解剖中不断地否定“厌世观”、“颓唐气息”，尤其对“二元人生观”，他大胆地暴露。一方面是“略略领会得唯实主义的人生观及宇宙观”，否定资产阶级的“自由”、“博爱”。他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革命，只赚着一与台奴婢匪徒寇盗的独裁制”^②。另一方面他深知“无产阶级化”的“化”也是曲折的、长期的。对心底还潜伏着“烦闷”、“绅士意识”，他毫不隐讳。在《赤都心史》35节《中国之“多余的人”》中，他以“多余的人”^③自比。其时，病魔缠身，“病卧几天，移我入此高山疗养院”，痛苦异常。心想“出院后某天当做某事”。然而，现实是病中“忏悔，悲叹，伤感”，什么实事也不能干。因此，他感到“我生来就是一浪漫派，时时想超越范围，突进猛出，有一番惊愕歌泣之奇迹。”“自己也曾以为不是寻常人，回头看一看，又有什么特异，可笑可笑。”浪漫与现实“两派潮流的交汇，端洵相激，成此旋涡——多余的人。”理智与情性相乖、“现实与浪漫相敌”，“心与智不调”，“宁可我溅血以偿‘社会’，毋使‘社会’杀吾‘感觉’”。

①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作家的个性，无论如何总需在他的作品中保持的。”载《郁达夫选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郁达夫《奇零集·日记文学》，说他的散文“多是解剖自己，阐明苦闷心理的记载”。开明书店，1928年版。②《瞿秋白文集》第1卷p23。

③“多余的人”，原指19世纪俄国文学中反映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象屠格涅夫《罗亭》里的罗亭、普希金《叶甫尼·奥涅金》中的奥涅金等均是“多余的人”的代表。他们对沙皇统治不满，感到生活窒息苦闷，强烈要求改变社会现状，可又缺乏行动的勇气、实干的才智，无所作为，被称为“多余的人”。秋白以此自比，并非真是“多余的人”，而是他对自己严格要求的表现。不过，这也多少反映他性格某些侧面，与他同时代的周恩来属于实践型的革命家，而他则是理论型的革命家，有文人的气质、才华。

① 这里，秋白不仅坦露心灵理智与性情的搏斗，而且与鲁迅一样“我以我血荐轩辕”。在《赤都心史》27节中，秋白思索着：

我看来暗暗的想，他们——非智力的劳动者，——即使有困难苦痛，大概永没有我这一种……“烦闷”呵。②

秋白向工农大众学习，在自我解剖中不断否定旧我，克服“异己的”意识、情感，这就使得这两部作品既有郁达夫那种大胆暴露自我，又不同于郁达夫散文的特色。那种严于解剖自我、战胜旧我不正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么？

其三，独特而鲜明的思想个性与创作个性。

秋白自己曾说：“我愿意突出个性，印取自己的思潮”。③在这两部作品中显示了秋白独特的个性。他从探索真理，追求“佛教人间化”，转向“共产主义人间化”，形成共产主义战士的个性。其思想演变的轨迹清晰反映在他的作品里，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他的走向马克思主义，不同于恽代英、张太雷，也不同于毛泽东、周恩来。他是经历了痛苦的复杂的自我灵魂的搏斗，这方面他与鲁迅之成为共产主义者是十分相似的④。秋白这种独特的无产阶级战士的个性，也与他同时代进步文学家的个性不同。他是无产阶级“化”了的。秋白在《我》这章节中对自己是这样说的：

“我”不是旧时代之孝子顺孙，而是“新时代”的活泼稚

①《瞿秋白文集》第1卷P219—220。②同①P183。③同①P114。

④鲁迅与秋白有许多相似性，可以相提并论。可是，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陈独秀，瞿秋白对人生等所做出的一些理论上的思考和阐述，大都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由于缺乏与中国极其复杂的社会各阶层打交道的丰富经验，缺乏中国政治极需的权术、手腕和策略的灵活性，更由于缺乏实力后盾，使他们注定是不幸的。笔者认为秋白的“不幸”主要是极左路线造成的，与陈独秀的“不幸”不能相提并论，秋白更不是属于陈独秀一类的历史人物。这，党的历史文献早有定论。

儿。

固然不错，我自然只能当一很小很小无足轻重的小卒，然而始终是积极的奋斗者。

我自是小卒，我却编入世界的文化运动先锋队里，他将开全人类文化的新道路，亦即此足以光复四千年文物灿烂的中国文化。

显然，秋白比他同时代的文学家思想高度要高。有趣的是，冰心也写了《我》，文中她说：“照着镜子，看着，究竟镜子里的那个人是不是我。这是一个疑问！”“这疑问永远是疑问！这两个我，永远不能分析。”“周旋世界的我呵！在纷扰烦虑的时候，请莫忘却清夜独坐的我！清夜独坐的我呵！在寂静清明的时候也请莫忘却周旋世界的我！”^②这里，作者能坦露自我，但尚不能用马克思主义观分析自我，这个“我”是充满矛盾的、孤独的，还是小资产阶级的“我”。

秋白的《我》讲“我”是无产阶级化了的，这个估计是实事求是的。他进入这思想境界是长期的，经过思想痛苦斗争的。秋白不象郭沫若，郭沫若是十足的浪漫派，在《女神·序诗》中就宣称“我是一个无产阶级者”。其实，当时郭沫若“连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概念都还没有认识明白”^③。《饿乡纪程·绪言》中“我”虽然明确向往红光所在的“饿乡”，但秋白并没宣称自己已无产阶级“化”。至《赤都心史·序》，他已亲历“赤色新国的都城”，眼见其“万丈火焰”，受其熏陶。实际上，他已与“士的阶级”决

①《瞿秋白文集》第1卷P213。

②婉莹(冰心)《我》，刊《燕京大学季刊》第1卷第4期。1920年12月1日。

③郭沫若《创造十年》，《沫若文集》第7卷版P133，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裂，他还没有宣称自己无产阶级化了。直至1921年12月，他已经加入无产阶级先锋队，秋白只是说“我自是小卒，我却编入世界的文化运动先锋队里”。可见，秋白对自己要求是高标准，又是谦虚的。虽然，他们两人在浪漫气息上有相通之处，但在思想性格上却是各有特点的。就散文的诗化、情感的浓郁而言，两者又有相似之点。

秋白的散文风格个性特色也是鲜明的^①。秋白有敏锐的政治观察力、哲学的思辨力。他的散文富于哲理。如“个性的生活在社会中，好比鱼在水里，时时要求相适应。”内涵丰富，耐人寻思。他的散文是诗与哲理的结晶，这与纵情抒写、似诗的郭沫若散文有区别。冰心的散文雅隽、柔美，周作人的散文恬适淡泊，孙福煦游记悠闲、超脱，郁达夫的散文伤感、狂放，秋白的散文思想深刻、语言明白晓畅，饱蘸感情、气势奔放，格调高昂、显示时代的亮色，它是革命现实主义的，又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萌芽。他的散文，境真情真：“饿乡之‘饿’，锤炼我这镣指柔钢，”“饿乡的‘实际’在我这一叶扁舟的舷下，——罗针指定，总有一日环行宇宙心海而返，返于真实的‘故乡’。”展示了他的真志向、真心灵。他欢呼并坚信“革命赤日的遥光”，显现了他坚定的真信念与内在的人格力量。确实是文如其心^②。

①秋白散文的个性，笔者在《现代作家作品百题》（1985年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中，曾有专文涉及，此处有发挥。

②司马璐在《瞿秋白传》中诬蔑秋白是“自由派的共产党人”，在苏俄“悲观”、受“迷惑”，才写了“对苏联共产党充满溢词的文章”。上述秋白文字在，秋白言行在，狱中他说：“只要共产党在，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何来“悲观”、“自由派”的气质？

三、高尚的情操 纯洁的爱情

——秋白的精神文明观和审美观

1923年，地球上还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在世界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秋白就撰写了《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不仅鲜明地提出在“资本主义式的文明”统治下，“美国的黑奴”“受‘西方式’的物质文明影响而精神文明便大大的堕落”，^①而且，指出通过“社会革命”、“热烈的斗争和光明的劳动”，求得“社会主义的文明”，求得“精神文明”的“改善”。^②早在半个多世纪前，秋白在这篇以及《美》等文章中，阐述了精神文明建设、树立审美理想的重要性，具体地论说了革命人生观、妇女观、爱情观、审美观、文化观、伦理观等。许多论述今天读来仍十分亲切。这正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开拓了关于瞿秋白政治思想理论的研究领域——过去还局限在他对文艺方面贡献的研究。

秋白是无产阶级杰出的战士，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美育，作出开拓性的理论贡献，他更以共产主义情操冶炼身心。在他曲折一生中高唱《国际歌》前进，为崇高的理想而献身；他忠于党的事业又热恋着剑虹，这本身就是一曲高尚的爱情之歌；他与杨之华冲破种种陋习，结为“秋之白华”，显示了新型的妇女观、婚姻观；他对女儿独伊不是亲生、胜似亲生，表现了一种新的道德观。优秀共产党员人与真、善、美的人，在他身上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他的言行成为精神文

^①原载1924年1月10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21卷第1期。现收入《瞿秋白选集》P100—101。^②同^①P108—109。

明建设的榜样。尤其是对还有精神锁链束缚的妇女,更有启迪。话从“英德纳雄纳尔”歌说起。

(一)翻译“英德纳雄纳尔”歌

“英德纳雄纳尔”俄语为:“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国际”之意。“英德纳雄纳尔”歌即《国际歌》。秋白说:“此歌自一八七〇年后已成为一切社会党的党歌,如今劳农俄国采之为‘国歌’”。①当时,它是共产国际的党歌。1920年12月,秋白在赤塔阅读了《共产国际》杂志。1921年6月,他积极参加共产国际的活动,并由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任中国科书记的张太雷介绍参加苏俄共产党。1923年,他任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的助手与翻译。此后,他一步步走上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岗位,这无不与共产国际相关。秋白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培养下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他对党、对共产国际以至共产国际的歌都有特殊的感情。

秋白第一次听到《国际歌》是在哈尔滨。1920年11月17日,他参加哈尔滨工党联合会召开的纪念十月革命胜利、纪念共产国际成立庆祝会时,听到这雄壮的歌声。自此,他就把“英德纳雄纳尔”装在心坎里。带着她穿越西伯利亚,到达“赤都”,并在那里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高唱“英德纳雄纳尔,一定要实现”。1923年1月13日,秋白随参加共产国际“四大”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回北平。心里不由自主地又哼起了“英德纳雄纳尔”,因为它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②。它是“世界大同的兆象”,是“革命歌”。③唱着它,想到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唱着它,胸中

①③1923年6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季刊第一期,秋白译《国际歌》歌词前小序。

②列宁《欧仁·鲍狄埃》,载《列宁选集》第2卷P434。

充满战斗的激情；唱着它，“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①；唱着它，坚定豪迈，从胜利走向胜利。当时《国际歌》在中国虽有不只一种译文^②，但都不够理想，难以配着乐谱唱。秋白此时已任党的机关刊物《新青年》主编，创刊号又是《共产国际号》，他决心把这个共产国际的党歌，无产阶级战斗的歌，译得它能唱，使“中国受压迫的劳动平民，也能”唱着它，“和世界的无产阶级得以‘同声相应’”^③。

如何译得既准确又好唱呢？那时秋白在堂兄纯白及叔叔菊农两边都住住。叔叔瞿菊农家有一张小风琴，^④秋白常常在风琴旁工作着，按《国际歌》的乐曲配译歌词，拿着译的歌词在风琴上

①列宁《欧仁·鲍狄埃》

②曹靖华《罗汉岭前吊秋白》：“你（按：秋白）说《国际歌》当时已经有了三种译文，可是没有一种译得象样，更谈不到能唱了。你要把它译得能唱，使它在中国人民口头上传布开来。”见《忆秋白》P165。

王小方《瞿秋白翻译《国际歌》》：“当时的中国，《国际歌》虽然有两种译文，但都译得不理想。”见《中国现代爱国者的故事》P54。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现知当时《国际歌》的译文有：一是耿济之与郑振铎合译的《第三国际党颂歌》，刊1921年9月《小说月报》第12卷号外《俄国文学专号》上，作为诗歌的“歌”译的，刊出时无曲谱。二是1920年时肖三在巴黎据法文《国际歌》翻译的，翻译后抄了数份寄回给国内的毛泽东同志。见李薰陶《萧三译《国际歌》》，刊《名人传记》1988年第1期。

③秋白译《国际歌》歌词前小序。

④曹靖华《罗汉岭前吊秋白》：“秋白，一九二三年初，你回国后，住在北京黄化门西妞妞房（按：今东板桥胡同）你的叔叔家里。”“你住的是一个跨院，有两小间房，外间靠门口的隔壁跟前，放着一张小风琴。你那时正在译《国际歌》”。又，瞿纯白之子瞿重华《大叔秋白生平琐记》，回忆秋白从莫斯科返国，曾住他家，教他唱《国际歌》，“歌页上的词曲排列成三行”，“第二行，是秋白大叔根据法文原文歌词译成的中文”。见《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可见，此时秋白已译好《国际歌》，不是在纯白家译的，如是，则重华的回忆中要提到。

自弹自唱，不断斟酌修改，直到顺口易唱为止。到译唱到“国际”一词时，秋白在风琴旁来回走动，这个词在汉语里是两个音节，而在外文中那是一串长长的音节，对照乐谱，足有8拍。怎么解决这难题呢？他走动着，思索着，嘴里还不停地哼着“英德纳雄纳尔”，这旋律气势磅礴，这歌词似奔泻的洪水，难以停顿。突然，他停住了脚步，言语学的知识使他得到“灵感”。秋白回到琴边，手按琴键，又弹起高亢激越的曲调，随着琴声，他心中燃烧着火一样的激情，不由唱出了“这是我们的最后决死争，同英德纳雄纳尔，人类方重兴”^①。词与曲和谐地融合成一体！这里，秋白用音译解决了这个矛盾。这固然是得力于语言学方面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出于政治鼓动的考虑：“‘国际’一字——欧州文为‘International’，歌时各国之音相同；华译亦当译音”，这样，才能收到“异语同声”的效果。^②

秋白翻译《国际歌》是为了用歌作为宣传战斗的工具。在北京，他白天到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等处演讲^③，晚上到纯白家，教纯白之子重华唱《国际歌》，让下一代，子孙后代，为实现“英德纳雄纳尔”这一伟大理想而战斗到底。在上海，1924年，上海大学的庆祝会上，秋白登台按他译的《国际歌》引吭高歌，任弼时等师生一起和唱，“英德纳雄纳尔”的歌声在会场回荡。^④1935年6月

^①这是秋白当时译的原文，现在《国际歌》的词是肖三经多次改译修订而成，但“英德纳雄纳尔”仍用秋白的音译。

^②秋白译《国际歌》歌词前小序。又，曹靖华《罗汉岭前吊秋白》：“你（按：秋白）说这个字（按：指“国际”词）在西欧各国文字都是同音，所以汉语也应该相同。”“这样在唱时可和各国之音一致，使中国劳动人民和全世界无产者得以同声相应，收万口同声，情感交融之效。”

^③许广平就是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听秋白讲演的听众之一。

^④有的著述说秋白在上海白渡桥下受中国党干部布置的任务，而翻译《国际歌》的。见《瞿秋白的故事》P19—20，刊《飞鹰》1989年第3期。这说法有误。

18日，秋白在赴刑场途中高唱“英德纳雄纳尔……英德纳雄纳尔”，他用歌声向群众宣传：“起来，受人污辱咒骂的！起来，天下饥寒的奴隶！满腔热血沸腾，拼死一战决矣。旧社会破坏得彻底，新社会创造得光华。莫道我们一钱不值，从今要普有天下。”他用歌声向敌人宣布：英德纳雄纳尔，一定要实现！而今，秋白用生命开辟的社会主义新社会已创建，该怎么珍惜她？当党和国家领导同志指挥大家唱革命歌曲时，心似滚滚长江，翻腾激荡，想起了列宁，想起了秋白如何重视全世界无产阶级战斗的歌，用它来鼓舞斗志，进行理想、革命精神、国际主义的教育，进行精神文明的建设。

（二）美好的情爱

爱情观、家庭观反映了人的道德、情操。秋白认为“家庭制度的根本，就是婚姻”，他反对“中国旧式的买卖婚姻”，主张“恋爱自由”，赞成“自由恋爱，是要求精神生活的改善”。^①他与鲁迅的第一次婚姻不同^②，乃经现代自由恋爱而结婚的。秋白当时24岁，是充满活力的年轻政治宣传家；王剑虹年方21岁，是思想解放的中共女党员。他们邂逅在金陵古城。王剑虹、蒋冰之都是湖南桃源第二女子师范的学生，又先后进了陈独秀、李达等在上海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读了些时候，感到不满足，要自己遨游世界。1923年夏，这对叛逆女性闯到了南京。同年8月，秋白受党中央委派到南京东南大学，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真是巧得很，施存统也是这次大会代表。会间，经施存

^①瞿秋白《中国知识阶级的家庭》，刊1919年11月21日《新社会》旬刊第3号。

^②鲁迅与第一夫人朱安的婚姻是由其母周老太太包办的，这是没有爱情的婚姻。

统引见^①，秋白与剑虹、蒋冰之相会了。她们那浪漫色调闯荡江湖的生活、解放了的女性个性、对文学的强烈爱好，引起了秋白好观察人的兴趣。无形之中，剑虹那一双会说话的眼睛，目光里充满智慧、犀利而又柔情，深深印在秋白心间。

王剑虹面颊红红的，眸子里摄下了秋白英俊、潇洒的形象：瘦长个儿，戴一副精致的眼镜，神采俊秀，谈吐不俗，风骨挺拔。爱慕之情油然而生。为何王剑虹对秋白一见倾心呢？或许是她与秋白有不少相似之处^②，诸如善于言词、酷爱文学，或是因为秋白真挚坦荡、博学多才。这只有剑虹心底最清楚。而秋白也被这个同自己一样失去母亲的才女所吸引。接着，秋白又拉着施存统来看望剑虹与蒋冰之。托尔斯泰的故居、普希金的诗……秋白滔滔不绝地说着，不时，秋白那不惊动人的眼光静静地朝剑虹飘过来。剑虹则报之以炽热的目光。于是乎莫愁湖碧波中映着他们的倒影，通向灵谷寺的小径留下他们的足迹。然而，正当他们心醉神迷之时，秋白不得不离开剑虹所在的石头城。30年代前期茅盾称为“于夜”的时期，60年代后期70年代初期，一盆盆污水泼向圣洁的秋白，什么“精神颓废”、“爱情至上”等

①王一知是王剑虹在桃源县第二女子师范的同学，后来一起在上海平民女校工读。1923年7、8月间她与瞿秋白、施存统、张春木（即太雷）、张特立（即张国焘）、邓中夏等在一个党小组。王一知与施存统是夫妇，并有了一个女儿。这样，施存统也就很自然地把秋白引见给王剑虹。

②王剑虹，原名王淑璠，1902年出生在四川酉阳，后迁居湖南。早年丧母。“五四”运动时，她跟秋白相似也是激进派，是湖南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学生运动的领头人。她也象秋白那样善于演说。丁玲（当时叫蒋冰之）回忆说：“她口若悬河的讲词和临机应变的一些尖锐，辟透的言论，常常激起全体同学的热情。”“她象一团烈火，一把利剑。”她爱文学，颇有文采。1921年建党后，她在上海从事妇女工作。《妇女声》等刊物登过她关于主张妇女解放的文章。

等。是“爱情至上”吗？如果真是个人第一、恋爱第一，那么，玄武湖、栖霞山还有多少名胜古迹可供他们游览，为何秋白匆匆别离他所依恋的剑虹呢？他想到的是中共上海区委会9月2日的会议，想到的是9月鲍罗廷任苏联政府驻广州常设代表，马上来上海与陈独秀商议如何帮助国民党改组，而他必须赶赴上海为之准备，并临场翻译。另外，在上海大学任教的张太雷即将赴苏，秋白是上海大学的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②，又是太雷的亲密战友。秋白恋剑虹，更恋党的事业，惦着办与太雷交接有关工作，赶着踏上南去上海的列车。

我党所办上海大学的吸引，以及心底朦胧而又似乎清晰的感情躁动，驱使剑虹约了蒋冰之，不久也进了上海大学，在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学习。秋白是社会学院社会学系的教授，可他上完课后，脚不由自主地走到剑虹和蒋冰之住的小亭子间。剑虹欣赏文学系俞平伯讲的宋词，更喜欢听秋白讲唐诗，普希金的诗，还跟秋白学俄文的普希金诗，以更真切地领会其用词的美丽。就在这小小的亭子间，秋白与剑虹的感情经过一个波折。秋白忙于校务以及党的宣传工作，有几天没到小亭子间来，剑虹变得烦躁，没头没脑地对蒋冰之说，要回童年时代的四川去，说着就走出了使她烦躁不安的亭子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无意间，蒋冰之为同伴整理散乱的被子时，在垫被底下发现一张奇特的布纹信纸，上面密密地写了一行行热恋的长短诗句。呵，聪明的蒋冰之明白了：剑虹热恋着秋白，却不会表达。蒋冰之急忙找了秋白，轻轻地把剑虹的诗交给秋白。秋白一口气读完信上诗后，三步并成两步赶到小亭子间。正好碰上剑虹回来。在亲切

①1968年版《瞿秋白批判集》

②王一知《回忆太雷》：“上海大学也是我党所办的”，“校务实际由邓中夏等同志主持。那时，瞿秋白同志是社会学系主任。”

的目光、柔情的谈话中，剑虹恢复了常态，小亭子间气氛又变得非常温柔和谐。他和她都激动异常，亭子间里桌上满满地散乱着他们写的字条。看来，秋白与剑虹是用笔谈话的，可惜没有保存下来，不然，那才是似诗一般别致的情书哩！这小亭子间笔谈的结果是他们决定把两个人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结婚的时间是1924年1月。洞房不是在这小亭子间，而是在慕尔鸣路兴彬里的一座小楼里^①。

这是真挚的爱，具有高尚情趣的爱。是“精神颓废”、“感情空虚”么？有的人恋爱时是热烈的，结婚后则冷却了。秋白呢？窗外，慕尔鸣路两旁的法国梧桐树叶在微风吹拂下沙沙作响；室内，他与她充满感情地低声细语，李白、杜甫、李商隐、李后主、苏轼、陆游、王渔洋、郑板桥……五千年的古国多少民族诗人够他们谈论的了。他们谈着又写着。秋白几乎每天写诗，一本又一本全是送给剑虹的诗；剑虹也天天写，一本又一本。他们相互酬唱，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祖国有气节诗人的爱国主义精神，丰富了他们的婚后精神生活。秋白把他俩喜爱的诗句刻在各种精致的小石块上，胸怀里更刻有对理想社会的爱^②。脑海里装着的是共产党人铁的纪律^③。党的需要就是无声的命令。

^①这座小楼有两楼两底，楼上正房住瞿云白，厢房是秋白的书房，秋白与剑虹住厢房后面一间小房间里，楼下住着施存统夫妇。蒋冰之（丁玲）住在过街楼上的小房里。

^②1924年1月13日，秋白致王剑虹信：“我们要一个共同生活相亲相爱的社会。”

^③丁玲以秋白为生活原型的小说《韦护》有一段写韦护的，“当你（丽佳）听我（韦护）述完我幼时的困苦，和我母亲的自杀之后，你抱着我……我能得到一点爱。”“可是你知道，我却在未得爱情以前，接受了另一种人生观念的铁律，这将我全盘变了”。“呵，多么甜蜜的时日呵！我们享有过的，只是太短促了。不久这争斗又开始。”“现在我走了，就在明天清晨到广东去。”“韦护”是惩坏护好的韦陀菩萨，而韦陀又是秋白笔名“维它”的谐音。后来，丁玲在回忆文章《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中说：“他（秋白）是韦护，是韦陀菩萨。”由韦护的“人生观念的铁律”，也可看出当时党员都认为秋白纪律观念强。爱情诚可贵，党纪党的事业更是第一位的。

尚在蜜月中的秋白，毅然南下广州的列车，去筹备、参加国民党“一大”，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说秋白是“爱情至上”，真是一派胡说。另一面，共产党人、精神界之战士，也是人。就是象秋白这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样卓越的党的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他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人就有七情六欲，尤其是秋白有着文人名士的气质，感情更为丰富、细腻。广州、上海，他与她书信来往不断。鲁迅与许广平有两地书。且让我们看看秋白给剑虹的两地书：

1924年1月12日信：“……你偏偏爱我，我偏偏爱你——这是冤家，这是‘幸福’。唉！我恨不能插翅飞回吻……。爱恋未必要计较什么幸福不幸福。爱恋生成是先天的……单只为那‘一把辛酸泪’，那‘悒悒奇气来袭我心’的意味也就应当爱了——这是人间何等高尚的感觉！我现在或者可以算是半个‘人’了。梦可！！梦可！我叫你，你听不见，只能画几个‘！！！！’，可怜，可怜呵！”

1924年1月16日信：“这两天虽然没有梦，然而我做事时总是做梦似的——时时刻刻晃着你的影子……没有你，我怎能活？以前没有你，不知道怎样过来的，我真不懂了。将来没有你便又怎样呢？我希望我比你先没有……”

1924年1月28日信：“我苦得很——我自己不得你的命令，实在不会解决我的人生问题。我自己承认是‘爱之囚奴’，‘爱之囚奴’！我算完全被征服了！”

由秋白给剑虹的两地书中可以看出，他对她爱得诚挚、热烈专一。这不由使人想到鲁迅与许广平既是师生又是恋人的《两

①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我平常叫剑虹常常只叫‘虹’，秋白曾笑说应该是‘魂’，而秋白叫剑虹总是叫‘梦可’。‘梦可’是法文‘我的心’的译音。”

地书》。鲁迅不但写了“情书”，而且选了他与许广平通讯的135封信出版。鲁迅出版《两地书》是纪念他和许广平“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是回答某些人的“笑骂诬蔑”。秋白身后不也有人诬蔑他那圣洁的感情吗^①？而今公布秋白的两地书于世，不正是对这些诬蔑的回答么？恩格斯说：“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②秋白与剑虹是恋人、也是师生，婚前是有感情的，婚后也保持着热烈的爱情，这不正是如恩格斯指出的高尚的感情、合乎道德的婚姻么？秋白的“两地书”与鲁迅的《两地书》也有所不同，鲁迅的倾向沉静、含蓄、委婉，而秋白的则热烈、奔放、浪漫。其时，秋白才20多岁，春风得意，而鲁迅则年长得多，常处于腹背受攻击的境遇。所以两人的“两地书”风格各异。然而，异中有同，鲁迅的《两地书》反映了“革命的爱在大众”。而秋白与剑虹的“两地书”有他俩的情爱，更有憧憬人类社会的爱。1924年1月13日，秋白致剑虹信就提到理想社会是“相亲相爱”，“人类将来的希望”是“要爱”、“我们大家都要爱”。1923年12月致剑虹信中还附有短诗：

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旧巢。

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

如果说这是“情诗”，那表达的也是革命者之情，为改变旧中国建设新社会之豪情。为实现这理想要做江南第一只春燕，为那时寒潮滚滚的中华大地衔来春色，这是年轻的政治改革家之志。情与志交融，体现了爱大众、忘我奉献，奋勇进击的精神境界。

^①十年浩劫时，《讨瞿战报》等除政治上攻击秋白是“大叛徒”、“修正主义”外，对他的婚姻、爱情也横加污蔑。

^②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秋白心海里装的是工农大众、党的事业，他直到广州工作结束，才匆匆返沪。回上海后，他不能眷恋着家，料理剑虹的病。尽管剑虹的肺病要精心护理、调养，秋白心急如焚。但第一位的是革命工作，他党刊编辑照编，上海大学社会系的行政工作仍旧进行，还要亲自上课。这样，哪里有多少时间照料剑虹呢？到1924年5月，剑虹痲病已入膏肓，也是最需要亲人陪伴的时刻，恰逢中共第一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召开，秋白忍痛赴会，把护理病重爱妻的事交托给二弟云白。6月，蒋冰之，这个剑虹的挚友又要离她回湖南去。剑虹咳嗽着，用手帕捂着，手帕里痰有血丝，她连走出门送相处了两年多好友的力气也没有了。7月初，痲病——19世纪20年代的不治之症，夺走了剑虹如花的生命，秋白抱尸恸哭。不论是他二弟云白的硬拉，也拖不开秋白；或是剑虹堂妹的劝说，也劝不动秋白。秋白要守在已离开这个世界的剑虹身边，陪伴着他的“梦可”——他的“魂”（虹）。人都有生离别恨。这不是一般的离别，而是永久的告别，谁都会多待些时刻的。何况他们新婚才半年，又是这样相爱，而秋白因工作多次离开剑虹，心里更感到对不起剑虹，在最后的诀别时，多陪伴剑虹“你的魂儿我的心”^①，这是人之常情。再加上秋白极重传统道德，谁也拉不开抚尸痛哭的秋白。可是，共产党人是特殊性格的人，一切听从党召唤。1924年7月1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被孙中山聘为最高顾问，秋白是鲍罗廷的翻译与助手，加上他本人因积极推进国共合作，帮助改组国民党，也被增补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这年夏，国民党右派猖狂反对国共合作。8月，国民党

①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他（秋白）在照片（王剑虹的）背后题了一首诗，开头写着，‘你的魂儿我的心’。”

中央一届二中全会召开，一场尖锐的斗争正等着秋白。因他是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是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又是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于是，秋白决然离别他不忍离开的剑虹，含悲忍痛又踏上南下广州的列车¹。多么坚强的党性！多么真挚的爱情！爱情诚可贵，革命价更高。这就是一个共产党人的爱情观。

（三）生命的伴侣

妇女观、婚姻观是世界观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鲜明地反映了人的道德、文明程度。秋白十分注重“创造新道德、新信仰”²，提出妇女要有“积极的道德”，“不要有消极厌世的道德观”³。要努力由经济的政治的压迫里解放出来。秋白提倡妇女解放，反对“旧家庭制度”，“父为家君等信仰”，反对包办婚姻、“买卖婚姻”⁴。在《小小的一个问题——妇女解放的问题》一文中，秋白深刻地指出妇女有“许许多多精神上的桎梏——纲常、礼教、家庭制度、社会组织、男女相对的观念——造成这样一个精神的牢狱把他们监禁起来”。只有把这些精神上的“手铐脚镣”打碎，才谈得到妇女解放问题。⁵秋白不但在理论上反对包办婚姻，反对束缚妇女的旧礼教，而且，他以亲身的行动破除轻视女子，桎梏妇女的旧伦理、旧风俗。他正气浩然，不怕可能遭到世俗观念的嘲讽，对是学生也是战友的杨之华，他热情地帮助她砸碎套在身

¹同P65①：“我到上海以后……我既看不到剑虹——她的棺木已经停放在四川会馆，也见不到秋白，他去广州参加什么会去了。”

²⁴瞿秋白《中国知识阶级的家庭》，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P18；P15—16，人民出版社，1937年版。

³托尔斯泰《答论驳〈告妇女〉书之节录》瞿秋白译后志，见《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5号。

⁵同②P47—49。

上的精神锁链。由共同理想、一致的新婚姻伦理观而互相理解，到正确处理难处的关系，出奇地登出“三则启事”，秋白与杨之华结为“秋之白华”，在现代妇女解放史上留下一段佳话，并且，也是现代文明的一则生动的教材。

杨之华，浙江萧山人，1900年生，原是浙江女子师范的学生。1923年寒假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系学习^①。她中等身材，苗条而匀称，年轻美丽，性格温柔，课堂提问回答，才思敏捷，是学生中的佼佼者。不过那时秋白的心已另有所属，未曾注意到这位超群美貌的萧山姑娘。倒是杨之华对西装毕挺、风度翩翩的年轻教授——秋白，留有难忘的印象。她对只比自己长一岁的教授，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感到惊奇。惊叹秋白广博的学识，敬仰秋白雄辩的口才。上课时，杨之华的一双眸子如闪光的黑宝石，紧盯着这位年仅25岁的教授。不过，课下，之华感到秋白挺严肃，似乎不大好接近。一个偶然的机会有改变了她的印象，也使秋白留意到这位积极投身于妇女运动的“上大”学生。

当时，杨之华在上海大学学习，同时，还在向警予同志领导下做上海的妇女工作^②。一次，苏联顾问鲍罗廷夫妇要了解上海妇女运动情况。向警予恰巧有事离开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大学支部向杨之华转告上级通告，要她去汇报。杨之华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鲍罗廷住的花园洋房，在客厅里意外地看到

^①杨之华《回忆秋白》P1：“我原是浙江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一九二一年底”，“我和宣中华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听说上海有一所上海大学，是共产党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一九二三年寒假中的一天，我愉快地走进了闸北青云路庆云里（按：这是上海大学老校址）。”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下面再引，不注出版社及出版年代。

^②向警予为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她同时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所属青年妇女部助理。王一知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妇委工作，同时也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属青年妇女部工作。“上大”学生杨之华、张琴秋是协助向警予工作的。她们办公的机关设在上海环龙路44号。

给鲍罗廷翻译的秋白。由于秋白的指点、鼓励，杨之华心情渐渐平静，拘束消失。她谈了上海丝厂女工罢工运动的情况，讲到中国青年女工在工厂要受资本家压迫，回到家里又要受到中国宗法旧礼教的戕害。她们参加罢工回家后，往往要被父母兄嫂打骂、羞辱。秋白心里暗自思量，怎么杨之华的这些看法与自己对中国宗法社会的观点很相似。接着又听到杨之华向顾问鲍罗廷提出，中国劳动妇女的革命性很强，不但能反抗资本家的压迫，而且不肯屈服于旧家庭的束缚，她们必定能解放自己。女工运动当务之急，是要建立自己的组织。这看法深得鲍罗廷赞赏，鲍罗廷夫人则介绍了苏联妇女的斗争生活，鼓励她做好妇女工作。由此秋白看到杨之华对妇女解放事业的热忱，了解到她在1922年就发表多篇反映妇女要求自由、解放心声的文章^①，发现她对妇女解放既有理论见解，又有实际工作才能，是位优秀学生与妇女工作人才。

秋白对杨之华的进一步理解，则是在帮助杨之华加入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时。事先，秋白通知杨之华，培养杨之华半年多的向警予要找她谈话，并对又高兴又害怕的杨之华作了鼓励^②。一个星期天，在向警予家，作为上海大学党支部书记的

^①杨之华曾发表多篇有关妇女解放的文章。《社交和恋爱》刊1922年7月《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对于“争论‘社交和恋爱’”的争论》，见同年8月11日该报副刊《妇女评论》；《谈女子职业》见同年11月该报副刊《妇女评论》。1924年4月，《妇女周报》第34期，杨之华在《保定女师学潮给我们的希望》一文中，谈到妇女起来斗争，“将由被压迫被支配的地位，由自觉而进到自主的地位了”。

^②杨之华《回忆秋白》P7—8：“秋白对我说，‘你要求入党的申请书，支部和我都看过了。’‘向警予同志与你面谈，’‘我也想找时间同你谈谈。’我听了他的话，又高兴、又担心地说，‘……我觉得自己还不够党员的条件。’秋白诚恳地说，‘你是C.Y.，已经是靠近党的积极分子，只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把学习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够更快进步……向警予同志很关心你，她跟我谈过你的情况。’最后，秋白约我在一个星期日到警予同志家里去”。

秋白，也参加了这场严肃的谈话。秋白对杨之华说：“我和警予同志都想听听你入党的动机。”杨之华叙述了她由家庭包办作不幸婚姻，表达了她对封建制度、礼教的恨。原来自幼由父母给她与沈剑龙定了亲。21岁与沈剑龙结婚，婚后不久沈剑龙迷恋灯红酒绿、靡靡之音，与思想倾向进步的杨之华产生裂痕。到杨之华生下一女后，仍想方设法感化沈剑龙回头，而沈剑龙依然沉溺于酒色。不得已，杨之华只身离开沈家。她到上海大学后，还抱一线希望给沈剑龙写了不少信，可沈剑龙连看也不看，气得沈剑龙的父亲对这个放荡儿子也失去信心，把这些信寄还给杨之华。杨之华由个人受包办婚姻之痛苦，讲到广大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由自己摆脱家庭束缚讲到献身妇女解放事业、党的事业的决心。她那肺腑之声，使秋白深深同情她不幸的生活遭遇，也更加理解她为何如此热忱于妇女运动，并敬佩她的理想、她的勇气、她的斗争精神。秋白满怀热情地对杨之华说：“是的，你要求加入共产党是完全正确的。我愿意介绍你入党。”^①听到秋白的话，向警予高兴地站了起来，亲切地望着杨之华，又激动地拥抱了之华，杨之华热泪潸潸。顿时，她感到室外春光明媚，心里也充满春光。

秋白对之华萌生情谊，则是在严峻的斗争之中，特别是“黄仁事件”后。1924年10月10日，国民党右派与租界当局勾结，收买暴徒，制造了将上海大学革命学生黄仁打伤致死的惨案。^②秋

^①杨之华《回忆秋白》P10。 ^②同①P11—12：“一九二四年十月十日，”“国民大会”，“全国学生总会主任郭寿华同志跳上讲台，”“对群众说：‘今天的国民大会，就是要打倒一切军阀和帝国主义’，”“国民党右派分子童理璋乘机指挥暴徒上台殴打郭寿华。上海大学学生、共产党员黄仁同志等几个纠察队员挺身上前制止时，黄仁同志被暴徒推落台下，又遭到台下暴徒的拳打脚踢，身受重伤”。“午夜”，“小小的病房里，只有我和黄仁同志两个人……秋白突然来到了……然而黄仁同志闭着双眼，已经不能答应了。”

白组织行动委员会,点燃群众反击右派的熊熊烈火。为了扑灭斗争烈火,上海英法租界巡捕房下令通缉瞿秋白。秋白转入地下,北四川路底兴业里1号的三层阁楼,则是他的秘密住所。那天,秋白正伏案紧张地起草一份文件,忽听到熟悉的叩门声——这是自己的同志,开门一看,却是女工打扮的杨之华。她是党组织指定与秋白联系的联络员之一。秋白见到杨之华就急切地问:“外面情况有什么发展?”杨之华汇报道,黄仁同志追悼会激起广大群众义愤。巡捕房搜查了上海大学和秋白慕尔鸣路的住所,敌人虽扑了个空,却把他的革命书刊搜去烧毁了。秋白听后在窄小的阁楼里来回踱了一会,说:“书可以被烧掉,但是,革命的理想是烧不掉的!”^①而后,他向杨之华交待了几点工作意见。在这秘密地点,秋白通过联络员继续领导行动委员会及其他工作。一次次联系,一次次既惊险而又愉快的秘密工作接触,把这两个失去爱情和家庭的年轻共产党人的命运联系得更紧密了。一天,天色已晚,为秘密工作,他们忙到深夜,他担心她的安全,她怕他出意外,他送她行一程,她又返回护送他一程,流连忘返。终于他发现,之华那对会说话的眼睛,将自己随剑虹而去的心,又唤了回来,他离不开之华,她也发觉自己早已爱上秋白了,为什么上苍不早把他赐给她呢?在共同的战斗中,他们产生了爱情。当然,要实现这种战斗的结合,还要砸碎套在杨之华身上的锁链,还要处理好横在他们之间的另一人——沈剑龙的关系,这后文再说。此处要评述在共同的理想和火热的斗争中,秋白与之华由情爱而结成“秋之白华”。婚后他们感情更加炽烈,原因是共同的战斗事业把他们结合得更紧。秋白在党中央搞宣传工作,主编《热血日报》,之华在党中央妇委工作,她深入到女工

^①杨之华《回忆秋白》P13。

中,收集反映,告诉秋白,增强《热血日报》的战斗性、群众性;秋白与戴季陶面对面斗争,之华在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妇女部工作,与之密切配合^①;党决定发动上海工人配合北伐,举行武装起义,之华在第一线参加会议,散发传单,把情况向秋白汇报,秋白起草的《上海二月二十二日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其中也有之华的心血劳苦。……他们是志同道合的同志,是一条战线的战友,因而,在人生的旅途中是永不分离的伴侣。走累了,他可以以她为依傍^②;她靠着他那肩膀,那是依靠和屏障。苦闷时,他那奕奕的眼神流溢多少爱的情致,蕴涵鼓舞人心的光芒,她回报以理解、体贴的目光。呵!文明儿女之间永恒联系的纽带究竟是什么?“秋之白华”不是提供了最好的答案?1925年秋,秋白亲自雕刻一枚印章,大理石印章上刻有“秋之白华”四个字^③,不正说明秋白与之华的婚姻、情爱已有了精神文明的永恒联系纽带吗?对这种共同战斗中凝结的爱情,蒋光慈的纪实性小说《短裤党》有反映。照王铁仙同志分析,小说中人

①杨之华《回忆秋白》P51—52:“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是戴季陶领导的,许多具体工作,则由叶楚傖管。叶楚傖也领导妇女部的工作。”“有一次,我们决定召开一个妇女工作积极分子会议,由于当时反戴季陶主义的运动正高涨,叶楚傖就不同意。”“我们坚决排除阻挠”,“如期开成了这个会议。在会议上,请柳亚子同志作了揭露戴季陶主义的报告”。

②瞿秋白《多余的话》:“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是的,我不能没有依傍。……我一直是依傍着我的亲人,我唯一的亲人!”

③此印章今存常州瞿秋白纪念馆。“秋之白华”,除寓有在共同斗争中结合,两人目标一致、结为一体之意外,尚表示他们夫妻的情谊如深秋的白菊花,圣洁、高雅。《礼记》《月令篇》诗云:“季秋之月,鞠有黄花。”季秋即秋季,黄花指菊花,此时白菊花盛开,“花”、“华”相通,“秋之白华”,使人联想到秋季的白菊花。

物杨直夫，即杨之华之夫的意思，秋华即秋白之花的意思。小说以上海第二次武装起义为背景，表现了杨直夫、秋华以及史兆炎（赵世炎的化身）跟沈船舫（孙传芳）、江洁史（蒋介石）的斗争，反映了杨直夫与秋华之战斗情谊。它使人联想到爱情的基础是共同的斗争事业与情趣。

现在再来补叙他们如何处理与另一个人——沈剑龙的关系。沈剑龙与杨之华感情破裂，但夫妻关系尚存。杨之华虽没有封建的“从一而终”意识，但总觉得身上套着锁链，不配爱人，也不配人爱。这里，秋白既要排除世俗的非议，帮助之华打碎精神上的锁链，更要使之华摆脱这名存实亡的夫妻关系。沈剑龙虽然对杨之华寄来的信看也不看，可是当妻子真要离他而去爱别人时，却不能无动于衷。更何况沈家还是萧山有名的绅士家族。因此，解决这颇费周折，经历了三次“会谈”。第一次是在山清水秀的萧山村郊杨家，杨之华一家人都十分关心这场未知结果的“会谈”，杨之华的妹妹杨之英招待秋白，忙着准备沈剑龙的到来，杨之华的哥哥杨葆青与沈剑龙是同学，由他请沈剑龙到杨家共叙此事。倒是秋白超脱、自然，有礼貌地与沈剑龙握手、叙谈，从文学谈到美术，由“五四”运动讲到人生之路，人与人应该有一种新型的关系，稍稍点拨几句。沈剑龙自是聪明人，已知其用意所在。进入实质性“会谈”是在杨家厢房里，秋白、之华与沈剑龙三人关上房门谈的。如今已不可能找当事人了解具体细节了。但是，从间接的资料可以知道，秋白与沈剑龙虽是“情敌”，但两人既没有争吵，更没有“决斗”，相互尊重，竟然达成了某种初步协议^①。

^①杨之英《纪念我的姐姐杨之华》：“他们（指秋白与之华）到家后，立即派人把沈剑龙请来，三个人关在房间里谈了差不多一整夜。临走时，我看他们（指秋白、之华与沈剑龙）说话都心平气和，十分冷静，猜想姐姐与沈剑龙离婚和与秋白结婚的事已经达成协议。”见《回忆杨之华》P147，安徽人民出版社。笔者曾访问杨之英同志，她说，具体事是他们三人会谈的。

毕竟，沈家是萧山名门大户，国内声望颇高，家主是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成员^①。沈剑龙请秋白等驾临舍下，把酒叙谈。于是，接着在沈家大花园里进行第二次“会谈”。这次会谈连第二手资料也没有留存下来。不过，可以作如下推测：老派人士对离婚与新派人物见解不一致，所以，秋白邀请沈剑龙、杨之华到常州举行第三次“会谈”。沈剑龙的父亲对秋白人品是敬重的，沈剑龙本人浪漫、放荡，爱好艺术缺才华，对才华横溢的党的宣传活动家，对豪放而又有名士气派的秋白，不免有些嫉妒，但又为秋白坦诚所动。且他对杨之华还是有内疚的。于是，他对秋白的邀请欣然应诺。1924年，桂子飘香的时节，在常州庙沿河瞿家祠堂后“翻轩”^②，秋白少年时代的卧室兼书斋进行“会谈”。可以想到，秋白只是在小方桌上摆上三杯粗茶，一盘芝麻桂花糕，接待萧山来的客人。然而，“会谈”的结果却出乎意料的好。沈剑龙赠送秋白、之华一张六寸照片。照片上，沈剑龙剃光了头，穿了一件和尚的袈裟，双手捧一束菊花。照片边题有“鲜花献佛”四字，并有沈剑龙签名。秋白望着照片，不由想到“会谈”最后，沈剑龙反向自己和之华祝福，也想到自己向沈剑龙的表示：“愿我们从此结为好友”，还想到沈剑龙那种愧为人夫的神色、之华那惋惜的目光。现在的读者对这张“鲜花献佛”照片的含意不甚了然的话，那么，读读下面邵力子主办的《民国日报》上的三则

①沈剑龙之父沈玄庐，浙江有名的左派，早期参加建党活动。见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P156。1924年5月召开的“上海中央扩大会议”，沈玄庐也出席了，因此，沈玄庐对这位年轻的党的政治宣传家秋白是熟悉的，尊敬的，同时他也写过一些新诗，对秋白文学上的才华也是看重的。

②瞿家祠堂，建筑面积1015平方米，分东西两个大院，各有四进。东院其中两进秋白家居住。第三进为秋白双亲与幼弟坚白卧室、客厅，第四进有屏门相隔，前大半间为秋白之妹鞅群、弟云白、景白、阿莲之卧室，后小半间系“翻轩”，是秋白的卧室兼书房。

启事，^①就一目了然了：

杨之华沈剑龙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脱离恋爱的关系。

瞿秋白杨之华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恋爱的关系。^②

沈剑龙瞿秋白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朋友的关系。

由这三则奇特的启事里，人们看到秋白处理人际关系的得当，变“情敌”为“朋友”；还看到这样纯洁的感情，即爱情不在，友情尚存；还看到秋白与之华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是严谨的，“脱离关系”再“正式结合”。杨之华、秋白对沈剑龙是真诚的，对王剑虹也是忠实的^③。

（四）赤爱的结晶

孩子是家庭的成员，赤爱的结晶。秋白认为“爱苗是人类将

①见1924年11月27、28、29日上海《民国日报》。有的误为11月7日，还有的把启事内容的日期误作报载日期。

②瞿秋白《多余的话》：“十一月七日与杨之华结婚于沪”，系误记。杨子英《纪念我的姐姐杨之华》：“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那天，姐姐和秋白正式结婚。”也为误记。此外，象曹子西《瞿秋白文学活动纪略》也跟着搞错了秋白与杨之华结婚时间。他们结婚时间为11月18日，为了纪念他们的结合，秋白送之华一枚金别针，上面秋白亲自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七个字。

③1932年第1卷第10期《社会新闻》刊登的《瞿秋白与杨之华》，对秋白与之华的爱情描写有不少失实之处。司马璐的《瞿秋白传》更无中生有地说，瞿秋白与杨之华的恋爱，使王剑虹“在病中它多此一打击”，“抑郁而死”。丁玲对此最清楚，说：“秋白是在她（王剑虹）死后才同杨之华同志恋爱的”。

来的希望”^①。“‘爱!’……宇宙建筑在你上。”^②可是杨之华的女儿被沈家硬留下了，她十分思念女儿，秋白对她的这种心情理解、同情。“独伊”^③，“独伊”，杨之华除了秋白、党组织，心里就独独牵挂伊了。1925年春，在秋白支持下，杨之华去浙江肖山接女儿“独伊”了。哪知她过去的公公认为孩子是沈家骨肉，杨之华既已脱离沈家，就不能让她这个外人看——更谈不上要接走。幸亏沈老公公的大姨太动了隐测之心，悄悄领她匆匆见了一面。当杨之华得知沈家骗孩子说妈妈在上海死掉后，她带着伤心的泪返回上海。见之华这样的神色，秋白安慰她说：“你过去在婚姻上所遭遇的不幸，一时不能见到孩子，这一点和安娜·卡列尼娜很相象，但是你所处的时代和安娜·卡列尼娜的时代完全不同了。独伊一定能回到你的身边，我一定比亲生父亲更加爱护她，教育她健康成长。”他还同她到萧山杨家，托人找沈家大姨太太把孩子抱出来。当之华接到独伊，把女儿紧紧抱在怀里时，突然沈家派的两个大汉奔来，一阵风似地把独伊抢走了。独伊挣扎着，哭喊着“妈——妈！”之华的心碎了，秋白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这是之华第一次看到秋白哭。又过了些时日，之华的母亲，把独伊接到外婆家玩，而后设法送她到上海。当母子团圆时，秋白比之华还高兴，抱着独伊亲切地说：“亲爱的女儿，我是你的好爸爸。”独伊亲昵地靠在秋白胸前，甜甜地喊：“爸爸，好——爸爸！”^④这里，人们不禁联想到鲁迅对于海婴亲子之爱。正是“无

①秋白1924年1月13日致王剑虹信。

②秋白《心的声音·爱》，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P14。

③杨之华生了个女儿，她过去的公公取名为晓光，希望她再生一个男孩。此时杨之华与沈剑虹关系已恶化，她说，女儿名字叫独伊，我这一辈子就只生她一个了。

④后来，秋白给小独伊写信落款就是“好爸爸”，见梦花《电闪雷鸣》。

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①。他们的精神境界、感情是相通的。

独伊非秋白亲生，秋白对她胜过亲生。不仅世俗旧观念后爹虐待非亲生子女不能相比，而且，也是夫权思想的丈夫所不能比的。在上海时，之华忙于工运，秋白对之华体贴，分担养育子女的担子。瞿独伊回忆：

爸爸对我十分慈爱，不管多忙，只要有一点儿空就到幼儿园接我和沈霞^②。我在家时，他手把手地教我写字、画画，希望我将来能成为一个新中国有用的人。后来，母亲给我看过我小时候父亲写给我的一首诗：

小小的蓓蕾，含孕着几多生命，

陈旧的死灰，几乎不掩没光明。

看那沙场的血花灿烂，经过风暴之后的再生。

谁道是无意中的赤化？却是赤爱的新的结晶。^③

他们平时有说有笑，亲似父女，又不象父女，而象朋友。这方面跟鲁迅和海婴相处，全然打破“父为子纲”的传统礼教，平等相待，又十分相象。后来，在莫斯科儿童院时^④，秋白象教育家似的带独伊投身于大自然。在节假日，他和之华把独伊接出儿童院，对独伊说，大地是我们的母亲，森林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一起去观赏大地上的森林吧。夏日里，他（她）们一起在森林里采蘑菇，卧听鸟儿们的歌唱，领略大自然天然无饰的美。有时，他（她）们去河里撑木筏玩。秋白卷起裤腿，用长竹杆撑木筏，秋伊和之华坐

^①鲁迅《答客诮》

^②那时茅盾家在秋白家隔壁，独伊和茅盾的女儿沈霞在一个幼儿园。

^③瞿独伊《怀念父亲》，见1980年第2期《新文学史料》。

^④同^③：“我们的儿童院设在莫斯科郊外沙皇时代的一座地主庄园地，四周是茂密的丛林，风景很优美。”

在木筏上。忽而，秋白引吭高歌，之华和独伊也随声应和着唱，木筏顺流而下，歌声随风飘荡在河面上，自小独伊就感受到纯朴归真的自然美。冬天里，树木、山川、房屋都罩上一层厚厚的雪，秋白、之华带独伊观看银装世界。关于秋白的美学观、美育观这章第五部分还要论述。这里先叙一段赏雪小插曲。赏雪时，秋白拉着雪车，独伊坐在车里，看“动态的”雪景。秋白跑着跑着，故意摔一交，还用手蒙着脸“呜呜”地哭起来。这时小独伊就向后面跟着雪车跑的妈妈喊起来：“我跌一交不哭，好爸爸一跌交就哭了哩！”秋白一听，放开手哈哈大笑地说：“独伊呀，爸爸再怎么跌交也不会哭的！”可不是，秋白政治上跌交摔得够重的，遭到打击够残酷的，他没有哭！仍然奋勇而行。这在后面的章节将详细叙写。

秋白关心孩子，把孩子看作祖国的未来、社会的希望。要孩子健康地成长，他更关注良好的社会环境、精神的食粮。秋白、之华爱孩子，更爱祖国，为了祖国的光明，他们回国了。可是，却将独伊留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为的是让她幼小的心灵上印出“国际”两个大字来，“国际”、“国际”，“普天之下”的意思，让孩子心里装着普天之下的大众。秋白还从万里之遥寄给独伊“一张印着一个大飞艇的明信片，上面写着‘你长大了，也为祖国建造这样的大飞艇’”^①。秋白就是这样尽父母教育子女责任的，就是这样重视家庭教育这一重要环节，就是这样以深厚的人情、崇高的人格来影响下一代。“小小的蓓蕾”则把他和之华爱情之花点缀得更美丽了。

（五）精神的文明

秋白不但在爱情、婚姻、家庭问题上表现出高尚的情操，而

^①见笔者访问瞿独伊记录，又见其《怀念父亲》。

且，提出一系列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¹主张，这些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一方面，他指出：“文明是人类劳动的创造”¹，并对西方文明进行科学分析。他承认西方物质文明已达到一定水平，但是，“二十世纪以来，物质文明发展到百病丛生”²。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发达，技术文明，只能使少数有钱人享受现代文明生活，而大多数劳动人民并不能摆脱受奴役的痛苦生活。物质生活低下，精神文明也极差。他指出：

“譬如美国的黑奴，也和中国人一样，受‘西方式’的物质文明影响而精神文明便大大的堕落！”“我们可以断定：单单现代式的技术发展，并不能‘从残酷的自然下解放人类’。”“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高等阶级，经济生活是很有保证的；然而最可怕的病症，精神病象以及生殖力的灭杀，刚刚在高等阶级里发现得最多。”³

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少数人富有，整个西方世界文明败坏、精神腐朽基础上，秋白还揭露西方鼓吹自由、民主的虚伪性。“外国资本家的报纸可以一面鼓吹中国资产阶级之所谓‘裁兵、理财、制宪’运动，一面协同军阀竭力压迫一切平民之集会、结社自由，甚至于市民（资产阶级）欢迎孙中山先生的大会都在禁止之列，更不论工会！可见外国资本家甚至于与军阀同样采取极公开的野蛮政策。”⁴尤为深刻的是，秋白见到帝国主义对中国采取暴力的“野蛮政策”，还看到它们更为阴险的“文化的宣传”，灌输西方的“自由、平等”，培植要全盘西化的人，从而控制中国。他写道：

①瞿秋白《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原载1924年1月10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21卷第1期，见《瞿秋白选集》P93。 ②同①P98。

③同①P101—102。

④屈维它（秋白笔名）《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原载《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6月15日出版。见《瞿秋白选集》P15。

于殖民地上往往最初一期外国人似乎是文化的宣传者，然而只要看一看下列几项‘琐事’，就可以知此种‘宣传’的限度了：美国人在中国所设学校都授美国宪法，还不是些自由、平等、法律之类的原则！

早在1923年，秋白年仅24岁，就已经分析出帝国主义的两手。一手是对我国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的侵略，“采取极公开的野蛮政策”；另一手则是文化渗透，和平演变，通过培植西化了的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者，阻止殖民地人民起来革命，阻挠受压迫民族真正得到科学文明而强盛，阻止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秋白说“我们也决不歌颂西方文化”^②。这是很深刻的。

另一方面，秋白对社会主义文明作了论述。仅靠“科学的技术文明”，不能直达社会主义；而单凭精神文明的意志，不重视物质文明，发展生产力，也建不成社会主义。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起建设，使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新型的关系，这样的社会主义文明将是美好的，令人向往的：

社会主义的文明是热烈的斗争的光明的劳动所能得到的，人类什么时候从必然世界跃入自由世界，——那时的科学的技术文明便能进于艺术的技术文明。

那不但是自由世界，而且还是正义的世界；不但是正义的世界，而且还是真美的世界！^③

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文明，如何达到真美的世界呢？1.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才可能发展东方民族的文化，建设文明社会。他说：“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的思想不破，则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无法抗拒；所以不去尽帝国主义的一切势力，东方民族之文化的发展永无伸张之曰。”^④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不推翻宗

^{①②}屈维它《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瞿秋白选集》P17。 ^④同^① P18。

^③瞿秋白《现代文明与社会主义》，《瞿秋白选集》P109。

法社会、封建制度，不去尽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旧势力，就谈不上现代文明社会的建设。2.改变私有制，坚持公有制，依靠无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劳动阶级，发展物质文明，更要注意精神文明建设，这才是建设社会主义文明之路。秋白指出：“只有根据于无产阶级集产的可能性，经过社会主义有规划的经济制度，尽量发展生产力，令人人都能享受脱离私产束缚之自由及涵养知识文化之权利”，“其他一切劳动阶级，亦只有与”“无产阶级携手，方能于复兴世界文化的伟大事业之中，尽他所能尽的力量。”^①这里，秋白强调了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阶级在发展物质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文明中的作用及主人翁地位，并说明他们获得“知识文化之权利”，在于改变私有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方向。在这一期《新青年》的另一篇文章中，除了进一步突出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前提，是坚持公有制，最终废除私有制外，还辩证地阐述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他指出：

等到私产绝对废除，阶级消灭时，科学愈发明，则体力劳苦的工作愈可减少，全社会的福利愈可增进；物质文明愈发达，经济生活愈集中，则精神文明愈舒畅，文化生活愈自由，为“求生”的时间愈少，则为“求乐”的时间亦愈多了。那时，才有真正的道德可言，不但各民族的文化自由发展，而且每个人的个性亦可以自由发展呢。^②

这里，秋白阐明了发展生产力，求得物质财富丰富的同时，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两者是相互促进的，不可偏废。3.注意信念、理想与现实的联系和自觉的党的纪律观念，

^①瞿秋白《世界的社会改造与共产国际》原载1923年6月出版《新青年》季刊第1期，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P426—427。

^②屈维它《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瞿秋白选集》P20。

并把它们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他提到“共产主义是‘理想’，实行共产主义的是‘人’，是‘人间的’”。因而，“党员的是否确信并了解共产主义”是十分重要的。要“严戒党员利用自己的地位作威作福，物质上的享用当加限制。”“务使党员人人受共产主义的教育”。^①他还认为“理想与现实之间必须有密切的联系”，“真正的社会主义理想却密切联系着现实生活”。^②重要的是为实现理想而奋斗。秋白自己更是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而不懈的斗争，不论是大革命的风暴中，还是后来受到党内残酷打击时，即使在敌人狱中，他都有着坚定的信念。言行一致，人们敬佩这样的共产党人，他的理想放射出夺目的光辉。秋白还认为要有“铁的纪律，便是要有统一的意志，全党党员行动绝对的一致。”^③他自己更是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他从少年时代就酷爱文学，在苏俄考察写报道之余作诗撰文，显露文学才华。1923年回国，党需要他做政治宣传工作，他从大局出发，毅然从政。后来，他受到党内无情打击时，内心抑郁，与之华相互依傍。突然调他赴中央苏区，要之华同行又未获批准，他依恋亲爱的人。怎么不依恋呢？他和她相亲相爱十年，患难与共十年，此一去是生死离别啊！杨之华是这样回忆离别之夜的：

当我醒来的时候，总看见他还在整理着什么，或者轻轻地踱着步，或者坐着抽烟沉思。快要天亮的时候，他看见我醒了，就悄悄地走过来，拿着我买给他的十本黑漆布面的本

①瞿秋白《共产主义之人间化》，原载1921年6月22日至9月23日《晨报》，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P194、P205、P223。

②瞿秋白《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原载1923年12月20日出版的《新青年》季刊第2期，见《瞿秋白选集》P121。

③瞿秋白《列宁主义概说》原载1925年4月22日《新青年》第1号，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P45，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子(这是他最爱用的),把它们分成两半,对我说:“这五本是你的,这五本是我的。我们离开以后不能通信,就把要说的话写在上面,重见时交换着看。”……他突然紧握我的手说:“之华,我们一起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被捕牺牲是意料中的事。我们活要活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①两情依依,难分难舍。可是,秋白的心是为党的事业而跳动的。第二天,在白雪纷飞中他别了之华,身影消失在大街尽头。这一别成了诀别。共产党人周雍文与陈铁君一对爱人是一起牺牲的。秋白夫妇也曾想“死也要死在一起”,但未能如愿。秋白不久牺牲在蒋介石的屠刀下,几十年后,杨之华则在“十年浩劫”中含冤死去。这里,人们看到了共产主义者忠于党的纪律的情操,对这样的共产党人谁能不敬佩呢? 4.提倡新道德,弘扬民族文化传统。他指出:“新阶级正在兴起的时候,伟大的斗争里需要自律的道德以为工具,发见真实的,因而有益于社会的道德——革命的道德”。^②他反对“全盘西化”的主张,认为这是“泯没民族的个性”^③,他主张发掘和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光复四千余年文物灿烂的中国文化”^④。5.秋白和鲁迅一样,也是精神界之战士。以猛烈的火力,横扫“精神垃圾”,色情文艺,唯心论,形形色色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秋白极其尖锐地剖析“唯美主义的《声色》”,“这色是色情”,那“声”是“‘叫春’时候的音调,倒也的确很浪的”^⑤。1923年,秋白撰文批判了张君勱、梁启超超科学的玄学人生观,批判了丁文江、胡适的“自然主义的人生观”,批判

①杨之华《回忆秋白》P149。

②瞿秋白《社会科学概论》,1924年10月上海书店出版,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P575,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③《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P212。④同③P213。

⑤V.T(秋白)《猫样的温文》,见《文艺新闻》第32号。

吴稚晖的“人欲横流的人生观”，公开宣称：“无产阶级”“向现存制度进攻；阶级斗争的过程里发见社会现象的公律，能使无产阶级觉悟：‘非解放人类直达社会主义不能解放自己’”。^① 1924年8月，秋白批判实验主义，指出它“是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实用哲学，尤其是‘美国主义’”。它叫人们为着“目前问题”、眼前利益，“怎样应付现状”，局部改良，不动根本。这与革命哲学背道而驰，“马克思主义所注重的是科学的真理，而并非利益的真理”。^②

（六）审美的观念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要培养情操高、心灵美的人，美育是育人的重要一环，审美观又是美育的重要环节。秋白重视审美教育。他广泛地涉猎了中国古代含有朴素美学思想的经典、西方美学思想，特别是19世纪俄罗斯美学思想。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对其涉猎的古今中外美学思想进行分析，提出自己的审美观。这主要反映在论《美》^③一文中，其他的则散见于他的文艺论文中。

在论《美》一文中，秋白摘录了几位唯心论者代表性的美学主要论点，指出不论是普洛廷所说“美”“是人的精神所具有的”，或是康德认为艺术美是“站在自然界之上”的，都跟黑格尔所说的美是“属于精神界”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把美作为一种纯主观的抽象精神，它既不存在于客观现实之中，也不反映在现实的

①瞿秋白《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瞿秋白选集》P126。

②瞿秋白《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原载1924年8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季刊第3期，见《瞿秋白选集》P145、P150。

③瞿秋白《美》，《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P124—130，1985年出版。下面凡引此文，不注出处。

艺术中。秋白认为这是唯心论的美学观,并将黑格尔说美“是绝对精神的世界”,评之为“这是‘美’的‘最后的’(?)宗教式的唯心论的解释”。在《饿乡纪程》中秋白正面阐明其唯物论的美学观:“抽象的‘真’‘美’‘善’的社会理想,决不能象飞将军似的从天而降。”“一切真理——从物质的经济生活到心灵的精神生活——都密切依傍于‘实际’”。美不是主观的抽象的,它是现实的客观的。

在论《美》一文里,秋白还嘲讽了把美作为审美主体单方面的“一厢情愿”。如果没有审美客体仅是审美主体的单相思,就仿佛是“乡下姑娘为的要吃饱几顿麻花油条,她就设想自己做了皇后,在‘正宫’里,摆着‘那么那么大的柜子,满柜子都是麻花油条啊!’”由此与唯心论的美学观划清界线,说明审美主体的美感,离不开审美客体。另一方面,审美主体又有能动性,能感受客观的美,这又跟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观中机械论有所区别。他说:“‘自然’向不吝嗷他自己的‘美’,也未必更须对我卖弄,——我只须能尽量享用,印取他的‘美’意”。^②这既说到大自然客观存在的美,也讲到人主观对客观美的寄托、感受、“印取”、留恋。正如他作品所描述的那样:“常州红梅阁的翠竹野花,环溪的清流禾稼,也曾托我的奇思遐想。”“黄陂铁锁龙潭的清波浩月,也曾使我低徊留恋”,“北京南湾子头的新柳,丝丝的纤影,几番几次拂拭我的悲怀诗思。”^③

社会美、自然美都是美。康德把美局限在艺术家的领域,这是唯心的。秋白在论《美》一文中作了注解式的批判。另一方面,他又不同意贬低艺术美。他指出艺术是“‘再现’并非模仿,并非底稿,并非抄袭”。这是针对有些苏俄文艺理论家贬低艺术美的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P52。

②③同①P16。

某些论点而言的^①。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真实的最高美是在现实世界中找到的。而不是由艺术所创造”的，“艺术不过是现实底苍白的复制”。^②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美在现实生活中，讲了美的客观性，无疑是对的。但是，讲艺术只是现实的复制，则取消了艺术家的主观创造力，贬低了艺术美。在此，秋白强调艺术是“再现”，在别处则正面说：“艺术家是个战士，而不是旁观者，他是个‘列宁派’，他要会抓住发展的倾向，而不是消极的照像机。”^③秋白突出艺术不是照像机，而是“再现”，与普列汉诺夫的“象形论”也划清了界线。普列汉诺夫认为艺术是符号，仿佛埃及和中国的象形文字，记录生活而已。这同样也是忽略了审美主体的能动性，贬低了艺术美。在另外的文章中，秋白正面批评了普列汉诺夫“他把康德的美学观念和费尔巴赫的美学观念混合在一起”，照他的意思，艺术大半只有消极的被动的作用。这是“‘无所为而为’的美学”^④。这种“符号”只“是一种相当的记号”，这种“符号，象形”是“不能够影响现实世界”的^⑤。

在论《美》一文中，秋白还论述了审美的阶级差异性，审美的时代特征。美是历史范畴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美具有不同特定的内涵。美是一种社会现象，处于不同阶级地位的人，

①张文泰同志在《试论瞿秋白的美学思想》一文中指出，车尔尼雪夫斯基“有意无意否认或贬低艺术美的作用”。笔者赞同他对此及文中其他观点。

②车尔尼雪夫斯基《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该文不是全文都是“艺术”是“现实”复制的观点，有些地方他也提到“艺术”“再现现实”。

③瞿秋白《斯大林和文学》，《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P265。

④瞿秋白《文艺理论家的普列哈诺夫》，《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⑤宋阳（瞿秋白笔名）《论弗理契》，同③P270。

审美的主体意识不同，对美的看法也有差别。文中说：

然而所谓“美”——“理想”对于各种各式的人是很不同的，非常之不同的。

对于施蛰存，“美”——是丰富的字汇，《文选》式的修养，以及《颜氏家训》式的道德，这最后一位是用佛家报应之说补充孔孟之不足的。

对于文素臣（《野叟曝言》），“美的理想”是：上马杀贼，下马万言，房中耍奇“术”，房外讲理学……以及麟凤龟龙咸来呈瑞，万邦夷狄莫不归朝。

对于西门庆，“美的理想”只有五个字：潘驴邓小闲。

对于“三笑”，是状元和美婢的团圆，以及其他一切种种福祿寿。

施蛰存只讲《庄子》，《文选》的章法、字汇，这种只讲形式的唯美主义美学观，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审美观。他讲《文选》式的修养、《颜氏家训》式的道德，又有孔孟之道的封建审美意识在其中，还要用佛家思想去补充。这是孔孟之道、佛教思想、资产阶级唯美主义三合一的美学观。

《野叟曝言》是清代夏敬渠作的长篇小说。书中主角文素臣追求的是“上马杀贼”、平叛救驾，“下马万言”、直言谏君。他的理想境界是：“万邦夷狄莫不归朝”，“麟凤龟龙咸来呈瑞”。这是个封建忠臣的形象。他的“‘美’——理想”跟农民追求“‘美’——理想”根本不同，他追求功名富贵，是酒色之徒。“房中耍奇‘术’”，却装作道貌岸然的理学家，在“房外讲理学”。他把这看作美，农民以为丑。阶级不同，审美标准不一。

西门庆是《水浒》和《金瓶梅》里的反面人物。他的“‘美’——‘理想’”既和农民的根本对立，也跟文素臣不相同。他贪婪、狠毒、纵欲，吃喝嫖赌、霸占人妻、谋财害命，是封建社会中典型的

恶霸官商式的色情狂人物。

《三笑》又称《三笑姻缘》，讲的是唐伯虎追秋香的故事。这对才子佳人追求的“‘美’——‘理想’”是：“状元和美婢的团圆以及其他一切种种福禄寿。”这跟文素臣的忠君报国、封妻荫子有别，有某种反封建礼教的意味，但跟劳动人民的反封建斗争、追求婚姻自由仍有差别。

秋白的“‘美’——‘理想’”是“‘真’‘善’‘美’的社会理想”^①，真、善、美的心灵。他自己是精神文明的楷模。更注意对大众进行文明的教育，审美的教养。他后来任苏区教育人民委员时，象苏联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一样，强调教育青年一代认识美、创造美；^②他领导制定的《苏维埃教育法规》，强调共产主义道德的教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美的心灵的培育。1923至1924年，他在上海大学任教务长时，重视美育，中文系必修课就有美学概论。他自己上课，更给人以高尚的精神愉悦，是美感与美的享受。他的作品则是美学珍品，他那崇高圣洁的人格操行，涤荡多少人的灵魂^③，使人迈向更真、更善、更美的境界。^④

①瞿秋《赤都心史》

②瞿秋白拜访过卢那察尔斯基，并读了他的大部著作，尤其精研了有关美育的论述。

③司马路1937年参加共产党，后被开除出党。解放战争时他与国民党特务蔡力行组建“中国人民党”，后办特务外围组织“大江通讯社”，继续反共，失败后逃往香港。他竭力丑化秋白情操，正说明他极端仇恨共产党，仇视共产主义，是个丧魂落魄者。

④本章某些片断曾在《人民日报》1985年7月23日发表，题为《碧血化雨涤尘埃·一只金别针》（袁鹰编发）。

四、秋白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贡献

一 兼议其在党史上的地位

国民党反动派是把秋白作为“共魁”枪杀的。^①中国共产党和兄弟共产党也是把秋白作为共产党的领袖而悼念的。^②可是，在秋白牺牲后43年这么长的时期里，除悼文、纪念文章外，绝大多数著述论的仅是文学家秋白在文学上的业绩。^③这种状况与秋白著述实际，与秋白在党史上的历史地位，与秋白对毛泽东思想萌芽形成的贡献，与秋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中国化所作的奠基性工作是不相称的。秋白匆匆来到人世间，又匆匆离去。在世36个年头，革命生涯不过十几个春秋。其中八年是在党的中央领导岗位上。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

①《社会新闻》载《多余的话》按语：“共魁瞿秋白已伏法于闽南”。
《社会新闻》为国民党中央局主办。

②加拿大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的悼文说：“中国共产党最优秀的领袖之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之一瞿秋白，为蒋介石的白色恐怖统治所残惨（酷）屠杀。”德国共产党、美国共产党、英国共产党等中央委员会悼文都称秋白为“领袖”。1955年6月18日，陆定一同志代表党中央作的《关于瞿秋白同志生平的报告》中说：“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

③也有个别的论著、少数文章谈到秋白政治论文或在党史上的功过。如1947年胡绳在《野草》第4期发表《读秋白遗文》，论及秋白有些政治论文。又如，1951年，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书中谈到了秋白在党史上的功过，不过未展开详论。再如，扬之华的《忆秋白》，较具体地叙述秋白的一些革命活动，见1958年7月出版的《红旗飘飘》第8期。

面)”。^①他集中精力搞革命文艺是“在被打击以后”，仅几年，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从总体上看，秋白的革命活动主要在党的宣传工作与实际政治斗争方面。他留存下来的500多万字的著作和译述，其中政治理论及社会改革等方面就有300多万字。直到1979年以后，逐步有些文章、论著，论及秋白的政治理论，阐述秋白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不过其中较多的是就秋白的某一篇政治论文，或是就他某一方面对党的工作贡献而论说的。^②因而，从宏观上论述秋白在中国现代革命史、思想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上的历史地位，就显得十分必要了。让我们先看秋白作为党的理论家、宣传家的风采与伟业。

(一)党的理论家

历史的车轮转到1925年，革命春雷滚滚，秋白热血沸腾。此时，正是初夏时刻，秋白和杨之华一起向闸北工人居住区走去，越走越感到一股革命的热气扑面而来。可不是么，2月，北方在李大钊领导下，“二·七”这天全国铁路工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郑州召开，此后织布工人、印刷工人等的罢工风起云涌。南方，杨之华与邓中夏等发动了上海日本纱厂4万多工人的大罢工，取得部分胜利，拉开了五卅运动的序幕。接着，秋白与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适时把这场“民族的劳资斗争”，引导到“为中国民族争解放”的斗争。^③5月，日本资本家、军阀、英帝国主义者枪杀工

^①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②王观泉、叶心瑜、丁守和、朱锡通等则不然，或有专著、或有专文论秋白的政治理论或思想。

^③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秋白仍当选为中央委员，与陈独秀、彭述之、蔡和森、张国焘组成中央局（相当于中央常委会）。他接连在《向导》上写了四篇文章，把经济斗争引向政治斗争。

人的暴行^①，更激起工人们的义愤。一路上，秋白夫妇听到工人们议论纷纷：“外国佬，太可恨，简直不把我们工人当人，随便开枪杀工人。”“学生抗议、游行，英国巡捕房好狠心，连年纪很轻的学生也不放过！”^②走着听着，秋白与之华在弄堂的一个棚户门前停了下来。那里有几个工人或坐或蹲，在听一位戴着老花镜的老工人一字一句读报。读着，这位老工人怒气冲冲地说道：“算了，别读了，这是啥报纸！尽是胡说八道。”秋白走近些，推了推眼镜一看，原来是《商报》。秋白就和这位老工人聊起来。老工人向秋白倾吐心里的话：“这种报帮着洋人和资本家说话，看了就气，能有为咱们工人说话的报纸就好了。再说，这种报文乎文乎的，咱工人也看不懂。”^③秋白既象答话，又象自言自语地说：“会有的。”他和杨之华离开这棚户老工人时，又一次以肯定语气讲道：“会有为工人说话的报纸的！”秋白一边离开闸北工人居住区，一边想到5月31日党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想到会议决定迅速筹办党主办的日报，以指导反帝斗争的民族解放运动。^④走着走着，秋白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跟他同行的杨之

① 5月15日，上海日本资本家枪杀内外棉七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5月28日，青岛日本纱厂资本家勾结军阀枪杀罢工工人8人；5月30日，英国巡捕开枪打死抗议游行群众13人，伤数十人。

② 五卅惨案中，上海大学学生何秉彝被英国巡捕打死，秋白弟弟瞿景白及其他上海大学学生20多人被捕。

③ 杨之华《回忆秋白》P44：秋白“在百忙中抽身深入工人群众，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有一次他到闸北一个工人居住区去，看见一个工人正在看《商报》。这个工人对秋白说，这种报纸不为工人说话，尽向着帝国主义和资本家，而且文字也不容易看懂，希望有为工人说话并且适合于工人看的报纸。秋白很重视工人的这种要求。”

④ 1925年5月31清晨，中共中央在上海闸北四川北路横浜桥附近的一幢旧式楼房里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由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瞿秋白和刘华等组成行动委员会，领导五卅运动。会议还决定办一份日报，由秋白主编，指导斗争。

华也感觉到秋白那稳重而有力的脚步，越来越快了。

走了一阵，他们终于到了目的地，闸北浙江路底华兴路56号。进了大门，他们到了一间客堂里，狭小的房间，一张白木长桌就占了一大块地盘，桌的四周摆着几条长板凳，长凳上已坐着沈泽民（茅盾的弟弟）、郑超麟、何味今（今名何公超）。这就是《热血日报》社的全班人马。他们一见秋白、之华到来，都站起来迎接、倒开水。秋白连声说：“同志们，坐坐。”他向同志们说，这是党主办的第一张日报。要写好社论，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勾结干的罪恶行径；要办好《罢市罢工消息汇志》专栏，及时报道反帝斗争的信息，吹响反帝爱国运动的战斗号角。他还谈了工人们对自己报纸的要求，要有战斗性，要通俗化、群众化，要登群众的来信、来稿，要开阔工人的眼界，多辟新颖的栏目。接着秋白的话，大家就七嘴八舌地谈论开了：这个说办《外人铁蹄下之上海》、《外人铁蹄下的中国》，那个说还可增加个专栏《舆论之裁判》；又一个说还可登些民间小调写的诗歌。杨之华也插话建议组织些工人通讯员，就更能反映工人的呼声了。

就在这灯光昏暗的《热血日报》社，秋白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他是主编，也是主要撰稿人。各期社论大都是他写的^②。此外，他还写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之高潮》、《洋奴乎国民乎》，并且分别以“默”、“顾”、“热”“血”、“沸”、“腾”、“了”等笔名，写了

①杨之华《回忆秋白》P44：“秋白在办报中很重视及时掌握情况和密切联系群众。”“报上经常刊登工人、学生、店员、海员等基本群众的来信来稿。报上的评论消息都力求短小通俗”。

②《热血日报》，1925年6月4日创刊，至6月27日出第24期后，巡捕房封闭承印《热血日报》的明星印刷厂，《热血日报》被迫停办。其中，沈泽民写6月18日社论，陈独秀写过几篇社论，秋白写社论20篇。杨之华《回忆秋白》P42：“在现存的二十四期报纸的社论中，光是收进他（秋白）在一九二六年自编的论文集的就有二十篇。”

20多篇短论，如《外国皇帝的勋章与中国同胞的血》等。也就在这狭窄、简陋的客堂间，秋白不顾疲劳，既要撰稿，又要做大量的组织工作、事务工作。他听取记者汇报，组织他们采访、写稿，他还要亲自编排、校对、付印，还要找工人谈话、接待众多的来访者^①。时常忘了回家吃饭。杨之华则从宝山路顺泰里12号家里，拎着搪瓷饭格，把菜饭送到报社，秋白边吃边看校样，间或还对杨之华讲一两句话：“这项工作比在大学讲台上讲课要有效得多。”^②之华高兴地告诉秋白，工人们手上拿的是《热血日报》，而不是《商报》，更不是《时报》了。

在此同时，秋白还主编党的理论刊物《新青年》月刊^③、党的机关报《向导》周刊^④；还给这些报刊杂志及《中国工人》等撰稿；还写了《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⑤、《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等小册子。这要化多么大的精力啊！简直是几个人才顶他一个人——一个有病之躯。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能做到吗？当然，还要有党的理论家特有的禀赋和才华，才能在主持两报一刊编务同时，迅速写出大量有深度的理论文章。杨之华回忆他那反击戴季陶主义的小册子就是一夜完成的：

①《热血日报》1925年6月18日启事：“出版十期，销数即达三万，投稿通信与亲来接洽者，日以百计。”

②杨之华《回忆秋白》P41。

③《新青年》季刊1923年6月15创刊，出四期后，于1925年4月改为月刊，但因人力和经济上的困难不能按期出版，实际成为不定期刊。到1926年7月，不定期刊出到第5号停刊。

④《向导》周刊，1922年9月创刊。1923年秋白参加《向导》编辑工作，1925年1月，秋白和蔡和森任党中央宣传委员，负责主编《向导》。该刊至1927年7月18日停刊，共出版201期，秋白在该刊发表70多篇文章。

⑤这是秋白一次讲演记录稿，由上海大学学生马凌山记录，印成小册子散发，时间约在1925年秋冬。

在一次党中央的会议上……经过秋白和任弼时等同志的力争，会议决定反击戴季陶主义，并委托秋白写文章进行驳斥。

秋白接受这个任务后，立即找了一些同志了解群众和各方面对戴季陶主义的反映，收集右派反动活动的材料，仔细研究了戴季陶的小册子。我们当时住的是一间很小的房间，秋白就在这个小房间的一小块空地上踱来踱去，或者坐在椅子上吸着烟，咬着笔端（他用的每枝笔端都是咬得粉碎的）。这是他考虑文章时常有的神情，他全神贯注在工作中，周围的任何动静都不闻不问。思考成熟以后，就动起笔来，衬着复写纸一口气写下来，一写就是两份，写得很整齐清楚，就象是重新抄过的一样。他那驳斥戴季陶主义的小册子——《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就在一天夜里写成了。

一夜之间，就写完洋溢战斗激情又有理论深度的小册子，确实要有才气。这不由不使人想到是党的创始人也是学者的李大钊，慧眼识人才，多次推荐秋白^②，把党中央决定办《新青年》季刊的任务交给了秋白。不久，又交付秋白主编《前锋》杂志^③。秋白没有辜负是导师又似兄长李大钊的看重。《新青年》季刊开始几乎是他一人搞起来的，组稿写稿，还要设计。瞧，那封面设

①杨之华《回忆秋白》P48—49。

②1923初，秋白刚从苏联回国，李大钊曾推荐秋白到北京大学俄国文学系任教，因反动分子阻挠，迟迟不发聘书。1923年4月，李大钊到上海，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请李大钊等商谈协助办学。（见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2辑）6月，秋白到上海，李大钊介绍他去上海大学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系主任。

③1923年7月1日，党的机关刊物《前锋》在上海创刊，假托广州出版，创刊号上秋白有三篇论文。该刊一共出三期，到1924年2月1日停刊。

计就很别致，监牢的铁窗，一只有力的手从铁窗中伸出，手中擎着一面红旗。真是多才多艺，编、写、画，样样拿得起。那时秋白风华正茂，胆识、才智过人，仅在这两刊上就发表40多篇文章，宣传马列主义。此外，他还讲授、编著了《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他还要参加党的各种会议，在党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会议上，以及党组织的政治集会上作报告，演讲。为之写决议，起草文件。超负荷的运转就是机器人也要吃不住的，何况在“五四”时他就得了肺病，去苏联又发作过，休养时医生已警告他，说左肺有一叶已烂穿，只能再坚持几年。回国后繁重的工作，白色的恐怖，敌人的搜捕，废寝忘食地写作，使他在1925年冬肺病复发，每天发烧，经常吐血。而秋白一直坚持斗争。1926年2月下旬，秋白还去北平参加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刚回到上海，就不幸躺倒。杨之华回忆：

中央知道他的病况后，就决定叫他疗养，为了保证他的安全，请了一位政治上可靠的医生，并通过这位医生在宝隆医院定下一间单人病房。住单人病房很贵，中央的好几位同志就凑了一笔钱帮助秋白。一切安排妥当后，中央就委托我传达中央的“命令”：强迫秋白进院治病……

我怀着感激、欣慰的心情，把中央的“命令”和一切安排告诉了秋白；同时，给了他一个体温表试他的体温。他激动地沉默了一会，拿起体温表看了一下，水银柱还是升得那么高。他带着微笑，缓缓地说：“这样也好，给我安排了一个安静的环境，我可以实现一个心愿了。我想编写俄国革命运动史，从中吸取有用的经验教训。”他把他需要的

①这三部讲稿，1924年作为《社会科学讲义》，由上海书店印行。同年10月，《社会科学概论》由上海书店出版单行本。

材料和平日用惯的文具等放在一只小提箱里，带到医院去。

秋白在肺病严重发作，处于生命危险之际，他想的是什么呢？不是个人还能活多久，而是想趁还活着就“要尽这一个责任”^①，即为革命撰书，借俄国革命运动史之经验，来指导中国现时的革命。19世纪20年代的肺病，是不治之症，多少革命作家死于不能劳累的肺病^②。然而，秋白为了提高党内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偏不顾劳累，广泛收集、阅读资料，要撰写好《俄国革命运动史》，他感到中国共产党党员，读马列主义著作、革命运动史是刻不容缓的事。这样才能正确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斗争中共产党领导以及苏维埃与社会主义之建设。这是当务之急呀！病到这样子，再要上书摊，翻找参考书，这自然不可能了。只好有劳夫人杨之华。杨之华按照秋白开的参考书单子，拎着书包，出入一个个书摊、书店、图书馆，寻找、购买，又急急地从书店赶到宝隆医院。秋白则把病床作战场，当他

①杨之华《回忆秋白》P 69—70。

②秋白《多余的话》：“我从一九一九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没有好好医治的机会。肺结核的发展曾经在一九二六年走到非常危险的阶段。”

③1927年7月，秋白编著的《俄国革命运动史》之一，即《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出版，秋白于同年6月3日为该书写的《自序》中说：“我很早便想利用我所有的一切材料，编纂一部俄国革命运动史略论。”“去年春病的期间，身体渐渐复原的过程里，在私庆得保性命之际，更觉得要尽这一个责任，因此，就动笔编了这一本书”。“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与农民问题的解决，始终是俄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这的确对于中国现时的革命，有很重要的教训。”

④不少左翼作家死于19世纪初的“癌”——肺病。1931年8月31日，蒋光慈死于肺结核。年仅30岁。1936年，鲁迅也死于肺病。此外，萧红也死于肺病及喉瘤炎，也是只有30岁。而叶紫死于肺病，年仅27岁。

拿起那些书时就象战士得到枪和子弹那样高兴，清瘦的脸上那双眼睛放射出异样的光彩，飞快地读那些书，常常是通宵达旦。这样，杨之华几乎隔一天就要上一次书店林立的四马路。转眼两个星期过去了。一次，杨之华走进秋白的单人病房，只见他穿着病人的睡衣，已离开了床，伏在桌子上，正兴致勃勃地写起来了，标题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秋白发现了之华，连声说：“五卅之后，正确地领导农民运动和解决土地问题，更是当务之急，所以我先编写这一部分。没有时间等待了呀！”^①他越说越急，越说越兴奋，越说越有劲。这劲头就象开会时他讲话那股劲，这劲头又象他在家写战斗文章时的那股劲。之华当然能理解拿起笔战斗对于秋白的作用，或许就象几年前秋白在苏联高山疗养院那样，边治疗边写作对秋白反是一种良药。再说之华见秋白病况似乎有些好转，也就只好劝他不能太急，写写歇歇，注意营养。边说边从包里拿出秋白要的书以及她给他买的营养品。此时，秋白看到之华同意自己写作，心情不由轻松起来，边接过书边把复写的一份书稿交给杨之华，带着开玩笑的口吻说：“这才是医治我和我们同志营养缺乏症的贵重药品呀！”从此，杨之华每次去医院看秋白，都要带回他写的可贵的精神产品——“上等治病的药品”，她作为第一读者读着，并告诉她自己的欣慰以及外面的动态。秋白思想敏捷，即刻根据新的斗争情况写时评、杂文。他的速度很快，一挥而就，同时还不影响他的专著《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的连续写作。就这样，秋白把病房作书房，变病床为战场，和自己“不治之症”斗，也拿起笔与军阀、帝国主义战斗。他写了《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中国境内之华人参政问题》、《怎样实现国

①杨之华《回忆秋白》P71。

民革命》等12篇时论，写了14则总题为《战壕断语》的杂文，以及《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的大部分。他不愧为党的杰出宣传家、理论家。

（二）步入党的最高领导

历史的一页翻到1927年，这是共产党人经历血与火洗礼的一年。早春二月，秋白感到的是那潜在的“寒流”。在无产阶级领导权、土地革命等一系列原则问题上，他与党的总书记等人分歧愈严重，愈表面化。同时，他的“第六感觉”已预感到新军阀（当时伪装为国民党“左派”）那霍霍的磨刀声，一场激烈的斗争已是不可避免了。秋白思绪烦乱、忧心重重。但是，为了医治党内“病危者”的“病”，为了挽救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他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皇帝斩首”，写了7.6万多字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这是他将提交给党的“五大”讨论的。3月，秋白和其他中央执行委员云集武汉，筹备“五大”召开。^①

不幸，预感成为现实。机枪在扫射，刺刀在飞舞，共产党员倒在血泊中！工人纠察队员倒在血泊中！湖州会馆遍地是血，正厅中央挂的“共同奋斗”红色锦旗也溅满鲜红鲜红的血^②，滚滚黄浦江翻腾的是层层血潮。这是1927年4月12日凌晨。当剑

^①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当时彭述之、郑超麟两人留沪未来，中宣部长由秋白兼任，记得有一时期，秋白生病，曾由张国焘代理过一星期。”见1980年6月20日《文汇报》。又据郑超麟1979年7月回忆，当时陈独秀也留在上海，秋白同张国焘、谭平山三人曾一度负责中共中央工作，秋白兼任中宣部长。

^②上海总工会设在湖州会馆，正厅里挂着蒋介石送来的锦旗，上面有他亲笔题字“共同奋斗”。然而，没过多久，他就撕下伪装面具，同帝国主义、老军阀“共同奋斗”，屠杀工人和革命群众了。奉系军阀张作霖1927年4月6日在北平逮捕李大钊等，蒋介石密电张作霖，主张将逮捕共产党人处死，南北呼应，“共同奋斗”。

子手弹冠相庆，革命处于严峻关头时，杨之华于12日晚接到党中央要她立即去武汉的加急电报。第二天，她参加了反击蒋介石大屠杀的抗议集会和示威游行。蒋介石的反动军队从四面八方用机关枪向游行队伍扫射，宝山路三德里地段堆积着一具具工人群众的尸体，偌大的上海但闻鬼哭与神号。傍晚，她乘江轮，逆水而上，一路上她含着悲痛，也含着忧虑，莫非秋白的肺病又发了。船一到汉口靠了江汉关码头，她就急急寻找旧英租界辅义里，三步并作两步，登上27号楼房。蔡畅^①等一些老熟人也在。有的拥护秋白的熟人把杨之华领入秋白住的厢房，还故意开玩笑说，部长“治”病，部长夫人驾到。说完就离开了房间，丢下杨之华一人，她心里象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直到秋白那熟悉的脚步声传入她耳中，才定下心来。见了秋白，她说：“真吓了一跳，以为你真‘治’病哩！”秋白说：“党内有人的‘病’是要‘治治’啦！”说着秋白从抽屉里取出一本厚厚的簿子，封面上用紫色铅笔端正地写着书名：“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他对杨之华严肃地说：“这一份底稿是留给你看的，另一份已经拿去付印了，准备提交给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革命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党内对很多原则问题的争论，必须求得正确的解决。你要冷静地考虑革命中的重大问题，想想我提的意见对不对。”^②杨之华翻了几页说：“你是说这‘病’是彭述之。”秋白点点头道：“这病的名词叫彭述之主义。”之华担心地讲：“可是，彭述之他是中央常委——”秋白打断了她的话说：“管他是什么，他已病入膏肓，面对老蒋的屠刀，还坐在‘太平庄’上高唱：

①蔡畅，蔡和森之胞妹，在巴黎参加中共支部，1924年派赴莫斯科学习，后回国参加大革命，从事妇女运动。杨之华夫妇与蔡和森及妻向警予是好友。

②杨之华《回忆秋白》P76。

‘革命的领导权天然在工人阶级身上’！”秋白停顿了一下，气愤地接着说下去：“没等到天上掉下革命的领导权，工人阶级却真正姓吴（无）了，多少工人兄弟的头已经落地啦！”之华心事重重地提醒秋白：“彭述之是和总书记两位一体的。”提起总书记陈独秀，秋白在房内来回走着、思考着，脑中闪现出头顶微秃的党的重要创始人，耳边似乎响起他那盛气凌人地训斥人的声音^①。同时，脑中又闪现出蒋介石那张凶狠的脸，耳边仿佛听到他那浙江奉化口音的密令：“杀！”以及“砰”、“砰”、“砰”的机枪扫射声。而后，秋白站住象似自语，又好象对之华的回答：“我可不怕皇帝斩首。”杨之华的眼睛落在秋白文稿的一行字上：

斩首是中国皇帝的东方文化，是中国的家常便饭。但是我要做一个布尔塞维克，我将服从真正列宁主义的纪律，我可不怕皇帝制度的斩首。^②

1927年4月27日，党的“五大”在武汉开幕^③。陈独秀中等身材，穿着长衫，仍是那般自以为是的神气，用那不紧不慢略带安徽口音的普通话，做了长达五个小时的政治报告。他对右倾错误没有认真分析检讨，对时局没有明确可行的对策。恽代英、张太雷等代表以失望的眼神看着秋白。罗亦农乘会议休息时走到秋白面前难过地说：“糟糕！”秋白一口一口抽着烟，心情沉

^①1926年，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乘机逮捕黄埔军校共产党员，强迫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员退出国民革命第一军。这是国民党右派阴谋夺权的信号。当时周恩来、陈延年（陈独秀儿子，中共广东区委书记）等主张反击。但是陈独秀等怕因此而导致统一战线分裂，对周恩来、陈延年严加斥责，并在《向导》周报上发表了《给蒋介石的一封信》，宣布谁反对蒋介石，谁就是“反革命”。这使蒋介石篡夺了第一军的全部军权。

^②《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第五章节录，见《瞿秋白选集》P332。

^③大会在武昌小学礼堂开幕后，即迁到汉口黄坡会馆继续开会，至5月9日结束。

重。他是带着《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但是并不希望把它真摊在代表们面前。1917年，秋白在北京大学旁听过陈独秀的课，那时陈独秀思想活跃，尤其是“五四”时批判旧伦理、旧文化，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他们之间可说既有师生之情谊，又有后辈对前辈的崇敬^①。1922年冬，陈独秀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秋白是其翻译，陈独秀发现秋白是难得的人才，请秋白归国。1923年秋白随陈独秀等回国，倍受重用，从任《新青年》季刊主编起，一直在党的总书记陈独秀领导下，做党的宣传、理论工作。在师生之外又多一层老上下级关系。不过，此时秋白倒颇象鲁迅对待太炎先生：“吾爱吾师，惟吾更爱真理”。秋白断然掐灭了烟头。“第二天开会的时候，在每个代表的座位上放着一本小册子，封面上印着：‘《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瞿秋白著’”。^②在这本小册子中，秋白尖锐地指出党内“有机会主义”，针对陈独秀、彭述之等人放弃革命领导权、“抑制农村阶级斗争”等错误作了批评，鲜明提出“我们的党，必须毅然决然和这彭述之主义奋斗”。^③否则，第三国际不能容纳如此之孟塞维克病的共产党。如此，我们只好准备加入第零国际罢！在以后的会议里，秋白发言再次强调小册子中所言：“无产阶级需要共产党之领导，所以实际上领袖中国革命的应当是共产党。”大声疾呼：“领导中国革命的人”“是有病，病的名词叫做彭述之主义，”“实在是孟塞维克主义”，“革命时机紧迫，赶快医治”。^④他怎能不大声疾呼呢？继上海“四·一二”大屠杀后，“广州发生了‘四·一五’血腥大屠杀……萧楚

①秋白的《革新的时机到了》反映了郑振铎等拜访“五四”时青年运动领袖陈独秀后，倡导“平民教育”，“民主、民治”的精神。见《新社会》旬刊第3期。

②杨之华《回忆秋白》P79。

③④《瞿秋白选集》P331—332，P339。

女……毕磊……结果都被捕牺牲了。”^①在北平，4月28日，奉系军阀绞死了党的重要创始人李大钊。李大钊与陈独秀一样看重秋白这样的人才。比较起来，秋白受李大钊思想、作风影响更多些。正是李大钊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指引他走上革命之路。李大钊那椭圆的面盘，满嘴的胡茬，那“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题词激励着他，党失去李大钊这样的中流砥柱，自己就该勇敢地站出来。会上，任弼时、蔡和森、张太雷、陈延年等都赞同秋白尖锐地提出问题。秋白小册子副题是：“第三国际还是第〇国际？——中国革命中之孟塞维克主义。”杨之华回忆：“恽代英同志戴着一副白丝边眼镜，一边笑，一边对我说：‘这标题写得好，写得尖锐。’”^②陈独秀皱着眉很不满意^③，彭述之怒气冲冲地用手拍着这小册子，连声说：“这是见了鬼！”

5月9日，秋白、杨之华都被选入29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秋白还进入七人组成的政治局。6月3日，秋白补入政治局常委会。他和陈独秀的斗争越来越表面化，几次开会都闹得不欢

^①徐彬如《回忆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的情况》（1971年一次座谈会上的谈话记录）。按，陈延年、徐彬如都是应出席党的“五大”代表，当时陈延年去武汉，而徐彬如（徐文雅）因工作需要留在广州。

^②杨之华《回忆秋白》P79。

^③秋白批判彭述之，实际上是针对陈独秀的，如“彭述之主义，”“并非彭述之一人的独创”，“彭述之主义者还是很多”等等。之所以未直接点陈独秀的名，其中，有爱护总书记的成分在内，也有秋白了解陈独秀的苦衷的成分。中山舰事件发生时，联共（布）中央委员布勃诺夫向陈独秀说明中共应对蒋介石采取让步方针；“整理党务案”是蒋介石提出，同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协商而达成协议，陈独秀只是执行而已，直到1927年3月，共产国际总书记布哈林报告还说只要蒋介石“暂时还未反动，尚未变节，无产阶级政党是可以帮助他的。”或许是出于同样原因，张太雷等想推荐陈延年代替陈独秀，而陈延年不同意。尽管陈延年反对陈独秀在中山舰事件后采取的让步政策仍然是很激烈的。

而散。秋白强调“进攻”，陈独秀要求妥协。他仍是总书记，这与其说他在党内的权威仍起作用，不如说共产国际的权威影响。鲍罗廷就是主张退让的。这就使得秋白到处作报告，鼓动进攻，进攻，却对改变整个局面无可奈何。眼见武汉国民党汪精卫政权也要步蒋家王朝的后尘，秋白深为大革命的前途忧虑。在这种矛盾心情下，7月初的一个傍晚，秋白对儿时的好友，当时为中宣部的工作人员羊牧之说道：“在武汉的日子不会太长了，趁没离开时，再去黄鹤楼走走吧！”^①他们从汉口江汉关前乘划子过江。一叶扁舟穿过江心激流时，秋白联想时局，触景生情，低沉吟道：“‘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两句最能表达我们此时的心境了。”^②羊牧之不解地问道：“现在落木还没有下吗？”秋白激动地说：“许多同志在牺牲，这不是萧萧下吗。”^③这时忠厚而又同情革命的船老大插了一句：“国民党要抓的人也太多了，你看武汉三镇哪天不抓人，哪天不杀人！”^④小划子靠岸后，秋白回味船老大的话，面对白浪滚滚的江水，烟水苍茫的武汉三镇，心里暗思：一个普通的船工，都看出汪精卫的国民政府在镇压共产党人，而我们党的最高领导竟然还对汪精卫抱有幻想。不禁气愤地说：“在前几天的中央扩大会议上，有些人还在高谈要承认国民党是当然处于革命的领导地位。荒谬地提出一切工农团体都要受国民党的领导和监督。什么当然领导！什么当然监督！我们要问：要不要共产党？是不是对得起已为党的事业而牺牲的李大钊等同志？”接着他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指着夕阳西下的远方群山说：“大好河山，又得沉沦一个时期了。”^⑤

天空翻卷着乌云，秋白预言中了。7月14日，汪精卫召开

①②③④⑤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

秘密“分共”会议，15日，血洗武汉三镇。秋白、恽代英等转入地下。在革命处于非常危急关头，秋白等筹备、主持了“八七”中央紧急会议^①。会议在汉口三教街（现称鄱阳街）一座公寓式的楼房里召开，出席会议的有秋白、张太雷、邓中夏、苏兆征、蔡和森、毛泽东、陆定一、任弼时、郑超麟等21人，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滋等3人也出席了。“参加会议的还有邓小平同志。八七会议时，他任党中央秘书处长。”^②会务工作由他负责，不过那时他叫邓希贤，24岁。在汪精卫反动政权鼻子底下开如此重要的会，够惊险，会务够重的。“出席会议的人不多，但因环境险恶，中央内部交通却花了三天功夫，将他们一个一个地带进会场。一进一出前后花了六天功夫。”^③会议只开了一天，由罗迈（即李维汉）任主席，宣布议程。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滋先讲话，而后秋白代表常委作党的新任务的报告。会议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傍晚，号称“蒸笼”的武汉，楼房里仍十分闷热，而人心更热。在热气腾腾中选出临时政治局正式委员9名：苏兆征、向忠发、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罗迈、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7名：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8月9日，秋白主持召开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常委，公推秋白负责^④。自此，

^①李维汉《关于八七会议的一些回忆》：“会议原来准备在七月二十八日举行，并由秋白、太雷和我与国际代表一起进行筹备工作。但是，由于当时的形势非常紧张，交通困难，”到“八月七日在汉口召开”。见1981年第8期《新华文摘》。^{②③}同^①。

^④有的回忆文章或论著中提到瞿秋白被选为中共中央书记。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提“我主持中央政治局”。李维汉回忆中提“大家都推选瞿秋白同志负责”。

秋白正式带领全党，顶着腥风血雨，开创十年土地革命新时期。时年28岁。为什么大家都推选秋白负责，这是历史的误会，还是历史的必然？秋白在党史上的历史地位如何？这是下文要论的。

（三）党的早期领袖 政治活动家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极其丰富、壮丽的历史，这部长长的气壮山河的历史画卷上，有多少英雄志士，有多少杰出的领袖。毫无疑问，秋白是其中的一位。他的历史地位是与他党的贡献联系在一起的。

人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他在大革命失败之时，党处于危难之际，主持召开了“八七”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①有的学者过分强调“撤销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组织处理固然不可少，但如同李维汉所说：“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九二七年七月间陈独秀拒绝去共产国际，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八七会议主要是批判他所代表的投降主义”。^②当时，我们的党是幼年的党，相当一些干部缺乏经验和理论水平，因而大革命后期，有些干部包括中央一级的接受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政策，使其路线、政策在中央占统治地位。“八七”会议上秋白的报告及其组织的讨论，他起草的《中共“八七”会议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P536，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②李维汉《关于八七会议的一些回忆》。又，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七月初几（……），老鲍（即鲍罗廷）提议独秀、平山去莫斯科与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自此独秀即不视事”。

告全党党员书》等，自上而下地彻底地从思想理论上清算了这条右倾机会主义的投降路线。从而，“八七”会议成为我党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它可以与其后的“遵义会议”，以及当代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相提并论。^①那时，革命力量受到重大损伤，党员由近6万人锐减为1万人，一些基层组织陷于混乱，党员与组织失去联系，不知所措，群众中弥漫着悲观、失望情绪。秋白的报告明确提出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在暴动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府，使党和革命群众有了斗争方向。秋白以惊人的胆识，战斗的雄姿，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力挽狂澜，恢复、整顿组织，高举红旗，发动起义，创建根据地。蔡和森一直是中央领导，这次未选入中央委员会。连他也极其客观公平地说：“我们绝对不要忘记‘八七’以后之伟大的效果。北方有好些同志说，‘假若新方针迟来一月，我们都散了。’这不仅北方为然，全国莫不如此”。“挽回了工农群众的恐慌和悲观”，“树立了工农革命苏维埃政权的新大旗。”^②

大革命中有多少英雄豪杰，共产党内又有多少一大批出众的领袖人物。为什么在这历史转折时刻，选择了秋白举大旗，带领全党前进？尤其是，7月12日，改组中央领导，成立五人临时中央常委会。五人常委中无秋白。然而，不多时日，竟然由秋白主持政治局工作，成为当时党的主要领袖。这决非历史的偶然

①当然“八七”会议也有缺点，如组织了反攻而忽略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保存力量，又如看到民族资产阶级倒向蒋介石反革命后，笼统地提出反对资产阶级口号，忽略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等。然而有的党史教材或论文，“八七”会议一带而过，大谈发展起来的盲动主义，或是稍点一下“八七”会议，又不与秋白贡献挂钩，这不合史实。

②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

机遇。早在党的“三大”时他就与陈独秀的右倾有分歧^①，此后，他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的旗帜都比较鲜明，而且有理、有节。这从陈独秀的反映也可看得出来。如前所述党的“五大”时，由于秋白注意策略，陈独秀对秋白用不点名方式批判他的小册子，只是皱皱眉头。此后，1927年6月30日，陈独秀在党中央扩大会议上提出国共合作11条政纲。秋白面对面地从理论到实际批驳它是集机会主义之大成，是向汪精卫武汉政权举起全面投降的白旗。必须要以土地革命反对反革命，不然红旗落地、人头落地。“在秋白讲话的时候，陈独秀一根接一根吸烟，露出不耐烦的神色，但总算还勉强克制着自己。”^②而当任弼时拿着“土地革命的宣言，要求中央批准以共青团中央名义发表”时，^③他才讲了几句，陈独秀一反大学者常态，既不和气，也无风度，而是个性固执、暴躁的“家长”。从座位上跳起来，蛮横地从任弼时手中夺过这宣言稿，将它撕碎，甩在地上，用脚使劲践踏，任弼时要求解释，陈独秀不让其再讲。其实，秋白发言尖锐，而任弼时刚开头，宣言稿也是和秋白等一起研究过的。为何陈独秀对秋白尚能忍耐，而对任弼时就发作了？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秋白的胆识、才学、威望。反对陈独秀右倾投降路线的同志选择秋白，受陈独秀这样或那样影响，而后又摆脱其影响的同志，也选择他，这就很自然的了。

①“三大”党纲，秋白起草时为“在此革命中，只有无产阶级是唯一的”“最彻底的力量”。“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陈独秀改为“无产阶级是一种现实的最彻底的有力部分”。“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这一改，“唯一的”“最彻底的力量”降为“最彻底的有力部分”，“不能成功”变为“很难成功”，这反映他们的原则分歧。

②杨之华《回忆秋白》P82。③同②；又，李维汉回忆也有类似情节，不过细节有不同，说“团中央书记任弼时同志代表团中央提出一个批评这个‘议决案’（按，指11条政纲）的书面意见”。

颇有意思的是，秋白本人毫无取代陈独秀之意^①，但共产国际代表却看中了他^②，群众反而拥戴他为领袖，这固然是革命的需要，但也跟他本人素质相关。秋白有着高于一般人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他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作出贡献，是出色的党的理论家。此外，他又是优秀的党的政治活动家。他那政治斗争的才能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表现尤为突出。国共两党合作，共产党员入国民党，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提出，李大钊在党内外贯彻的。这在马克思主义书本中没有现成的答案，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无先例。党内从总书记到基层多数党员思想不通，直到党的“三大”，经秋白、张太雷等上下积极活动，终于使马林、李大钊主张成为党的决议。1923年6月中旬，“三大”在广州召开，张国焘等激烈反对，认为“国民党是一个官僚的党，加入去只有使党腐化”。^③陈独秀则从反对、服从共产国际决定，加入了国民党，转向“一切工作归国民党”。^④秋白跟张国焘同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与蔡和森等也是好友，会上会下，路南路北，他向他们宣传共产国际、

^①秋白《多余的话》：“我虽然在一九二六年年底及一九二七年年年初就发表了一些议论反对彭述之，随后不得不反对陈独秀，可是，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

^②秋白当过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翻译。秋白批评陈独秀，实际也是对鲍罗廷的指正。后来，通过血的教训，鲍罗廷认识了右倾投降主义的危害。7月13日鲍罗廷带秋白上庐山研究武装起义等党的工作，邓中夏向鲍罗廷汇报南昌起义，秋白也同时听取，并发表决策性意见。21日，鲍罗廷与秋白回武汉，23日接替鲍罗廷的共产国际代表到达。当夜就与秋白等会谈。这些表明共产国际对秋白的看重与培养。

^③李立三1930年2月1日《党史报告》，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

^④蔡和森《论陈独秀主义》

^⑤党的“三大”在广州恤孤院后街31号（现恤孤院路3号）召开，一部分代表住31号楼上，楼下会议厅，另一些代表住路南“春园”。秋白楼上楼下跑，是会议内外活跃的人物。

李大钊的决策，谈他看法：领导辛亥革命造成中华民国的，是国民党，它是中国革命现有的材料，应就现有材料努力改造，参加并促进国民革命。秋白跟陈独秀熟悉，受其看重，也便于联络张太雷、恽代英、邓中夏等，他既和张太雷等一起积极推动国共合作，又提醒总书记考虑在联合的同时，保持独立性，争取领导权。更重要的是，他通过起草“三大”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来排除“左”及右的干扰。针对张国焘在社会主义青年团内散布的影响，秋白给团广东区委、广州地委组织的团员骨干作报告，宣传党关于实现国共合作，进行国民革命的决议。6月下旬，他风尘仆仆赶往杭州，召开浙江党团会议，传达“三大”精神，说服党团员执行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此时，秋白确似风云人物，很象“中流砥柱”^①。接着又风风火火返回上海，因为张国焘“三大”虽未进入中央领导机构，但在上海党组织中仍有相当权威。秋白出席了上海地委兼区执委会召开的党员大会，捍卫了“三大”关于国共合作的决策。8月，秋白又赶到中国又一“蒸笼”——南京，代表中央在东南大学出席并领导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二大”，通过了团员加入国民党的决议案。在此期间，正是24岁的秋白对剑虹一见钟情之时，美貌、善良的王剑虹比莫愁女更使秋白留恋，他多想在石头城多留些时日。然而，帮助改组国民党的一系列政治活动正等着他，踏上南下的火车，列车奔驰，栖霞山的红叶眼前闪过，心中还思念着那位红颜女子。9月，秋白作为

①鲁迅称守常先生是革命的“中流砥柱”。见易明善《李大钊与鲁迅》，1979年5月6日《四川日报》。秋白在杭州时作诗托物言志：“飞来峰下坐听瀑泉，——我恨不能再乘风飞去。且来此冷泉石上，做个中流的砥柱。”见1923年《新青年》季刊第2期《飞来峰和冷泉亭》。

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执行委员，已加入国民党。^①先代理后正式领导上海地委兼区执委会下属“国民运动委员会”，从事对国民党的统战工作。^②10月初，急南下广州，安排共产国际代表与孙中山会面，任鲍罗廷的翻译与助手。10月上旬末，鲍罗廷跟“瞿秋白，谭平山、阮啸仙等人谈话，研究改组国民党的计划”。^③此后，秋白任孙中山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④，该月下旬，孙中山聘请鲍罗廷为顾问。在此期间，秋白住在鲍罗廷的东山区春园公馆，为其改组国民党出谋献策，帮助草拟“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等重要文件。11月，又返沪，在中共中央三届一中全会上讨论这些纲领草案。以后秋白又参加了国民上海执行部以及在广州的“四人委员会”对此纲领的讨论。^⑤秋白作为年轻干练的政治活动家，在共产国际、共产党、国民党三方之间周旋，推动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显露政治家的才干。国民党“一大”及以后，与毛泽东等同志捍卫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反击了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更表现了秋白是我党有威信的政治家。正是他集理论家与政治活动家于一身的素质，所以，在李大钊牺牲，陈独秀犯错误离开中央以后，大家才公推他为领袖。

①秋白《多余的话》附录“记忆中的日期”，“一九二三年九月，是年加入国民党。”

②江苏省档案馆史料编研室《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江苏党组织发展简况》

③杨云若《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纪事》

④《加伦在中国》

⑤《胡汉民先生年谱》，国民党“一大”纲领草案“曾在上海执行部第一次会议中提出研究，经过整个晚间长时间的讨论。参加研究的有展堂先生（即胡汉民）和廖仲恺、瞿秋白、汪精卫等。然后，又在广州‘四人委员会’（廖仲恺、鲍罗廷、胡汉民、汪精卫）外加瞿秋白，对政纲讨论15小时。”

(四)为毛泽东思想形成作了开拓性贡献

雷蒙德·威利的《毛泽东主义的出现》一书，有一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这章里威利指出，陈伯达文章第一次用了“中国化”这个术语，不过它“所包含的基本思想，却不是陈伯达的，而是瞿秋白的”。这从一个侧面道出秋白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正如秋白自己所说：“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①那么，秋白在哪些方面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并为毛泽东思想形成作出贡献呢？

秋白最早根据列宁《两个策略》的思想，从理论上论证党的“二大”提出的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纲领。1923年9月，他在《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中国现阶段要求的是彻底的“民主革命”，这是“中国到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民主革命”是现阶段的，“目的必然在于社会主义”，“民权与社会两革命间的进程紧凑得多”。这样，就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初步轮廓的提出提供了基础。党的“一大”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二大”虽区分但不知把革命的两步联系起来。秋白的贡献在于论证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与进程。这是毛泽东思想萌芽的开端。

秋白较早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程度，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性质，阶级斗争的形势，阶级斗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等等”。^②如果说1926年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文，较全面地论述了敌、我、友，是毛泽东思想萌芽时期的重要代表作。那么，在

①秋白《瞿秋白论文集》自序，《瞿秋白选集》P311。

②《多余的话》

此前后，秋白的一些文章也是毛泽东思想萌芽时期的重要著作，在这些文章中他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特点、革命任务、阶级阵线。1923年7月，秋白在《前锋》发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一文中指出，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是帝国主义共有共管的“国际殖民地”，即“半殖民地”。1923年5月，秋白在《向导》发表《中国之地方政治与封建制度》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假手于官僚军阀，而确立其‘势力范围’”，军阀“借着外国帝国主义作后盾”，因而，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反帝反封建，“颠覆封建制度，掘帝国主义的根，绝帝国主义的命”。1925年6月，秋白在《热血日报》上发表《谁是敌，谁是友？》，指出“帝国主义”、“军阀、奸商”“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民众”要联合“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列强各国的民众”，“受列强压迫的其他弱小民族”，“靠我们真正的朋友”，“反对我们国外国内的一切敌人”。此后，秋白对阶级阵线的论述更为分明：“无产阶级与农民、工匠联盟作为进攻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地主阶级的主力军，同时决不可以忽视民族资产阶级及店东小资产阶级”。^①这时，还明确指出：“中国国民革命之为世界社会革命的一部分”。^②后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论述：“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从逻辑上说，不正是这一论点的发挥么？

秋白较早地论述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1923年9月，秋白撰文指出：“马克思以为‘在某种程度之内各阶级的联合常常是革命所必要的先决条件’”。“无产阶级应当和资产阶级联合而反对‘君主、诸侯及军阀’”。^③另一方面他又提出：“无产阶级应当引

①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瞿秋白选集》P 329。

②秋白《〈瞿秋白论文集〉自序》

③秋白《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载1923年12月《新青年》季刊第2期。

导最大多数的农民小商，行民权革命到底，而以严厉手段镇压君主派或军阀派的反动，并且遏制资产阶级的畏怯妥协。”这里，已略含有对资产阶级要具体分析之意。在《政治运动与智识阶级》中秋白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由“买办式的‘商业资本’”与“官僚式的‘财政资本’”构成的，这是“卖国派专制派”。另一部分由“纯粹的中国工商业”构成的，是“爱国派民治派”。在其他一些文章中，秋白提到“工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妥协倾向和压迫政策，不能不反抗”，要“联合小资产阶级督促资产阶级而行民族革命”。后来，毛泽东同志论证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对之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不也正是秋白论述民族资产阶级有革命性也有妥协性的逻辑发展么？当然，尤为重要的是，秋白较早地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论述了无产阶级在联合中争得领导权问题。1923年2月，秋白撰写《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文中提出：“务使最易于组织最有战斗力的无产阶级，在一切反抗旧制度的运动中，取得指导的地位。”^①1925年1月，秋白任党的“四大”政治决议草案审查小组长，在他审定党的决议案中用明确的语言讲了领导权的问题：“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够取得胜利。”^②1926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工人阶级……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这无疑是融入秋白、邓中夏等早期党的领导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尤为可贵的是，秋白还进而提出在军队、政权中争夺领导权，提出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1926年1月，秋白撰写《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文中提出革命发展到现时的阶段，工人阶级“取得政权”^③是尤其紧急而

①载1923年6月出版的《新青年》季刊第1期。

②《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中共党史参考资料》（2）。

③载1926年3月25日《新青年》月刊第3号。

重要的责任了。同年8月，他在《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正需要在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实行其力争革命领导权之斗争。”^①此外，在其他文中，他还强调在政权中争夺领导权，提出“无产阶级需要共产党的领导，所以实际上领袖中国革命的应当是共产党”。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把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看作是“革命胜利”或是“革命之反动”的“先决条件”。^②这不能不说秋白政治的敏锐、成熟。由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邓小平等同志反复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也可反证早在大革命时期秋白就如此重视党的领导的决定作用，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秋白最早根据中国国情提出武装斗争的基本思想。早在1923年“二七”惨案后，他就提出平民的“武装革命”与“群众运动”应“同时并进，互相为用”^③。1925年五卅运动后，他把武装斗争提到更高的地位，指出“中国被压迫的民众”“应当准备自己的武力，才能抵御英日帝国主义及奉直军阀的压迫和侵略”。^④1926年5月，秋白发表的《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是我党最早全面系统论述武装斗争的力作。他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已经造成武装革命的必要条件。因此，现时革命运动的中心问题，已经是实行准备革命战争”。“种种革命斗争的方式”，“革命战争是主要的方式”。因为“在欧美”“工人的巷战，未始不能使革命胜利”，但在中国“即使(城)市巷战暂时胜利，也很难持久”，

①见《瞿秋白选集》P293。

②早在1921年喀琅施塔得叛乱时，秋白就敏锐地察觉反对共产党是他们的口号。见《赤都心史》6《革命之反动》：“这次克龙史泰的口号却是‘无共产党之苏维埃’”。《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P131。

③秋白《中国之地方政治与封建制度》，1923年5月2日《向导》第23期。

④秋白《五卅屠杀后之奉系军阀》，1925年7月2日《向导》第120期。

因此,要“创造革命的军队”^①。更可贵的是他说没有“革命党的指导,始终难以战胜”敌人。自然,这还没有升华为“党指挥枪”,但由此发展引申,是可以推导出毛泽东同志后来这样著名论断的。秋白强调党对武装的领导,这跟秋白作为党的领导、参与计划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参与决策南昌等起义不无关系。

秋白较早提出党的建设的一系列问题。秋白认为无产阶级最“先进的一部分组织政党”,这个政党——共产党是“指导全阶级的革命运动”的。^②它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问题,“必须工人阶级的政党主观上有正确的战术”。为此,必须反对右倾的“彭述之主义”,必须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这在他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在“八七”会议上的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均有论述。此后,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③、《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中,既批判了右,又批判了“左”。在《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第10讲、第11讲中,都深刻、具体地批判了自己盲动主义的错误^④。秋白曾在几个月中有过失误,原因是复杂的,这下面章节将详论,但至少如当事者所言:“国际代表,主要是罗明纳兹”,“他们不仅是盲动主义和惩办主义的创造者,而且是强迫执行者。”然而,秋白毫不诿过于人,而是严以律己,深刻自我批评,并且把它写于党的历史。没有一颗无私的心,能做到么?秋白还积极提倡党的优良作风。他说:“使党前进的,正是自我批评。”^⑤“注意党与群众

①见1926年5月25日出版《新青年》月刊第4号。

②《列宁主义概说》,《新青年》第1号。

③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研究》中说:“‘六大’决议是瞿秋白同志起草的,米夫、布哈林都修过改,拿回来后秋白同志又改过。”

④秋白《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见《中共党史报告选》。

⑤李维汉《回忆与研究》P235。

⑥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

的关系”。 “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实践相密切联系”^①。他反对党员“谋取私利”，提倡艰苦奋斗。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20年代初，作为党的中央委员，他生活简朴，党的机关活动经费困难，他将自己有纪念意义的挂表当了50块大洋，给党作为活动经费。后来赎回后，战友沈泽民要赴苏区，他将此表赠给沈泽民^②。一块普通的旧钢怀表，却闪耀着共产党人艰苦奋斗、团结战斗的光辉。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这是民主革命的三大基本问题。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秋白在上述三大问题上的理论贡献是巨大的。

秋白最早认识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意义，他高度重视土地革命，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雏形。1922年，他说：“无产阶级没有农民的辅助，不能有尺寸功效。”^③1923年，他起草的党纲中指出：“农民当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加，也很难成功。”^④1926年，他进一步指出：“中国革命应当以土地革命为中枢。”^⑤1927年“八七”会议上他强调“要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来”。^⑥那么，怎样开展土地革命呢？他根据中国

①秋白在“八七”会议起草的《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

②秋白《瞿秋白论文集》自序》

③1921年秋白赴苏，他响应苏联政府征集金物号召，把自己的金质挂表捐献出来，苏联政府回赠他一只钢质挂表。后来沈泽民将此表转赠给徐海东，徐海东又转送给彭德怀。到1946年彭总将此表还杨之华。今此表存常州瞿秋白纪念馆。

④《赤都心史》

⑤瞿秋白《中国共产党纲草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P110。按：秋白起草的原文为：“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

⑥秋白《国民革命之农民问题》

⑦秋白在“八七”会议上代表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作的《关于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

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中国革命运动发展底速度是不平衡的。”^①提出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创造“农村武装割据”。1927年12月，秋白的《武装暴动的问题》，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雏形。到1928年11月，毛泽东的《井冈山的斗争》，把它发展成红色政权的理论。1930年1月，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则形成乡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完整理论，而秋白是创立此理论的前驱。综上所述，秋白的理论论述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开拓性贡献。

（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与“中国化”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它如同整个毛泽东思想体系一样，也不仅是毛泽东个人的，而是我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也含有秋白的贡献。尤其是在中国革命早期，毛泽东同志着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他主要精力投入革命斗争^②。而秋白既是革命家、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写《社会哲学概论》等专著、长篇哲学论文。当时，他的理论贡献更为突出些。主要表现在：

秋白在中国较早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战斗作用，强调它的实践意义，指出理论不能跟实践相离。1922年他说：“一切真理——从物质的经济生活到心灵的精神生活——都密切依傍于实际。”^③1925年他又说：“革命的理论必须和革命的实践相密切

①瞿秋白《政治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P177。

②1921年7月至1927年7月，毛泽东写作发表120多篇文章，近40万字，全部都是论述中国革命的，无一篇哲学专论。因为他有此哲学实践作基础，他后来发表的哲学论著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上更出色。

③秋白《饿乡纪程》

联结起来”。^① 1927年他更指出：“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② 这些对于毛泽东同志提出“实事求是”的原则，有着积极的影响。当然，这也有个发展过程。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同志着重运用马列主义研究中国革命实际，此后1930年，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强调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1941年，他则指出党的历史就是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历史。1942年，称之为“实事求是”。这条党的思想路线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秋白等党的早期领袖对此的论述^③。当然，毛泽东把它发展了，尤其是把实践提高到第一位，这是新发展。

秋白在中国最先系统全面地宣传辩证唯物论，并且把它和历史唯物论共同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④ 1923年，他在上海大学主讲“社会哲学概论”和“现代社会学”^⑤，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性、完整性。尤为有突出意义的是，他系统地讲授了辩证唯物论（秋白称之为“互变律的唯物论”）他说：“宇宙是永久的动、变、改造、发展之过程”，“宇宙及社会的变易观，便不能不以能‘动’能‘变’的主体归之于物质，——物质如此流变，所以

①秋白《列宁主义概论》 ②《瞿秋白论文集》自序

③秋白在《社会哲学概论》中接触到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标准问题，他说：“一切科学的思想都应当时时和具体的现象相较对。”

④当时相当一些人只把唯物史观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秋白吸取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论相统一的理论，把它们作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看待。1926年秋白在《马克思主义之概念》的笔记中更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四个组成部分：辩证法的唯物论、唯物史观、经济学说、科学社会主义。

⑤此课讲历史唯物主义，后出书为《现代社会学》。它受布哈林著作的影响。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副标题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书名为《现代社会学》是因为在当时中国反动统治下，用此书名易出版。否则是“赤化”宣传物。

思想亦反映而流变”。“物质现象的根本便是‘物质的动’。”^①他还说：“事物之矛盾性的概念，这是现实的宇宙及社会的‘根本属性’。”“宇宙现象的根本便是‘物质的运动’。动的本身便是矛盾。”“物的矛盾及事的互变便是最根本的原理，——没有矛盾互变便没有动，没有动便没有生命及一切现象。”^②他又说：“宇宙间的一切现象，既然是永久动的，互相联系着的，社会现象亦是如此。”“宇宙间一切都动，一切都流，实际上是决无绝对的静，”“一切都是变的，不断的变易律是一切的根本。”而“所谓‘动’，就是斗争，就是矛盾。”“所以‘斗争’，与矛盾（趋向不同的各种力量之相对抗），——足以规定变动的历程。”“动的历程，便是内部矛盾的发展。”“历史的发展，本是矛盾的发展。”^③毛泽东则进一步把唯物辩证法看作是分析的哲学。《矛盾论》则发挥了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其“军事辩证法思想”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秋白宣传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他指出，“意识”和“实质”（客观存在）的关系，是“哲学上的根本问题”。“不是意识规定实质而是实质规定意识”。“哲学中的唯物论并不是否认精神，却是解释精神”。^④他又指出：“心物问题是社会科学里的先决问题。”“物质先于精神。”^⑤在肯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前提下，秋白进而提出社会意识的反作用，“精神上的力量能回复其影响于物质的基础”，落后于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表现着历史的“惰性律”，而马克思主义则能够指导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此外，秋白还最先富有创见地提出：“社会革命渐次完成改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后，”“精神文明自然也能真正改善”，

①②秋白《社会哲学概论》，见《上海大学讲义》。

③⑤秋白《现代社会学》，见《上海大学讲义》，1924年。

④秋白《社会哲学概论》

“社会主义文明”使得社会成为“真美的世界”。^①毛泽东同志则创造性地发挥了意识对物质能动反作用的原理，在《矛盾论》中提出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在一定条件下又具有决定性作用。在《论持久战》中强调人的“自觉能动性”，以及如何充分发挥这种积极作用。邓小平同志则发展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物质文明”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②

秋白还强调时势造英雄的历史工具论。他在1923年指出：“个性的动机仅仅是群众动机的先锋，阶级动机的向导。”“群众的人生观渐渐有变革的要求，所以涌现出适当的个性。此种‘伟人’必定是某一时代或某一阶级的历史工具。”“历史工具仍旧是历史的产物。”^③1924年，他指出是时势造英雄，无产阶级领袖是时代的产物，称列宁是“是全世界受压迫的平民的一个很好的工具”。^④毛泽东则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了党的群众路线，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秋白关于革命的理论论述，并非完美无瑕，其中也有某些偏颇。如他曾有“一次革命论”，中国革命可以和世界革命“合流直达社会主义”。又如，他曾讲中国革命是“无间断的革命”，“革命潮流不是低落而是高涨的”，错误地估计各地工农暴动“显然有汇合成总暴动的趋势”，主张组织中心城市暴动。^⑤

①秋白《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

②邓小平《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P 15，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③秋白《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

④秋白《历史的工具——列宁》，1924年《孤星》第4期《追悼列宁专号》。

⑤秋白《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布尔塞维克》1卷5期。

他的以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为主导的哲学思想，以及他的人生哲学都是可取的。如他赴刑场时所言：“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些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但是，有的论述尚欠周全。如他否定偶然性^①。其实，有必然，也有偶然。偶然中蕴藏着必然性。此外，在其《多余的人》、《多余的话》中有着某些老子、庄子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残影。

那么怎样看待秋白这些偏颇或“左”呢？其一，要看到导致这种情况的复杂因素。过去，有的只看到秋白的“左”，而未看到这“左”常来自当时共产国际或其代表的指导。象“一次革命”论、“不断高涨”论、“无间断革命”论等，都是共产国际代表提出的，秋白不过是宣传、执行而已。那么他又为何执行、宣传这些呢？从客观上讲，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由于党的年幼，在接受共产国际正确指导同时，也接受一些“左”的。从主观而言，秋白无疑是当时党内天才的理论家，优秀的政治活动家。然而，他过早地被推上领导全党的地位，又在那样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下，领导全党实行史无前例的伟大转折，这是当时其他人也都会感到难以胜任的。加上他的书生气质，缺乏象毛泽东那样多的实践，墨守苏联的经验。这样，在共产国际代表错误指导面前而陷入盲目性，搞盲动主义，“城市中心论”，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二，就受共产国际代表或当时苏联有的领导人的消极影响而言，情况也十分复杂。过去，有的只看到秋白与共产国际代表错误主张一致的一面，未见其不一致的甚至斗争的一面。如，共产国际和苏联当时有的领导人提“第三时期”的理论，认为当时处于“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时期，这种理论无视中国

^①秋白《现代社会学》：“有定论(决定论)的意义便是否认一切偶然性。”这也受布哈林观点的影响。

革命处于低潮的现实。对此，秋白曾表示异议，^①受到布哈林的批评。又如，斯大林同志，共产国际认为蒋介石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1927年初，秋白也曾这样看。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秋白从中国实际出发，认为蒋介石“已经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由此可看到秋白曾受其消极影响，可又有某种突破。再如，秋白曾针对鲍罗廷、罗易和陈独秀的右倾，写了《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虽未点名，但问题提到“中国革命史中之孟塞维克主义”。可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却说：“中国不会有孟塞维克主义。”自然，秋白出于对共产国际组织的服从、对共产国际代表的敬重，这种争论以至斗争往往是很注意方式的。

某些失误与贡献相比，贡献是巨大的。他留给后人的是一个蕴藏极为丰富的思想库。这是极珍贵的精神财富，象介绍“新经济政策”的文章等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正如他所说：“无产阶级之革命思想的指导，当然是集体的工作，然而我确是这个集体中的一个个体，整理我的思想，批评我的思想，亦许对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不为无益。”^①秋白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以丰富的文献资料，采用了按党的会议和革命运动发展之各自递嬗，双线叙述党的早期历史，是党史萌生时期的重要著作，有其历史与现实的意义。^②

①秋白《瞿秋白论文集》自序》

②本章第4、5节曾在盐城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发表，题为《论瞿秋白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贡献》。

五、瞿秋白文艺思想纵横谈

——与鲁迅、毛泽东文艺思想比较

秋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十年浩劫中，他的名字在现代文学论著中消失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秋白光辉的历史本来面目的恢复，一些新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大都提到秋白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然而，他的贡献仅仅是译介么？50年代，有些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与专论，则以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证明秋白文艺主张的正确。回避了其历史联系。并且，横向比较也很不够。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下，运用系统论、相似论、比较研究的方法论，把秋白文艺思想放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长河中作动态考察，就发现秋白文艺思想来源于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又有发展，它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先声。秋白文艺思想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历史联系性，这跟他们共同的政治斗争、以及思想理论的一致性相关。话从秋白为毛泽东的《湖南农民革命》一书作序说起。

（一）毛泽东的支持者 再次赴苏

说到《湖南农民革命》，有些同志可能感到生疏，而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许多人都熟悉。为什么毛泽东同志这篇报告要秋白作序呢？这不仅是当时秋白党内地位比毛泽东高，面主要是这篇报告被彭述之腰斩了。事情是这样的：1927年初，为了驳斥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诬蔑，毛泽东同志考察了湖南湘潭等县的农民运动，写成《湘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报告只在党

中央机关报《向导》上登了一部分，就被陈独秀、彭述之禁止继续刊登。秋白到武汉知道此事后，十分气愤，对中央宣传工作人员羊牧之说：“目前党内，特别在中央，有些同志不敢支持已经开始，或者正在开始的农民革命斗争，反而横加指责，今天一个过火，明天一个越轨，这不行。毛泽东同志这篇文章，是亲身下去做了几十天实地调查，很有说服力的文章”。并交待羊牧之将这“报告”“单独刊印”。^①为了支持毛泽东，1927年4月11日深夜，秋白伏案为此书写了一篇赞赏这篇报告的序言。文中写道：

农民打倒官权、神权、族权、男权是为着什么？是为着创造自己的民权。他们农民协会的民众参加县政，主持乡民会议的运动。民众已经开始自己管理自己的事……

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

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②

秋白还把《湖南农民革命》作为他与杨之华在武汉的见面礼。郑重地叮嘱杨之华说：“这是一篇好文章，人人都应该读几遍，希望你好好学习。”停了一下，秋白又愤愤地讲：“可是，这样好的文章，却不准宣传，真是岂有此理！”^③望着秋白激动的神态，之华心想：秋白与毛泽东的政治理论观点多么一致啊！

是啊，早在党的“三大”时，他们在反对陈独秀的右、张国

①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见《忆秋白》P79——81。杨之华《回忆秋白》P68，讲到秋白“在四月中旬”把这报告“交党办的长江书局出版了第一个单行本，书名是《湖南农民革命（一）》”。

②《瞿秋白选集》P346——348。

③杨之华《回忆秋白》P76。

煮的“左”时，就是志同道合的战友。而后，他们并肩反击右派。1925年，秋白撰写《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等文，毛泽东写《国民党右派分裂的原因及其对革命前途的影响》等文章，共同反对戴季陶主义。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秋白、毛泽东等与戴季陶在会上面对面斗争，驳斥得他抬不起头来。会议休息时，秋白、毛泽东等共产党代表正在凭楼远眺，恰好戴季陶等也上楼来。由于大会决议对戴季陶的“训令”已成定局，维护了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同时也出于礼仪，秋白和他们几个握了手。毛泽东同志见状，也逐个握了手，可谓配合默契。不过，跟戴季陶握手时，毛泽东朗笑着说：“台上握了手，可不能台下踢脚呵！”弄得戴季陶十分尴尬。后来，秋白回忆这情景，对羊牧之说：“我确认他（指毛泽东）是一位既有原则又讲策略的党的优秀工作者。”^①此后，1926年夏、秋，毛泽东同志接办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这年7月，陈独秀、彭述之把持党的四届三中扩大执委会，通过陈独秀起草的《决议案》，指责农民运动“过左”，这给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造成困难。为了支持毛泽东同志工作，秋白应毛泽东同志邀请，同年8月，赴讲习所，作了题为《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的讲座。“八七”会议后，秋白为首的党中央委以毛泽东中央特派员的身份，领导秋收起义。1928年1月6日，秋白在中央常委会上讲到“湖南要先发展割据的局面”。同年2月17日，秋白又对毛泽东领导起义部队在遂川造成割据局面表示赞成。此后的报告中他也多次称赞毛泽东。这些政治观点的一致或许是他们文艺观点相似的原因之一吧。

秋白的两次赴苏，对他在中国传播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更产

①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

生积极影响。20年代初，他在苏联时翻译了《共产主义与文化》等文论，写过《最近俄国文学问题——艺术与人生》等文艺论文。1928年，秋白第二次赴苏，是为筹备党的“六大”召开。同时，也自然带着中国革命文学的论争寻求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一次，秋白与曹靖华在大教堂附近的莫斯科河畔散步。秋白对曹靖华讲到，中国极需要苏联的文艺作品与文艺理论的介绍，应当把这作庄严的革命政治任务完成。^①在苏期间，秋白就翻译了苏联著名的《三八妇女节之歌》。杨之华在中国时一直搞妇女运动，哼着此歌连声叫好。后来，秋白回国后，由曹靖华转寄的苏联书报翻译了《新土地》等名著。

（二）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

秋白对马列主义文艺论著的翻译、评介主要在第二次赴苏后。特点是数量多。翻译了恩格斯给哈克纳斯论现实主义的信、恩格斯给爱论斯德论易卜生的信；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论易卜生的成功》、《法国的戏剧文学和法国的图画》、《别林斯基的百年纪念》、《唯物史观的艺术论》；翻译了列宁的《列甫·托尔斯泰象一面俄国革命的镜子》、《L·N·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以及V·亚陀拉茨基等的《关于列宁论托尔斯泰的两篇文章的注解》；翻译了拉法格的《左拉的〈金钱〉》等等。又一特点是他既有翻译、还有评介、论著。有《恩格斯和文学上的机械论》、《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马克思文艺论底断篇后记》、《文艺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拉法格和他的文艺批评》、《关于左拉》、《社会主义的早期“同路人”——女作家哈克纳斯》、《论弗理契》、《苏联文学的新阶段》、《斯大林和文学》等等。尤其是，他还结合中国

^①曹靖华《罗汉岭前吊秋白》，见《忆秋白》P 166。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实际，写了一组文艺大众化的论文，如《大众文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我们”是谁？》、《欧化文艺》、《大众文艺的问题》、《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等。再一特点是，秋白的翻译，直接从俄文翻译，较多地得之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正宗，并将它“中国化”了。鲁迅、冯雪峰等当时也翻译。或是通过日文转译的，或翻译的是日本文艺理论家的理论，其中有些并非真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另外一些如太阳社的蒋光慈、钱杏邨，以及创造社后期的成员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镜我等，他们倡导无产阶级文艺理论，但其理论大多来自日本的藏原惟人、青野季吉、川口浩等人。而这些日本无产阶级文艺理论，主要又是吸取苏联“拉普”派、波格丹诺夫等人的文艺理论。加上钱杏邨等人当时大多年轻、偏激、易产生片面性。因而，他们传播的也并不全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秋白既是政治思想家，又是马列主义文艺家，两次赴苏，在传播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上就有特殊有利之处，直接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那里理解、把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加上他注意结合中国革命文艺实际，在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过程中，更接近马克思主义。不象太阳社、创造社一些同志那样过分“激烈”，而是较为辩证。如他既坚持钱杏邨的“文艺的政治化”说法，又批驳了胡秋原先生“勿侵略文艺”的“文艺自由论”，还指出了钱杏邨“放弃了文艺的特殊工具”的偏颇。秋白将马克思主义文艺原理指导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时，一下就抓住问题的核心——文艺大众化。1932年，李长夏致信周扬，认为在《文学月报》发表的有关大众化的文章中，秋白的“理论最有条理，有最大的影响”。①

①见1932年《文学月报》第5、6期合刊。

国内外有些论著提到秋白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①，这自然是事实。但是，把秋白的贡献仅局限在译介上就值得商讨。秋白的《“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等著述。比较系统地译介、著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关于文艺与政治、与群众、与革命、与生活，以及文艺的特殊性、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文艺的题材、语言等方面都有比较完整、系统的论述，并形成有他个人特色的文艺思想体系。不仅如此，秋白撰写的《大众文艺的问题》等论文，运用马列主义文艺理论，致力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问题的解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在文艺与群众关系上，秋白根据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文艺必须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这一党性原则，提出文艺为“劳动民众”服务。无疑，秋白关于文艺大众化的思想是受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启发而来的，但它又是“中国化的”。由于印欧语系是拼音文字，口语和文字基本一致，汉语书面语言是用汉字，“文”与“言”脱节，要文学革命，必须如秋白所言，要“文腔革命”，要努力大众化，要“创造普洛的革命大众文艺”^②。这不是一般的传播，而是开拓性的传播，指导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

其次，在文艺与生活关系上，秋白认为“文化为‘动’——即生活的现实”^③。这来源于马列主义的唯物论的反映论。但秋白又辩证地指出：“主观的我在客观的物之中”。^④这区别于丘赫莱

①王薇生同志提到苏联马克·施奈德的《瞿秋白的创作道路》，夸大瞿秋白受惠于苏联文艺理论，单纯称赞瞿秋白把苏联火炬（即革命文艺思想理论——笔者）带回到了中国。

②《瞿秋白文集》〔二〕P 856，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下不注版本。

③《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P 251。④同③P 93。

伊的唯心论：“真正的艺术——它永远是自我表现”，也不同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机械唯物论：“艺术……再现现实。”说明了文艺作品是客观现实与作者主观认识、情绪、感受的统一，这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至今仍有深远意义。特别是在西方现代派反对文学反映生活，鼓吹只写“心理现实”，只写人的“潜意识”，而我国竟有人也说文艺“要顽强表现他自己一个赤条条的我”时，在庸俗社会学泛滥，完全无视创作中有作家个性特点时，秋白关于创作中客观与主体的辩证统一文艺观更有现实指导意义。

最后，在文艺领导权问题上，秋白根据列宁关于“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一部分”的论述，进而指出：“文艺革命运动之中的领导权的斗争，是无产阶级的严重任务。”^①“只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能够保证新的文艺革命的胜利”。^②

秋白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使之“中国化”过程中，由于是开创，不可避免地也有历史的局限，这后面还将详论。这里先谈在他的有些文章中提到的“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这种混淆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说法，无疑是受“拉普”的影响。1928年初至1930年初，秋白在苏联，那时正是“拉普”理论盛行之时，自然受到影响。但是，正如王铁仙同志指明的那样：“他（指秋白）虽然有时使用‘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这个名词，但是实际的含义和拉普的观点还是有区别的。”^③秋白用这个名词原意在强调文艺应当揭示社会内部矛盾和必然前景，这种揭示应通过真实的形象反映。这跟“拉普”提倡的政治观念的演绎和图解的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并非一回事。又如，秋白曾讲：“在

①《瞿秋白文集》〔二〕P 880。②同③P 881。

③王铁仙《略论瞿秋白的现实主义观》，1982年第3期《文艺理论研究》。

文艺上,他们不会需要浪漫主义。”表面看来,这又跟反对浪漫主义的“拉普”派一致。可是,再仔细辨别一下,又可发现秋白反对的只是虚伪的浪漫主义,并不反对理想。他说:“问题是在于怎样把这些情感和理想建筑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真正的现实主义”应当具有“为着光明理想而牺牲的精神,革命战斗的热情,”“要求改革,要求光明的‘幻想’,远大的目的。”^①王明堂同志说:“他一方面说反对浪漫主义,一方面又在谈‘热情’和‘理想’。这就是瞿秋白既受‘拉普’理论的影响,而又不同于‘拉普’理论的一个明显的例子。”^②秋白的基本文艺思想是属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范畴的。正因如此,当太阳社钱杏邨、创造社李初梨等受“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影响,提出“文学,有它的组织机能”,“要创造生活”时,秋白能敏锐地指出这是唯心论的,夸大了文艺的作用。

(三)与鲁迅文艺思想的同异

秋白是革命家,也是文艺理论家。鲁迅是文学家,也是革命家。他们都象把火带给人间普罗米修斯那样,努力以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他们的文艺思想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文艺与政治关系上,秋白强调两者关系密切,秋白说“文艺战线上的斗争,正是总的政治斗争的一部分”。鲁迅也是如此,并说“无产阶级文学”是“政治斗争的一翼”。从此出发,他们都肯定文艺的阶级性、文艺的武器作用。秋白说:“文艺”是“一种辅助的武器”。鲁迅也认为文艺可以“用于革命,作为工具的一种。”

^①《瞿秋白文集》〔二〕P1008。

^②王明堂《把火带给人间》,江苏省社科院《理论研究》1983年第9期P5。

在论文艺大众化问题上，秋白提出文艺为劳苦大众。鲁迅也是肯定这个方面的，他希望“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秋白还提出：“革命的大众文艺必须开始利用旧的形式之优点”。^①但要防止盲目模仿旧形式，要“依照着旧式体裁而加以改革”，“创造出新的形式”^②。鲁迅在《论“旧形式的采用”》中也有类似的说法。

在文艺的特殊性问题上，秋白强调文艺是“武器”，并不否定它是“特殊工具”。他指出：“应当经过具体的形象，”“用‘描写’‘表现’的方法，而不是用‘推论’‘归纳’的方法，去显露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历史的必然和发展。”^③鲁迅讲得更辩证：“它之所以是工具，就因为它是艺术的缘故。”

当然，他们在有些看法上也有差异，如秋白把大众文艺看成是普洛文艺的唯一文艺，这就绝对化了。而鲁迅则比较实际，他指出：“在现下的教育不平等的社会里，仍当有种种难易不同的文艺，以应各种程度的读者之需。”在文艺的阶级性上，鲁迅的看法更辩证。秋白的文论中只谈到文艺的阶级性，未讲到共同人性。而鲁迅则既批判了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而又不滑向庸俗阶级论，他认为人的性格、感情是人的阶级性和“人之常情”的对立统一，文艺“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在文艺与生活关系上，秋白的认识是唯物论的反映论，但在前期，多少还有些机械论的痕迹。如他在《〈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中说：“文学只是社会的反映”。^④这里，就忽略了创作主体的“自我”反映。鲁迅论述就比较辩证：“现在的文艺，就在写我们自己的社会，连我们自己也写进去。在小说里可以发见社会，也可以发见我们自己”。在歌颂与暴露上，鲁迅侧重于揭露黑暗，而

①《瞿秋白文集》〔二〕P 890。②同① P 863。③同① P 868。④同① P 544。

秋白主张揭露的同时，也主张赞颂“新式的人物”。此外，在创作方法上、翻译的“信”与“顺”的关系上、对“五四”新文学的估价上，他们的看法也不尽一致。

他们文艺主张的“同”、“异”，是跟所处的环境、各自条件等因素相关的。在30年代，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是反革命文化“围剿”，以及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文艺思潮的挑战，这些都促使他们较多地从文艺与革命的关系论述文艺与政治、文艺的阶级性、文艺大众化等一系列问题。而他们又同时是作家，自然地又顾及文艺的特殊性。他们文艺主张的某些差异，则跟他们各自的特殊经历、素质分不开。为什么鲁迅的文艺主张较为辩证，切合中国文艺运动实际？这是因为鲁迅一直战斗在文艺战线上，面向实际。而秋白早期曾有一度搞新闻、文艺，之后主要精力在党的工作上，只是30年代初，才又回到文艺园地来，对文艺战线上的情况不如鲁迅熟悉，较多的是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看中国文坛，这自然也是联系实际的，但中间有的是理论上的推理，有时不免与实际脱离，如对“五四”新文学的片面估计就是如此。可是，在另一些方面。如关于文艺的领导权问题，秋白的论述比鲁迅就更全面、深刻，这又是跟秋白作为党的早期领导人的身份相关。作为政治家、宣传家，秋白的文艺思想显示其宏观的敏锐、政策性强；作为文学家、思想家，鲁迅的文艺思想特色是辩证、深刻。他们各有千秋，李何林把宋阳(秋白)与鲁迅并称“现代中国两大文艺思想家”。

(四)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历史联系性

如果把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比作历史长河的话，那秋白文艺思想既不是源头，也不是终点。1917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1919年12月李大钊发表了《什么是新

文学》。1923年至1924年间，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沈泽民等，则进而提出一些革命文学的主张。1925年到1927年，茅盾、郭沫若、鲁迅等对革命文学都有进一步论述。但是，这些文艺理论主张还不系统、完整，有些提法本身也较含糊，甚至失误。到30年代，秋白经艰苦的探索终于粗具系统。过去，一般说法是到40年代初，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形成文艺思想体系。其实，秋白的文艺思想已初步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其中某些重要的理论主张，已为集大成的毛泽东《讲话》所吸收，为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的形成作了开拓性贡献。那末，它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历史联系性及理论的共同性何在呢？主要有以下几点：

在文艺为人民群众这个根本问题上，秋白提出：“普洛大众文艺应当在思想上意识上情绪上一般文化问题上，去武装无产阶级和劳动民众：手工工人、城市贫民和农民群众。”对此，毛泽东同志概括为文艺为工农兵，并把它提到文艺方向的高度。从为大众出发，秋白强调现在应搞些“初期的”“大众文艺”^②。至于提高，“大众文艺”“将同着大众去渐渐的提高艺术的水平线”^③。在《讲话》中，毛泽东把“向工农兵普及”、“从工农兵提高”，都纳入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总方向，并证明文艺为人民和坚持党性原则的一致性。文艺大众的关键何在？秋白提出：“作者生活的大众化自然是最中心的问题。”这里，接触到作者思想、生活大众化、革命化，但缺乏具体论述。在《讲话》中，毛泽东具体地指出：要“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要“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对大众艺术的形式，秋白强调

①《瞿秋白文集》〔二〕P856。

②同①P900。③同①P881。④同①p877。

民族化、通俗化，认为文学“是民族性文字的表现”，要使中华民族的人民大众“读惯，看懂”。后来，毛泽东同志从“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审美欣赏情趣着眼，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中国文化”、“民族形式”的问题。并且突出强调不能以西方文化为主流，而应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雷蒙德·威利讲到陈伯达认为新的民族文化，应该既是“中国化”的，又是“地方化”的。“这两个术语之一“中国化”，毛泽东在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便采用了。可是。威利又指出，“陈伯达早在同年5月4日所发表的《我们关于现代文化运动的意见》一文中，已经第一次用了这两个术语，不过这两个口号所包含的基本思想，却不是陈伯达，而是瞿秋白的。”而后威利进一步论证说，到1938年时，瞿秋白关于文艺大众化的思想已经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内的大批知识分子，包括陈伯达。^①透过这些分析，也可窥见秋白的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历史联系。

在文艺与生活关系上，秋白注意到文艺反映生活，要经作家这中介。他要求作家了解现实，观察、体验生活，作家应该“深入到民间去”。这说法是列宁关于作家要“到农村或外地的工厂（或前线）去观察人们怎样的新的方式建设生活”的思想的发挥。但是，在国统区缺乏实现这口号的条件。在延安，革命根据地里过去被反动统治阶级隔绝的作家和人民群众之间联系的障碍已被拆除。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地从理论上概括为：“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它源于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又反作用于生活，“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

^①雷蒙德·威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第四章“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P85。转引自王薇生论文未刊稿《国外对瞿秋白文学活动的评价》。

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由此出发，毛泽东不仅强调作家“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而且要求作家“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造世界观。这是他对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立足点比秋白高，更有深度。在怎样反映生活上，秋白反对公式化、概念化，“脸谱主义”。指出“文艺的特殊任务在于‘用形象去思维’”。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不能“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文艺有自己的“特殊问题——艺术方法艺术作用”。在谈诗时，也提到了形象思维。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中讲到要“标新立异”，“不要雷同”。

在文艺塑造“新人”问题上，由于秋白到过社会主义的苏联，他根据“苏维埃”“锻炼出了新式的人物”，提出无产阶级要“表现革命战斗的英雄”，要写社会主义新人。这跟恩格斯关于“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的文艺主张是一脉相承的，又体现了工农武装割据，劳苦大众自己掌握政权的时代特点。毛泽东同志更迫切地感到文艺与新时代当家作主的群众结合的必要性，鼓励作家表现“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要“以写光明为主”。秋白歌颂红军的《“匪徒”》颂等作品，就是讴歌光明的。毛泽东的诗词更是坚持表现正面理想，致力塑造无产阶级光辉形象，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他们关于歌颂生活中进步的、光明的、积极的文艺主张，至今都有现实意义。

此外，秋白强调党对文艺的领导权，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明确规定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包括新文学）由无产阶级领导。他们都突出党性原则、党的领导；都提倡为大众，而不是迎合某些读者群；都主张用“现代中国普通话写”，必须使大众听得懂，看得习惯；都注意文艺的典型、形象化的特征。

列宁说过，无产阶级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同样，毛泽东文艺思想也不是凭空而来。毛泽东文艺思想是集老一辈革

命家和革命文艺家理论之大成，其中特别是秋白的文艺思想。秋白的文艺理论是早期共产党人及革命作家文艺主张的发展、完善，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先声，它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与毛泽东文艺思想有着历史联系性与理论的共同性。这种历史联系与理论相似的原因，从客观而言，他们都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时期，都直接继承马列文论，都根植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土壤。同时，如前所言，在大革命时期，政治上他们相互理解、支持。土地革命时期，1934年，秋白到江西苏区，领导文化、文艺工作，创办高尔基戏剧学校。学校有三个剧团，演出时毛泽东同志常来，他们相处甚融洽。庄东晓回忆：“毛泽东经常看汇演，”“秋白同志是毛主席最接近的战友，在党的政策方针、路线问题上，两人的观点经常是一致的……每次见到他们两人，总是面带笑容，还常在一起谈笑咏诗呢。”^①那时，毛泽东的党内地位比秋白高，不过他们都受王明的压制，政治观、文艺观是一致的。秋白为江西中央苏区文艺工作规定大众化、通俗化，采取多种形式，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而这些，在延安时基本都继承了下来。威利普认为延安文化和文艺运动是江西中央苏区瞿秋白模式的继续。自然，从中总结出的文艺理论也就有着必然的联系与共性。就主观而论，他们两人都有很高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都精通辩证法，都有求实的作风，又都有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都有创作实践。尤其是，他们共同推崇、敬仰鲁迅。毛泽东在延安时曾研读鲁迅著作，后来又说过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而鲁迅与秋白又是心心相印的。冯雪峰回忆，秋白的文艺主张“还影响了鲁迅先生，使鲁迅先生也写了不少文章，为文艺大众化而奋斗”。^②这样，就可寻找到

①庄东晓《瞿秋白同志在中央苏区》，1980年第3期《新文学史料》。

②冯雪峰《回忆鲁迅》P132、133。

这两位伟人的心理素质相近之处(当然,也有不同点,这后面再论),特别是文艺观的相通。1942年,《讲话》发表前,毛泽东同志深情地谈到“要是瞿秋白同志还在就好了!”他“又懂政治、又懂文艺!”在作了“讲话”后,毛泽东把讲稿“放了半年才拿出来。在这半年之中,主席阅读了《海上述林》等等”。^①毛泽东还对萧三说过:“是啊!假如他(指秋白)活着,现在领导边区的文化运动该有多好啊!”^②

(五)跟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差异性

秋白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也有差异性,与毛泽东正确的文艺主张相比,秋白有些文艺论述有“左”的地方。如,秋白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失败的。他对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评价偏低,说新文学是“‘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又如,他对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也有某种的程度估计不足,认为赋、诗、词、散文等等“实在并没有多少可以做我们研究的对象的”。秋白关于“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提法是不妥的。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并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1938年,提出“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到1958年,则提“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统一”。这不仅对秋白关于现实主义的提法是个发展,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是个发展。

关于传统文艺,秋白总的观点是对的,但在具体论述时却有些偏颇。在《学阀万岁》中,他不恰当地把古典名著《西游记》等跟色情的《陆根荣黄慧如轧饼头》相并列,都作为声讨的对象。

^①李又然《毛主席——回忆录之一》,1982年第2期《新文学史料》。

^②萧三《忆秋白》,1980年6月16日《人民日报》。

在《大众文艺问题》开头，把“说书，演义，小唱，西洋镜，连环图画，草台班的戏剧”，错误地一概称为“反动的大众文艺”，“表现着封建意识的统治”，“武侠和剑仙的梦想”。毛泽东则以一分为二的观点指出：“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取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后来概括为“推陈出新”。1964年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为什么秋白有时对民间文学的论述正确，如《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中所论即是如此。为什么有时对通俗文学、民间文学的看法又比较偏激，而毛泽东不这样呢？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通俗文艺、民间文艺，如“小放牛”倍加欣赏。这也许是毛泽东生长在农村，在斗争中和工农群众有较多接触的缘故吧。而秋白在城市，大多数时候在党的领导机关工作。30年代他在上海那段时间，又处于白色恐怖之中，与工农大众接触较少。

关于创作自由问题。秋白正确地指出胡秋原先生未能恰当地批评钱杏邨的理论错误，批驳了胡秋原的要文艺脱离政治的资产阶级“文艺自由论”。但是，胡秋原先生对钱杏邨的指摘以及要求自由竞争言论中，也有某些合理因素。如他认为“新文学运动以来的自然主义文学，趣味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革命文学，小资产阶级文学，普洛文学，民族文学，以及最近民主文学，我觉得都不妨让他存在。”这里，把无产阶级的“普洛文学”与为国民党反动派服务的“民族文学”并列，认为可并存自然是错误的，但他主张其他各种文学的多样化，无可非议。而且，胡秋原先生还说“民族文艺”“摧残思想的自由，障碍文艺之自由的创造”，主张“艺术之发展，全靠各种意识互相竞争”，这又是可取的。秋白对此未肯定。毛泽东在《讲话》中则指出：“应该允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1957年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问题

是，在实践中他并未坚持这正确方针。由上所述，可以看到毛泽东文艺思想形成过程是经历了吸取、扬弃、融汇的过程。

另外，秋白曾反复说“文艺的特殊工具性”，并具体指出它“用形象去思考”，对文艺的内容与形式、创作方法、文艺批评等有关文艺特殊性问题均有不少论述。但是，他毕竟只是在30年代初期才有较多的精力研究文艺，他对文艺内部规律的研究也还不够。毛泽东同志绝大部分精力也放在政治、军事斗争上，文艺上的论述大多还是从政治着眼，属文艺本身的规律，如典型化的几个“更”、“两结合”的创作方法等虽有论述，但都较原则，缺乏深度和广度。威利说：“毛泽东本人想集中精力解决政治与军事战略战术问题，也不免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文化的关系。”这虽有些偏颇，但却也多少道出毛泽东对文艺内部规律缺乏更多时间研究的客观原因。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关于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提法，关于创作题材、方法多样化的意见，关于作家必须加强社会责任感、创作作品必须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的观点，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指示等等，都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新发展。秋白的文艺思想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历史长河中占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他象普罗米修斯把火带到人间那样，给普洛文艺迎来了光明，这光明一直照亮中国文坛，他的许多文艺主张至今仍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①本章最初在台州师专学报1985年第2期发表，题为《瞿秋白与毛泽东文艺思想之比较探讨》，后经较大增补，改题为《瞿秋白文艺思想纵横谈》，在南京教育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发表，收入本书又有修订。

六、秋白对语言理论的奉献

——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开拓

秋白是卓越的革命家、文学家，也是我国现代杰出的语言学家。在语言学领域也有非凡的成就。过去有的论者偏重阐述秋白在文字改革上的贡献，并且，讳言其历史局限性。其实，秋白不仅是中文拉丁化道路披荆斩棘、承先启后的开拓者，而且，他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语言文字领域，写下几十万字的论著。其中，虽有某些偏颇，但更多的是精辟的语言理论，至今，对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仍有指导性。这些都与秋白所处的时代，与他的政治哲学观相关。话从秋白第二次赴苏说起。

(一)第二次赴苏

1928年夏，秋白化装赴苏。在莫斯科郊区兹韦尼哥罗镇附近的乡间别墅主持中共“六大”后，就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留在莫斯科，直到1930年8月回国。这期间，他虽处于政治斗争的风浪中，但已不主持中共中央领导工作。尽管忙，却有精力进行理论思维。或许纠缠不清的派别纠纷使他厌烦，更促使他潜心理论研究。1928年冬，1929年春，他两次疗养，有了充足的时间。同时，20年代初跟秋白一起研究汉字拉丁化的科洛科洛夫又常来看他，当时正是苏联文字改革处于高涨时期，这些使得秋白又开始了中断的汉字拉丁化的研究。这段时期，他不仅为中共党的建设、共产国际运动作出重要贡献，而且，在中文拉丁化上、语言理论上也取得令人惊喜的成果。

当时，秋白一家住在“柳克丝”^①二楼12号房间，“柳克丝”座落在特维尔斯卡亚大街（今高尔基大街），它靠着克里姆林宫。一天，当克里姆林宫大钟刚敲过，一位学者来访，秋白觉着面熟而又陌生。是啊，怎么不面熟呢，六七年前，他们曾多少次一起研讨中文拉丁化；又怎么不陌生呢，如今眼前这位好友已是语言学教授，苏联早期有名望的汉学家。秋白取下了带金丝边的眼镜，看了又看。终于由栗色的头发下，清瘦面孔上那闪动的一双深邃的蓝眼睛认出来了，惊喜地喊道：“科洛科洛夫！”这对“终生的知己”^②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原来，20年代初，秋白在“东西文化的接触地”——苏联考察，就与科洛科洛夫相识，并结为心灵的挚友。科洛科洛夫比秋白长三岁，俄国人，在中国新疆出生、长大，中国姓名为郭质生，青年时代才回国，对中国朋友有特殊的感情。他是这样回忆与秋白邂逅相遇的：

1921年的春天是温暖的，常有阳光和煦的日子。五一节前的一天，和往常一样，我领着自己的两个小女儿在救世耶稣教堂附近的公园里散步。……突然，我的注意力被两个年轻的中国人吸引住了。和当时久居莫斯科的中国人不同，他们穿得很好。其中一个手里拿着质地很好的皮包。挽着夹大衣，戴着金丝眼镜，一看就是个知识分子，那沉稳的风

①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寻觅双亲的足迹》：“‘柳克丝’当时是共产国际的干部宿舍。李立三、陆定一、任弼时等同志以及日本的野板参三、保加利亚的布拉高耶娃都在这里住过。一九二八年”，“我和爸爸、妈妈住在‘柳克丝’。”“今天的‘柳克丝’已改名为‘中央大旅馆’。那气魄宏伟的建筑，那沉重的镶有厚玻璃的大木门都一如往昔。”“二楼的十二号房间”，“是很大的（至少在当时我的眼中是如此）。房间的深处是一个恰能容下一张大床的壁龛。在靠窗的地方摆着父亲的的写字台，旁边有一个阳台，夏天总摆满花草。”见瞿秋白纪念馆编《瞿秋白研究》（1）P368—369。

②《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P103。

度和他的年龄不太相称，另一个则显得活泼好动，手里拿着照相机，肩上斜挂着照相机的黄色皮套。他们正想给那座教堂拍照，但看见我后有点发窘。看样子他们把我当成是维护秩序的人了。……我也按中国习惯向他们提出了一些初次相识时一般的问话。果然，他们是北京《晨报》派来的记者。一个叫李宗武，带金丝眼镜的就是瞿秋白。^①

此后，他热情地表示愿意帮助“独在异乡为异客”的中国记者，请秋白到家中作客，为之当翻译。后来，苏俄外交委员会东方司果然派了科洛科洛夫作为秋白的翻译。到1921年9月，秋白被《晨报》社解雇，经济困难，没有适合的住处，秋白应科洛科洛夫的邀请，住在他家。他们结为知己，促膝长谈，谈革命，谈汉字拉丁化。在第一次赴苏期间，秋白两次与列宁会面，列宁当时曾说：“拉丁化对东方语言是一个革命的因素。”那时苏俄掀起了文化革命的风暴，拉丁化运动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在列宁的启发下，在拉丁化浪潮里，秋白与科洛科洛夫共同探讨列宁提到的这有趣而又困难复杂的问题。这时，秋白研究中国汉字怎样用拉丁字母拼写，并在业余时间做两大抄本^②。1922年底，秋白离苏返回祖国，就把笔记抄本放在科洛科洛夫家里，希望科洛科洛夫把研究继续下去。这次科洛科洛夫来，带来了秋白的拉丁化笔记抄本，以及关于进一步研究的建议。一个无私、一个奉献，都是为了革命而作这项研究的。后来，秋白去科洛科洛夫家，向其请教语言及中文拼音化的理论问题，也谈生活中愉快与不愉快的事。秋白的女儿独伊回忆：“在郭质生家中，两个大人（郭质生和父亲）正在热烈地谈论着什么，而我和郭质生的女儿（一个与我同龄的小女孩）在地毯上兴高采烈地玩着一只玩具狗，那狗会

^①科洛科洛夫1960年给杨之华的信。

^②杨之华《忆秋白》，《红旗飘飘》第8期。

跳,并会发出可笑的叫声……”^①此后,他们还有多次交往。

语言学家科洛科洛夫的出现,以及他带来拼音化的抄本、有益的建议,勾起了秋白对语言理论、汉字拼音化研究的兴趣。王明等制造的所谓“江浙同乡会”是“反党小组织”,搞得秋白精疲力尽,而王明又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支持,随着米夫、王明将所谓派别斗争步步升级,更弄得秋白身心交瘁。^②1928年底、1929年春两次不得不疗养。远离是非漩涡的安静环境,空闲的时间,给秋白继续研究提供了好的客观条件。特别是马林诺的列宁疗养院,它位于莫斯科南面数百英里处,是座幽静的乡村疗养院。山川、树木、房屋,都罩上厚厚的一层雪,秋白在雪地里自由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思绪飞到了莫斯科。

①瞿独伊《寻觅双亲的足迹》。又,秋白《未成稿目录·痕迹》中有“郭质生”题。

②王明在1925年由上海大学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另一说为许凌青给陈独秀信而保送去的),从辈份上讲,秋白为其师。王明投靠米夫,1927年1月随米夫访华回苏后,留该校工作,他诬陷与他意见不同的几个江苏浙江籍同学组织宗派集团“江浙同学会”。1928年夏,事情闹大了,秋白亲自过问,并派周恩来调查,查无宗派组织。1928年秋,经联合审查委员查实,作出不存在反动组织“江浙同乡会”的结论。此时,鉴于米夫支持王明掀起派别斗争的风波,秋白提出撤消米夫职务。据陈一诚回忆,自此,米夫、王明把秋白作为眼中钉,“诬蔑瞿秋白是什么‘布哈林分子’”,“欲置瞿秋白死地而后快。”(见《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1期《关于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王明集团成员盛忠亮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中,也有他们阴谋攻击、陷害秋白的记载。这时期恐怕可说是秋白“黄金时代”向“艰难岁月”转换时期,少不了不愉快。也就在这场说不清的纠葛中,秋白的弟弟,中山大学学生瞿景白莫名其妙地“失踪”了,至今下落不明。秋白的妻子杨之华在中大学习受到严重处分。秋白《未成稿目录·痕迹》中有“忆景白”题。临刑前还念及此事。

想到了帮他一起研究的科洛科洛夫、吴玉章以及和他朝夕相处一直支持他的杨之华。回到疗养院房间里就给杨之华写信：

我最近又常常想起注音字母，常常想起罗马字母的发明是很重要的。我想同你一起研究，你可以帮助我做许多工作。这是很有趣的事，将来许多人会跟着我们的发端，逐渐的改良，以致于可以适用于实际工作上去，使中国工农群众不要受汉字的苦。这或许要五十年、一百年，但发端是不能怕难的。我们每人必须找着一件有趣的大部分力量和生活放进去的事，生活就更好更有趣了。^①

1929年2月，秋白拟制出《中国拉丁字母草案》^②。10月又加修改，定名为《中国拉丁化字母》，署名瞿维托。1930年春，先在莫斯科《中国问题》杂志第2期上发表，接着出版单行本。后来，又写了《汉字和中国的言语》等16篇语言、文字的论文，以及信四封。

（二）历史唯物主义的语言、文字观

在这些语言、文字的论文中，秋白的重要成就之一是，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运用于语言理论领域，开拓了社会语言学的新领域。他在中国最先传播“互辨律”的唯物论，并明确用历史唯物主义去观察、研究社会现象，包括语言这特殊社会现象。他认为语言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产物，语言为适应社会的变化和人们交际的需要，它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根据这种动态

①杨之华《忆秋白》

②据苏联语言学者史萍青介绍，该书1929年6月由莫斯科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出版社出版，用玻璃版印行，只印了200份。据瞿独伊80年代重新去苏联，得知样书（方案草案）“至今仍然珍藏在列宁格勒的公众图书馆内”。

的语言观,他考察了汉语的发展,并联系社会的变迁作了辩证的分析。他从古代白话、《红楼梦》和《水浒》时代的白话、以及现代白话的比较中,看出中国语言的发展;反过来,又由《水浒》跟《红楼梦》的言语不同,分辨出自明朝到清朝白话的变迁,看到社会生活一天天的复杂起来,语言一天天的进步。他指出:“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极大变动。实际生活的需要,已经发展了新式的言语;一切新的关系,新的东西,新的概念,新的变化,已经这样厉害的影响了口头上的言语,天天创造着新的字眼,新的句法,使文言的汉字不能够再束缚它。”^①这里,秋白阐明了词汇是语言中最敏感的要素,它直接反映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动;阐述了句法变化虽极其缓慢,但新的生活也影响到汉语文法向严密、丰富的方向发展;此外,他还论说了现代汉语发展力图冲破汉字对它的束缚,道出汉字与汉语发展中有矛盾的一面。

汉语发展的规律是什么?秋白注意一般社会现象的“公律”,更注意语言尤其是汉语的“特别公律”。他认为汉语是向多音节发展。他推想远古时代汉语原本是多音节的。到上古时代有了汉字,一个汉字一个音节,表示一个意义,汉语为适应汉字的这一特点,单音节的词变得较多起来。随着语言的发展,它总是要冲破这种束缚的。明、清以来,特别是到了现代,汉语中的词已演变为大半是多音节的,以双音节为主。“只有完全不懂现代言语学和语法学的人,方才会说中国言语还是单音节的”。^②现代汉语以双音节词为主,并且,三音节、四音节的词一天天多起来。这样,原来一个音节一个意义的汉字,在多音节词中就成为字根或字头、字尾,就象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的各国语言那

①《瞿秋白文集》〔二〕P 684。1953年版,下面不注版本年代。

②同① P 685。

样,这使中国文字采用拼音文字具有可能。同时,多音节词的逐渐增多,也使汉语拼音中同音相混的困难逐渐减少。例如,“闭关主义”读起来象“悲观主义”,于是就产生一个新词“关门主义”来代替它,以减少同音相混。这也是采用拼音文字的重要客观条件之一。

秋白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语言观出发,认为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它也是顺应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他从上古中国文考察到现代中国文,发现上古文是周朝人画的许多符号,这是象形文字,而后它缓慢地向谐音方面发展。他又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角度,对比了埃及文字的发展。埃及文字从象形文字最后发展到现在的拼音文字,中间经过一个形声文字的历史发展阶段。由此他推断:“文字的发展道路”是“从象形到形声,从形声到拼音”,“拼音的文字是合乎言语规律的。”^①秋白的这一论断是符合汉字历史发展趋势的。甲骨文中形声字约占20%,到许慎的《说文解字》,该书共收9353个汉字,其中形声字为7706个,占82%,而在现代的《中华大字典》中,形声字占90%以上。这有力地表明汉字本身的发展有表音的要求。不过这些形声字半边还是表义的,而声旁又有许多不能正确表音,加上声旁就有1300多个。因此,秋白认为,“汉字不是表示声音的符号”,而“文字和言语在同一个系统里”,却是“文字和言语几乎完全分离”。这样,为求“文字和言语一致”,“能够适应现代的社会生活”,拼音化是汉字历史发展的必然。这就把社会学中“必然的公律”运用于语言研究,从更高的理论层次论说拼音化是历史的必然规律,论证了汉语与汉字在同一系统里,在矛盾中求新的统一的发展趋势。

^①新发现的秋白手稿《中国文和中国话的关系》,原件存中央档案馆,复印件在常州瞿秋白纪念馆。

(三)语言的规范——运用社会学于语言研究

秋白运用现代社会学的基本理论，结合现代思维学、语言学的知识，把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它是思维的工具。秋白说：“思想实在是没有声音的言语”^①。它又是社会统一使用的交际工具，人们用它表达思想，社会上靠它作为传递信息的重要交际工具。从语言的社会性、交际性出发，他认为中国现在的形势，以及将来的发展趋势，都需要一种各省人共同的普通中国话，人们用它来互相谈话，沟通思想，传递信息。他科学地指出，“经济的发展沟通了向来差不多是隔离的区域，方才产生一种可能——可以形成中国各省人大致共同可以懂得的普通话。”“因为社会生活和政治学术上，都有共同通用的言语的必要”^②。他还从各国的国语大抵有一种方言作基础，又掺杂其他许多方言的影响，指出中国“现在普通话的基础”是“北方话做本位的”。强调“从小孩子的时候起，到他独立地参加社会的生活为止，必须学习普通话”^③。把学校作为学习、推广普通话的重要阵地。

也正是从语言的社会性出发，他十分注意语言的纯洁，强调语言的规范，使语言所负载的信息成为人们容易共同认知的交流信息。为此，他不能容忍语言的混乱与杂凑。在调查社会上用语状况后，他极其尖锐地指出：“现在中国的言语，实在处于极端混杂的状态之中：古代文言”、“现代文言”、“新式白话”、“旧式白话”、“这四种言语同时并存着”。^④这种新旧言语的并存、用语的混杂主要表现为：1.乱造新词。把“工人代表的区域会议”、“支部书记”叫成“雷阳会议”、“细胞书记”，这类怪名词弄得谁都莫名其妙；2.古文腔，乱用不必要的文言虚字眼，文白

①《瞿秋白文集》〔二〕638。②同①P 654。④同①P 645。

③新发现的瞿秋白手稿《中国文和中国话的现状》

相杂。如：“十一龄女生”、“绝对无需于阶级斗争之手段”，又如：不写“我把两只梨子吃了”，而写“我将二梨喫了”。这种半文不白严重影响人们交际、信息的流通；3.不正确的欧化。第一，词法方面，中国用词习惯语尾“的”“地”通常不连用，然而，有的却写“幽默的地”这一类字眼。第二，句法方面，我国民族文法的习惯是短句较多，用语简短明瞭，主语中心词很少有长的定语。有的话的句法就违背这种民族习惯心理，不写“她是一个寡妇，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她……”而写成那种迎合洋人心理的欧化句子。或写成“她是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的寡妇……”或写成“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而做着寡妇的她……”这是“全盘西化”的折光反映。第三，外国文法的“硬译”，洋腔洋调。例如，翻译作品中有这样的话：“我决不是要由这一点，在同志里培进斯基上头竖起十字架来。”这种洋翰林的文腔，如果在公开场合谈起来，一定会引起“哄堂的”大笑！

秋白认为“必须肃清这些不通的字眼”、“违背文法的习惯”，不然“就剥夺了群众了解的可能”。正是这种强烈的群众观念，与劳苦大众息息相通的深厚感情，使秋白怀着极大的愤怒批判统治阶级对语言的污染，把中国言语的“古物陈列馆”示众，以辛辣的笔锋嘲讽官绅的西崽文腔。主张欧化要用正确的方法，不论字法、句法、章法均应符合汉语的习惯和中华民族的心态，以保证语言成为全民族、全社会的交际工具，在经济发展、文化技术革命中起到信息交流的作用。

温济泽同志说：瞿秋白“他是我国应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学的第一个人。”布哈林是共产国际总书记。秋白多次参加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第二次赴苏成为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成员。布哈林所著《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影响了秋白，据此秋

①《瞿秋白研究文集·序》，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白撰写了《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并进而把社会学的原理运用于语言学领域，把语言作为社会约定俗成的特殊社会现象，作为社会共同使用的符号系统，从它的社会性、交际性出发，要求它必须规范化，标准化。

（四）论现代文学语言的建设

秋白又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理论，把语言作为文学的第一要素，十分重视文学语言的建设。在《论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时，第一就讲“用什么话写？”“中国的普洛大众文学应当担负创造这种言语的责任”，即“创造出‘可爱的中国话’”。他把以现代普通话为基础，提炼“可爱的中国话”，作为文学革命的任务，文学工作者神圣职责。他说：“文学的责任，就在于把这种新的言语，加以整理调节，而组织成功适合于一般社会的新生活的文腔。”^①怎样才能建设好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呢？他提出应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要处理好书面语与口语的关系。“书本上写的言语应当就是整理好的嘴里讲的言语，因此，他可以比较复杂些，句子比较长些，字眼比较细腻些。然而他不应当和嘴里讲的言语比较起来是另外一种的言语。”^②这也就是说书面语可把有声语言符号系统转换为文字符号系统，“文”与“言”一致，与普通话一致。它是加工过的口语。

二要处理好现代文学语言跟古语、外来语的关系。现代文学语言必须是现代化的，象“于斯时也”是古代文腔，它跟以双音词为主反映现代生活的现代文学语言，很不协调。当然，这不是说不可以吸取古语中有用的成份。秋白说：“可以运用文言的来源：文言的字根，成语，虚字眼等等，但是，必须使这些字根，成语

^①《瞿秋白的文集》〔二〕P 620—621。 ^②同^① P 646。

虚字眼等等变成白话，口头上能够说得出来，而且的确能够增加白话的精密，清楚，丰富的程度。”“同样，我们应当用这样的态度去采取外国文的字眼和句法。”这就是说为着现代文学语言的丰富与严密，可以把古语中有生命力的融化在现代白话里，为着同样的目的，也可以吸收外国语言中我们所需要的成分。这种欧化的成分要合乎我国语言的规律，真正容纳到现代的中国白话里去，而不是游离于民族语言之外的洋腔洋调。

三要处理好翻译与现代文建设的关系。秋白《论翻译》中提出翻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①。怎样使翻译帮助现代中国文学语言建设呢？在《再论翻译》中，他批评了那种存心偷懒，随便乱翻译的行为，如译出“将行将入木的速度扭现于目前”这样的句子，拼凑出“扭现”这样谁也不懂的新名词。还批判了只管“装进异样的句法”，不管是否能说得出来的不负责任的翻译。强调翻译“应当用中国人口头上可以讲得出来的白话来写。”“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白话文。”“真正的白话就是真正通顺的现代中国文”。指出“信”和“顺”不应对立，应该是“一方面和原文的意思完全相同（‘信’），别方面又要使这些句子和字眼是中国人嘴里可以说得出来的（‘顺’）”^②。

四要处理好文学语言与方言、俗语的关系。秋白认为“在特别需要的时候”，为了“更加能够表现现实的生活”，现代文学语言可以吸取为普通话所接纳的方言、土语，但这不是方言的滥用。秋白还认为现代文学语言应是“群众的言语”，大众的语言，它要以“口头上的俗语做来源的主体”。当然，这也不是群众俗语的照抄、照搬，而是进行加工和提炼了的群众言语。

①《瞿秋白的文集》〔二〕P 934。②同①p918。③同①P 929。

秋白的这些精辟的见解,对于我们现在的汉语规范化,文学语言的建设,基础教育中的语言训练,都有指导意义。

(五)理论特色

秋白语言理论的最大特色是强烈的实践性。他不仅从汉语、汉字的发展提出汉字必须改革的理论,而且,身体力行。20年代,他两次赴苏,跟苏联语言学家科洛科洛夫、龙果夫等,以及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具体研究、拟制中国拉丁字母方案。在1929年春,他拟订的《中国拉丁化字母草案》,有字母表,音节写法的七个表及注解,有拼音文字和汉字对照的短文,还有他和科洛科洛夫合拟的第二种方案。他是通过这些论证汉字改革的必要性及可能性。这个草案,他又作了修改,1930年出版的除有方案和字母的拼写法外,还有两篇汉字和新文字对照的读物。另有两个附表:一是《新拉丁字母的一览表》;二是《汉字拼音表》。到1932年,他制定的《新中国文草案》则更完备了,除字母表、声母表、韵母、拼音表、检音表外,还有拼音规则、书法大纲、文法规则,以及拼音和书法的说明。其中,具体地研讨了拼音后如何解决同音词的问题。单音词有同音的,加上字尾区分,加了之后,仍有混同的,用变声拼法区别。其他如词儿连写等难点都作了认真有益的探索。由于他注重实践,调查^①,如吴玉章、黎锦熙评论

^①杨之华回忆:“在同别人日常接触中也注意研究各地方言的发音。1932年9月1日,鲁迅和许广平到紫霞路我们家里,秋白从桌子里拿出他研究中国拼音文字的原稿,提出里面有关文字改革和文字发音的问题同客人讨论,因许广平是广东人,他又找出几个字来特意请她发音以资对证”。(见《回忆秋白》P120)彭玲回忆:“他(指秋白)叫我们(指彭玲和应修人)用方言读一些字音给他听(我是长沙人,长沙方言中保留着古人声,我能分辨),他一一记录下来。他说:‘我们都是南方人,本来我还约了两位北方人,不知为什么今天没来。不过我对北方话比较熟悉,自己有些把握,暂时不来没关系。’他是想通过方言调查给汉字定音。”见彭玲《难忘的星期三》,1982年第4期《新文学史料》P107。

的那样，他的方案超过了以前的各种方案；也正由于他注重实践，在实践过程中他逐步纠正立刻“废除汉字”的过激主张，他越接触实际越看到汉字改革的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他说：“实行罗马字母的拼音制度，当然不是立刻就可以办好的，这需要长期的斗争，和有系统有组织的工作。在这过渡时期，必须还要利用汉字。”^①我们学习秋白的语言理论，既要抓住其理论的真谛，更要学习他脚踏实地的实践精神。与其重复他关于汉字必然向拼音化方向发展的名言，不如象秋白那样愈艰难，愈努力，切切实实地研究、解决中文拼音化中一个个难题。在现代文学语言建设上，他批评“不成腔调”的“欧化诗”，痛斥“时文的文言”，他的散文明快、奔放，用语规范，是典范的文学作品。他还用“真正活的言语”，写了《英雄巧计献上海》等通俗文艺作品，较好地运用方言、俗语。他的翻译精确又流畅，鲁迅称赞为“信而且达，并世无两”^②。这些实践，使他的语言理论对实践有更大的指导意义，也使他有意无意地纠正他过去说法的偏颇。如他在1931年时，对新文学的语言评价过低，经过文艺大众化的论争，尤其是1933年大量阅读鲁迅杂文后，他对新文学的评价、对新文学家创造新白话文的贡献评判，都比较客观、公正。

他的语言理论还具有鲜明的战斗性。他主张“文”“言”一致，汉字必改，是为了把革命文化交给大众，点燃大众的革命火焰。实行“文腔革命”是为了“文艺革命”。他倡导普通话，建设现代文学语言，是为了发展普洛文艺。他要求语言规范，是为发展经济。

他的语言理论又有开创性的特色。虽然1892年卢懋章就提出“切音新字”的设想，它是切音，并非简化的拼音字母。1926年，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它比“切音新字”以及它以后的“注音字

①《瞿秋白文集》〔二〕P 692。②《鲁迅全集》第7卷P 465。

母”是个进步，但它太拘泥于发音学原理和英文习惯，是学者研究或书斋里的拼音文字，只是注音符号，未能广为推行。秋白的《中国拉丁化字母》，承前启后，批判地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又超越前人。对建国后的《汉语拼音方案》来说，是奠基性的。它的26个字母，全由秋白的“字母”27个中选取；它的声母、韵母表采用“字母”中表示子音和母音共42体式，占整个声、韵母的75%；它还从“字母”中接受了用字母和符号分隔音段(音节)，以及用“r”来表示儿化韵尾的书写规则。吴玉章同志说，秋白“开辟了中国新文字发展的道路”。此外，秋白关于语言社会性的论述、关于现代文学语言建设的论述等都带有开拓性。他的那种勇于探索，不畏艰险，敢于革新，富于创新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六)历史局限

无庸讳言，秋白语言文字某些看法也有偏颇之处。首先，马尔“语言新学说”对他有一定影响，他文中多处提到“无产阶级的普通话”、“绅士等级的言语”、“农民的原始的语言”、“智识阶级的白话”。这跟马尔关于语言是有阶级性的看法吻合。他还讲过“广东话、福建话、江浙等话，应当有单独存在的权利，不能够勉强去统一”。这又跟马尔的语言从最初无限的分歧到最后统一的理论相一致。他主张“文字革命”，多次说过“废除汉字”，这跟马尔认为文字有阶级性，是上层建筑的看法相关。秋白在苏联时正是马尔在苏联语言学界处于称霸地位，他无法摆脱马尔的理论。在这时期，布哈林的理论著作在苏联理论界占有重要地位，布哈林就是把语言看成是上层建筑的，这也影响到秋白认为语言、文字也可用对待其他上层建筑的革命方法搞突发性变革。

其次，他对汉语、汉字看法有些偏激，不全面。他讲“中国言语是很贫乏的”，“简直没有脱离‘姿势语’的程度”，这是不符合

富有表现力的汉语实际的。把方块汉字不能充分反映生动活泼汉语的问题，错归之于汉语了。对汉字他又只看它的严重缺点，对它统一汉语、保留汉文化等历史作用估计不足，忽略它又有其优点的一面。在汉字与汉语关系上，只讲它们矛盾的一面，没有看到它们又曾有某种相适应的一面。产生这些问题，有它历史的具体的复杂的原因。拿“废除汉字”来说，这口号有它的历史性。早在“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就主张“废汉文”^①。30年代，汪祖懋、许梦因在南京发起“文言复兴运动”，叶圣陶、鲁迅等都主张打倒汉字，采用拼音文字。秋白也提出“废除汉字”，这反映了他对封建保守的传统势力冲击的愿望。这口号的产生也有它社会历史背景。我国长期处于封闭社会环境，到现代，这些人较早接受东方或西方文化潮水般的冲刷，受到国外语言学的影响，封闭的世界打开了，国外先进的科学与国内落后的封建制度，形成对比。在批判保守、落后同时，连古老的汉字也一起否定。长期的闭关自守与这不无关系。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苏联拉丁化运动对他的制约。苏联第一次拉丁化中国文字代表大会的决议案讲：“汉字是古代封建社会的产物，是中国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工具之一”，“我们要根本铲除象形文字，以拼音文字来代替它。”^②当时“苏联党的中央委员会，曾经认定反对鞑靼等民族改用罗马字母的人，事实上等于出卖阶级。”是“右派机会主义者”。^③作为联共党员，作为服从共产国际的共产党员，不能不遵守上述决议。从他主观来看，政治上的“左”在语言理论上也有“左”的色彩。不切现实地过早地提出“废除汉字”正是政治

①1917年胡适与陈独秀的通信。

②《拉丁化中国文字拼音和写法参考书》，苏联新字母中央委员会印。

③《瞿秋白文集》〔二〕P 856、P 916。

上急躁冒进的反映。正如政治上是出于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仇恨，是出于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犯了急性病，误把低潮看作高潮一样。出于对劳苦大众深沉的爱，过分急切希望“中国工农群众不受汉字的苦”，只看到海参威10万华工用拉丁化新文字扫盲收到的局部成效，没能从更为广阔的背景考虑，忽略了民族、地区、时代的不同，笼统地提出“废除汉字”。这是不妥的。也正如他政治上勇于自责，坦诚检查盲动主义那样，在语言实践中，他不固执己见。越是后期，他很少再提废除汉字，相反，他两次提出要有长期过渡，过渡时期必须还要利用汉字。我们应把历史人物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地分析，不宜用今天的目光苛责前人，要知道他们开创的事业是史无前例的。更不应把历史人物某些偏颇——又是历史人物本身已开始觉察、纠正的，反加以发展。这样，是容易滑到“左”的方面去的。

最后，他忽略了现代文学语言与古代文学语言的联系，曾经说“五四”新文学语言是“‘非驴非马’的一种言语”，“是不人不鬼的言语”。这也是当时革命文学论争中“左”的思潮的反映。可贵的是，后来，秋白自觉纠正了这种看法。这正表现了秋白赤诚坦直、勇于改过的品格。尽管曾有这样或那样个别看法上存在的偏向，但秋白“关于文学语言等问题的意见，在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①。他那开拓与独创的精神及其宝贵的语言理论，跟他那光辉的革命理论、伟大的实践一样，将长留人间。^②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说明，1985年版。

②本章最初发表于南京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题为《瞿秋白对语言理论的贡献》，修改后在学林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研究》（2）刊出，收入本书后作了少许修订。

七、秋白在“左联”时的文学活动

——中国普洛文学运动的先驱

20年代的最后一个年头，岁末之夜，秋白曾感慨万分地诵读：“田园将芜胡不归！”^①这“田园”就是他酷爱的文艺园地。近十年，他以革命为重，投身于政治，荒疏了心爱的文艺，怎能不感慨呢？1931年1月7日，他被王明极左路线排斥出中央政治领导机关后，心情是抑郁的。然而，能回归荒芜的文艺家园，却又是令人欣慰的。自此，他度过政治上艰难的历程，转入文艺战线辛勤笔耕，取得了辉煌的业绩。这时期他的重要文学业绩之一是领导了“左联”。可是，6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相当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②，或是避而不提，或只是提他翻译、传播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不提他对“左联”的指导。近年来有的仍持此观点，有的笼统带一句，对秋白是如何领导“左联”的缺乏具体论述。这时期他的又一光辉文学业绩是，擎起鲁迅这面旗帜，正确、全面地评价鲁迅杂文。几十年来，对鲁迅杂文一直毁誉不一，对秋白的论鲁迅杂文看法也不尽一致。因而，探讨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在鲁迅研究中的地位，就十分必要。这时期他的另一战斗文学业绩是，对资产阶级“人权派”，“文艺自由论”思潮的斗争。可有的仅作为文艺批评，未从坚持党性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高度来评价。秋白取得这些可喜的文学业绩，固然反

①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忆秋白》P147。

②1979年中南七院校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及这年出版的其他四部现代文学史，1983年许志英等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1984年叶鹏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等均未提秋白领导了“左联”。

映了他经受了特殊考验，表现了文学上的才华，同时，也离不开战友、知己的帮助、鼓励。且放下新交知己冯雪峰、鲁迅不表，先叙秋白跟旧友茅盾的重逢。

（一）故友重逢返“家园”

锣鼓声声，万家欢庆1931年新年。秋白夫妇却被撤消了职务，蛰居于上海大西路西宜里一间斗室里。大西路即今延安西路，当年这里是破落的贫苦市民区。鸽子笼似的小屋一家挨一家，平房楼房挤在一起，楼上楼下，嘈杂得很，唯秋白的小房间里出奇的静，杨之华轻手轻脚忙家务，秋白伏案写检查。转眼又是爆竹震天响，左邻右舍拜年庆新春。秋白却仍在家写检讨声明。党内没有同志来慰问有病的秋白，亲朋好友也没有来拜访这位曾是“共产党首领”的，都怕受牵连。从春到夏，秋白在寂寞中度过。患难之中杨之华有时发发火，吐吐冤屈之情。秋白总是好言安慰，间或逗逗乐，这时冷清小屋才传出杨之华银玲般的笑声。就在这门庭冷落之时，茅盾夫妇来访，给他们带来了友情、温暖、欢乐。杨之华回忆：

1931年初夏，我们住在上海大西路两宜里。一天下午，秋白和往常一样，正在专心地写着文章，我在看书，忽然传来了一阵敲门声。房东太太嘟囔着去开门。我们听到客人在

①1931年1月7日，党的四中全会后，秋白写《瞿秋白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的信》，秋白按四中全会决议案作了检讨。1月27日，米夫、王明控制的政治局作出《关于贺昌等同志的决议案》，责令秋白写书面声明。2月20日，又作出《关于1929—1930年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行动问题决议案》，翻出老账要秋白检讨王明等捏造的罪名。秋白又被迫写了《瞿秋白同志声明书》。以上“信”与“声明书”见1931年2月15日出版的《党的建设》第3期。

问：“何先生在家吗？”房东太太不耐烦地回答说：“这里没有姓何的！”

这时，我已听出是茅盾夫人孔德沚的声音，就急忙放下书本，一边跑下楼，一边大声说：“有姓何的！”并对神色诧异的房东太太解释说：“我娘家姓何。他们是我的朋友。”房东太太扫了客人一眼，回房去了。

孔德沚是和茅盾一起来的。我请他们夫妇上楼进房后，悄悄地告诉他们说：“秋白又改名换姓了，不再姓何，改叫林复了。”

这时正当秋白转到文化战线上工作不久，茅盾当即向秋白表达了关切和欢迎之情，向他谈了他的创作情况和打算。秋白请茅盾介绍了文艺界的情况，听取了意见。^①

为什么茅盾此时来看秋白呢？原来是这年4月下旬，沈泽民穿着西服，其妻张琴秋身着旗袍，来向兄长茅盾辞行。沈泽民讲到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讲到派他去鄂豫皖苏区。还“谈到秋白在四中全会后心情不好，肺病又犯了，现在没有工作，并告诉了我秋白的新地址”。^②这里，由兄弟两人身上看到两种人格。茅盾置牵连于度外，于人患难之中伸出友谊的手。沈泽民，是“二十八个半

^① 杨之华《回忆秋白》p 124。按，杨之华回忆把茅盾夫妇两次来访秋白误记为一次，一些专著，文章据此也错了。事实上，茅盾带来《夕阳》（即《子夜》）大纲是第二次，“警报”亦发生在第二次来访。见茅盾《〈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载《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4期。

^② 茅盾《〈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

^③ 沈泽民原名沈德济，早年就读南京河海工程专科学校，1919年发表过两篇小说，1921年入党，大革命前与刘少奇等一起去苏联的，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在红色教授学院学习，1930年秋回国，六届四中全会被选为中央委员，1931年去苏区，1933年11月20日死于肺病，死前他将给党中央的报告用药水写在衬衫上，由成仿吾穿在身上，交给秋白，呈送中央。

布尔什维克”之一，他与秋白有私交，他要去苏区，秋白将自己有纪念意义的挂表送他。他政治上还是跟秋白界限分明。不过毕竟天良不灭，告知茅盾秋白近况，让其兄来看望被打击的秋白。人啊人，人的感情就是这样被极左路线扭曲了。由此，也可看出秋白那纯真的党性，美好的人性。那时虽然组织上没有分配他工作，他却主动关心文艺战线上的情况，很有兴趣地听着茅盾的讲述，询问了茅盾长篇小说《夕阳》（后改名为《子夜》）的构思。茅盾看着秋白消瘦的病体，不忍多打扰，说过几天带小说已写好的前几章来，再详谈。茅盾回忆：

过了两天，记得是一个星期日，我带了原稿和各章大纲和德沚又去，时在午后一时，秋白边看原稿，边说对这几章及整个大纲的意见……①

谈得最多的是农民暴动和工人罢工。秋白说：“雁冰，你写农民暴动，怎么没有提土地革命呢？写工人运动，就大纲看，第三次罢工由赵伯韬挑动起来，也不合理，这样写把工人阶级的觉悟降低了。”接着，向茅盾介绍了红军和苏区的发展形势、党的有关政策，建议据此来修改。茅盾听得入了神，频频点头。谈着，不觉天色已晚。杨之华回忆：

这时，王一知同志来了。我请他们一起吃晚饭。正吃着饭，邮差送来了一封信，我立即拆开来看，上面写着：你们母亲病得很厉害，快回去看看吧！

这是党送来的警报，机关被敌人破坏，牵连到这个住所。

大家必须立即离开此地：秋白夫妇必须马上转移。但是，仓促之间他们搬到何处居住呢？“你们暂时搬到我们家去住几天再说。”

①茅盾《〈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

②杨之华《回忆秋白》P 124。

茅盾向秋白建议。“那要给你们添麻烦了。”秋白说。“都是自己人，快走吧。”孔德沚说。是知己、旧交，他们在茅盾家住了一个多星期，茅盾叫他的两个孩子让出床铺睡地板，热情接待他们。秋白跟茅盾更深入地谈论《子夜》。“雁冰，你写吴荪甫坐‘福特’，这是普通轿车，象他那样的大资本家，应当坐更高级的轿车，何不让他坐‘雪铁龙’呢？”秋白征询地说。“哦，好的，改为‘雪铁龙’好。”茅盾为秋白如此细心而心悦诚服，连连说好。《子夜》大纲原来的结尾是，吴荪甫与赵伯韬两大集团握手言欢。秋白建议改成一败一胜，这样更能反映工业资本家斗不过金融、买办资本家，中国民族资本家在三座大山重压下是没有出路的。诸如此类，大至情节结构，小至细节，茅盾都采纳了秋白的意见，作了修改。可以说，《子夜》的创作是秋白直接关心的结果。此外，杨之华回忆，这时期他们还“谈形势，谈上海文艺界的情况，谈‘左联’的工作，谈他们的作品和工作计划……，永远谈不完似的。秋白的心情很愉快，神态很安详，好象根本没有想到敌人的搜捕和避难的境遇。”^②或许可以说，自此秋白与“左联”接上了关系，因为1931年5月的下旬，茅盾就出任“左联”行政书记。当然，更直接参加对

①1923年秋白任上海大学教务长，茅盾在该校中文系兼课，首次会面，就感到秋白人如其文，幽默风雅得很。（秋白两本散文集由茅盾编入“文学研究会丛书”出版。）这年，茅盾为上海党的区执委会委员，秋白为党的中央委员，党内活动经常在一起。1924年茅盾夫妇参加秋白与杨之华结婚仪式，后来，秋白家搬到茅盾家顺泰里12号隔壁的11号，1925年杨之华介绍孔德沚入党。1927年4月茅盾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秋白在武汉兼管宣传部工作，他们常见面。1930年8月，秋白从苏联回国，知茅盾已从日本回国，秋白用暗号写信，请开明书店转茅盾，信中秋白改姓何，杨之华改姓林。秋白抽主持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空间，跟茅盾相会、交谈。

②杨之华《回忆秋白》P 126。

“左联”的领导，则是跟“左联”党团书记冯雪峰结识之后。

(二)通往“左联”的桥梁

1931年5月初的一天，秋白与年轻的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相识了。杨之华回忆：“在茅盾家里，我认识了冯雪峰同志。有一天，他给茅盾送去刚创刊的‘左联’的机关刊物《前哨》。”^①秋白看着这位高而瘦的青年，这青年充满热情的脸上略现出诚实的拘谨。茅盾看他们不相识，就给他们作了介绍。冯雪峰1927年入党，而此时秋白已是党的领袖。他见到仰慕已久的前辈，十分高兴，又看到秋白如此平易近人，拘谨的神色放松许多。不多的交谈，秋白对冯雪峰也有良好的印象，瞧着冯雪峰那股血气方刚的劲头，仿佛见到自己过去的影子。同时，冯雪峰的忠厚、富有地下工作经验，又使秋白感到这是可以信赖的人。杨之华则感到冯雪峰不仅是湖畔诗人，更是颇为硬气的汉子，更增加信任感。正是出于这种直觉，“过了几天，冯雪峰同志又来了。秋白就问他有没有可靠的社会关系，想请他找一个比较长时间居住的地方”。比秋白小四岁的冯雪峰对这样的信托很激动，“很兴奋”，他立即找可靠的好友谢澹如商量。谢澹如祖辈经商，父亲是钱庄老板。“五四”时期，谢澹如结识了应修人、恽代英。后来他加入湖畔诗社，自费出版诗集《苜蓿花》。1929年后在上海开小书店，售左翼书刊，“左联”《前哨》经费的筹集、印刷均由他负责。此人可靠的，他的富家身份也便于掩护，他家的独家楼房庭院更适宜革命者秘密居住。这时恽代英已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于雨花台，要再接待一位常州英杰，他欣然同意。“事先，澹如做了

①②杨之华《回忆秋白》P 125。

③冯雪峰《回忆鲁迅》(1952年版)

一些准备工作。”“他在报上登了召租广告，在住房附近贴了几张租房告示，以防万一。”一切就绪，于6月间，由冯雪峰陪秋白夫妇到谢家。秋白剃了平头，穿着短装，布鞋，乡村教师打扮，杨之华也着农妇服装。谢夫人钱云锦回忆：“除了澹如，我和他母亲都不知道这对夫妇的真实姓名和来历。”“我按上海人的习惯，称呼他为林先生，称呼杨之华为林家嫂嫂”。^②冯雪峰为秋白找到安静、秘密的居处——“紫霞路68号是我家在南市华界自置的一所楼房，占地七分多，三开间三进，环境相当僻静”。^③紫霞路距黄浦江边约半里路，离老城隍庙不远。68号位于紫霞路中段。它的大门向北，两边是小商铺、旧式住宅。后门在施家弄，这条弄堂西通王家嘴角街，东到花衣街。住此进退方便。冯雪峰、谢澹如为秋白安排好幽静、方便的创作环境。谢宅天井里有几盆花草，一缸金鱼。秋白夫妇住2楼东厢房。西厢房是藏书室，资料丰富。秋白写作，他们为其准备了一张特制书桌。“他的书桌，是一张特制的西式木桌，里面有书架可以放文件，下面抽斗也一样，只要把书桌上面的软木板拖下来，就可以象盒子一样，连抽斗也给锁起”。^④到秋白去苏区时，这张书桌搬到鲁迅家，保存至今，成为党内外同志友谊的见证。

冯雪峰是秋白领导“左联”的桥梁。冯雪峰回忆说：“我大概三四天到他那里去一次，至少一个星期去一次，主要是去和他谈‘左联’与革命文学运动的情况，讨论问题，和拿他写的稿子。”^⑤谢夫人也说：“那一段时间，秋白足不出户，来看望他的，除了冯

①②③钱云锦《忆谢澹如掩护党的秘密工作的片断》，见《党史资料》丛刊1983年第3辑。

④许广平《鲁迅回忆录·瞿秋白与鲁迅》，《忆秋白》P273。

⑤冯雪峰《回忆鲁迅》P128。

雪峰好象没有别人了”。^①通过深入的接触，秋白发现冯雪峰既耿直又愚憨，是刚中有柔的人，是可作为同志的人。冯雪峰敬佩秋白的人格品行，佩服秋白敏锐的目光，来一次紫霞路，心中升起一片彩云。1932年冬，秋白夫妇离开谢宅。后来，谢宅为日寇炮火所毁，荡然无存。和谢宅相关的一些人命运又如何呢？谢澹如1962年9月26日病逝。冯雪峰比秋白命运还要惨，1958年4月被开除党籍。自此，他以秋白忍受委曲的精神，勤勤恳恳为党工作，直至1976年1月31日，含冤长辞人间。7月16日，茅盾拖着虚弱的身体，主持了没有悼词的追悼会。一切似乎烟消云散，只留下一件不寻常的长衫。这是秋白有感于冯雪峰的深情，将一件伴随自己战斗七八年的长衫，披在雪峰肩上作为纪念。长征中，冯雪峰把一件件随身东西沿途丢弃，唯独留着秋白赠送的长衫。在上饶集中营，他把毛线背心送给难友，珍藏着这长衫。如今，这凝聚血和泪，悲和欢的长衫，陈列在常州瞿秋白纪念馆。

（三）人生知己留“纪念”

秋白与雪峰的友情是建筑在共同的事业上的，是建筑在对鲁迅共同的尊崇上的。1932年夏秋之间^②，雪峰陪伴住在市区的秋白夫妇自南到北，横穿上海，来到位于闸北的鲁迅家。鲁迅住

①《忆谢澹如掩护党的秘密工作的片断》

②《瞿秋白年谱》（周永祥编）等专著对秋白与鲁迅第一次会面地点、时间有不同的说法。周永祥同志采用许广平早年说法。许广平《鲁迅回忆录》P118讲是春末或夏初。而冯雪峰《回忆鲁迅》中提到的是“在1932年夏秋之间”。据丁景唐于1961年4月下旬找许广平、杨之华核对，她们回忆当为夏秋之间。又，《鲁迅日记》9月1日记“访何家夫妇”，则在此前当为秋白夫妇先来拜访鲁迅。1932年春，“一·二八”淞沪抗战，至5月5日才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战事混乱，秋白不可能出访。鲁迅“一·二八”战争时也避居在外。杨之华回忆：“秋白和鲁迅的第一会晤”是“我们从毕兴坊搬回紫霞路以后。”（《回忆秋白》P132）“一二·八”战争后，秋白夫妇随谢澹如家住毕兴坊有几个月，以此推算也不会“在春末或夏初”。

在四川北路底拉摩斯公寓(今北川公寓),不远处是虹口公园,那里百花盛开,微风送来阵阵芳香,和煦的阳光照射到公寓三楼窗棂。鲁宅里充满着喜洋洋的气氛,秋白和鲁迅一见如故。早在这之前他们由冯雪峰介绍,就有文字之交。1931年12月5日,秋白给鲁迅信说:“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和自己商量一样。”鲁迅回信以“同志”相称。杨之华说:“鲁迅与友人通信,用‘同志’呼称的,这是绝无仅有的。”^①可见,鲁迅早把秋白看作同一战壕的战友。这次相会,他们倾心交谈。秋白从掀天动地的俄国十月革命,谈到俄国进步文学家的笔是为劳苦大众而写作的。鲁迅也深有同感。秋白由“一·二八”战争带来的不安定,谈到文学战线上种种不能令人满意的现象,言语之中流露出对“左”的厌恶,更引起鲁迅的共鸣。心灵的相通使得处于逆境中的秋白由衷地露出笑容,中午,破例小饮些酒。望着正在饮酒的秋白的清瘦脸庞,鲁迅的思绪不知怎的回闪到爵禄饭店。那是1930年5月7日,个子较高的李立三约鲁迅来此,为准备在上海搞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李立三对鲁迅说:“你是有名的人,请你带队”,并表示要发给鲁迅一支枪。枪,冯玉祥倒是给过李大钊的,可情况、时间、对象都不同。鲁迅本来就不赞成“左联”搞飞行集会那一套,对李立三这种冒险更反对。可李立三又是当时党的重要领导,怎么办呢?鲁迅就幽默地说:“我没有打过枪,要我打枪打不倒敌人,肯定打了自己人。”李立三见要鲁迅拿枪带队不行,又提出要鲁迅发一个宣言支持。鲁迅的看法是:那样一来,我就很难在中国住下去了。李立

^①《回忆秋白》P129。鲁迅另外称过同志的,见《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在这篇文章中,他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

三马上说：“可以到莫斯科去。”！这正如秋白批评是“热昏（是‘左’）”^①，鲁迅自然不会同意这种“热昏”的蛮干。是啊，同是共产党的领导人，却是如此的不同。鲁迅感到从政治观点到文艺主张都与秋白心心相通。饭后，彼此放弃了午睡，直谈到夜幕催人，才依依不舍分手。自此，他们肝胆相照，十分相投，多次互访。秋白几次避难都在鲁迅家中。

1932年冬，秋白第一次避难鲁迅家里，秋白心灵深受触动，把青年时代写的《雪意》诗书赠鲁迅，附有跋文。文中云：“此种颓唐气息，今日思之，恍如隔世。”自然，这是向颓唐往事的告别。但是为何此时再书写？许广平云：“仍是对此时此地遭遇压迫的写照”。同时，也是把鲁迅作为可以理解自己的知音呵。1933年春，秋白第二次避难鲁迅家中，后来鲁迅还为秋白在东照里租了“亭子间”。这下一章将详说。这里先说鲁迅书赠秋白一副对联：

疑欠道兄属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洛文录何瓦琴句

杨之华说：“疑欠（欠是冰的本体字）是秋白的笔名。洛文是鲁迅的笔名。鲁迅录的这两句话，是从清朝浙江四明人徐时栋书写的《烟屿楼笔记》^②中选用清朝浙江钱塘人何瓦琴（即何秦）的集襖

①罗高林《鲁迅与共产党人漫记》P 256—258，武汉大学出版社。按，陪同的还有潘汉年。鲁迅将此事向胡愈之谈过。

②瞿秋白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政治讨论的结论》，见《瞿秋白选集》P 451。

③杨之华《回忆秋白》P 139。又《鲁迅日记》（下）P 819，“二月二日晴。……午后得王志之信。往来青阁买《李太白集》一部四本，《烟屿楼读书志》一部八本，共泉五元。”P 860，“书账”中有“烟屿楼读书志八本三·〇〇”。再，北京鲁迅博物馆有鲁迅藏书《烟屿楼笔记》，《烟屿楼读书志》两种共八本。

帖联句，借以表达他同秋白之间的知己深情和决意以同志相待的至诚。”^①杨之华看到秋白高兴而郑重地把这幅对联挂在亭子间的墙上，并经常对着它沉思着。这里倾注了信赖与友情。秋白是极重感情的人，对张太雷、彭湃自不必说，读读他写的悼念文章，真是催人泪下。即使是“二十八个半”之一的沈泽民，秋白主持六届三中全会时，安排他任宣传部长，四中全会他却站在王明一边，把秋白开除出政治局。秋白不计较这些个人恩怨，在他去苏区时，秋白赠他挂表，而来看望秋白的却是他的弟弟茅盾——当时尚未恢复党组织关系的人。对共产国际指令纠正李立三的错误，秋白首先表示“我当然间接的负着立三路线的责任”。大权在握时仍让李立三当政治局委员。然而，一当共产国际，米夫变了调调，李立三在背对背检查时竟然把一切推给了秋白。李立三说：“我实际工作中的错误”，“是在秋白同志影响之下的，”甚而还揭发批判：“秋白同志的确用了两面派的手段。——他在三中全会上的行动，就可以表现出来”。^②而鲁迅对背“两面派”罪名的党员表现如此崇敬，公开墨书引为“知己”，且是“得一知己足矣”。饱尝人间冷暖的秋白怎能不动情呢？杨之华说：“那时候，许多与我们熟悉的朋友、同学……都躲避我们，生怕与我们接近会给他们带来麻烦。可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些朋友不但没有躲避我们，而且关怀我们，掩护我们。……他对共产党员表

①杨之华《回忆秋白》P 139。

②李立三同志的发言见1931年5月10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3期P 11。又，李立三搞“左”，用“残酷斗争”对待自己的同志，而王明等把这个办法又用到他身上，1936年苏联内务部将李立三逮捕，1939年释放，但还继续审查，后被开除党籍。1945年澄清问题回国，为中央委员。“文革”中又被关押，1967年6月22日自杀，又被开除党籍。1980年3月平反，骨灰盒里只有他的一副眼镜。

现了无限的热情和可贵的友谊。”^①秋白十分珍惜同甘苦共患难的友谊。那么,对这位不是党员的布尔什维克的友谊,如何“同怀视之”呢?

没两天,鲁迅夹着黑印度绸书包,巍巍然来到秋白的新居。望了望端正挂在墙上那副对联,露出会心的微笑,那本来象刷子般的短发,似乎也变得柔和些。而后由包里拿出《热风》、《坟》、《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接着又象变戏法似的,由包里拿出了笔头呀,好纸呀,还有糖果呢!啊!阳光、春风,小屋里洋溢着欢乐。等鲁迅慢慢的轻轻的脚步声消失后,秋白动情地对之华说:“我感到很对不起鲁迅,从前他送的书我都在机关被破坏的时候失去了,这次我可要有系统地阅读他的书,并且为他的书留下一个永久的纪念。”^②即编鲁迅杂感选集,并为之写序。杨之华回忆:

秋白想动手完成这个任务,但当时的环境很不好,妨碍他的工作。东照里12号的房东,是个好事泼辣的中年寡妇,广东人,住在上海多年了。她的房客中有中国商人,也有日本的商人和浪人。女房东和日本浪人似乎都“关心”我们,时常来串门,问长问短,谈东道西,纠缠不完,既妨碍秋白工作,又影响我们的安全。于是我们想了个谢客的办法:白天,秋白装病半卧在床上,关起房门看书;我就在房门口的炉子上熬汤药,药味充满了整所房子,这些药我都偷偷地倒掉了。这出“戏”演得很成功,房东和房客果然不再来打搅我们了。秋白在白天专心研究鲁迅的著作,夜深人静时,就伏在一张小方桌上写作,花了四夜功夫,写成了《鲁

①②杨之华《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下简称《序言》)是怎样产生的,1958年1月号《语文校习》。又,冯雪峰回忆,“那时就是在上海的党中央也并没有人直接到秋白同志的住处去。”这岁月是很寂寞的。

迅杂感选集》序言》。^①

《序言》刚写好，下午时分，突然，一阵急促而沉重的脚步，从楼下一直送到房门口。紧接着又是砰砰直响的打门声。秋白夫妇大吃一惊，急忙把桌上文稿、书籍收藏起来。而后杨之华定了定神去开门。呀！原来是鲁迅的一场逗趣。他说：“你不是说听惯了我的脚步声吗？这次你听出来了没有？”对面见着这“小喜剧”的日本女房客也不由自主地笑了，笑这位50多岁的“大先生”，居然也这样天真。鲁迅进房坐定后，秋白就把那篇《序言》给他看。鲁迅一边认真地看，一边抽烟沉思着，看了很长时间，显露出感动和满意的神情。此时无声胜有声，鲁迅忘记了香烟头烧到他的手指。此时有声么？他向来不大当人面赞扬对方。^②此时无声么？鲁迅对秋白说：“你写作的环境比我坏得多。”《序言》的是非，有如明镜的鲁迅言行在，一照自明，这下节将论述。

（四）《序言》——文艺批评的里程碑

对《序言》评价不一，相关的是对鲁迅杂文毁誉不一。资产阶级文人从陈源到梁实秋都诋毁、贬低鲁迅的杂文，奚落鲁迅“仅是冷讥的发表一点‘不满于现状’的杂感而已”^③。“实在没有一读价值”。这自不待言。同一阵营的同志也否定鲁迅的杂文：

^①杨之华《回忆 秋白》P 136。

^②鲁迅的言行表明是赞成《序言》的。1933年3月20给李小峰信：“有一本书我倒希望北新印，就是：我们几个人在选我的随笔，从《坟》起到《二心》止，有长序”。1933年4月13日致李小峰信：“《杂感选集》已寄来约有十四五万字，序文一万三四千字。”“序文因尚须在刊物上发表一次，正在托人另抄，本文我也须略看一回”。“此书印行，似以速为佳。”对许广平、冯雪峰更直接称赞了《序言》写得好。

^③梁实秋《“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1929年10月上海《新月》第2卷第8期。

“有一个时期，我们曾经想道：鲁迅的小说虽不曾表现时代思想，杂感等确实很能表现。及至找来一读，这个迷梦更是进一步的根本上被摧毁了！”^①“读了他（指鲁迅）那篇随感录以后我得了三个判断：“他还是一个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法西斯蒂）！”^②因此，“秋白认为有必要为鲁迅辨明是非，给鲁迅一个正确的评价”，“他要和鲁迅一起反击敌人对鲁迅的攻击，同时也要引导同志和朋友正确地认识和对待鲁迅及其杂文。”^③秋白在《序言》中说鲁迅的杂感是“中国思想斗争史上的宝贵的成绩”，有它的“战斗的意义”。指出“杂感这样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战斗的“阜利通”。从而进一步奠定现代杂文文体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他还把鲁迅与高尔基相提并论，称赞鲁迅的作品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一座纪念碑”，赞颂鲁迅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革命军马前卒”，“青年叛徒的领袖”，号召“我们应向他学习，我们应当同着他前进”。秋白擎起了鲁迅这面红旗，正如茅盾所言：“对于当时的文艺界起了非常大的指导作用。”^④至今仍有现实意义^⑤。

①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见《现代中国文学作家》第1卷，上海泰东图书局1930年版。

②杜荃《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1928年8月《创造月刊》2卷1期。

③杨之华《回忆秋白》P135—136。

④茅盾《纪念秋白同志，学习秋白同志》

⑤港台出版的三种中国现代文学史在不同程度上轻视鲁迅的杂文。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三卷）（香港昭明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周锦《中国新文学史》（一卷）（台湾长歌出版社出版），他们都只称赞鲁迅小说，而贱视鲁迅杂文。周锦对鲁迅后期杂文否定更为突出，认为“不能算做文学作品”，这与20年代谈杂文“决不能与小说戏曲并日而语”是一个调。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美国耶鲁大学出版，中译本为香港友联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则否定鲁迅杂文的战斗性，只承认它的“娱乐性”。

《序言》的历史意义还在于：它对鲁迅的思想及其发展作了基本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序言》指出：“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历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这99个字，精炼地勾勒出鲁迅思想发展的轮廓，把鲁迅的思想轨迹，放在“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关系的变化，以及思想界之变化，这样广阔的历史背景来考察的。它指出鲁迅作为一个“友人，以至于战士”——共产主义者的特点：鲁迅是“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投入共产主义者的堡垒的，这些宝贵的“传统”即伟大的鲁迅精神，这是鲁迅区别于一般共产主义者的个性特色。它谈到鲁迅思想的转变，用的是“进到”，而不是“到”。这也就是说，它不是突变论，而是过程论，辩证地论述鲁迅思想的发展过程；它也没有把鲁迅前后期思想对立起来，没有看作前后不相干的两截。其实，“友人”、“战士”不是对“逆子贰臣”的简单否定，否则就没有“革命传统”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评论，它从世界观高度、从时代环境的广度来论文评人的，可谓高屋建瓴，大处落笔。在这之前，也有对鲁迅公允、透辟的评论，如茅盾的《鲁迅论》。但此文写于1927年，没涉及1927大革命失败后鲁迅的杂文。而《序言》不仅更深刻，而且更全面。在鲁迅研究史上、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都是有里程碑意义的。这99个字中两个“进到”的论述，以及“鲁迅最主要精神”的论述，是把鲁迅作为既是文学家、又是思想家^①，从政治观、历史观、文学观综合起来的论述。这样，它的意义远远超出对鲁迅个人作出：

①李长之《鲁迅批判》中认为鲁迅“不够一个思想家”。

正确评价的范围，超出文学评论的范畴，它涉及到爱国知识分子的发展道路——思想家鲁迅正是走这条革命道路的先驱者；涉及到革命文学建设中一些重大问题，诸如对革命文学的正确评论等等。因而，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纪念碑的意义。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认为它仅“是一篇很有影响的重要文章”，有的论文说《序言》“反映出瞿秋白对鲁迅认识不足”。显然评价过低。另有一些称之为典范、不可逾越的顶峰，又偏高了。秋白读的鲁迅杂文，基本上是1933年以前的，而这之后鲁迅著作的份量还相当大，这不能不影响到整个评价的深入，如“改造国民性”问题，这是鲁迅思想一个重要部分，评论未涉及。又如，对鲁迅杂文艺术特征也欠更深入全面的分析。

1933年，秋白在《序言》中论述“鲁迅的最主要的精神”影响深远，它影响到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演说辞》中所论的“鲁迅精神”。秋白首先说，鲁迅精神“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毛泽东讲：“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而要正视现实，坚持斗争，就产生秋白所说鲁迅精神的第二点：“‘韧’的战斗”，毛泽东则赞扬鲁迅“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而要坚持不断的战斗，就要有秋白所说鲁迅精神的第三点：“反自由主义”，秋白说鲁迅的“打落水狗”，“真正是反自由主义，反妥协主义的宣言”，毛泽东则称道鲁迅“主张打落水狗”，说“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决不中途投降妥协”；而这些不妥协的斗争“是针对这个地主资产阶级的虚伪社会，这个帝国主义的虚伪世界的”，于是秋白就提出第四点：“鲁迅的最主要的精神”“是反虚伪精神”。这样，秋白就把鲁迅精神归结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毛泽东后来也说：“他一点没有假慈悲的伪君子的

①《通达彼岸的“桥梁”——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1979年第4期《社会科学战线》。

色彩，”“他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1941年，周恩来在《我要说的话》中说明鲁迅思想和功绩时，三次引用《序言》里精辟的论点。

鲁迅自己对《序言》也是看重的。许广平说：“在动笔之前，秋白同志曾不断向鲁迅探讨研究，”“写出之后，鲁迅读了，心折不已。‘只是说得太好了，应该坏的地方也多提起些。’”^①冯雪峰说：鲁迅讲“分析是对的。以前就没有人这样批评过”。鲁迅“说话时候的态度是愉快而严肃的，而且我觉得还流露着深刻的感激的情意。”“文革”中有人说“鲁迅对瞿秋白是有保留的”。^②是也？非也？有鲁迅的言行在。

（五）左翼文坛领导

50年代，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提到：“瞿秋白在左联活动的一个时期中，也曾参加了领导，起了很大的决定性的作用。”其他的如刘绶松、王瑶以及孙中田等五人、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组所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有类似的提法。甚而，还写进当时中学文学课本里：“当时他（秋白）在上海同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尤其是左联的文学运动。”“文革”中，他的名字、作品在现代文学史书、中学课本中消失了，他在长汀的纪念碑被砸，谁能料到左翼文艺运动的引航人，他的“寂寞身后事”竟是这样！1979年以后，相当论著提到秋白的散文、文艺译作后，有的进而提到他“为‘左联’的工作出过许多主意”，但仍不提他对“左联”的领导。中学语文教材增添附录《我国的现代文学》，也许

^①许广平《秋白同志和鲁迅相处的时候》，1959年6月号《语文学习》。杨之华也有类似的回忆，见《回忆秋白》P138。

^②冯雪峰《回忆鲁迅》

^③见1971年9月25日《光明日报》一篇“回忆”文章。

是受这些现代文学史著作的影响，提“左联”只讲鲁迅，不说秋白。为此，有必要论论秋白与“左联”。

其实，党对这早就有明确肯定的结论：“1931年至1933年，瞿秋白同志在上海同鲁迅先生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大量的当事或当时人的回忆录可作印证：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说，1931年5月下旬，在他“担任行政书记（“左联”的）不久，瞿秋白参加‘左联’领导。并邀约他谈谈改进左联工作的问题”。当时是“左联”党团书记的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中说：“1931年5月”，“秋白同志就开始和‘左联’发生关系，并且比较直接地领导我们工作了。”曾任“左联”书记的周扬在《为大家开辟一条光明的路》中说：“秋白与鲁迅先生一起参加和指导了左翼文化运动。”“左联”领导人之一夏衍在《追念瞿秋白同志》中说：“记得是1931年的春夏之交……秋白同志来参加文化工作的领导。”

秋白对“左联”的领导主要表现在：1.引导“左联”克服“左”倾，掌握正确的策略，发展左翼文学运动。如以前“左联”成员在商业性质的刊物上发表作品被认为右倾，秋白认为这是“左”，应利用合法斗争形式，扩大左翼阵地。此后，从1931年8月起“左联”改变了活动方式，盟员不仅在“左翼”刊物上发表作品，也在其他刊物上发表。这年9月，“左联”办的《北斗》刊物，丁玲主编，也刊登非“左联”成员如叶圣陶、徐志摩等人的作品。茅盾曾说“左联”“摆脱了‘左’的桎梏”，“促成这个转变的，应该给瞿秋白记头功。”2.领导第二次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他不但写《大众文艺的问题》、《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倡导这次讨论，而且当“左联”成员郑伯奇在《大众化的核心》一文中，提出大众化迟迟不能

①1955年陆定一同志代表党中央所作《关于瞿秋白同志生平的报告》。

②茅盾《“左联”前期》，《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

实现“第一重困难在大众自己”的错误观点时，秋白立即撰文《“我们”是谁？》加以批驳，并经夏衍约郑伯奇谈心，以使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健康发展。诚如孙殊青、包忠文于《瞿秋白在左联时期的文学活动》一文中指出，这次讨论是“在瞿秋白积极领导下”进行的。3.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俄罗斯、苏联文学的译介工作，倡导“普洛文艺”。秋白认为要创立中国的“普洛文艺”，就要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为此，他不仅译介，而且对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了开拓性贡献。这样，就并非简单地恢复“文革”前的说法，因为那时除了易著作略有论说鲁迅与秋白如何共同领导“左联”外，一般中国现代文学史书仅是提出论断，而没有论述，尤其是没有具体考察证明，没有讲秋白通过什么途径进行领导，以及领导起了怎样的作用，有的论著讲得又太“过”了。如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讲：“左联成立后，设立了党的组织——党团，瞿秋白、周扬、夏衍都担任过领导工作。”其实，秋白在“左联”中并没有具体职务，而是以他在党员及党的干部中的威望、文艺上的造诣来指导“左联”的，尽管他在党中央“靠边站”了，党的干部、文艺界的党员，仍把他当作领导。^①他是这种特殊身份实际参加对“左联”、“文委”领导的。何以为证呢？其一，新发现秋白手稿《苏维埃的文化革命》。这是秋白为“文委”（中国共产党文

^①1983年11月19日下午，唐天然同志托同事向阳翰笙询问秋白和“文委”关系。阳翰笙回答说，四中全会后华岗作宣传部副部长，华岗有时来“文委”，这时开始派秋白参加领导“文委”的工作。华岗不来就让秋白来。秋白是代表宣传部领导“文委”的。“文委”负责人、“左联”行政书记和常委阿英，在回忆文章中也提到秋白“受中央委托主管文化工作”，曾任“左联”领导的夏衍回忆文章也印证了这一点。不过，不是王明把持的政治局的正式决定，只是党的干部尊秋白为领导。

化工作委员会)起草的一份文件,是1931年10月至11月间写的。文件中提出“要为着文化运动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斗争”,要在大众之中发展普洛的革命的文学、话剧、美术、音乐等运动,要面对反动的大众文化,去创造革命的大众文化。这文件的最后还附列了“社联”、“教联”、“剧联”、“新闻记者联盟”、“左联”的工作计划纲要。其中“左联”的工作计划纲要是:“一、政治参加。二、创作批评(理论的斗争)。三、大众文艺,新作家的培养。四、文艺理论的宣传(翻译)。五、文研的指导(文新)。(1.创作和文艺理论的斗争——新作家;2.大众文艺——新作家;3.文艺理论的宣传;4.文研的指导)。”为什么会起草这份关系到整个文化战线任务的文件呢?这跟他以特殊身份参与领导“文委”——左翼文化总同盟的领导核心相关。也跟他是教育人民委员的身份相关。常州瞿秋白纪念馆里,陈列的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布告》上,铅印着“瞿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这份文件也涉及到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任务。其二,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通过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新任务》的决议。这个文件是冯雪峰根据秋白指示起草的,经“左联”执委会多次研究,最后由秋白修改定稿的。为什么由秋白修改定稿呢?这也是他作为特殊领导身份决定的。茅盾说这决议“瞿秋白化了不少心血”,“它标志着一个旧阶段的结束和新阶段的开辟”。如今,这文件陈列在瞿秋白纪念馆里。

秋白那时正受敌人追捕,不可能以公开身份参加“左联”活动。那他又是通过什么途径对“左联”领导的呢?第一,通过鲁迅。自1932年夏秋之交,秋白夫妇和鲁迅夫妇相会后,到1932年11月、1933年2月与7月,秋白四次避难鲁迅家中^①,这期间他们

^①马蹄疾《瞿秋白四次到鲁迅家避难考》,1986年第1期《辽宁大学学报》。

之间曾有多次交往、倾心交谈。无疑，秋白对鲁迅的思想有重要影响。许广平在《瞿秋白与鲁迅》一文中回忆：“他们俩人”“在革命战线上相互支援，在文化工作中共同切磋……如关于大众语问题的讨论和关于翻译问题的讨论以及对文化战线上各种反动势力的斗争等等”。可以说，他们是同一战壕里的一对孪生兄弟，亲密无间，心心相通。因此，这时期鲁迅对“左联”的指示、意见，相当一部分，也可看作是秋白的指示、意见。尤其是，相当一些“左联”成员对鲁迅是尊敬的，而鲁迅对秋白又是敬仰的，很看重秋白的意见。常说：“何苦的说法，我看还是对的”。这样，秋白可通过影响鲁迅来领导“左联”。第二，通过“文委”。“文委”的领导成员冯乃超、冯雪峰、阳翰笙、夏衍、周扬、阿英等，也是“左联”的领导。秋白通过“文委”领导了“左联”。第三，通过冯雪峰与茅盾。冯雪峰是“左联”党团书记，与秋白关系密切，经常到秋白秘密住处谢澹如家汇报，不少“左联”的重大活动都经过他向秋白请示’与之讨论而后才施行。秋白对“左联”许多重要意见，也通过冯雪峰而转达。后来，1933年6月，他们有一个多月住在一起，联系就更方便。茅盾把秋白作为老上级，更作为“能肝胆相照的挚友”，对秋白转变“左联”“左”倾的意见，更是折服不已。^①秋白可通过茅盾影响“左联”，特别在茅盾担任约半年“左联”行政书记的这段时间里。第四，秋白以他自己模范的党性、高昂的斗志、艰苦的工作、战斗的文章，率领和影响“左联”成员以及广大文化战士，反击反动派的文化“围剿”。

秋白参与领导“左联”后又起了怎样的积极作用呢？1. 促进“左联”内部的团结，树立鲁迅的威信，从而增强了“左联”的战斗力。“左联”是由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影响下的作家等几路人

^①茅盾赠丁景唐诗中云：“左翼文坛两领导，瞿霜鲁迅各千秋。”茅盾心目中秋白仍是上级、领导。

马联合而成。“左联”成立初，革命文学论争时产生的隔阂还没有消除，有的党员作家对鲁迅也不心悦诚服。正如夏衍在《“左联”成立前后》中所说：“成立‘左联’的时候，我们在组织上服从了党的意见，与鲁迅实行了联合，并以他为‘左联’的领导人，但在思想上显然还是有差距的。”这样必然影响团结战斗。秋白参加“左联”领导，这是党内外作家都拜服的。他提出向鲁迅学习，对确立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地位，提高一些同志对鲁迅的认识，具有重要作用。促进了一些心里不服的同志对鲁迅态度有了转变，从而统一了思想，增强“左联”的战斗力量。2.使“左联”对“左”倾路线影响有所摆脱，从而出现了党在白区工作受王明路线危害而遭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左翼文化战线却取得辉煌成就的现象。“左联”成立初，正是李立三冒险主义错误和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时期，“左联”不能不受其影响。1930年8月，“左联”关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的决议，就认为“中国革命快要到高潮时期”。“左联”大搞飞行集会，使不少党员和非党同志被捕。正在这困难时刻，1931年5月，秋白参与“左联”领导，他找茅盾谈，就反对“左”倾冒险，克服关门主义，争取和团结广大进步文艺工作者提出意见，并建议“左联”办大型刊物，以吸引各方面作家。9月即办了《北斗》，刊有冰心、戴望舒等的作品，左翼作家在资产阶级办的《申报》、《新闻报》、《东方杂志》、《申报月刊》上占领文艺阵地，还在《时事新报》、《晨报》等国民党办的报纸上发表作品。1931年10月，秋白又找冯雪峰指示起草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新任务》，最后经秋白修改定稿，于11月“左联”执委会通过这个决议。它是1930年8月“左联”决议的“反拨”，正如茅盾在《“左联”前期——回忆录[12]》中所评述的那样：“这个决议在左联历史上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左联”从此“从左倾错误路线影响下逐渐摆脱出来”，

“开始了蓬勃发展，四面出击的阶段。”³。为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出开拓性、奠基性贡献。由于这及他与鲁迅一起领导“左联”，整个左翼文化运动，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人们尊他为左翼文艺大军的“政委”，是我国革命文学的重要奠基人。

（六）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斗争与对“文艺自由论”等批判

有的论著把秋白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斗争，看作是“文艺批评”；又有相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及关于秋白的专著、论文，把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批判，统统归入反文化“围剿”战斗^①。这两种倾向都模糊了敌友界限。鲁迅、秋白等跟“民族主义文学”的斗争，这是文艺上反对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战斗。“民族主义文学”的头面人物是国民党电影检查委员王平陵，上海市党部委员、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长兼军法处长范争波等。上海市政府委员潘公展在《从三民主义的立场观察民族主义的文艺运动》中表明，要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来反对普罗文学。秋白写了《狗样的英雄》，剖析了“民族主义文学”代表作，一针见血地指出万国安的《国门之战》是鼓吹“剿杀苏联‘红匪’的”小说，深刻揭示其反共、反社会主义苏联、反人民的本质，是“屠夫文学”^②。秋白的这篇战斗檄文以及《青年的九月》、《狗道主义》等文，与鲁迅、茅盾等的声讨文章配合，使“民族主义文学”在群众中陷于孤立。

^①包忠文在《左联文艺斗争中的几个问题》中提出：“我们的一些论述”“把左翼文艺领域的反‘围剿’的内容、范围大大地扩大了。”事实正如包忠文教授所言，如上官艾明的《瞿秋白与文学》，就把“新月派——梁实秋之流”“胡秋原和苏汶之流”都作为“‘文化围剿’里的一头猎犬”。

^②刊1931年8月20日《文学导报》第3期，原题为《屠夫文学》。

较多的著作笼统地对“新月派”提出批判。其实，它的主持者与成员闻一多、卞之琳等政治倾向有很大不同。胡适，“五四”时是右翼著名学者。他宣扬西方文明、“民主”，1929年写《“人权与约法”的讨论》等文章，1930年，胡适等出版《人权论集》，“搭出了‘反对政府派’的架子”，颇能迷惑人。秋白在《中国人权派的真面目》中揭露：“中国人权派表面上反对摧残人权，要求保障自由，实际上却并不反对什么国民党，并不是反对什么压迫和剥削，而是反对共产党”。“目的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欧美式的宪政国会制度。”“这是人权派的真面目。”① 30年代，胡适愈趋投靠国民党当局，高唱“政府权”，秋白、鲁迅写《王道诗话》抨击这个戴着“博士衔”的资产阶级右翼文人，“人权抛却说王权”。“新月派”的又一代表人物徐志摩，虽跟反动派无组织上关系，但其《猛虎集》中的一些诗，政治上反动，情感上颓废。秋白针对徐志摩在《声色》上发表的《一个诗人》，写了《猫样的温文》，揭露猫样温文的诗人鼓吹“声色”，这是“另外一种的缰绳”。② 它羁縻青年沉迷于淫秽声色之中。

胡秋原自称为无党派的“自由人”，以“自由知识分子”的面貌出现，1931年底发表《阿狗文艺论》等文，认为“民族主义文学”是“法西斯蒂的文学”，“警犬”，“摧残思想的自由，阻碍文艺之自由的创造”。另一面，他又把矛头指向“左联”，叫嚷“革命勿侵略文艺”。对这种“文艺自由论”，“左联”进行了驳斥。这时“左联”成员苏汶以“第三种人”身份支持胡秋原的谬论。“第三种人”属“同路人”，对其“创作自由”的论战，不是反文化“围剿”。即使对“自由人”胡秋原也不属“敌我”斗争范围，据《胡兰畦回忆录》中提

①《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6期，1931年11月10日。

②1931年10月19日《文艺新闻》第32号，编入《乱弹》时改题为《猫样的诗人》。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P373—375。

到,他后来在国外一度还参加过反帝大同盟等进步活动。当然,批驳他们“文艺自由论”的反左翼文艺、反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十分必要的。秋白写了《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等论文,以列宁关于文学的党性原则,批驳胡秋原的“文艺自由论”,“是他要文学脱离无产阶级而自由,脱离广大的群众而自由”。这种“文艺至死也是自由的”,正是胡秋原自己所说的“自然主义文学,趣味主义文学”,“小资产阶级文学”,“民族文学”等“都不妨让他存在”。这实质上是让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学自由泛滥。对苏汶的“创作自由”论,秋白指出,他“比胡秋原先生更加巧妙的保护文学的自由”,手法是攻击“左翼文坛里没文学”,于是“文学界里也没有左翼文坛”,“文学脱离左翼而自由了”。秋白既驳斥胡秋原、苏汶自由化谬论,又不回避钱杏邨某些机械论错误,捍卫了列宁关于文学的党性原则时,不愧为大手笔。鲁迅赞云:“真是皇皇大论!在国内文艺界,能够写这样论文的,现在还没有第二个人!”^①

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的斗争中,在批判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文艺思潮中,秋白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推动了左翼文艺的发展。秋白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颗灿烂的巨星,也是中国人民革命运动史上的群星之一,其光辉永不磨灭。^②

^①冯雪峰《回忆鲁迅》P 131。从总体上说,秋白这篇论文是坚持、发展了列宁的关于文学的党性原则,是“皇皇大论”。但也有个别论述有偏颇,如“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又如“文学是附属于某一个阶级的”等。在这篇论文中,秋白没有把苏汶、胡秋原看作敌人,而是批判他们的自由化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但在《红萝卜》中,似乎把作为“自由人”的胡秋原划入“敌人”方面去了。^②本章主要内容曾先后发表:沈阳教育学院学报1983年3、4期合刊《瞿秋白在“左联”时期的文学活动》;临沂师专学报1989年第3期《瞿秋白与“左联”》;南通师专《教学与研究》1984年第3期《怎样理解瞿秋白论鲁迅的一段话》;本院《中学教学参考》1983年第2期《鲁迅精神札记》。

八、棘地荆天两代人友谊的“结晶”

——兼论秋白与鲁迅杂文的同异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与恩格斯有着感人至深的友谊。1847年，他们共同起草了《共产党宣言》。中国古代文学史上，744年，唐朝天宝三载，李白在洛阳结识了比他年轻11岁的杜甫，次年秋又相聚。他们饮酒谈笑，切磋诗文，亲如兄弟：“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①可惜没有留下共同构思的诗作。在现代，秋白与鲁迅结下了终生不渝的友谊，又传下了真挚友情的结晶——合作的15篇杂文。

这些杂文不论是秋白和鲁迅商讨过的，还是先由秋白写而后鲁迅只作少许改动的，都是秋白执笔的。为什么许多不知情的人们多少年把它们当作鲁迅之作呢？鲁迅比秋白年长18岁，这两代人又为何无“代沟”，如此心心相印呢？其时，秋白外遭国民党当局追捕，内受王明极左路线打击，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他刚回荒芜的文艺园地。而鲁迅已是蜚声文坛的“主将”，反动派恨他却又无可奈何，革命阵营内部“左”得可爱的作家，一哄而上，也扳不倒。何以鲁迅偏偏看重秋白这一位共产党人，并与他亲密合作呢？他们又是怎样开始这类创作上的合作呢？话得从30年代秋白在鲁迅家首次避难说起。

（一）首次避难和支持鲁迅对芸生批判

1932年，刀光剑影。在南京，蒋介石成立“剿共委员会”。6月，他调集了90个师50万兵力，向解放区实行全面“围剿”。

^①杜甫《与李白十二同寻范十隐居》

蒋介石任“剿匪”总司令，兼鄂豫皖“剿匪”总司令。何应钦为闽粤赣三省“剿匪”总司令。何成濬、王均、刘峙为前敌总指挥，指挥蒋匪军杀向苏区。蒋介石在其统治地区实行残酷的法西斯统治，进行文化“围剿”。在上海，党的地下机关遭破坏，左翼作家被囚禁、屠杀。巡捕房、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鹰犬”们，据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国民政府”发的密令〔凡缉拿瞿秋白、周恩来者各得两万元，缉拿陈绍禹、沈泽民、张闻天、罗效贤（罗登贤）、秦邦宪等五人者，各得一万元〕，个个急红了眼，盯着那重金悬赏，在十里洋场的大街小巷，布下了搜捕的密网，一心要将“匪首”瞿秋白捉拿归案^②。纵然，秋白隐姓埋名，改装打扮，但是，逮捕、死亡仍然象影子那样，时刻跟着他。

这年11月下旬的一天，夜幕降临，警车在北四川路呼啸而过，刺耳的铃声令人更增加几分不安。突然，北四川路底的鲁迅公寓响起了急速的敲门声。这时鲁迅已到北平省亲，许广平

①《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19126号公函》，此原件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②〔美〕斯图尔·施拉姆说：“几乎可以肯定，周恩来是在1931年夏末秋初去江西的。向忠发被处决后，秦邦宪任总书记，他大概是在1932年初去江西的。”见其著作《毛泽东》P127，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内部发行。王明（陈绍禹）向尼姆·威尔斯口述的自传，谈到他回莫斯科的时间是1931年6月。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研究》P249，克拉伦登出版社1966年版。香蒂·斯瓦鲁普曾引用王明的自述。常州瞿秋白纪念馆“秋白的怀表”说明：“1930年9月，秋白将此表赠沈泽民，沈于31年又转赠红廿五军副军长徐海东。”按：沈泽民于1931年赴皖任鄂豫皖苏区省委书记。罗登贤，“‘九·一八’前后他是中共中央驻东北的代表，并兼任中共满州省委书记”。见胡济涛主编《新名词辞典》P9022，上海春明书店出版，1951年版。张闻天，“1933年1月，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张闻天同志生平简表》，《回忆张闻天》P381，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这样，留在白区的秋白，自然就成为敌特的主要搜捕目标了。

开门一看，面前是“剃了光头，圆面孔”的秋白。她见秋白那身着装，紧张而又沉着的神色，不同于一般的敲门，知道有“情况”。便敏捷地让他进屋，又四下张望一下，没有发现可疑的人，遂关好门。问道：“怎么就你一人？”“之华给盯上了。”瞿秋白的爱人杨之华被叛徒盯梢，秋白在紫霞路的秘密住处随时会出现“毒蛇”。哪里最安全？“去周先生家！”“之华必须摆脱‘毒蛇’，不能牵连鲁迅”。秋白脑中快速闪过上述决断，立即来到鲁迅家。此时，杨之华在夜色的掩护下，急急穿梭于马路、里弄。时而从一辆电车跳下，又登上另一辆电车，时而躲进一家僻静的小店，又猛地跑进五光十色的大商场，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她要甩掉尾随的“毒蛇”。后来，杨之华追忆：

我们得到组织送来的警报，知道有一个叛徒在盯我的梢。秋白于是立即住到鲁迅家里去。因为叛徒认识我，为了免得把他引到鲁迅家，我没有同秋白一起去，只好在马路上转了三天三夜。秋白……很担心我的安全，请一位同志到处找我，终于在马路上碰见了。这时正是白天，我不放心，就请他先走。我又在街上转了很久，直到天黑以后，确信后面没有“尾巴”了，才到了鲁迅家。①

许广平早在北京女师大读书时，就听过刚从苏联回来的秋白讲演。那时秋白穿着西装，留着长头发，英俊、洒脱。讲演起来头发掉下来了，头那么向上一扬，掉下的头发就服贴地回位了。九年后，在许广平家秋白的装束变了，人也变得稳重、老练。对这位过着地下生活的革命者，许广平分外敬重。正好鲁迅还没由京回沪，她把和鲁迅睡的双人床让出来，亲自为秋白夫妇铺上清洁的床单，请他们在鲁迅写作兼作卧室的一间朝

①杨之华《回忆秋白》P 133—134。

北大房间里住下。

11月28日下午，鲁迅乘火车离开北平，30日傍晚到达上海。回到寓所，意外地碰上秋白夫妇正在他家避难。鲁迅深深吸了一口气，尽力抑制内心的兴奋。他庆幸秋白夫妇脱险，更为挚友的到来而快慰。秋白和鲁迅各自都异常激动，都有一肚子话要向对方倾吐。他们推心置腹，侃侃而谈。谈政局，谈时事，谈文学，谈人生。谈得忘了时间的流逝，有时秋白甚而忘了是在避难，发出爽朗的笑声。许广平是这样回忆他们相处的：

“秋白同志来了几天才见到鲁迅回归”，“在这期间，他和我们在一起，我们简单的家庭平添了一股振奋人心的革命鼓舞力量，是非常幸运的。加以秋白同志的博学、广游，谈助之资实在不少。这时，看到他们两人谈不完的话语，就象电影胶卷似地连续不断地涌现出来，实在融洽之极。”^①

融洽是他们后来合作杂文的基础。那么又是什么使他们谈得如此相投呢？王观泉同志曾正确地指出，鲁迅见到瞿秋白，不会有“象小海婴见到杨妈妈”那种近乎膜拜的心态。不过对于鲁迅，秋白确实令人神往。秋白28岁主持党中央工作，是党的早期领袖。此时，秋白虽然是身无一职的普通共产党员，但他依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听着秋白滔滔不绝的高论、博大精深的见解，在鲁迅心目中，秋白俨然是精神界的领袖——即使秋白比鲁迅年龄上要小一辈。诚如1906年时，鲁迅感到章太炎

①《鲁迅日记》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下文所引，均此版本，不再注。P 803，1932年11月28日日记：“下午静农相送至东车站”。30日日记：“晨八时至浦口，即渡江登车，十一时车行。下午六时抵上海北站，雇车回寓。”

②许广平《鲁迅回忆录》，见《忆秋白》P 274。

先生“令人神往”一样，并非因为太炎先生“是学者”，年长一辈，而是为了他是反清王朝的“光复会”精神上的领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①另外，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时，王明等人突然袭击，攻击秋白主持的三中全会是“调和路线”，这公正么？明明他是照共产国际指示办的，怎么变成他个人的罪名？明明是王明等人在搞派别活动，怎么反而污蔑他搞“小团体”，“两面三刀”？把秋白清除出政治局还不够，甚而株连到他妻子，杨之华的中央妇委委员和总工会女工部秘书也同时被撤掉了。秋白的内心是够痛苦的，更为难以忍受的是他不能、也不愿对人讲心灵的创伤，就是在自己妻子面前也得装扮一副笑脸。②善于观察人生、感觉敏锐的鲁迅，对秋白心灵的苦不能不有所察觉：秋白是受打击而无怨言，自己心情抑郁，却为他人带来了光明与欢乐；感到“人的精力已经象完全用尽了似的”，却更主动、更忘我地为党的事业工作。鲁迅作为党外布尔什维克，对秋白坚强的党性、高尚的情操、美好的品德，更加敬佩。自然，秋白对鲁迅也怀着尊敬之情。鲁迅对反动势力横眉冷对，坚韧战斗。在极左的气氛下，保持清醒的头脑。对同道的嘲笑、辱骂、攻击能够正确处理。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鲁迅在反文化“围剿”战

①鲁迅《关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且介亭杂文末编》。

②夏衍：《追念瞿秋白同志》，“在我和他断断续续的近两年的工作接触中，丝毫也没有感觉到他受了打击之后的委屈的心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最经不起打击——特别是来自内部的打击，而在秋白同志的身上，是一点也找不到牢骚、委屈之类的个人主义情绪的痕迹的。他从来不谈个人的事，不谈过去的事”。见1955年12期《文艺报》。

杨之华，“我当时的党性修养还不够，一方面为秋白感到不平，同时对宗派主义者这样无理地对待我也感到委屈……有时我碰到一些不愉快的事，随便向他嘟囔几句，也不会影响他的情绪。相反地，他总是给我除忧解闷，对我说上几句既风趣又有深意的话，使我解开了疙瘩，高兴起来了。”（《回忆秋白》P90、93。）

场上节节取胜。这些都使秋白由衷佩服。

他们相互视为知己,除互敬外,还在于有共同的理想、道路、见解。秋白和鲁迅都出身于南方城市中破落的士大夫家庭,都饱经了世态的炎凉,都看到社会和本阶级的虚伪与黑暗。鲁迅“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①。秋白宣言:“‘我’,不是旧时代之孝子顺孙”^②。他们各自探索的具体途径不尽相同,但殊途同归。都由“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绅士阶级的武臣”,^③进到无产阶级的战士。秋白是通过在列宁故乡的考察和学习,明白“未来的时代将是社会主义时代”^④,树立“共产主义是‘理想’,实行共产主义的是‘人’”的信念。^⑤鲁迅则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 and 深刻的观察之中,”^⑥从革命民主主义走到共产主义。他们走的都是“同着新兴的社会主义的先进阶级前进”的道路。^⑦

他们有着共同的追求。为了将“阴沉沉,黑魑魑,寒风刺骨,腥秽污湿的所在”的旧中国,变为“灿烂庄严,光明鲜艳”的新世界,^⑧秋白受打击而不气馁,坚持地下斗争。为了打破封建主义那种残酷和虚伪的秩序,迎来光明、纯洁的新天地,鲁迅用他那支“金不换”,坚守在文化斗争的岗位上。他们目标一致,革命见解相同。他们对当时文化界复杂斗争形势的分析,对粉碎反动派文化“围剿”的对策,都有共同言语。对帝国主义的横暴,都燃

①鲁迅《〈二心集〉序言》

②瞿秋白《赤都心史·我》,《瞿秋白诗文选》P164。

③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瞿秋白选集》P526。

④瞿秋白《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1921年2月《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公报》第1期。⑤瞿秋白《共产主义之人间化》,1921年6月《晨报》。⑥⑦同③P546、541。⑧瞿秋白《〈饿乡纪程〉绪言》,《瞿秋白诗文选》P17—18。

起满腔怒火；对“九·一八”后东北的沦亡，又有同样的哀愁。鲁迅一边吸着烟，一边把积压在胸中的块垒，向秋白倾诉；秋白品着别人送给鲁迅的名茶，向同患难的战友，敞开了自己的心胸。

对诗《汉奸的供状》的批评，以及对反批评的驳斥，这既表现了秋白与鲁迅的情谊，也是他们并肩战斗的见证，是他们共同编著的前奏。

那史无前例的年代，有的论著讲鲁迅在《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中批判的芸生，就是秋白。^①其实，这段公案就发生在秋白于鲁迅家避难期间。芸生，原名丘九如，宁波人。写了一首讽刺胡秋原的诗《汉奸的供状》，诗中有“剖西瓜”之类的恐吓、“丢他妈”之类的辱骂，登在《文学月报》第1卷第4期上（11月出版）。冯雪峰回忆说：“我看到了，认为这是完全违背党的策略的，很不高兴，因我当时是文委书记，即去找编者，提出我的看法，并建议他在下一期《文学月报》上有公开纠正的表示，他完全不同意，于是争吵起来。”后来，冯雪峰找了秋白、鲁迅，秋白“也同意”他的意见（公开纠正）。冯雪峰还请鲁迅“出面”。^②12月10日，鲁迅以通信的形式给编者（周扬）一信，写下了著名杂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当时，秋白正是第一次在鲁迅家避难，他支持了冯雪峰，与鲁迅的看法相同。鲁迅怎么可能把芸生当作秋

^①冯夏熊《冯雪峰谈左联》，讲到一个时期阿英（钱杏邨）把“芸生”误传为“瞿秋白”，冯雪峰指出阿英的说法“毫无根据”。见1980年第1期《新文学史料》。阿英误传之文为《关于瞿秋白的文学遗著》，见1938年6月9日《文汇报》。瞿独伊：“一种说法是，鲁迅写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是‘批判’我父亲的。说这种话的人正好把事情弄反了，这篇文章倒是鲁迅和我父亲交换过意见才写出来的。”见1980年第2期《新文学史料》上《怀念父亲》一文。

^②冯雪峰1972年9月26日致陈则光信所附抄件，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又，冯夏熊《冯雪峰谈左联》，也谈到请鲁迅出面说话。

白的化名来批判呢？

至于《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的发表，如何引起“同道”“用假名夹杂着真名”来攻击，而秋白力排“左”的非议，著文反驳，这是秋白第一次避难鲁迅家中时的事。且其中“内斗”曲折，待到下一节文字来表叙。再接着说鲁迅不可能把芸生当作秋白来批判。巧得很，鲁迅给周起应信后的第二天，11日，特地办了六种菜肴，设家宴，邀请冯雪峰作陪客，为秋白夫妇送行。^①这既是送别，也是庆贺战斗杂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发出。文章是用鲁迅个人的名义，观点却代表了秋白、冯雪峰的看法。

11点多钟，史平穿着一件旧西装大衣，大衣领头翻起，遮盖了两颊，头上戴的铜盆帽压到眉毛以下，来到鲁迅的住所，接秋白夫妇转移他处。鲁迅穿着旧的灰布棉袍子，依依惜别。

“远不远？”秋白问史平。“很远，我去叫三辆黄包车。”说着，史平正要去叫车子，被很关心这次转移的鲁迅拦住了。“不用你去，我叫别人去叫车子。”鲁迅招呼许广平去安排车子。这时秋白指着鲁迅问史平：“你们会过吗？”史平和鲁迅同时回答：“没有。”

^①1932年12月11日，鲁迅为秋白夫妇饯行，鲁迅日记中有记载：“十一日，星期。县……治饌六种邀乐扬、维宁及其夫人夜饭”。见《鲁迅日记》下卷P804。乐扬，即冯雪峰。维宁，秋白笔名魏凝的谐音，用笔名的谐音，有保护秋白之意。

查，12月25日前，未再有如此隆重宴请秋白的日记记载，可看这次为饯行，且与史平来接秋白夫妇转移别处时间吻合。史平在《一个深晚》中讲来接秋白夫妇的时间是：“一九三一年阴历十一月的某一天，大约是深晚十一时许了。”“阴历十一月”即阳历12月，吃好夜饭，“大约是深晚十一时许了”。时间上衔接得起来。为何1932年12月11日鲁迅日记中未留下史平的名字呢？许广平说：“那时为了革命利益，我们自觉遵守纪律，从不问来人姓名和住址。”据唐天然同志查考，“史平就是陈云同志”，“当时任全国工会党团书记”。鲁迅自然会在日记中留下史平来接转移走秋白这样事关党的机密的文字。

接着，秋白给他们作了相互介绍：“这是周先生，就是鲁迅先生。”“这是×同志。”史平望着鲁迅尊敬而诚恳地说：“久仰得很。”

鲁迅正为秋白夫妇和史平路上的安全担心，露出庄重而忧愁的神色，关切地问史平：“深晚路上方便吗？”“正好天已下雨，我们把黄包车的蓬子撑起，路上不妨事的。”史平用安慰的口气答道。

这时，许广平已安排好车子。秋白走到门口对鲁迅说：“我要的那两本书，请你以后就交××带给我。”又指着史平向鲁迅讲：“或者再请×同志到你这里来拿一下。”史平随即插话：“隔几天我来拿。”

鲁迅似乎未听见史平的插话，面孔上表现出非常担心的神气，对秋白低声说道：“今晚你平安的到达那里以后，明天叫××来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

秋白默默地点了点头。跨出了房门，走了几步又回头张望，见鲁迅夫妇站在门口目送着，秋白说：“你们进去吧。”在濛濛细雨中，秋白等离去了，而丝丝愁云布满了鲁迅的心田。

（二）第二次避难与合作编辑《萧伯纳在上海》

1933年春，中央苏区粉碎第四次“围剿”，俘虏了蒋匪军李明、陈时骥两个师长、以及士兵万余人。湘鄂皖赣苏区也取得了胜利，并与中央苏区连结。方志敏率红十军二进闽北，使闽北苏区、赣东北苏区和中央苏区连成一片。苏区增地10万平方里，红军增加到30万人。对红军的胜利，蒋介石咬牙切齿，在国统区加紧法西斯统治。

早春二月，阴霾漫天，黑云压城。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这月上旬的一天，警报接踵而来。上海中央局秘密得知，“蓝衣社”当夜要对紫霞路突然袭击，要破坏中共在那里有一个据点。经

分析研究,认为秋白在紫霞路的秘密住所,很可能出事。中央局组织部长黄文容急急赶到紫霞路谢宅,登上阁楼,急闭房门,压低声音对秋白说:“火速转移!”去哪里呢?一时黄文容也提不出适合的去处。“只有一个地方可去:周先生那里。”出于对鲁迅的信赖,急切之间,秋白脱口而出。

上海,自20年代初就是党中央机关所在地。在这里有多少共产党员,又有多少党的机关、秘密联络站。然而,危急时秋白想到的首先是去鲁迅的住处,他们岂但是“神交”,且是患难之交。于是傍晚时分,黄文容护送秋白夫妇几次转车,横穿上海,最后到北四川路底的电车终点站,而后快步来到鲁迅公寓。黄文容一边按门铃,眼睛的余光扫了一下斜对面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一会儿,竟是鲁迅亲自出来开门,见着黄文容露出诧异的神情,刚要问话,黄文容一把就将秋白推进门去。鲁迅立即认出秋白夫妇,热情地迎他们进里屋。秋白与鲁迅别后才一个多月,他们却象久别老友重逢,话语不绝,十分兴奋。自此,秋白第二次在鲁迅家中避难。

①1933年2月10日《鲁迅日记》下卷P820:“晨。上午复靖华信,附文,它笺。”“它”即史铁它,秋白的俄文姓Страхоб的前三个字的译音,有时译为史铁儿。靖华,曹靖华。他与鲁迅相识,也是秋白的学生与战友。

20年代初曹靖华曾被SY(社会主义青年团)派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这时秋白给中国班的学员教俄语兼政治理论翻译。1922年,秋白在莫斯科近郊疗养,曹靖华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去探望秋白。1923年秋白回国主编《新青年》,曹靖华的第一篇译稿契可夫的《蠢货》,就由秋白看后在《新青年》上发表。1924年,秋白将曹靖华的译稿《三姐妹》作了认真修改,交郑振铎出版。大革命失败后曹靖华赴苏学习,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等高校任教。1928年至1929年秋白再次赴苏,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这期间他们还有交往。30年代,秋白为曹靖华翻译的《铁流》作序,在苏联的曹靖华也不断地寄些苏联书报,托鲁迅转给秋白。

鲁迅与曹靖华的交往也颇多。鲁迅赞赏曹靖华那种“一声不响,不断的翻译”的辛勤劳作。1933年2月9日鲁迅收到曹靖华来信,10号复信。此时秋白也在,就附笺寄出。由此可以断定:2月10号时,秋白夫妇已第一次避难在鲁迅家了。

这一次，秋白在鲁迅家住的时间较长。秋白与鲁迅朝夕相处，促膝谈心，十分相投。当鲁迅谈到同道之中的人居然造了个假名，在同道办的杂志上撰文骂他^①，气得胡子直翘，连声说道：“真是活见鬼！”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由秋白支持鲁迅撰写的给“起应兄”的信，即《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已在1932年12月《文学月报》第1卷第5、6期合刊“通信”栏内发表。编者还加上“这是尊贵的指示，我们应该很深刻地去理解”的按语。可是“左联”成员祝秀侠化名首甲，与方萌、丘东平还假造个“郭冰若”的名字，^②联名发表《对鲁迅先生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有言》^③，为芸生的《汉奸的供状》辩护，攻击“鲁迅先生为要纠正‘切西瓜’之类的‘恐吓’时，却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是“考茨基的和平革命论，戴白手套的革命论”。“是极危险的右倾的文化运动中和平主义的说法。”而“芸生的诗在我们看，他的基本立场是正确的”。^④对《汉奸的供状》中“丢他妈”的辱骂、“切西瓜”之类的恐吓，秋白与鲁迅本有相同的否定看法，对首甲等貌似不偏不倚，什么“不要忘记了在左的辞句遮掩之下的盲动主义，”^⑤“却也不要忘记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复活”，其实，是在搞极左的残酷斗争，秋白从党内路线斗争高度更有

①1935年4月28日鲁迅致萧军信还提起此事：“那个杂志的文章，难得做得很，我先前也曾从公意做过文章，但同道中人，却用假名夹杂着真名，印出公开信来骂我，他们还造一个郭冰若的名，令人疑是郭沫若的排错者。我提出质问，但结果是模模糊糊，不得要领，我真好象见鬼，怕了。”（《鲁迅书信集》下卷P805。）

②祝秀侠，广东番禺人。曾一度加入“左联”，不久离开革命文艺队伍。丘东平，广东海丰县人。原名丘席珍，1910年生，早年曾任彭湃秘书，“左联”成员，1938年参加新四军，1941年7月24日，率鲁艺华中分院同志们冲破日寇包围时，在盐城北秦庄壮烈牺牲。作品有《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等，收入胡风编《东平短篇小说集》。

③④1933年2月1日出版《现代文化》杂志第1卷第2期。

切肤之痛。尤其是挥舞这极左大棍的是“左联”中“同道人”，受这棍棒打击的又是自己亲密的战友，秋白感到更难以容忍，立即写了《慈善家的妈妈》、《鬼脸的辩护——对于首甲等批评》，与鲁迅并肩战斗^①。

《慈善家的妈妈》是篇寓言体的杂文，通过对“侠客”动辄威吓“切你的西瓜”，再不就是破口大骂“丢他的妈”的讽刺，说明“那样的手段是不行的”，使“穷光蛋反而弄糊涂了”。^②表示了对芸生以辱骂和恐吓代替严肃论争的批评。

《鬼脸的辩护——对于首甲等批评》，则是篇有力的驳论。文中批驳了首甲等的混淆“笑骂”与“辱骂”，以辱骂代替理论批判的谬论，肯定并进一步发挥了鲁迅给周起应信中的意见。文中说：

“芸生在《文学月报》上发表了一首诗，是骂胡秋原‘丢他妈’的，此外，骂加上一些恐吓的话，例如‘切西瓜’——斫脑袋之类。……鲁迅给《文学月报》一封信，说‘恐吓辱骂决不是战斗’，而署名首甲、方萌、郭冰若、丘东平的四个人就出来判定鲁迅‘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

“革命当然要流血的，然而嘴里喊一声‘斫你脑袋’还并不就是真正革命的流血。何况文化斗争之中，就是对付正面的敌人，也要在‘流血’的过程里同时打碎他们的‘理论’的阵地。当你只会喊几声‘切西瓜’的时候，就要被敌人看做没有能力在理论上来答辩了，而一般广大的群众并不能够明

①瞿独伊：“当鲁迅的这篇文章遭到一些人攻击的时候，我父亲马上写了《鬼脸的辩护》和《慈善家的妈妈》这两篇杂文来保卫鲁迅的观点，保卫他自己和鲁迅两人共同的观点。”见《怀念父亲》一文，《忆秋白》P 236。

②瞿秋白《慈善家的妈妈》，《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P.126—127。

白敌人‘理论家’的欺骗。国际的革命思想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几十年来没有一次是用‘切你的西瓜’那样的恐吓来战胜反动思想和欺骗的理论的！这种恐吓其实是等于放弃思想战线上的战斗。

“所以说‘恐吓决不是战斗’的鲁迅决没有什么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而自己愿意戴上鬼脸的首甲等却的确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观点。”^①

鲁迅那封通信是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出发的，而秋白这篇文章则是从思想斗争、理论批判、路线斗争的角度来论的。再看这场论战的前前后后，可以感到他们在同一战壕里战斗，配合默契。^②在此基础上，他们合作编辑《萧伯纳在上海》。

1933年2月17日，爱尔兰的著名戏剧、评论家萧伯纳，在周游世界时到达上海，引起轰动。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P121—122。

②鲁迅在《致〈文学月报〉编辑的一封信》中讲“别德纳衣的诗虽然自认为‘恶毒’，但其中最甚的也不过是笑骂。”而“芸生先生的一篇诗”则是“辱骂”。这里鲁迅把秋白译的别德纳衣诗：《没工夫唾骂》，是讽刺托洛基茨的。与《汉奸的供状》作了区别。（秋白译的诗登在《文学月报》，第1卷第3期上。）秋白在《鬼脸的辩护》中讲：“把这些‘理论家’比做‘走狗’，‘叭儿狗’，——这都有确定的意义的，虽然是笑骂的字句，而表现着批判的暴露的意义。至于‘丢他妈’，只是“无能的‘气急’”。这里，秋白把鲁迅的“叭儿狗”之类作“笑骂”。“喜笑怒骂，皆成文章”。1933年4月11日，秋白与鲁迅交谈，执笔写了《透底》，4月19日鲁迅用自己的笔名何家干发表在那天的《申报》“自由谈”栏目中。祝秀侠因该文涉及到他把别人文中引用普列汉诺夫的话也叫新八股，而写信给“家干先生”，进行辩驳。家干在回信中写道：“其余的人也会有新八股性。例如只会‘辱骂’‘恐吓’甚至于‘判决’，而不肯具体地切实地运用科学所求得的公式，去解释每天的新的事实，新的现象，而只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实上乱凑，这也是一种八股。即使明明是你理直，也会弄得读者疑心你空虚，疑心你已经不能答辩，只剩得‘国骂’了。”（鲁迅《伪自由书》P87——89，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再次对他批判。

在萧伯纳未到上海之前，2月15日，鲁迅写了《颂萧》一文。萧伯纳来上海时途经香港，2月14日，他对香港大学学生讲话。由于他“终身拥护这渐进社会主义”，且讲话中提到青年要成为“赤色革命家”，上海各报攻击萧伯纳“宣传共产”。对此，鲁迅在《颂萧》杂文中予以反击。热情肯定萧伯纳“是伟大的”，揭露黑暗的“特别国情”：“只要汝今天成为革命家，明天汝就失掉了性命”。瞿秋白和鲁迅认识一样，认为萧伯纳敢于投这样一颗“炸弹”，本身就证明是“资产阶级的‘叛徒’”，人格的“伟大”。不论是上海滩上文氓的污蔑，还是想萧伯纳“说几句于自己有益而刺着别人”的“低能儿”的文笔，都无损于“萧的伟大”。^②

2月16日午后，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将改造社的电报给鲁迅看，电文是讲要鲁迅会见萧伯纳。鲁迅慨然允诺。^③17日晨，鲁迅得内山完造信笺，知萧伯纳已在上海登陆。午间得到蔡元培先生信，邀约鲁迅前往宋庆龄夫人家，参加欢迎萧伯纳的午宴。萧伯纳坐在圆桌的上首，“雪白的须发，健康的血色，和气的面貌”。同席的还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其他领导成员杨铨、林语堂，斯沫特列女士也在坐作陪。^④吃饭时的萧伯纳给鲁迅留下深刻印象，“毫不觉得他是讽刺家”^⑤，只觉得萧伯纳用筷子的有趣。萧伯纳开始用起筷子时，总是夹不住菜，好几次后，他竟然巧妙的紧紧的夹住一块什么东西，于是他得意地看着圆桌旁的

①鲁迅《颂萧》，《伪自由书》P 26—27。

②《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P 328、299、P 326。

③鲁迅《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南腔北调集》P 67。

④⑤《鲁迅日记》下卷，P 821：“十七日，晨。晨得内山君笺。午后汽车贾蔡先生信来，即乘车赴宋庆龄夫人宅午餐，同席为萧伯纳、斯沫特列女士、杨杏佛、林语堂、蔡先生、孙夫人，共七人，饭毕照相二枚。同萧、蔡、林、杨往笔社，约二十分钟后复回孙宅。经介木村毅君于萧。傍晚归。”

④⑥鲁迅《南腔北调集》P 68。

一张张脸，可是鲁迅发现谁也没有注意到萧伯纳的用筷成功。饭后又合照了相。萧伯纳站在蔡元培和鲁迅的中间，慈祥的老人面带似乎了解一切的微笑，斜视着长着硬须发的鲁迅。鲁迅回报以会心的笑容，穿着马褂的蔡元培则是沉思的表情。午后2点光景，鲁迅等一起与萧伯纳参加“世界笔会中国支会”的欢迎仪式。在福开森路世界学院的精致小厅里，有梅兰芳等名人、记者约50人把萧伯纳围在中间，要萧伯纳讲演，向他提问，好象翻检《大英百科全书》似的，又向他赠送纪念品。20多分钟后，回孙夫人家。在宋庆龄家的草地上，上海和各国记者、照相师以及“改造社”的木村毅君、一些文士，再把雪白胡须的萧伯纳团团围住，由林语堂、洪深当临时翻译，要萧伯纳回答各种问题。鲁迅虽然没机会和萧伯纳畅谈，但从萧伯纳幽默而又锋利的答话，鲁迅感到萧伯纳善于撕掉绅士们虚伪的假面，是个好人。傍晚，鲁迅回到家里，兴奋地和秋白夫妇谈起当时和萧伯纳会见的情形，坦率地说出：“我是喜欢萧伯纳的。”因为他是“被我自己所讨厌的人们所讨厌的人”。①听着鲁迅的叙述，秋白也感受到萧伯纳这位激进的戏剧家，有着非凡的讽刺才能，也是那样无情地剥掉“圣贤”的伪装，那样犀利地揭穿资本主义的黑暗内幕。难怪资产阶级的报刊指责萧伯纳讲的是“尖刻语”，放的是“冷箭”，攻击萧伯纳不过是玩弄“借主义以成名，挂羊头卖狗肉的戏法”②。听着鲁迅正面谈到对萧伯纳的良好印象，对比资产阶级文人的污蔑、奚落，秋白跟鲁迅一样，从心底喜爱这个正直而诙谐的戏剧讽刺家。

第二天，上海高楼大厦、低矮平房传遍了萧伯纳的“幽默”、

①鲁迅《南腔北调集》P 67。

②1933年2月17日《大晚报》社论《萧伯纳究竟不凡》

“轶事”，热闹得比泰戈尔到沪还要厉害。各报的新闻，比萧伯纳本人的话还要出色得多。在同一时候，同一地方，听的都是萧伯纳的答话，写出来的记事都是各不相同的。英国的《字林西报》报导萧伯纳说，“中国的民众”，“他们所要挑选的自己的统治者，不是什么戏子或者封建的王公”。大概是这些作为统治者的“戏子”还不大合于英国的胃口，美国人爱看了，而英国人却又有些讨厌，故而借萧伯纳之口，说出其讨厌。中国半官方的《大陆报》捏造出萧伯纳说，“好的统治者”“不是一个好戏子”。这是在讲，南京国民党政府好，好就好在它不象一个“戏子”。日本文的上海《每日新闻》记载得更有趣，“中国记者问：‘对于中国政府的你的意见？’——‘在中国，照我所知道，政府有好几个，你是指那一个呀？’……”这里，萧伯纳说的“戏子”消灭得无影无踪，多了个中国政府有好几个，其中，当然也包括日本政府扶植的“满州国”政府。鲁迅认为对于萧伯纳同一的答话，而有不同以至矛盾得出奇的评述，就这一点看，萧伯纳“是一面镜”^①。秋白也以为这些不同的报导，是“一而平面的镜子，在这里，可以看看真的萧伯纳和各种人物自己的原形”^②。他们在交谈看法时共同觉得：“最好有人收集当天报刊的捧与骂，冷与热，把各方态度的文章剪辑下来，出成一书，以见同是一人，因立场不同则好坏随之而异地写照一番”。^③

这几天，瞿秋白与鲁迅总谈论着关于萧伯纳的话题。觉得见到这位幽默大师的人太少，而他的离去又太快，关于他的故事

①鲁迅《南腔北调集》P70。

②《萧伯纳在上海》写在前面，1933年3月野草书屋出版。

③许广平《鲁迅回忆录》

竟有这么多，不同的评论更是这样的离奇，尽快地汇集借重或歪曲这个“萧伯虎”（西洋唐伯虎）的种种文章印行成书，实在必要。谈着说着，有才气、办事敏捷的秋白，来了兴致。对鲁迅说道：“我们何不亲手来搞一下？”鲁迅点了点头，并向爱人看了看。许广平立即就兴奋地担任购买大小报的任务。她去北四川路一带书报摊，常常总是抱回来厚厚的一大叠。秋白与鲁迅商量后，圈定剪贴的文章。鲁迅则在总体编排上出些主意，具体的工作如翻译、剪贴则多是秋白偏劳。秋白笔译的速度够快的，还要忙剪贴、编辑。桌上、地板上都铺满要剪的报刊。秋白又是拿剪刀剪，又是用浆糊贴，忙得不亦乐乎。两位夫人：杨之华和许广平都帮忙剪的剪、贴的贴。于是秋白集中精力编辑、加注，作按语，很快辑成厚厚一册《萧伯纳在上海》。鲁迅为它写了序言，书署“乐雯”编译。“乐雯”这笔名由鲁迅笔名“隋洛文”衍生而来。秋白与鲁迅共用这笔名表明他们是这样的相知。鲁迅珍贵这合作的纪念，自费将此书交野草书屋于3月印好发行。从剪贴、编译、校对、出版、发行不足一月时间，这不仅对当时的出版事

①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似乎是讲17日当夜就编辑成《萧伯纳在上海》。“2月17日，”“归来已傍晚”，“鲁迅与秋白同志就觉得，”“把各方态度的文章剪辑下来，出成一书”。“于是由我跑到北四川路一带，各大小报摊都细细搜罗一番当天的报纸”，“连夜编辑，鲁迅写序，”“即市里所见《萧伯纳在上海》”。有的论著，如冒焯《瞿秋白研究》P206也讲：“2月17日，”“鲁迅与秋白连夜编辑成《萧伯纳在上海》”。但是，一、此书中辑录有2月18日《大晚报》、《字林西报》、《大陆报》、日文《上海日报》、日文上海《每日新闻》、《申报·自由谈》的文章，还有19日的日文上海《每日新闻》、俄文报《上海震报》的文章，甚至有21日《字林西报》的消息报导。二、有秋白为之写的《写在前面》，是22日写的。鲁迅为之作序，是28日。三、许广平在《欣慰的纪念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中讲她“跑了几次书摊，收集了几天内的中外报纸和杂志之类一大堆”。这几天内的书报，就不是17号当天的。由此可以推断“连夜编辑”，应是几天后的事。

业，而且对今日出版周期如此长的出版界，不能不说有“刺激”。

（三）心心相印，合作写了15篇杂文

在共同编辑《萧伯纳在上海》时，秋白与鲁迅首次合作写杂文：《〈大晚报〉的不凡和难堪》。此后一个短时期内，就接连协作写出了10多篇精美的杂文。为什么秋白与鲁迅第一篇合作的杂文，不是《王道诗话》，而是《〈大晚报〉的不凡和难堪》？这后面要详论。此处先进一步交待什么原因使他们在短期内留下这么多共同创作的精品。

就外部环境而言，第二次秋白在鲁迅家较长时间的避难，增强了两人相互的了解，消除棘地荆天两代人之间的隔膜。此后不久，鲁迅又为秋白安排了离鲁迅公寓近的安全住所，便于交谈切磋，共同构思。当然，搬迁也颇费周折。2月底，黄文容把秋白转移到中央局地下交通主任高文华家住。鲁迅为好友的离去而愁怅，也为秋白没有安定的住处而不安。他亲自多次奔走^①，为秋白夫妇找一处既秘密又靠近自己的住所。3月初，鲁迅通过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的夫人帮助，在施高塔路东照里12号寻到一处理想住所。这是日本人住宅里的一个亭子间，便于隐蔽。^②

①《鲁迅日记》1933年3月1日记载：“同内山夫人往东照里看屋。”3月3日日记中又写道：“晴，上午内山夫人来……午后往东照里看屋。”《鲁迅日记》下卷P822、823。

②许广平《鲁迅回忆录·瞿秋白与鲁迅》：“这‘屋’（其实只是一个亭子间）似乎是日本人租住的，所以要内山夫人陪去看，由他分出余屋租给中国人，而这人就是秋白同志他们。这比夹住在中国人堆里问长问短，查职业，看家底好得多了。鲁迅也为此稍稍放心，因此满意地租了下来。”

施高塔路靠北四川路底，即今山阴路，是热闹的北四川路的一个分支小马路，而东照里又是嵌在这小马路上的一条小里弄，它偏僻，行人稀少，进出安全。而且，它距在北四川路底的鲁迅公寓也不远，互相来往方便。3月四五日时，秋白夫妇就迁居在这隐秘的亭子间里。

意气相投的人，再近还觉路途远。年过半百的鲁迅，不管日夜的繁忙，挤出时间寻找更靠近秋白住处的寓所，^①不怕搬迁之苦，于4月11月把家搬到施高塔路大陆新村9号。跟秋白家只隔一条马路，路南路北，只一箭之遥。白天，鲁迅穿着长袍穿过马路登上秋白的亭子间；夜晚，秋白着短衫常到鲁迅家回访。他们在一起海阔天空，纵情长谈。那真是神交胜比邻！许广平回忆：

我们家搬到大陆新村之后，就过往更其频繁，有时晚间，秋白同志也来倾谈一番。老实说，我们感觉少不了这样的朋友。

杨之华回忆：

我们住在这里的时候，鲁迅几乎每天到东照里来看我们，和秋白谈论政治、时事、文艺各方面的事情，乐而忘返。我们见到他，象在海阔天空中吸着新鲜空气、享受着温暖的阳光一样。秋白一见鲁迅就立即改变了不爱说话的性情。两人边说边笑，有时哈哈大笑，驱走了象牢笼似的小亭子间里不自由的闷人气氛。我们舍不得鲁迅走。但他走了以后，

①《鲁迅日记》1933年3月8日记载：“下午至施高塔路一带看屋。”3月21日记下了鲁迅“决定居于大陆新村”。4月11日记载为：“是日迁居大陆新村新寓。”《鲁迅日记》下卷P 823、825、827。

②许广平《鲁迅回忆录·瞿秋白与鲁迅》，《忆秋白》P 278。

他的笑声、愉快和温暖还保留在我们的小亭子间里。他还经常留下一些书刊。这些都使秋白深感欣慰。①

在这样相对稳定、幽静的环境里，频繁的接触，会心的交谈，沟通了一致的人生看法、文笔志趣。这无疑是秋白与鲁迅共同构思创作杂文的重要外部条件。从内部来说，他们有着心灵的共鸣，有着共同的创作心理。话从上文杨之华讲到秋白“不爱说话的性情”说起，秋白青年时是比较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他第一次赴苏时，他剖析自己：“我生来就是一浪漫派，时时想超越范围，突进猛出，有一番惊愕歌泣之奇迹。”他宣称自己“是‘新时代’的活泼稚儿”。②1923年他归国，精神抖擞，朝气蓬勃，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之中。那四年左右，党内生活还比较正常，也是秋白政治生活中比较得意之时，他性情开朗，精力旺盛，话语不绝。直至许广平再次会见秋白，秋白演讲时头一扬，把掉下头发甩回去的动作、神态还历历在目。何时开始秋白性情变了呢？秋白第二次赴苏不久，1929年夏，秋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公开演讲中批评了王明等的宗派主义，在此之前还提出撤换支持王明的米夫职务的建议，因此他成为米夫、王明的眼中钉。在1929年下半年以及1930年春反对布哈林分子的清党运动中，秋白被撤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职务，他的妻子杨之华受到严重处分，他的弟弟瞿景白也突然从中山大学“失踪”，这事对他刺激很大。自此，他接二连三地遭到极左的打击，他只觉得“心中空无所有”，变得沉默寡言了。

鲁迅也深受“内斗”之苦。同一营垒的“革命文学家”有的对鲁迅进行人身攻击，什么鲁迅“看见旁人的努力他就妒忌，他

①杨之华《回忆秋白》P 135。

②瞿秋白《赤都心史》，《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P 219、213。

只是露出满口黄牙在那里冷笑”。^①有的诬栽鲁迅，什么鲁迅有“杀戮青年的主张”^②等等。鲁迅对同志射来的“冷箭”，“灯下独坐”，“倍觉凄清”。鲁迅当然能理解秋白心情的压抑、沉闷。或谈笑以驱走“闷人气氛”，或赠送素雅的堇花，以安慰孤寂心灵。最难忘的是鲁迅亲自送一盆堇花的情景。那时鲁迅还住北四川路底公寓。巍巍长者，着一双布鞋，双手捧着一盆堇花，走过长长一段路，东拐西弯，来到东照里12号，推开大门，登上一级一级楼梯，喘息未定，即行敲亭子间的门。秋白开门看到气喘吁吁的鲁迅和堇花一盆，心里象打翻了五味瓶，是甜、是苦、是酸辨不出，说不清。堇花点缀空旷的小屋，使小小亭子间充满生机。它是党外布尔塞维克，向在列宁故乡入党的马克思主义者捧出的一颗火热的心。阳光，温暖着凄苦的心；堇花开放在秋白的脸上。

厨川白村曾说：“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底”^③。在排解“内斗”心灵之苦中，秋白与鲁迅“一面经验着这样的苦闷，一面参与着悲惨的战斗，向人生的道路进行”。^④他们取得心灵的共鸣，产生强烈的创作冲动。鲁迅认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⑤秋白则认为“凡事

①见华汉、李一氓编的《流沙》第3期(1928年4月15日)上发表的《鲁迅在上海》。

②杜荃《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1928年8月《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杜荃，郭沫若的化名。

③1933年3月6日鲁迅日记：“下午访维宁，以堇花壹盆赠其夫人。”(《鲁迅日记》下卷P823。)秋白写文章曾用过“维”、“维嘉”、“维摩”等笔名。“维宁”是与鲁迅交往时常用别名之一，有时也作“惟宁”。许广平讲赠堇花“是含有祝贺新居之意的，这堇花是3月3日内山夫人送来，鲁迅以之‘借花敬佛’的”。见《鲁迅回忆录·瞿秋白与鲁迅》。

④⑤《鲁迅全集》第13卷：《苦闷的象征》。

⑥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4卷P182。

彻底都好，而‘透底’就不见得高明。因为连续的向左转，结果却碰见了向右转的朋友，那时候彼此点头会意，脸上会耍辣辣的”。……一个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一位是博学多才的党的早期领袖，他们都有深邃博大的思想，一如滚滚长江，一似滔滔黄河，江河汇合，更加汹涌澎湃。他们合作的15篇杂文好比黄河、长江奔腾而出。

目前，学术界较多的认为秋白与鲁迅合作的杂文为14篇^②。怎么又多了一篇？这新多出来的是哪一篇？这新多出的一篇为前文提到的《〈大晚报〉的不凡和难堪》。它应是秋白与鲁迅首次合作的杂文。为何这样说呢？其一，该文表达了秋白与鲁迅对萧伯纳共同的想法。在《颂萧》一文中，鲁迅正面肯定萧伯纳的“伟大”。在此文中，则反驳《大晚报》“一笔勾消萧的伟大”，又正面说“至于可恶可怪的萧——他的伟大，却没有因为这些人

①《透底》，1933年4月19日《申报·自由谈》。

②陈铁健等同志认为秋白与鲁迅合作杂文为14篇。也有相当的著作，学者认为是12篇。鲁迅作品注，一般注合作杂文为12篇。如，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的《南腔北调集》P85中的“注”即如此。又如，林志浩《鲁迅传》P372：“大约从三月五日到十月二十五日，瞿秋白……或自己构思，或同鲁迅交谈，形成主题，写成政治上犀利、艺术上成熟的杂文十二篇。”（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王铁仙同志说：“瞿秋白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以后写的杂文共有十四篇，其中《〈子夜〉和国货年》和《儿时》也署鲁迅的笔名，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但未经鲁迅修改，鲁迅以后也未收入自己的集子，并且笔法确不同于鲁迅杂文，故不计入。”他认为是12篇。

也有认为他们合作杂文是13篇。或把《〈子夜〉和国货年》作书评，而排除出杂文之外，或以《儿时》与鲁迅笔调不象，排除在外。

还有认为他们“协作撰写杂文”“十篇”。（吴中杰《鲁迅传略》P272：—273，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这显然有误差。

‘受着难堪’，就缩小了些”。^①为什么这些人认为萧伯纳可恶呢？文中说：这是“卑劣的资产阶级心理，以为给了你‘百万家财’，给了你世界的大名，你还要背叛……萧伯纳不在这种卑劣心理的意料之中，所以可恶之至。”^②鲁迅也是这样看的：萧伯纳“他有钱，他偏讲社会主义……他偏讲革命，他偏谈苏联，他偏不给人舒服……于是乎可恶。”^③其二，该篇文笔犀利，好用反语，冷嘲热讽，这是典型的鲁迅笔法。有些词语诸如“可恶之至”、“呜呼！”更像鲁迅用语。其三，鲁迅改了题目，收入自己作品。在〔又招恼了大主笔〕下，附《大晚报》社论：《萧伯纳究竟不凡》，作为自己《颂萧》正文的第二部分。第三部分是在〔也不佩服大主笔〕题目下，用“前文的案语”，将秋白执笔写的此文作为第三部分。鲁迅将这篇文章收入《伪自由书》，如同《曲的解放》等篇一样，把它看作自己的作品。其四，这篇署名秋白用了他们共同合作编辑《萧伯纳在上海》时的笔名“乐雯”^④。其五，《大晚报》的《萧伯纳究竟不凡》中除攻击萧伯纳外，还有对鲁迅的讽刺：“一代文豪也确定了他的伟大”，“萧先生可别小看了这老大的中国，象你老先生这样时髦的学者，我们何尝没有。坐在安乐椅里发着尖刺的冷箭来宣传什么主义的，不须先生指教，戏法已耍得十分纯熟了。我想先生知道了，一定要莞尔而笑曰：‘我道不孤！’”而乐雯所作“前文的案语”，没有明显为鲁迅正名。这

①②《〈大晚报〉的不同和难堪》，《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P 326、329、328、329。

③鲁迅《谁的矛盾》，《南腔北调集》P 65。

④1930年2月，鲁迅签名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以“堕落文人”为名，呈请通缉鲁迅。对这卑劣伎俩，鲁迅即以“堕落文”的笔名表示抗议和嘲笑。由此而衍生出“洛文”、“乐文”等笔名，又谐声为“乐雯”。

也反证了此文并非仅是秋白所作，而是代表了两人的。

这些合作的杂文，有些是秋白“在他和鲁迅见面的时候，就把他想到的腹稿讲出来，经过两人交换意见，有时修改补充或变换内容，然后由他执笔写出”。有些则是“写好后才交换阅读，他可能同鲁迅一起切磋，也可能在个别字句上彼此提供一些意见”。这些文章用鲁迅的笔名，由鲁迅当作自己的文章寄出发表，它们是两人友谊的结晶，计有：

2月中下旬，〈〈大晚报〉的不凡和难堪〉。3月5日，〈王道诗话〉。3月7日，〈苦闷的答复〉（发表时改题为〈伸冤〉）。3月9日，〈曲的解放〉。3月10日，〈〈子夜〉和国货年〉^③。4月11日，

①许广平《鲁迅回忆录·瞿秋白与鲁迅》，《忆秋白》P 279。

②杨之华《致茅演义》未刊稿，见《鲁迅与瞿秋白》P 88，天津人民出版社。

③1953年版，1986年版《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都将此文收入“文艺杂著”（续辑）内，与其他合作杂文放在一起。只是1982年版的《瞿秋白诗文选》把它排出，列入“评论”辑中。这是篇书评，对茅盾“成功的”“写实主义”小说《子夜》作了肯定。但它不同于一般的文艺评论，不乏借题发挥的杂文文笔，如：“国货年呢，恐怕除出做《子夜》的滑稽陪衬以外，丝毫也没有别的用处！——本来，这是‘子夜’，暄红的朝日没有照遍全中国的时候，那里会有什么真正的国货年”。另外，此文署的是秋白与鲁迅协作编辑《萧伯纳在上海》的笔名“乐雯”。鲁迅修改近50处，重新抄过寄出，发表在1933年4月2日和3日的《申报·自由谈》上。不少修改之处，更显出鲁迅文笔的含蓄、尖锐。如将“国货大王在睡梦里也不能够安宁，时常梦见工人的‘烧厂’，推翻他的宝座”中的“不能”，改为“没有一刻”，把“的‘烧厂’”，圈掉。这样就更形象、含蓄。又如，把“空谈的大学教授，吃利息的高尚诗人，这只是一些社会的渣滓。”中第二分句的逗号改为问号，第三分句删去，改为：“宝剑和铁腕？”这样，“直”改为“曲”，文笔更冷隽些。综上所述，还是把它作为合作的杂文为宜。冒忻《瞿秋白研究》P 81、82：“鲁迅还把其中的13篇编进自己的杂文集中去。”包括了这篇。查，鲁迅杂文集未收入此篇，什么原因，这下文将论及。（以上引文中着重号均为笔者所加。）

《关于女人》、《真假堂·吉河德》^①、《内外》、《透底》。4月24日，《人才易得》(发表时改题为《大观园的人才》)。9月28日，《儿时》^②。10月25日，《中国文与中国人》。

(四)合作的杂文是与鲁迅杂文同一类型而又有独特风格的

“瞿秋白同志的杂文是和鲁迅的杂文同一类型而具有自己独立的风格和光芒的创作。”^③秋白与鲁迅合作的15篇杂文具有这样的特色。

1. 同一类型

大千世界，大至宇宙星系之间，小至原子运动的形式，都有相似之处。如参天的松柏与水边的藻类，都有相似的叶绿素。

①秋白原题写作《真假董吉河德》。

②此文鲁迅寄出前曾稍作修改，改了一个字，一个标点：将秋白原文中“感觉到‘中午’以后的衰退”的“到”，改为“得”字；把“大众的事业是不死的，”中的逗号，改为句号。还署上鲁迅的笔名“子明”。鲁迅1934年1月17日致《申报·自由谈》编辑黎烈文信“把《儿时》作自己的杂文，‘无聊文又成两篇，今呈上。《儿时》一类之文，因近来心粗气浮，颇不易为，一涉笔，终不免含有芒刺，真是如何好。”(《鲁迅书信集》上卷p481，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鲁迅说“一涉笔”，“不免含有芒刺”，是指“此次偶一不慎，复碰着盛宫保家婿”。(同上p481)“盛宫保家婿”即号称美男子的邵洵美。鲁迅曾说，“邵洵美之徒……吃完许多米肉，搽了许多雪花膏之后，就什么也不留一点给未来的人们的。”(《鲁迅书信集》上卷p477。)这与《儿时》中“‘浮生如梦’的人，从这世界里拿去的很多，而给这世界的却很少”，意思相近。这可以理解鲁迅给黎烈文信中也承认此文有自己的笔调。据此，可把《儿时》作为秋白与鲁迅合作的杂文。然而，鲁迅终未将此文收入自己的文集，这下文将详述。

③《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文学编”说明》Ⅱ。

颇为有趣的是，他们合作的由秋白执笔的杂文，与鲁迅的杂文有惊人的近似。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不了解真情的人们，都把它们误认为鲁迅之作。例如，1933年秋白在《透底》中写道：“反对八股是应该的。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这样的八股，无论新旧，都在扫荡之列。”：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讲演，把“新八股”称作洋八股，说：“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②

从宏观来看，这合作的由秋白执笔的杂文，与鲁迅杂文有哪些方面相近似呢？第一，都是战斗的“阜利通”。鲁迅的杂文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秋白也把杂文作为精悍而灵便的战斗武器。1933年3月12日，国民党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对记者说：“日军所至，抵抗随之”。两天后，秋白执笔写了《迎头经》③，一针见血指出“迎头经”就是“逃跑经”。“日军到沈阳，迎头赶上北平”。这就是宋院长所说“抵抗随之”。即“我的‘抵抗’只是随日军之所至，你要换个样子抵抗，我就抵抗你”。而国民党当局的“勿后跟”，是“日军退守租界的时候，就要‘严飭所部切勿越租界一步’”，是“惶惶大军，迎头而奔，‘啞啞’小民，勿向后跟”，④深刻暴露其“抵抗”乃是一派谎言。这与鲁迅早于此文写的《观斗》、《航空救国三愿》⑤，迟于它的《文章与题目》⑥，在迅速而传神地勾画对外不抵抗，对内抵抗抵抗者的脸谱上，确有异

①瞿秋白《透底》，《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p75。

②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一卷本）P787，人民出版社出版，1967年11月改排袖珍本。

③《迎头经》，秋白写于1933年3月14日，由鲁迅署名何家干，发表在1933年3月19日《申报·自由谈》上。④《迎头经》，《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P58—59。

⑤《观斗》，鲁迅写于1933年1月24日；《航空救国三愿》，鲁迅写于1933年2月3日。

⑥《文章与题目》，原题为《安内与攘外》，鲁迅写于1933年4月29日，本篇及⑤中两篇均见《伪自由书》。

曲同工之妙。此外，《王道诗话》鞭挞了胡适的“人权论”，《大观园的人才》讽刺反动政客吴稚晖和政治娼妓汪精卫，《关于女人》则是对“奢侈和淫靡”、“买淫”与“卖淫”等社会“腐化现象”的“曝光”，《最艺术的国家》剖析“两面光滑”左右逢源乃是中庸之道，《透底》揭示了“透底之至”思维方式的人必然走向反面。这些显示了作者对旧中国、旧道德、旧文化、旧风俗、旧思想强烈的进攻态度、战斗的批判精神。因此，“这些杂文，可以和鲁迅的杂文比拟，是由于它们乃是作为袭击人民敌人的利刃而创作出来，在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上完成过极迫切的批判、讽刺和攻击的任务，同时它们是足以为今天的杂文作者的示范的缘故”。^①

第二，都注意描述、剖析类型形象。鲁迅“砭锢弊常取类型”^②。秋白在执笔写这些杂文时，亦注意选取有代表性的类型。在《人才易得》里，秋白只寥寥几笔：“老气横秋的大‘放’一通，直到裤子后穿而后止。”^③就把张口就是“放屁”、“放屁”的吴稚晖活脱脱勾勒出来。一句话：“当时指着手无寸铁或者已经缴械的小百姓，大喊‘杀，杀，杀！’那呼声是多么雄壮呵。”^④就剖析出吴稚晖是个坚决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客。带头上书呈请“清党”的是他，通电反共的还是他。写的是一个“骂山门”的“吴老老”，揭露的却是一类“党国元老”死心塌地反共的嘴脸。此外，此文把汪精卫比作“玩笑旦”，是“打情骂俏”的政治娼妓，高唱“又战又和”调调，不正代表国民党反动派中另一类人物吗？在《出卖灵魂的秘诀》中，秋白写“胡适博士对症发药”，请“日本朋友”，“征服中国民族的心”。^⑤则刻划出那一类无耻文人献媚的“社会相”。这些自然使人联想到鲁迅《新药》，成为“药渣”的那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文学编”说明》Ⅲ。

②鲁迅《伪自由书·前记》P3。

③④《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P85。⑤同③P61—62。

位“党国的元老吴先生”，“现在”出卖“复药”了。^①联想到鲁迅的《言论自由的界限》，献媚的“新月社诸君子”小骂大帮忙，不料“来了一嘴的马粪”^②。他们的杂文都展现了“这一类”人的“社会相”，“直接写的是一个，概括进去的是一群”，揭示出“这一类”人的某一本质特征，勾勒出“现代社会的魂魄”。

第三，都运用了多样的形式、多种文笔。鲁迅的杂文够“杂”的了，秋白更充分发挥了杂文“杂交性”、“边缘性”的特点，执笔写的合作杂文，形式多样，百态纷呈。有短论《透底》；有时评《苦闷的答复》；有杂感《出卖灵魂的秘诀》；有书评式随笔《〈子夜〉和国货年》；有含有“理趣”的小品：《最艺术的国家》；有“集束手榴弹式”的杂文《内外》；有“经传注疏式”的杂文《迎头经》；有杂剧短曲式的杂文《曲的解放》；有抒情散文《儿时》；有诗化杂文《王道诗话》；有深含寓意的杂文《真假董吉诃德》等。鲁迅是大手笔，笔调多样。时而怒目金刚，掷出投枪；时而以小喻大，因著显微；时而深情委婉，饱含诗情。博学多才的秋白，更是多种笔墨。或直截了当，要言不烦；或广征博引，发人深省；或粗笔勾勒，痛快淋漓；或寸铁杀人，一刀见血；或亦庄亦谐，奇趣横生；或巨刃摩天，所向披靡。他们都达到“嬉笑怒骂，皆成文章”^③的境地。

就微观而论，亦很近似，以《王道诗话》为例。这是他们合作的第二篇杂文。秋白在鲁迅家避难时，他们在一起回顾所走过的道路，发现在前进的道路上，有的落伍、后退，有的甚至背叛，胡

①鲁迅《伪自由书》P105—106。②同①P99，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③原文出自黄庭坚《东坡先生真赞》，鲁迅在《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中引用：“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用热骂，而且要‘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着重号笔者所加）”。

适不就是这么一个么。“五四”新文学的浪潮中，他提倡白话文，也曾摇摆过文学改革之旗。“五四”不久，迅速从新文化运动中分化出去，走向反面，先是向北洋军阀献媚，继而投靠新军阀蒋介石，跪倒在“洋主子”脚下。在回顾战斗历程，谈论人生之路，探讨是追求名声、权欲还是“实用主义”使胡适如此堕落时，秋白气愤地谈到：胡适对英文《字林西报》记者发表谈话，竟然指责北平狱中政治犯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信系“伪造”，犯人生活自由，没有过严刑拷打的非人生活，还表示不再讲“人民的权利”，而要坚决拥护“政府的权利”。①听到此，鲁迅拍案而起：“什么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主席？开除这个败类！”②没过几天，秋

①唐天然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书中，发现一篇瞿秋白的《字林西报》的摘译稿：《〈字林西报〉之北京通信》，原文小标题为“伪造的监狱书信——并未证实的事件——严刑拷打说毫无根据”。此文是该报记者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盟执委会主席胡适的综合报导，登在该报1933年2月21日上。1月10日，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的政治犯，致函中国民权同盟，控诉狱中非人生活。1月30日该盟总干事杨铨和分盟主席胡适一起参观国民党陆军监狱。杨铨看后揭露狱中黑暗，而胡适对《字林西报》记者发表谈话，否认狱中有施用酷刑事实。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由陈漱渝、陶沂编，1979年12月出版。书中还有周丽亚译的全文，题目改为《〈字林西报〉记者关于胡适为政治犯问题发表的谈话报导》。

②1933年3月3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中央研究院开会，决议开除胡适。查《鲁迅日记》，1933年3月3日鲁迅写道：“下午……往中央研究院”。按：鲁迅为该盟的上海分盟执行委员，也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领导成员。往中央研究院，正是参加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根据原上海分盟执行委员胡愈之同志于1960年回忆：“提议开除胡适的正是鲁迅。”

白挥笔写下《王道诗话》，鲁迅只作少许修改，由许广平抄写后，用鲁迅的笔名“干”，发表在1933年3月6日《申报·自由谈》上。它跟鲁迅大量讽刺性杂文十分相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战斗性强。鲁迅的杂文是政治的匕首，这篇杂文则可称之为射向蒋介石麾下御用学者的“乱弹”。1933年3月21日，《字林西报》载文披露胡适鼓吹国民党政府要行使“镇压”之“权利”：“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利”。不到半月，秋白执笔揭露胡适“人权抛却说王权”，“王权”即“党国”之屠戮权、镇压权；抨击胡适这个“能言鹦鹉”搞欺骗与镇压的两手，真是“毒于蛇”。鲁迅见着这样的诗句妙文，尽管他惯于幽默而平时严肃，这次却禁不住哈哈笑了起来，连连称赞，真乃“机关枪的乱弹”。

二是刻画“社会相”。文中勾画胡适卖身投靠国民党当局，“刻露而尽相”，“并写两面，使之相形”。象文中“胡博士到长沙去讲演一次，何将军就送了五千元程仪。价钱不算小。这大概就叫做‘实验主义’”，^②便收到上文说的效应。写的是“文化班头”胡适“社会相”，显现的是反动派御用学者的“本质相”。胡适去长沙讲一次“人权论”，当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阀何健赏大洋“五千元”，资产阶级反动学者俯首屈膝，还不都是因为钱而软了膝盖骨吗？

三是笔法婉曲。鲁迅好用曲笔。这篇杂文寄直于曲，文笔含蓄。把它与一年前秋白写的《鹦哥儿》加以比较，就可发现这一特色，这两篇杂文都因胡适为《人权论集》作序而引发的，都从周栎园所说“鹦鹉救火”^③谈起，但两篇笔法有明显不同。《鹦

①②《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 P48—50。

③周栎园，由明入清的学者，著有《栎园书影》，“鹦鹉救火”引自该书第2卷。

哥儿》先讲“鸚鵡救火”是胡适“整理国故”的“新发见”，接着讲“现在的鸚哥儿都会救火了”，例如，普法战争中资产阶级的“救火”。而后加以类比：“中国的鸚哥儿现在也学着法国资产阶级：也牺牲了自己的‘人权’论的政见，也主张来这么一个国防政府。”^①后面又讲鸚哥儿还不如兔儿爷会骗人。这样写铺得较开，也太直。而《王道诗话》一下就切人要害：“鸚鵡会救火，人权可以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②而后插入胡适去讲一次人权，得“五千元”，文笔曲折，比前一篇“你们的‘人权’‘自由’……还要骗谁呢？”含蓄得多。接着由“人权论”转到“政府权”，再转而至“王道论”，一层层深入，最后以孟夫子吃肉而又“远庖厨”作结，蕴含深意。诗话“文化班头博士衔”，“人权王道两翻新”，更是“点睛”之笔，微言中见精义。

四是文笔辛辣。鲁迅曾说：“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这篇杂文的语言亦很锋利。如“博士的头脑并不简单，他不至于只说‘一手拿着宝剑，一只手拿着经典’！如什么主义之类。他是说，还应当拿着法律。”^③这里岂止是写出胡适博士的“头脑并不简单”，而是“显示人的灵魂的深”。“博士”之类的词、“什么主义之类”的用语，幽默、讽刺，使人想到鲁迅《知难行难》中的“博士”、“胡适之博士”，想到鲁迅《好政府主义》中的“如石膏，肉桂之类”的用语，想到鲁迅《“光明所到……”》中对胡适的冷嘲热讽：“胡适博士……他就是‘光明’……呜呼，光明只跟着‘光明’走，监狱里的光明世界真是暂时得很！”^④

五是饱含诗味。鲁迅的杂文是议论的诗。秋白执笔的这篇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 P387—388。

②《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 P48。

③同② P49。

④鲁迅《伪自由书》P53。

他们合作的杂文，更洋溢着诗情。文末四首律诗，提携全篇，深化主题。使全文于严整中见情趣，于平直中见波澜。使之成为诗话式杂文。文末第二首诗的最后一句：“杀人如草不闻声”，出自明朝诗人沈明臣《凯歌》。鲁迅在《“醉眼”中的朦胧》中也引用过：“知道人道主义不彻底了，但当‘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时候，连人道主义式的抗争也没有。”^①秋白在《王道诗话》中引用此句，再配上“虐政何妨援律例”。更有深意，显得凝炼而又有神韵。文末第二首诗的首句：“人权王道两翻新”。这在鲁迅作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中第2节，也有诗化的议论：“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象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②

其他各篇亦是如此，既有秋白那种尖锐泼辣的特色，又有鲁迅那样并不剑拔弩张却能一剑击中的文风。即使象《儿时》这样反映秋白“个性”的杂文，亦可寻到它与鲁迅杂文相似之处。相当一些论者，甚至象许广平同志都认为《儿时》“笔调不象”鲁迅的^③。问题是把它放在鲁迅杂文哪一种系列里比较。如果把它跟鲁迅暴露性系列杂文比较，自然感到文笔不象。但如将它跟鲁迅写的为数不多的歌颂性杂文相比，如《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祝中俄文字之交》、《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题未定草(9)》等；或是将它跟鲁迅的诗化散文，如《为俄国歌舞团》、《长城》、《生命的路》对比；或是把它跟鲁迅的散文化的诗，如《风筝》、《秋夜》对比，又觉得笔法也相象，放入这些系

①鲁迅《三闲集》。《“醉眼”中的朦胧》写于1928年2月23日，最初发表于1928年3月12日《语丝》第4卷第11期。

②鲁迅《且介亭杂文》P 6，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此文1934年3月发表。

③许广平说，“颇致疑于这一篇短文，（按：指《儿时》）理由是笔调不象，而瞿秋白又常借用先生的笔名。”

列也还和谐。所以，唐弢把这篇《儿时》作为佚文辑入《鲁迅全集补遗》。

2. 独具特色

世上树叶成千上万，但绝不会有两片绝对相同的树叶。由秋白执笔他们合作的15篇杂文，跟鲁迅的杂文有着相似性。但是相似不等于相同^①。一些论著把它们完全等同起来，称之为“都是匕首和投枪”。其实，这些杂文还具有秋白自己独特的风格。表现为：之一，秋白杂文有通达晓畅、峻急明快的特色。鲁迅比秋白年长，饱经风霜，知人论世更深刻，文笔深沉。同时敌人的“围剿”，友人的“冷箭”等因素，使鲁迅好用“曲笔”，亦正亦反，亦庄亦谐，有时不免晦涩。秋白在20年代中期就是党的杰出理论家，写的大都是政治性论文，是对工农大众宣传、鼓动的，需要旗帜鲜明，有言必尽，直透人心。他曾说“革命作家总是公开地表示他们和社会斗争的联系”，加上他自己坦率的性格特

①唐弢把《儿时》编入《鲁迅全集补遗》时，认为“先生（按，指鲁迅）既不否认是他自己的作品，并且说明这是在另一种心境下写的。其实这样的笔调也并不少见，《准风月谈》里的《夜颂》和《秋夜纪游》，就都是的。先生好定庵诗，这一篇从所引诗意出发，以深思的笔调，写坚定的意志，反复申诤，充满诗意，非先生实不能达此境界的。”（唐弢《编后记》）

另外，《儿时》的心灵独白，与鲁迅的独白式的袒露内心相通，文中所说把“生命溶化在大众的里面”、“天天在为这世界干些什么”跟鲁迅文中讲的“革命的爱在大众”、“随时为大家想想”相沟通。至于“大众的事业”这些词语，在鲁迅的《门外文谈》中也有。因此，从微观上看，此文与鲁迅一些杂文也相似。

②对秋白与鲁迅杂文的“等同论”的异议，王铁仙曾有专文论说，见1981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增刊，王铁仙《鲁迅瞿秋白杂文异同论》。

点，因而，他写杂文常急切提出见解，直言不讳，条分缕析，痛快淋漓。鲁迅曾说：“何苦（按：秋白的别名之一）的文章，明白畅晓，是真可佩服的！”^①但是，从另一面来看，秋白杂文缺乏鲁迅的“深沉”。这可从秋白原稿与鲁迅改动后文稿对比中看出。例如，《出卖灵魂的秘诀》秋白的原文是：“胡博士对症下药——预备向日本帝国主义上条陈。”鲁迅将“日本帝国主义”改成“日本朋友”。这一改，就含蓄多了，既幽默又深沉。鲁迅“他也表示过秋白同志的杂文深刻性不够、少含蓄、第二遍读起来就有‘一览无余’的感觉”。^②

之二，秋白的杂文有笔力豪骋、热情奔放的特色。鲁迅眼前常依稀浮动着革命者的血，心中积满愤怒和悲哀。他的杂文基调是冷峻，那冷冽犹如匕首四射的寒光，那严峻好似斗士临战凛然的神色。秋白在20年代后期，作为党的领袖，叱咤风云，激昂文字，如同“惊天动地的霹雳”，又似万马奔腾的战鼓。如果说鲁迅的杂文是挖心的匕首，那秋白的杂文则是“反抗束缚的乱谈”、“乱弹”。^③例如，秋白写的这段议论：“就象要自由的人，忽然要保障复辟的自由，或者屠杀大众的自由——透底是透底的了，却连自由本身都漏掉了，原来只剩了通体透明一丝不挂。”^④这是何等的淋漓尽致，何等的汪洋气势。鲁迅将《人才易得》改题为《大观园的人才》，寄直于曲，寓有国民党政府如戏台之意，既幽默又严峻。这反映了他们不同的创作个性。秋白爽直、明快、热烈，有一定的积极浪漫主义色彩。鲁迅则是深沉、冷峻的

①②冯雪峰《回忆鲁迅》P 130。

③瞿秋白《乱弹（代序）》，《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P 347、350。

④《透底》，《瞿秋白诗文集》P 401。鲁迅发表时，将“就象”删去，“都”改为“也”字，把“了通体透明一丝不挂”删去，改为“得一个无底洞”。

现实主义创作风格。

之三，秋白的杂文又具有高尔基诗与政论相结合的特色。早在20年代初，秋白就翻译了高尔基的《海燕》^①，高尔基散文的战斗诗意，影响过秋白。30年代初，秋白翻译了《高尔基论文选集》、《高尔基创作选集》，无疑更直接对秋白杂文写作产生影响。高尔基曾说：“无产阶级文学”“要用文艺的方式造成现实主义的叙事诗的艺术”。他的论文就是诗与政论的结合。秋白的杂文也有这样的特色。如：

中国的这些“人”，在《子夜》里，大半还在“狗”的愚弄，欺骗，压迫之下，然而他们已经在奋斗，在抵抗。……

大众的斗争虽然还没有打倒那些洋货的国货的种种大王，然而已经象潮水似的涌上来。尤其是《子夜》所写的那时候，是有一阵汹涌的浪潮，后来才暂时退了些。这种浪潮时时刻刻激动着，从这里推到那里，即使有些起落，而冲破一切的前途是明显的。

这政论式的言语充满信心的力量，洋溢着战斗的气息。那激情似喷发的火山，那诗情如汹涌的潮水。

自然，鲁迅杂文中也有诗意，也有热情。但那是热得发冷的情感，“冷压”的诗意，于“无情”中见情——毕竟鲁迅的道路更为曲折，阅历更深。而秋白30刚出头，勤于哲理性思考，有理论

①瞿独伊：“我在清理母亲保存下来的父亲遗作的抄件中，意外地发现了《海燕》译文的另一手稿——《暴风鸟的歌》。”“很可能是秋白同志二三年从苏俄归国以前的早期译作。”见《暴风鸟的歌》，1982年第4期《新文学史料》。《海燕》曾影响秋白的《暴风雨之前》等作品。

②高尔基《冷淡》，《高尔基论文选集》，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5卷P582，1987年版。

③《子夜》和国货年》，《瞿秋白诗文选》P459。

家的雄辩；生性敏于感受，有浪漫气质，性格直率。他直接在文中诉说自己的“心事”，吐露自己的愤怒、憎恶或是赞美，并且有着浓郁的诗情，逼人的气势。读秋白的杂文，眼前似乎出现秋白卓越鼓动家的面影，心情无法平静。

丁景唐与王保林曾指出：“《儿时》是一篇最具有秋白‘个性’的杂文。”^①的确如此，它最能反映秋白杂文独特的风格。且看下面一段文字：

本来，生命只有一次，对于谁都是宝贵的。但是，假使他的生命溶化在大众的里面，假使他天天在为这世界干些什么，那末，他总在生长，虽然衰老老死仍旧是逃避不了，然而他的事业——大众的事业是不死的，他会领略到“永久的青年”。^②

这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崇高心灵的独白，是革命人生观的文学阐述，字里行间洋溢深情。这种感情的吐露是直抒心胸，激情外溢。区别于性格内向的鲁迅的文字表达方式。鲁迅行文含蓄、浑厚。秋白用语平实、通俗、流畅。不象鲁迅那样常用曲笔，文言词语较多，而是“平民语言”，大众看得懂。看了之后，又为秋白真挚的感情、高尚的情操而激动。

这篇抒情杂文还流露了秋白身处逆境，那种淡淡的哀愁，那种不能前进时的烦恼、迷惘：

“生命没有寄托的人，青年时代和‘儿时’对他格外宝贵。……感觉到‘中年’以后的衰退。

“每一个人的脸都已经看厌了。……我于是想念‘儿时’，
“不能够前进的时候，就愿意退后几步，替自己恢复已

①丁景唐、王保林《读瞿秋白和鲁迅合作的杂文——〈儿时〉》，新疆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

②《儿时》，《瞿秋白诗文选》P405。

经走过的前途。”^①

为什么想念“儿时”？是因为感到“中年”以后的衰退，看够这一张张讨厌的脸；是因为前进之路不通畅。怎么不通畅呢？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等将秋白开除出政治局，就未正式分配给他工作，他主动在文化战线做些工作亦受打击。1933年第五次反“围剿”前夕，秋白用狄康笔名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上，发表近20篇短文，揭露蒋介石对苏区“围剿”策略上的改变及其罪恶目的，提醒党的决策者注意。带来的却是王明等对他进一步的摧残、打击。1933年9月22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错误的决定》，在全党对他开展无情的批判。杨之华回忆秋白当时痛苦的心境：

秋白当时的处境真可谓“内忧外患”集于一身：外有严重的白色恐怖的威胁，生活很不安定；内受宗派主义者的打击，身体又患很重的肺病，衰弱得很。在这种情况下，秋白……念念不忘的“伟大的目的”，就是争取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②

在这样逆境里，感到“中年”以后的“衰退”，生命的“停止”，想念无忧无虑的“儿时”，这是可以理解的。于是，有诗人气质的秋白，在错误《决定》下达的第6天即9月28日，用抒情的笔调曲折地表达自己抑郁的情思。然而，秋白心底有着“伟大的目的”、“伟大的理想”，理想的力量战胜心灵一角的衰退、怠倦、疲乏的情绪。秋白在文末写道：“过去的始终过去了，未来的还是未来。究竟感慨些什么——我问自己。”^③至此，我们仿佛看见受“自己人”打击的人，心情沉重，却拖着疲惫的身子，昂然向

①《儿时》，《瞿秋白诗文选》P405—406。

②杨之华《回忆秋白》P95。

③同①P406。

前的身影。这人物、这情绪多么象《野草·希望》中的“我”，象《野草·过客》中的那位“息不下”、“脚已经走破了”的“过客”。

鲁迅的《野草》写于20年代，并且鲁迅在《野草·题辞》中说：“去吧，野草，连着我的题辞！”^①这表明鲁迅对苦闷、颓唐……的告别。30年代，鲁迅再也没有写过《野草》这种类型的作品。或许，这就是鲁迅未将此篇收入自己的文集的原因吧。

出于类似的原因，鲁迅没有把《子夜》和《国货年》收入自己的杂文集。看下面的文字：

明明还只是子夜，而居然以为天已经大亮了，甚至于太阳又要落山了，于是拼命的赶路，唯恐怕夜再来之后，就永久不是天日了。这当然不是个个人都这么想。这只是冲在大众前面的一些人。^②

这里，秋白襟怀坦白，对自己过去“左”的估计形势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也是再次告诫人们警惕“左”倾盲动主义。这种感受、这类文笔是秋白独有的。鲁迅不仅不会认为“天已经大亮”，而且，早对“黎明之前”、“革命高潮”之说提了批评。在1928年4月，鲁迅就写了《太平歌诀》和《铲共大观》，指出南京市民对革命者的冷漠；长沙市民对革命更麻木，他们拥挤着去看“共魁郭亮之首级”——郭亮是湘鄂赣边区特委书记，他被杀害时正是秋白担任中央领导，搞“左”倾盲动主义的时候。鲁迅告诫革命者说，“市民们是这样的市民”，以为现在是“黎明之前”，为时过早。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这些杂文还体现了秋白杂文独特的风格，跟鲁迅杂文是有区别的。但是，这不能得出秋白杂文与鲁

①鲁迅《〈野草〉题辞》，《鲁迅小说诗歌散文选》P198，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②《瞿秋白诗文选》P459。

迅杂文“有某种高下之分”^①的结论。当然，也不能将他们的杂文等同起来^②。王铁仙同志曾把鲁迅杂文比喻为“汪洋浩瀚的大海”，“如海洋般地博大，深沉，雄浑，不可穷尽”。把秋白的杂文比方为“如同湍急奔泻的一道山涧、清流，一泓清澈见底的池水碧波”。^③这形象比方正说明秋白、鲁迅对杂文创作、杂文的发展都有各自的贡献，他们的杂文各具特色，各有千秋。

他们的杂文有区别，这“异”是“同”中之异。“同”是主要的。那么，他们的杂文为什么如此相似呢？为什么棘地荆天两代人相处又如此融洽呢？这是因为：

他们的出身、道路和理想相同。都出身于“士”的家庭，并背叛了它，共同走过一条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道路；他们都是革命家、思想家，有着共同的革命理想、人生追求，思想博大精深，合作创作中比较容易形成深刻而一致的见解。

他们都是“将”、“帅”，一为思想界的主帅，一为文化革命的主将。又都饱受“内斗”之苦，一见面就结成神交，文笔战场，配合默契。

他们都是领袖群伦的大手笔，又有大体相当的文化素养。鲁迅从诸子散文到明代“公安派”散文，从罗隐的《谗书》到皮日

①③王铁仙《鲁迅瞿秋白杂文异同论》，《华东师大学报》1981年第4期增刊P27。王铁仙同志在这篇论文中，通过比方把鲁迅、秋白杂文作了区别，并说：“在这种区别中，如果含有某种高下之分，我以为也是不必回避的。”

②曹子西《瞿秋白文学活动纪略》P159：“瞿秋白和鲁迅的杂文不只在思想内容的深刻性和明确性上，就是在表现形式的广泛、灵活和多样性上，也都是可以互相媲美的。”（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修订版）王尔龄《论瞿秋白的杂文》：“就杂文而论，鲁迅、瞿秋白无疑是双峰插云的一代文宗。”“并驾齐驱。”见《人民日报》1985年8月12日第7版。

体的《皮子文藪》、陆龟蒙的《笠泽》丛书，到屠格涅夫的《散文诗》，能鉴古取今，融合中外，形成鲁迅的文笔风格。秋白学识渊博，诗文古词，根底甚深。从唐诗宋词到清代“今文经学派”，从老庄散文到佛经《大乘起信论》，到高尔基的《鹰之歌》、《海燕》以及《市侩》等政论、到希腊希伯莱文化，贯通中西，才华横溢。这样，他们才有相似的文艺志趣，而秋白模仿鲁迅笔法才有可能，使得他们的杂文相似。

他们都无私，主动相知。为了战斗的需要，为了作品的发表，秋白有意模仿鲁迅的文笔，并用鲁迅的笔名由鲁迅寄出。鲁迅为了秋白的安全，始终没有说出这些杂文的执笔者，并不怕掠美之嫌，把13篇杂文收入自己的杂文集，没有无私之心是不能办到的。这真是：秋白、鲁迅杂文如此相似，“干”、“子明”是你们共同的名字，15篇杂文铸成的友谊碑有两个面，两面合成一尊名垂千古的纪念碑，“子明”、“干”、“何家干”、“洛文”、“乐雯”，是“无私”的代名词。

为了摹拟得象，秋白学习鲁迅杂文，研究鲁迅笔法。例如，秋白的《大观园的人才》把吴稚晖比做老旦，汪精卫比成花旦，就受对鲁迅《宣传与做戏》的启发。看鲁迅这篇文中的一段：

教育经费用光了，却还要开几个学堂，装装门面；全国的人们十之九不识字，然而总得请几位博士，使他对西洋人去讲中国的精神文明；至今还是随便拷问，随便杀头，一面却总支撑维持着几个洋式的“模范监狱”，给外国人看看。还有，离前敌很远的将军，他偏要大打电报，说要“为国前驱”。……这就是我之所谓“做戏”。①

此外，在《新的“女将”》等杂文中，鲁迅均有象此类的比喻、

①鲁迅《二心集》P123，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影射，秋白吸取其某些看法或说法，加以发挥，在《人才易得》中写一味骂山门的吴稚晖那一套不行了，而要“似战似和”的汪精卫出台。也把他们耍的政治手腕比为“做戏”。此外，象《最艺术的国家》，秋白也从鲁迅的《论照相之类》中吸收某些观点，并翻出新意。加上秋白精通语言学、文字学，写起来不光神似，而且形似。在鲁迅方面，也注意学习、研究秋白的论著，鲁迅看了秋白写的：“这些欧化绅士和洋场市侩，后来就和‘革命军人’结合了新的帮口，于是僵尸统治，变成了戏子统治。僵尸还要做戏，自然是再可怕也没有了。”^①感到这论述与自己的观点在碰撞、在融化。忽而转化出一个新念头：官场就是戏场，国民党的统治就是戏子统治。于是，鲁迅将秋白原题《人才易得》改为《大观园的人才》，把反动统治窝喻为“戏场”。这些说明相知有助于相似。^②

他们心理素质有某种相似，又能相互帮助。秋白少年时，

①《瞿秋白选集》P537。

②秋白在研究鲁迅杂文基础上，1933年4月8日秋白写了《鲁迅杂文选集》序言。4月11日，秋白一天之内就执笔写了《关于女人》、《真假董吉诃德》、《内外》、《透底》等四篇杂文，不仅笔法酷似鲁迅的，而且有些说法如《内外》中的一些论说，即脱胎于鲁迅的《春末闲谈》。1933年2月下旬，秋白在鲁迅家第二次避难，合作写《〈大晚报〉的不凡和难堪》，合编《萧伯纳在上海》一书，此期间前后，鲁迅写的《颂萧》、《谁的矛盾》、《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萧伯纳在上海〉序》等文章与秋白的看法、文笔相近。如2月23日夜，鲁迅写到肖伯纳“他往往撕掉绅士们的假面”。与秋白22日在《他并非西洋唐伯虎》中所写，萧伯纳“他把大人先生圣贤豪杰都剥掉了衣装，赤裸裸的搬上舞台。”说法相近。此外，2月28日，鲁迅写的，对萧伯纳的讲话，“人们就也爱听，也怕听”，既“要看看别人的赤条条，却小心着自己的整齐的衣裤”。与秋白之说也相近。这些进一步证明了相知才相似。

因士宦之家的破落，吃粥、住祠堂，倍受势利的冷眼。17岁那年人家欢天喜地过年，爆竹声中给他万般温暖的生母却吞火柴头离他而去。青年时代他爱上了王剑虹，可结婚后仅几个月，“梦可”^①也永远地离开了他。20年代末、30年代初，那动荡不安的岁月，把他推上党的最高领导地位的共产国际，忽而把他从崇高的位子上，象对待“布哈林分子”那样，狠狠地打了下来。秋白虽然生性开朗、坦率、浪漫、乐观，经受这一个个挫折，也变得忧郁、沉默寡言了。鲁迅自幼家道败落，青年时无爱的包办婚姻更给他带来心灵的苦闷，中年时的风雨周折，知“天命”时还时时侧着身子提防“冷箭”，他在寂寞中思考，在孤独中生活。他一口又一口猛吸着烟，又张开嘴把烟喷出去，孤寂不但没有随轻烟飘逝，反而在胸中越积越浓、越沉。

两颗都是沙子，谁也粘不了谁。两块钻石相碰击，则产生耀眼火花。秋白理解鲁迅的孤寂，并不迁就他的悲观。秋白诚恳地向战友指出：

早期的革命作家，反映着封建宗法社会崩溃的过程，时常不是立刻就能够脱离个性主义——怀疑群众的倾向的；他们看得见群众——农民小私有者的群众的自私、盲目、迷信、自欺，甚至于驯服的奴隶性，可是，往往看不见这种群众的“革命可能性”，看不见他们笨拙的守旧的口号背后隐藏着革命的价值。鲁迅的一些杂感里面，往往有这一类的缺点，引起他对于革命失败的一时的失望和悲观。^②

秋白还满怀热情地为鲁迅指出前进的道路，鼓舞鲁迅战斗：

鲁迅其实并不孤独……贫民群众……他们是真的光明

①“梦可”，法语“我的心”的音译，秋白称“剑虹”为“梦可”。

②《瞿秋白选集》P544。

斗争的基础。精神界的战士只有同他们一路，才有真正的前途。①

鲁迅对秋白也是肝胆相照。周建人回忆：

有一次，我看到秋白给鲁迅的信中，用了一个笔名“犬耕”。

一般人看过这个笔名，也许就过去了，可是对于中国文字的运用有深刻了解的鲁迅，知道秋白的寓意是什么，见面时便问他了。秋白回答说，搞政治，他的力量不够。耕田本来是用牛的，狗耕田当然就耕不好了。

鲁迅对他丝毫没有责备，只是说：“你对我说可以，不要再对别人说了，可能影响不好。”②

这是多么赤诚的忠告，这是多么深厚的友谊。这样，棘地荆天两代人，才能亲密无间心相印，精诚合作传佳篇。③

①《瞿秋白选集》P 532。

②周建人《我所知道的瞿秋白同志》，1980年3月16日《解放军报》。

③本章主要内容曾在以下刊物发表：《新闻通讯》（1985年第6期）题为《谈〈儿时〉的写作特色》；丽水师专学报（1986年第1期）题为《从〈王道诗话〉、〈儿时〉说开去》；南通师专学报（1986年第2期）题为《略说秋白、鲁迅杂文之同异》。

九、最后的斗争 悲壮的一幕

——《多余的话》断想

夜色已深。窗外，秋风萧萧，秋雨靡靡；灯下，一本《多余的话》（下简称《话》），思绪万千，万千思绪。多余的话是否多余？长期以来褒贬不一。它是国民党反动派伪造呢，还是秋白所作？它是求生乞降的自白书，还是历史、人生的沉思录？文中自我分析是“小布尔乔亚”的自我欣赏，还是共产党人的严格自我解剖？它的基调是什么呢？又怎样理解《话》中表露的惆怅、心忧呢？特别是其中某些过头的自责言词，把它作为历史人物的历史文献来理解，还是作为带文学性的心灵独白散文来看？《话》中反映的“我”的矛盾心态，是否可看作秋白的人格分裂呢？

秋白如是跟随红军长征，那么也不会在敌人扫荡时被捕了。自然，也就没有《话》。按秋白的身体是不宜去苏区的，如果他留在上海，尽管在白色恐怖之下，但有战友的掩护，有妻子杨之华的照顾，也就不会有后来发生的一切。让我们还是从秋白离上海去中央苏区讲起吧。

（一）在人间“天堂”

秋白把中华苏维埃的首府江西瑞金称为“天堂”、“老家”^①。

^①1934年1月7日，风雪交加，秋白离别上海。半个月后，尚在赴瑞金途中，秋白托人给杨之华捎来一张小条子，上写着：“我将到我们的‘老家’，很快会看见亲兄弟，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天堂，快来！”（杨之华《回忆秋白》P150。）确切说，“红都”在瑞金城西的沙洲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共中央机关均在此。

那么，他在“天堂”里生活又怎样呢？1934年2月5日，秋白经长途跋涉抵达瑞金沙洲坝，立即到老茶亭村，就任中央教育人民委员。“人民委员”是仿照当时苏联政府的体制、称谓，即“部长”的意思。据当时也做教育工作的刘英回忆：

“秋白同志住在一间狭小的平房里，房里除了一张木板床、一张破旧桌子和几条长板凳外，就是他的一个所谓书架；一块长板上放了许多书和文件。在这间屋子的外面另有一间屋子，里面有一张旧长条桌和几条长板凳，这是大家开会的场所。每次开会，秋白同志总是热情地和大家打招呼，给大家倒水。”“我还记得第一次去参加秋白同志召集的一次讨论会。一见面，就觉得好象见到了老朋友。他是那样平易近人，使人丝毫不感到拘束。这次会议研究的是‘苏区文化教育工作计划’，计划草案是秋白同志亲自执笔起草的。”^①

这矮平房就是中央教育委员秋白的卧室兼办公室。它是用“干打垒”的大块黄土坯筑成的，人字屋顶，屋里陈设简陋。吃的粮也是定量分配，盐更少，“一日一人只吃一钱盐，职无高低，人无老幼一律。”^②生活是够艰苦的了，但时而从这矮小土屋里传出秋白爽朗的笑声。他怎能不欣慰呢？苏区是他赞扬的地方。那里是“中国民众自己的政权”^③，是“新的社会制度”^④。红色苏区是他向往的地方，在他主持中央工作时不是还为根据地建立与发展化费过不少心血吗？而今从白区来到苏区，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当然无比欣慰。

然而，又有一丝惆怅缠绕心头。不仅是离别了知己鲁迅、茅

①刘英《秋白同志在中央苏区》，1980年6月16日《北京日报》。

②徐特立在50年代写给杨之华的信。

③④瞿秋白《“匪徒”》，《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P430。

盾，由心爱的文学园地转到教育的岗位，而且是1933年9月22日王明路线控制的临时中央给他的无端打击：《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其实，秋白以狄康笔名写的《庐山会议的大阴谋》等文，揭露国民党“庐山会议的结果，最重要的就是决议严密的封锁苏维埃区域”，这“也表示着国民党统治的崩溃”，“不敢叫大队的士兵去打，却只敢‘封锁’，‘包围’，‘步步为营’”。①这提醒党注意敌人“围剿”策略变化又有什么不好呢？可是，王明等把持的中央却认为这是“严重的有系统的右倾机会主义”，“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为此“应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②于是，在党的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斗争》上点名批判秋白。小组批判会上，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对着秋白蛮横地吼道：“象你这样的人，只有一棍子敲出党外去！”③秋白被迫写了《我对错误的认识》④。此时，他怎能不“感觉到‘中年’以后的衰退”，“衰老和无能的悲哀，象铅一样的沉重，压在他的心头”。⑤而正当他迷惘时，在全党以批判他来贯彻王明路线时，1933年底，突然，临时中央要秋白去苏区赴中央教育人民委员之职——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号《布告》就公布此职，几年都没有叫他去，这次调秋白去，王明控制的中央真实

①狄康（秋白）《庐山会议的大阴谋》，1933年7月30日《斗争》第49期。

②《六大以来》

③瞿独伊听母亲杨之华讲述的，《忆秋白》P231。李竹声后被捕，叛变。

④刊《斗争》第56期。

⑤秋白《儿时》，1933年9月28日写，同年12月15日用鲁迅笔名子明在《申报·自由谈》发表。鲁迅未将这篇他们合作的杂文收入自己的集子，表明文中反映的某种情绪是秋白独有的。

目的何在呢？和秋白临行前谈过此事的彭玲说：“我一直疑心，这是王明他们存心为难秋白同志的花招。”^①此时秋白如何想的没有留下文字记载，留下的只是他的表示：苏区“是要去的，否则有人要说我怕死呢”。^②他还曾要求杨之华同行，但没有得到领导的同意。如今秋白在这土屋感到莫名的惆怅，固然跟孤身一人相关，更重要的是，战事果如自己所料，蒋介石采纳了顾问西克特等人提出的“堡垒政策”，以50万兵力，步步为营，蚕食中央苏区。而博古、李德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失利，瑞金城笼罩着战云。眼下，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前途未卜。枪炮声越来越近了。此时，秋白只是“担任了人民委员的清闲职务”^③，可心情却不轻松，土屋里常传出秋白来回踱步的沉重脚步声。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闲职”并不闲。即使在炮火连天的战争环境下，秋白还抓了教育事业的根本建设，即教育条例、章程的制订。现存于常州瞿秋白纪念馆有一本《苏维埃教育法规》，这是毛边纸油印本，接近16开本大小，共有小学、中学、职业中学、师范、戏剧学校、大学、夜校、训练班等24个条例，1934年4月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布。可以想象到秋白刚上任就雷厉风行地干了一阵子。小土屋里常亮着灯光，他带着患严重肺病的身体，在灯下用毛笔审批一个个简章、大纲。“闲职”不闲，秋白还穿着杨之华做的一套衣裤，扎起裤脚，骑马去巡视列宁小学教学，或去苏维埃大学、红军大学、高尔基戏剧学校讲话、讲课，^④当时在戏校边学边教的石联星回忆：“秋白同志以身作则地自己也来

①②彭玲《难忘的星期三——回忆秋白、之华夫妇》，《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P110。

③《多余的话》

④1934年4月3日《红色中华》刊有秋白4月1日在苏维埃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红军大学是1933年11月7日在瑞金西郊大树下开学的，秋白曾去讲政治理论课程，学员有苏振华、刘道生、唐亮、韦国清等。

上课，他用鲁迅的话来鼓励我们：路是人走出来的。”^①大家都很喜欢听秋白讲课。怎会不喜欢呢？1916年，17岁的秋白就只身赴无锡乡间小学任教，1921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讲授唯物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1923年任上海大学教授。杨之华回忆：秋白“亲切地微笑着，”“取出讲义”，“不是照着讲义念，而是在讲义的基础上补充了很多活材料”，“引用了丰富的中外古今的故事，深入浅出地分析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当前的革命斗争密切结合起来。”大家“觉得这个课堂太狭小了，窗外和门口都站满了热情的听众”。^②而今，更成熟了。听他的课，如同游历上下古今，东南西北，确是一种享受。

这年，秋白35岁了，却是他的“晚年”了。“晚年”不“晚”，更不“闲”。他还任《红色中华》报主编，直到1935年1月，还坚持出了最后一期。他还兼管艺术局的工作，亲自修改大鼓词《王大嫂》、编辑出版剧本集《号炮集》，组织剧团演出、会演。当时任中央局宣传部艺术局局长赵品三回忆：

火星、红旗、战号三个剧团，在各战区的农村、火线上活动到1934年底，就都按预定日期和汇合目的地，向鄱都县小密附近一个山上的××村前进。快要爬山时，远远望见高山口的茶亭前有个黑点在摆动。爬到快要上去的半坡腰，忽听上这发出：“同志们！加油！只有一里路了。”谁也没有想到，那是秋白同志冒雨来迎接大家。高兴之下，大家一口气爬上去，又谈又笑的进了村子……太阳下山不多一会儿，三个剧团的汇演就开始了……越演越有劲。观众更凑劲儿，大雨儿都淋不散他们。打伞的、戴斗笠的、

①石联星《秋白同志永生》，《新华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

②杨之华《回忆秋白》P 3—4。

披蓑衣、被单和禾草的。……陈潭秋、陈毅等同志当时都看了汇演。^①

这是江西苏区最后一次汇演，也是一次留下悲壮纪念的会演，导演这次演出的是秋白。不过秋白自己也将进入悲壮的“一幕”了。

（二）最后岁月

将近1934年年关，冬雪飞扬。在这寒冷的夜晚里，杨之华和鲁迅围坐在火炉边，这是秋白走后他们第一次会见。按说应是欢乐的，但气氛却相当抑郁。鲁迅病中消瘦的脸上露出焦急的神色问杨之华：“听说秋白在苏区病死了，这个消息确实吗？”猛一听鲁迅的话，杨之华心里一阵揪痛，一时心神不定。她想到鲁迅的病体，象安慰鲁迅又象安慰自己似地答道：“我没有听说过，我想并不见得确实。”接着鲁迅不胜感慨和惋惜地说：“象秋白这样的身体，去苏区是不适宜的，如果他留在上海，对于全国文化上的贡献一定更大。”之后，鲁迅凝视着火盆，长久不语，象在回忆和秋白相处的日子。当杨之华告别时，鲁迅再三叮嘱：“如果得到了确实的消息告诉我一声，你自己也要多加小心。”那么，他们遥念的秋白情况究竟怎样了呢？

1934年10月，红军一队队突围转移，秋白也整装待命。可是，“在中央政府讨论转移的一次会上，主持会议的毛泽东同志向大家……提到哪些部长和部队一起长征，其中却没有包括瞿秋白同志。瞿秋白同志去当面向毛泽东同志要求参加长征。毛主席当场没有回答，只是说，你这个问题下面再说。”^②秋白当场

^①赵品三《秋白同志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话剧工作》，《忆秋白》P331、332。

^②吴黎平（即吴亮平，当时任国民经济委员部副部长）《忆与秋白相处的日子及其他》，《学习与研究》1985年第1期。

向毛泽东提出的这一请求，反映他渴望随中央红军、中央机关同行，以便提醒领导，使革命摆脱“左”的桎梏。按说毛泽东与秋白彼此是理解的，他们同受“左”的排斥，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不过，此时毛主席只是“驾空”的苏维埃政府主席。吴亮平过去和秋白一起在上海搞左翼文化运动，在苏区又是好友，也为秋白不能去长征难受、不平。他回忆：“两天之后，我曾经对把秋白同志留下的这一决定，问过毛泽东同志。说秋白这样的同志，怎么可以不带走，让他听候命运摆布？毛泽东同志回答道，他也提了，但是他的话不顶事嘛。”^①决定权在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这“三人团”又受在莫斯科的王明遥控。前面章节曾讲到秋白与王明、米夫在莫斯科起就有一段“斗争”，其命运明白人早可猜到大概。当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张闻天，后来回忆：参加长征“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②为什么不让秋白参加长征？当时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同志回忆：“有的为‘左’倾路线领导者不喜欢的干部，则被他们乘机甩掉，留在苏区打游击。如瞿秋白，何叔衡等同志，身体根本不适宜游击环境，也被留下，结果使他们不幸被俘牺牲”。^③跟毛泽东秉烛夜谈过的冯雪峰说：“毛主席认为这是博古、王明他们有意把瞿秋白当作包袱甩给敌人造成的。毛主席曾气愤地说：‘将来要跟他们算账，为什么不把瞿秋白带到长征的大队伍中去！’”^④

①吴黎平《忆与秋白同志相处的日子及其他》

②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年12月6日，见《遵义会议文献》P78。

③《伍修权同志回忆录》，1982年第1辑《中国共产党史资料》。

④陈早春《夕阳，仍在放光发热》，《回忆雪峰》P299，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出版。

北风呼啸，寒意袭人。痛苦莫过于受自己人的处置。事已至此，秋白明白博古等人怎样处置自己，反而坦然了。这时，秋白邀请李富春、蔡畅、傅连璋等聚餐话别。这是生死离别，“天堂”里“最后一餐”。席间，秋白风趣地举起一个杯子说：“这酒杯是之华在上海给我的纪念品，让我们一起为革命胜利干一杯！”在那样的逆境里，秋白想到的是革命，是胜利。车辚辚，马萧萧，红军一队队经过秋白的茅屋向西开拔。秋白的助手、教育部副部长徐特立催马赶来，向秋白告别。秋白发现徐老的马夫身体不好，立即把自己高个子强壮的马夫换给徐老^①。年过五旬的徐老望着年方35岁，身体瘦弱，脸上还有些浮肿的秋白，脑中快速闪过：前不久，人家送秋白几两盐，他马上跟自己分享。而今，秋白更需要身强力壮的饲养员，却让给了自己，徐老眼眶润湿了。徐老哪里料到这一别，竟是白头人送黑头人。危急关头，秋白想到的是同志、是战友。第二天，留守苏区的陈毅见到秋白，问他为何还没走？看到秋白病弱的身体，估计他打游击是吃不消的，就要把自己的膘肥体壮的枣红大马送给秋白，劝秋白追上中央红军。秋白望着豪爽的陈毅说道：“组织上没有决定，我不能擅自前去，要服从组织的决定。”这是具有坚强党性的秋白，在人生接近尾声时发出的声音。当秋白等被甩在反动派清剿区时，惦念着秋白的鲁迅、杨之华又怎样呢？

1935年，杨之华家被国民党军警搜查，她虎口脱险，避居一工人家中。她在此之前写信告知鲁迅，秋白病死消息不确。而后，上海党的机关遭到大破坏，去苏区地下交通断了，她自己处境

①徐特立给杨之华信，讲到秋白曾和他“换一马夫以强壮的马夫给我”。又一说，杨之华《回忆秋白》P156：“秋白嘱咐他的身强力壮的马夫跟徐老走，好好照顾徐老，并把自己的一匹好马也换给了徐老。”

危险，不便再与鲁迅联系。鲁迅得杨之华信后心稍安，但报上连连报导“围剿”捷报，又使鲁迅坐卧不安。1月6日，致曹靖华信：“它（秋白笔名，由史维它简化而来）嫂平安，唯它兄仆仆道途，不知身体如何耳。”4月，鲁迅收到秋白狱中化名来信——2月初，秋白、何叔衡等取道福建以转香港返沪，23日拂晓，行至闽西长汀水口镇牛庄岭，为还乡团“义勇队”发现，与保安团激战中何叔衡壮烈牺牲^①，秋白等被俘，他顶住刑讯、编造假口供，蒙骗了敌人，得以写信求保。杨之华回忆：“我得到通知说，鲁迅叫我去拿一封紧要的信。我托人去取来了。这封信是秋白被捕后敌人还不知道他的身份时化名林祺祥写给鲁迅的，让他设法觅铺保释。”“鲁迅得信后，就积极设法营救秋白。他先给我送来了50元钱，叫我寄给秋白用。同时，他拿出一笔钱帮助筹办一个印刷所，好作为铺保去保释秋白”。^②可是，新铺登记，怕引起敌特机关注意，搞不好未保出秋白，外面同志反被捕。正当鲁迅、茅盾尚无万全之策时，杨之华通过以牧师身份为掩护的秦化文同志，取得一个旅馆老板的铺保证明，甚而，还为秋白租了一所住所，以便保释后秘密居住。然而，铺保证明等寄出不久，5月11日，《中央日报》刊登俘获“共产党首领瞿秋白”，“伪名林祺祥”。杨之华一看报，知道秋白不能活了。鲁迅得知后木然坐在椅子上，一语不发。5月14日，鲁迅致曹靖华信：“闻它兄

^①何叔衡，1920年跟毛泽东等建立“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次年，又一起在上海筹备中共“一大”。瑞金时任最高法院院长，抵制王明路线的乱杀、乱捕，被撤职。长征时正是花甲之年，被留在苏区。转移时曾长叹欲言，秋白劝他：“事已如此，夫复何言。”激战中他不愿生俘，举枪自杀，滚落悬崖，受重伤，被匪兵枪杀。

^②杨之华《回忆秋白》P142。按：这时，杨之华也接到周建人转来的秋白信，内容跟鲁迅信同。

大病，且甚确，恐怕难以医好的了。”^①这一切，狱中的秋白一概不知晓。秋白又怎样突然被反动派发现的呢？狱中表现如何？

4月10日，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之妻被俘，供出秋白等被捕。下旬，敌人由一个叛徒处查明林祺祥即瞿秋白。5月10日，秋白被押送到长汀36师师部。第二天，在军事法庭会审时，军法处长吴淞涛叫被俘投敌叛徒当庭对质^②。秋白坦然地说：“既经指认，我就不用‘冒混’了。我就是瞿秋白。我在上抗笔述的供录，算是作了一篇小说一样？”^③至此，秋白已知非降即死，是不能活着走出长汀了。在即将“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于5月17日至22日，写了《多余的话》。对它历来争议颇多，有人认为“字里行间，充分地流露了求生之意”。这下一节将详论。这里截取中统特务对秋白劝降的一段^④，看共产党人的气节。

王傲夫是北平燕京大学毕业生，又是“中共自首人员招待所”头头，懂得攻心为上。他假意关心地说：“京沪朋友都很关心瞿先生的身体和安全。许多亲友，甚至许多青年为瞿先生的安全担心。中央关心你，挽救你，也是爱惜你的才学，才派我们远

①《鲁迅书信集》下卷P810，第963号函。

②这叛徒曾是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勤杂人员。他指认林祺祥（当时福建保安14团呈文、通电均为“男匪林祺祥”）即瞿秋白。

③赵庸夫《关于瞿秋白之种种》附录《审讯记》。《逸经》第34期，民国26年7月。

④国民党36师、军统对秋白软硬兼施、诱降失败后，国民党组织部长陈立夫派中统局科长王傲夫、干事陈建中（中共叛徒）来劝降。途中又召中统福州调查室主任钱永键、中统龙岩区调查室主任朱培璜，组成“劝降小组”。历时6天，共进行9次劝降和审问，其中7次是“劝”，2次为“审”。王傲夫、钱永键与秋白对话，朱培璜为录事，陈建中为文书。四人中王傲夫为首，大都由他发话。秋白亦主要跟他舌战。

道而来。哪料到同你谈了好几天，你无动于衷呢？”秋白从容答道：“王先生，钱先生，谢谢你们好意。我问你们，这种关心和陷害有什么区别？事实上，没有附加条件是不会先许我生存下去的。这条件就是要我丧失人性而生存。我相信，凡是真正关心我爱护我的亲友家属，特别是吾妻杨之华，也不会同意我这样毁灭的生存，这样的生存只会长期给他们带来耻辱和痛苦”。说到此，秋白想到一年前和杨之华别时的对话：“之华，我们一起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被捕牺牲是意料中事……即使我们不能共享胜利的喜悦，那样牺牲也是无尚幸福的。”杨之华回答：“嗯，万一真到那一天，也是幸福的！”想着脸上露出一丝微笑。是的，他相信自己的爱人会为自己的表现而感到自豪。当营救毫无希望时，杨之华曾“想去长汀监狱，陪着秋白一起赴难”^①。真是一对革命夫妻啊！——这，狱中的秋白并不知晓，只是凭着直觉感到杨之华支持他，与他并肩斗争，故而微笑。反共“溶共”专家王傲夫自然也察觉秋白情绪微妙的变化。哪能放过战机，立即紧逼上去：“你如果决心生存下去，不一定叫你作公开的反共工作。你可以担任大学教授，也可以化名做编译工作，保证你不作公开反共。瞿先生，你不见顾顺章转变后，南京对他的优待。他杀人如麻，中央都不追究嘛！”钱永健也插了上来，“‘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看瞿先生还是从速考虑吧！”秋白斩钉截铁地说：“我是瞿秋白，不是顾顺章！我情愿做一个不识时务笨拙的人，不愿作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秋白志坚如山，气贯长虹。有当时的审讯记录在！也有当时敌36师师长宋希濂后来写的文字在！！

①②杨之华《回忆秋白》P149、163。

③宋希濂《瞿秋白烈士被捕和就义经过》

(三)心灵的独白

1864年夏，李秀成写完“自白书”，为曾国藩所杀，忠王晚节不忠。秋白呢？窗外，秋风萧瑟，秋雨绵绵。案头，一本《多余的话》。心头，思潮起伏。30年代中期，《社会新闻》、《逸经》刊登《多余的话》后，长期以来，争论甚多。一说它是敌人捏造的伪作。可是，关押秋白的36师师长宋希濂后来回忆，秋白“写了一篇《多余的话》”，他还“看了一遍”。^①访问秋白的记者李克长亦看到秋白的《话》。^②那么发表时是否伪作呢？《话》与今存秋白狱中致郭沫若信的手迹对照，情绪、用语是一致的。再与他的其它作品、致亲友信对照，也看出其间矛盾心灵的一致性。因此，当时郑振铎说《多余的话》“这是假的，是伪造的。”^③这不能成立。又一说则把它作为“叛徒的自白书”^④。可是，它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如讲到30年代，他避开了“左联”，保护了鲁迅、上海地下党的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反而表示：“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求饶、乞求不死。文中讲到这是“绝灭的前夜”的话，早已把生死置于度外了。因此，它和李秀成的“自白书”是截然不同的。自1979年陈铁健的《重评〈多余的话〉》发表后，各报刊登载的几十篇这方面文章，一致否

①宋希濂《瞿秋白烈士被捕和就义经过》

②李克长《未正法前之瞿匪秋白访问记》，1935年第13卷26期《国闻周报》。

③《茅盾回忆录18》，《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1期。按：说《话》不是伪作，是秋白遗作，并不排除个别地方被敌人篡改的可能性，因为现在发现的敌伪档案中一份《话》，是当时36师两份抄件之一，原稿迄今尚未查到。

④戚本禹《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叛变行为》

定它是“叛徒的自白书”的说法。不过，有个别学者认为秋白的《话》跟日本共产党人河上肇的《狱中独语》相似，“秋白希望通过《话》所作的让步，赢得个人自由或至少赢得生存。”^①其实，两者有截然不同。河上博士写《狱中独语》是为请求保释，以便翻译《资本论》，确实有求生之意。而秋白是在“生命的尽期”，对自己、人生、革命的反思，向党倾吐“最后的最坦白”的心底话。既是“最后”“生命的尽期”的话，何来求生之意？就自我分析这一点而言，也跟《狱中独语》相距十万八千里，而与卢梭的《忏悔录》却有某种相近。在不怕死精神上，《话》与恽代英词《时代的囚徒》，方志敏文《死——共产主义殉道者的记述》是相通的，不过风格不同。恽代英、方志敏诗文壮烈豪迈，秋白则超脱自然。对死安然处之，甚至以死为安乐的休息，死前还记挂着“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这跟鲁迅《死》一文中表现出的安然倒颇相近的。

一说《话》是伪作，又一说它是“叛徒自白书”。耐人寻味的是，这两种彼此对立的观点，在观察、研究角度的某一点上，却相互一致，即都把它作为历史人物的具有历史文献的“遗书”或“自白书”、“陈述书”，并以此来鉴定历史人物。其实，从题材上讲，《话》通过对自己生活道路的回顾，剖析思想的历程，抒发他对人生的所感所思所“忧”，“说一说内心的话”。从体裁上看，它是自我心里、心史评述性的散文，跟《心的声音》、《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一样，也是“心里记录的底稿”。它有某种文献价值，但与完全作为史料的历史文献有区别，它是文学作品。

为什么要把它看成文学作品呢？首先，从秋白这个人来看，如他在《话》中所述，始终是个“积习未除”的“文人”。世代书香

^①罗大成、符晓《瞿秋白与河上肇——也评〈多余的话〉》，1980年第2期《社会科学研究》。

门第的熏陶，他从少年时代对文学就有浓厚的志趣。20年代初，历史将秋白推上了政治舞台，他并没有放弃对“文艺的爱好”。30年代，在他政治道路上历经坎坷，备尝艰辛时，便产生“复归”文艺家园的心态。1931年至1933年、1935年正是这样的时期。前一次，秋白是王明的“阶下囚”；这一次，是蒋介石的“阶下囚”。不同的是上次被开除出政治局，却有并肩作战的挚友鲁迅等；这次却是“被拉出了队伍”，死囚牢里内外隔绝，“寂寞此人间”。但是，还有笔，虽然“余剩的日子”“不能按年份来算了”，毕竟还有一点时间，可用在秋白喜爱而又荒疏的文学上，而且，这也是一种战斗。真正作为革命史、共产党党史或其它史料，国民党反动派不会发表。唯文学作品不然，如曲笔用得好，也许“有机会能使之出版”，因此，《话》是作为文学作品来写的。其次，从《话》本身来看，文中说：“心上有不能自己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真相。”这“冲动”是“自我分析的脾气”、写作的内力，即写心理独白式作品的创作冲动。在这种创作冲动下写的《话》，无论是结构、语言、人物、表现手法，都具有文学性。以“何必说？”为“代序”，之后，以“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为小标题，依次叙说，最后，以“告别”作结语，篇章结构完整。文中深情的语句：“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这又多么富有情意，语言生动而又素朴，淳真而又富有感情色彩。文中的那个“我”，更是活生生的这一个“我”的艺术形象，他非毛泽东那样实践型的政治领袖，他跟勇猛向敌进攻的革命家张太雷气质也有不同，他是学者型的文人政治家。跟别的学者型政治家相

比,他的情感更为纤细、丰富、复杂,他的性格受到东西方文化的影响。他与鲁迅都受传统文化影响,不过印记略有差异。文中的“我”有个性特色。表现手法也是文学性的,多曲笔,少直言。题诗:“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引自《诗经》的《黍离》篇,这是理解《话》的钥匙。它表示无所求,不求生,不求“身后的虚名”,唯有“心忧”。这也是《话》的题眼。多余的话并不多余,就在于要写“心忧”:忧虑王明路线的统治,忧虑革命的前途。而在狱中写此文,不能不用曲笔,以被扭曲的形式反映。文中的“我”有时也随之变形,自贬之词、反语、夸张等等都与这样特殊的表现手法相关,有的地方是实中有虚,虚中有实。这也反过来证明了它不是记实的历史文献。如果以史料史实来要求,或是会认为这不符合秋白的为人,或者就否定此文是秋白所写。最后,联系秋白这方面成稿和未成稿的作品来看,最早的是《心的声音》,反映了秋白走向革命的一段思想历程。且称之为心史的序曲。《饿乡纪程》是记著者“‘自非饿乡至饿乡’之心程”;《赤都心史》是记作者在20年代初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心理上之经过”。这两本散文集是“中曲”。而《话》则是它们的续篇“终曲”,心史的最后总结。这些就是心史完成稿的三部曲。从未完成稿看,《话》又是首曲。秋白对记者李克长讲:“《多余的话》已脱稿,还打算再写两本,补充我所想讲的话,共凑成三部曲。”可惜,秋白没有时间来写了,现在只留下《未成稿目录》。一是《读者言》共10个篇名,如《“阿Q”以后》等,估计为随笔式散文。二是《痕迹》:1.环溪。2.大红名片。3.父亲的画。4.娘娘。5.宁姐(以上《家乡》)。6.黄先生。7.出卖真理(以上《北平》)。8.“饿乡”。9.郭质生(以上《第一次赴俄》)。10.丁玲和他。11.“生命的伴侣”。12.独伊。13.误会(以上《上海》)。14.蓝布袍子。15.庐山(以上《武汉》)。16.忆太雷(以上《1927年年底》)。

18.“老爷”。19.忆景白。20.面包问题。21.夜工(以上〈第二次赴俄〉)。22.油干火尽时。23.“做戏”(以上〈退养时期〉)。24.那松林的“河岸”。25.真君谭(雪峰)。26.不管唱,不管认。27.淡淡的印象(以上〈苏区〉)。28.逃! 29.俄的研究。30.不懂的(以上〈上抗〉)。31.得其放心矣(〈汀洲〉)。这是自传性散文。这三部曲的两部都是散文,《话》自然也是散文作品。另外,《痕迹》是按编年写秋白自己的生活道路,写与他自己相关的人、事、事件。这些都在他的家史、以及敌我斗争史、党内斗争史背景上展开,以突出他个人的生命史。如果讲《痕迹》含有历史文献意味,倒还说得通。《话》不能作为丝毫不误的文献,它是心史。

有的研究者不相信《话》是秋白所作,或许以为《话》有损秋白高大完美形象,这在于主观上认为领袖、英雄、先烈、必定是“百分之百”圣洁无瑕,把他们作为不食人间烟火的神来要求。秋白自己就不相信“百分之百的布尔塞维克”。哪里有十全十美的人呢?秋白也是人,是人必有七情六欲,他的革命生涯就是不断克服自己心性弱点的历程。他一面慨然受命于险难之际,一面怅然“与个人情趣难分手”。这样,对他流露出未能从文的某些愁怅情绪也就容易理解了。秋白的可贵在于最终仍是理智战胜感情,以革命大局为重。

(四)复杂的心态

秋白的惆怅、心忧主要是对王明极左路线。可是,在敌人的狱中,又不能公开谈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错误,只能谈自己。“1931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

①中央档案馆存手抄《未成稿目录》一件,原为国民党档案所存。1980年第3期《近代史研究》登刊陈铁健《瞿秋白就义前后》一文,在注释中发表了 this 目录。原抄件无17。

直到现在。”“偶然我也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已经在政治上死灭”，“心中空无所有”，要求的是“休息，休息，休息！！”“永久休息”等等。”对这种自责的过头话、贬词、忧伤情绪有各种不同看法。大致可以归为两大类。一类认为它“主要思想倾向是错误的”^①。另一类则说它“光辉是主要的，灰暗是次要的”^②。这两种观点对立，但有一点又相同，即都认为有“灰暗”的情调。如何看呢？这还得回到我们前面的命题，即这是篇灵魂独白式的文学作品。文中通过这样一个受极左错误路线残酷打击的“我”的形象，通过这种过火的自贬言词，曲折地反映秋白对王明路线的愤慨、痛心，甚至有所斗争。秋白在《话》中说：“我自己不愿有什么和中央不同的政见。我总是立刻‘放弃’这些错误的见解”。^③这“中央”是王明把持的中央，“放弃”两字上打上引号，说明并不想放弃，或是明“放”暗不“放”。他对王明那一套至死也是怀疑的，否定的。不过，这种否定是通过否定自我扭曲的形式表现，非大勇者无私者是不能如此的。方志敏在狱中写的文字十分注意共产党人典范形象，抒发了革命理想、气节，这诚可贵。而秋白除表达革命情操外，更强烈地曲折地对王明极左路线进行暴露、鞭挞，并且，不怕由此使人误解自己，有损典范形象，这更难能可贵。^④

①④《多余的话》

②陈云志《瞿秋白》，黑龙江人民出版社，P 101；《话》“整个情调是低沉的，灰暗的，”“就其思想倾向来说是不健康的”，“错误的”。王维礼、杜文君《应当全面评价瞿秋白》；《话》“的主要思想倾向是错误的。它集中地反映出瞿秋白思想的动摇和革命意志的衰退。”

③陈铁健《重评〈多余的话〉》；《话》“既有令人夺目的光辉，也有使人不爽的灰暗。光辉是主要的，灰暗是次要。”

④方志敏在总结赣东北根据地斗争及个人革命史时，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李立三的冒险，可对断送赣东北根据地和红十军团的王明路线只字未提。

另外,这种否定还通过自我批判升华了。他追根探源,认为“左”,自己是起始者:“而我——这时期当然我应当负主要的责任——在一九二八年初,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仍旧认为革命形势一般的存在,而且继续高涨,这就是盲动主义的路线了。”“老实说,立三路线是我的许多错误观念——有人说是瞿秋白主义——的逻辑的发展。”“我当然间接的负着立三路线的责任。”而这“就埋伏了后来的祸害”。由此而来的自责、自愧是自我超越,不应看作是灰暗不健康的情调。其中流露出忧伤的心绪,它的主流是忧国、忧党、忧民。

那么,有没有思想情感矛盾所产生的忧郁成份呢?有的。文中秋白真实地讲出当政治家和做文人的矛盾。说自己一度成为党的领袖是一场“历史的误会”,他不无遗憾地说:“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这种以坦荡的胸怀无情地剖析自己,跟鲁迅有惊人的相似。秋白往往是观念上接受马克思主义,而在情感上还潜伏着绅士意识。需要、理智驱使他奋战在血与火的斗争前沿,可他摆脱不了书生的文质彬彬。无产阶级的人生观使他受打击后仍然坚持党的工作,可心灵深处不免惆怅、痛苦,“名士化”的绅士异己意识克服了,可脆弱、伤感还潜伏着。这种解剖是深刻的。早在第一次赴俄时,他在文中就描述了两个自我的矛盾。他还在文中分析了自我的“心智不调”^③,即心性、情感和理智的矛盾,浪漫的个性与现实的矛盾。1924年1月11日,他在致王剑虹信中说自己:“心灵有两个世界”。和秋白同时代的

①《话》。这段话前面,秋白提到“南昌暴动和两湖广东的秋收暴动”以及“广州暴动”的“正确”,但这是“在党领导之下”的“我们”干的。在另外一处又提到他虽是党中央的“直接的政治领导”,但这些暴动是“组织部军事部去办”的。由此看出他功归大家,“过”则自己勇敢承担。

②《赤都心史·生存》

③《赤都心史·中国之“多余的人”》

文人不乏自我分析。郁达夫自我解剖也是够大胆的了，不过他是自怜自爱自我欣赏。秋白则是无情地批判自己残余的“绅士阶级的意识”，并由此得出有益的教训：“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炼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不免是一出滑稽剧。”俗话说，一锤可以定音，是否可以说，这一锤就定下《话》的自我解剖基调。这样，能说它的基调是“灰暗”、“消极”吗？

《话》中某些忧伤情绪与过去作品披露的低沉情调，是一脉相承的。在《赤都心史》的《中国之“多余的人”》一节里，秋白曾感叹：“我竟成‘多余的人’呵！噫！忏悔，悲叹，伤感”。在《话》中感叹“我竟成了颓丧残废的废人”，“脆弱的人呵！”但是，他又有另一面，积极向上主导的一面。在《饿乡纪程》中，秋白热情地呼喊：“灯塔已见，海道虽不平静，拨准船舵，前进！前进！”表示要“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在《话》中他表示：“我二十一、二岁，”“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思路”，“无从改变”。这里应明确两点。一是秋白在最后岁月中一些忧伤、孤寂，既跟他早年的伤感、颓唐有联系，而又不是“回归”。有的认为《话》中生死观反映了秋白佛学思想升华，佛门的涅槃使他肉体和精神上得解放。这种看法和他的实际不符。秋白在他生命最后时刻，指导他的仍是共产党人的生死观，他面对敌人说：“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最大的光荣。”“共产党人是杀不尽的。没有共产党，革命是不会成功的！”二是他思想情感矛盾的两方面，不是并列的“二元”，而是有主次之分的，他的无产阶级人格，始终居于主导地位

位，支配不断克服异己绅士意识。早在20年代初他就背叛了绅士阶级，他说：“秋白的‘我’，不是旧时代之孝子顺孙”。在生命的最后，更是无产阶级人生观居统治地位。三是不要孤立地就表层结构看一词、一句、一段，而要从全文、全人来看，注意表层结构后面的深层涵义，注意是否反语，要透过反语见话中之话。

（五）并非多余的尾声

1935年5月22日，余剩岁月果然已不能按月计算了。6月18日，秋白到天国休息了。当时，鲁迅还不知道，杨之华也不在旁。他的躯壳也不能由其自己作主送交医学校的解剖室。他静静地躺在罗汉岭下的一片草坪中，太阳快落山时，始有人为之装殓、埋葬。目击秋白就义的拾粪人刘玉堂心里连连祈祷：入土为安、入土为安^①。20年后，谢觉哉将秋白遗骨带回北京，后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又过了11年，1966年10月15日，“革命造反派”捣毁了秋白的坟墓。而长汀县黄田背村的当年贫苦农民刘玉堂，现在已过花甲之年，他带着孙子，捧着菊花，不远千里，在夕阳时分赶到八宝山，抱着被砸碎的墓碎痛哭失声，哭声阵阵上九天。

秋白到天国去休息了，人间的杨之华悲痛欲绝，鲁迅悲伤

^①1951年夏，曹靖华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他到长汀县，找到当年目击秋白就义的拾粪人刘玉堂，以及亲殓秋白的张仁福。后作《罗汉岭前吊秋白》一文，文中讲到：“秋白同志”“被难后，露尸至午后四时左右，始有人送棺木一具，张仁福说，他亲自代为装殓，并抬至盘龙岗埋葬。拾粪人刘玉堂说，他当日上午，同平常一样，进城拾粪。由西街经过时，正遇秋白就义。”见《忆秋白》P 163、164。又，《谢觉哉传》提到1951年谢觉哉在老农民罗仁发带领下来到刑场，又经张永福（按，疑即为张仁福）指点，找到秋白的坟，谢觉哉亲手把秋白遗骨装在瓦罐，带回北京。安葬在八宝山。

得甚至难以振作精神执笔写字，他们含悲忍痛跟茅盾、郑振铎商量出版秋白遗作。鲁迅说：“人已经不在了，但他的著作、他的思想要传下去，不能泯灭了。”鲁迅扶病为之整理遗稿，编辑以至校对。①1936年5月编成《上海述林》上卷的纸型铸成，鲁迅托友人内山完造运往日本印刷装订。这月下旬鲁迅病危，仍不忘下卷的校对事，托许广平代校。8月初，病稍有转机，又坚持校，至9月30日校毕。10月2日下午《海上述林》寄至，鲁迅亲自分送，等不到下卷出版，19日，鲁迅也赴天国与挚友秋白相会了。他可自豪地对战友说，你的书署名“S.T.R”——秋白笔名“史铁儿”拉丁化拼音缩写，以“诸夏怀霜社”名义出版了。诸夏就是华夏，指整个华夏民族，寓意全中国，怀霜，就是怀念阿双（秋白奶名）。诸夏怀霜，就是全中国整个中华民族都怀念着秋白啊！

秋白到天国去休息了，就在他步入天国的一霎那，他还盘腿坐在一片草坪中间，仪态从容自如，面带微笑迎接“永久的休息”，留下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形象，留下了一座美的丰碑。在长汀罗汉岭下，高达30米的瞿秋白烈士纪念碑上，刻着这样的碑文：“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整个生命的瞿秋白烈士永垂不朽！”这碑树立在长汀，也树立在亿万人民心里，千秋万代，万代千秋。

听！中华大地分明还回响着秋白的歌声：“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历史不管出现什么曲折，“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①不久，杨之华去苏联，编印秋白遗著，实际上由鲁迅承担。解放后，杨之华任全国总工会主席团委员兼女工部部长和全国妇联副主席，1963年在洪久成同志帮助下完成《回忆秋白》书稿。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书稿未能出版，1973年她被林彪、康生、“四人帮”一伙迫害致死，直到1984年她的遗稿才出版。如今她和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尚健在。

后 记

多少年，秋白一直作为优秀党员的楷模活在我心里。那是50年代末，在大学参与撰写《左联时期无产阶级文学》一书时，接触到秋白的一些诗文，自此，这位情操高尚的共产党人形象，就深深印在我脑海中。在“史无前例”的岁月里，一片讨翼声中，我看到了《多余的话》。它反而使我感到与秋白更贴近了。他是那样严于律己，胸怀袒露，是位真正的人。他曾叱咤风云，也有人间悲欢喜乐。他不是仰视才见的“神人”，而是可以而且也能够学的伟人。

1979年以来，为《现代作家作品百题》等五本著作撰稿时，涉及秋白的专题。多次去秋白故居，广泛收集陈云、李维汉、茅盾、冯雪峰、许广平、杨之华等对秋白的回忆资料，拜访秋白挚友羊收之，请教前辈王士菁等过程中，秋白的形象越来越鲜明：清瘦的面庞上架着一副深度金边近视眼镜，秋风吹拂着他那俊美的头发，他是“书生”，又是杰出的政治家，文弱而又内含无穷的力量，柔情而又坚定，朴实而又才气非凡。这美好而典范的共产党人的理想、言行激励着我。在温济泽、王铁仙、陈铁健、王观泉、冒焯等挚友宣传秋白精神启发下，望着案头可汇成专集的自己发表的研究秋白系列论文，萌生了进而写秋白专题论著的念头。从多侧面对党的早期领袖秋白作专论，这是严肃而艰巨的工作，深知力不从心，但先烈的忠魂时时催我努力，又得到革命前辈曹瑛、专家朱正等的指点，同行王保林、钱瓌之、王海磷等的鼓舞，历时数载，几易书稿，终于写成《瞿秋白论》。时逢学术著作出版难，为求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决定加写秋白短暂壮丽的曲折人生，把秋白的理论与人物的“心的历程”、斗争历史交织起

来。这不得不大返工，重赴常州，走萧山，会秋白爱人妹妹杨之英，访秋白女儿瞿独伊。“萧萧木叶石城秋”，沥沥秋雨成书难。其中艰难真令人感慨万端。幸得南京建筑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实验工厂，爱国企业家杨克平先生给予真诚而有力的支持。此外，吾妻刘桂琴及小女更全力相助。思之夜不能寐，披衣伏案爬“格子”，寒暑两春秋，改成《优秀共产党员——瞿秋白评传》。最后，几经周折，实际缩写成：瞿秋白专题评传。

定稿一年多后得以出版，得感谢注重社会效益的河海大学出版社何定达、吴劭文等同志，感谢南京教育学院领导的支持，感谢付出辛劳的南京人民印刷厂工人，感谢在设计、印刷发行等环节上帮忙的陈孝兴、贾德祥、毛积源、杨阳、赵同等同志。封面秋白头像请杨阳所画，他作了无私的奉献。世上毕竟好人多，有乐意助人的人，心灵高尚的人。另外，为使本书体现瞿秋白研究的新水平，反映中共党史早期阶段研究的新成果，曾吸取或引用了景唐、汤淑敏、王明堂、刘福勤、吴奔星、丁守和、叶心瑜等学者著述，除大多在书中注出外，这里也表示感谢。撰写此书时曾力图对秋白的革命理论、哲学思想、文艺与语言理论、精神文明观、诗文创作做“立体工程”探析，在党史、现代文化史广阔的背景上，考察其贡献和历史地位，并把这种专论和描述他那坎坷而带有悲壮色彩的人生结合起来，以确凿史实为据既透视那特定的历史时代，又多少表现一些他那政治理论家兼“文人”的个性。能否如此，实难把握，有待专家、同行批评指正。更希望全而科学大部头的瞿秋白评传问世。

再次鸣谢南京建筑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实验工厂！

鸣谢香港环宇企业公司总经理杨克平先生！

鸣谢河海大学出版社！

叶楠1990秋于南京秦淮河畔寓所。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瞿秋白评传

作者 =

页数 = 2 4 5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